

学校代码: 10475
学 号: 104752060024

河南大学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

宋代外交思想研究

Research on the Diplomatic Thought of Sung

专 业 名 称: 中国古代史
专 业 代 码: 060106
研 究 方 向: 宋史
年 级: 二〇〇六级
研 究 生 姓 名: 张云箐
导 师 姓 名、 职 称: 苗书梅 教授
完 成 日 期: 二〇一〇年四月
论 文 主 题 词: 宋代/外交思想/形成/演变/
特点/类型

关于学位论文独立完成和内容创新的声明

本人向河南大学提出博士学位申请。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的，对所研究的课题有创造性的见解。据我所知，除文中特别加以说明、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括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括其他人为获得任何教育、科研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事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申请人（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张云等

2010年6月9日

关于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授权书

本人经河南大学审核批准授予博士学位。作为学位论文的作者，本人完全了解并同意河南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要求，即河南大学有权向国家图书馆、科研信息机构、数据收集机构和本校图书馆等提供学位论文（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本）以供公众检索、查阅。本人授权河南大学出于宣扬、展览学校学术发展和进行学术交流等目的，可以采取影印、缩印、扫描和拷贝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本）。

（涉及保密内容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获得者（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张云等

2010年6月9日

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签名：苗书楠

2010年6月9日

摘 要

10-13 世纪东亚政治格局存在着剧烈动荡与变化, 格局的“主角”此消彼长, 10-11 世纪的大国是辽、北宋, 12 世纪初随着辽、北宋国力相继消弱, 金成了主导东亚政治格局发展的主要力量, 随着金的力量从顶峰迅速衰落, 至 12 世纪下半期东亚格局中形成了南宋与金对峙的局面; 1234 年金亡后, 蒙古(元)又成了主宰这一区域的“主角”, 东亚政治格局的变动决定着两宋的外交。

以东亚政治格局的变化与重大事件发生为主要依据, 宋代外交思想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 宋太祖、太宗时期(960 年-997 年), 宋代外交思想初步形成; 第二个时期: 真宗即位至宣和二年(997 年—1120 年)宋金订立“海上之盟”。“澶渊之盟”后, 宋的外交思想主线是以宋、辽关系为基轴, 大国和平相处的思想。1038 年西夏建国, 开始侵扰宋边境, 成为困扰宋外交的一个重要问题, 宋对西夏的外交思想较为复杂, 一方面是宋对西夏积极防御, 以夷制夷, 保证宋边境安定的思想; 另一方面也有着主动进攻, 包制西夏的思想。第三个时期: 从“海上之盟”至绍兴和议(1120 年—1141 年), 宋金联合攻辽, 宋辽和平关系崩溃。金对宋入侵, 宋廷投降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第四个时期: 从绍兴和议至端平元年金亡(1141 年—1234 年)。宋金对峙, 宋投降主义思想与现实主义的抵抗思想在冲突中发展。第五个时期: 从端平二年蒙古军入侵宋至宋亡((1235 年—1279 年)。蒙古军队大举南下, 宋军先是进行了英勇抵抗, 后来一溃千里, 投降主义思想逐渐又在宋廷中占主流。

宋朝外交思想突出表现为以下四个主要特点, 一是“守内虚外”, 消极被动的特点; 二是积极谋求和平的特点; 三重视道德感化的特点; 四是在强敌面前妥协退让, 求和投降的特点。这些特点渗透于宋的外交思想中, 长期指导着宋的外交政策, 且影响深远。

宋朝外交思想主要分为以下四个主要类型, 一是以范仲淹、王安石、李纲、岳飞等为代表, 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积极防御、主动出击、英勇抵抗外来入侵的现实主义思想; 二是以宋代听政皇后、司马光等为代表的因循守旧, 闭关自守、崇尚中庸的保守主义思想; 三是以宋徽宗、童贯等人为代表的脱离现实, 不注

重实际力量，盲目乐观，夸大儒家思想中道德力量的理想主义思想；四是以宋钦宗、秦桧、贾似道等为代表的背弃国家根本利益，软弱妥协，放弃抵抗的投降主义思想。

宋代继承发展了前代的外交思想，和平是宋代外交思想的首要追求目标，以“王道”思想作为维护朝贡体系和平的主要手段，宋王朝成为东亚政治格局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因循守旧的保守主义、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使宋王朝在国内经济实力下降、国内矛盾尖锐、在军事力量敌强我弱的前提下，其外交思想最终堕落为逃跑乞和的投降主义。

关键词：宋代；外交思想；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保守主义；投降主义；

ABSTRACT

There were the upheaval and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East Asia on the 10th-13th century .The key role of pattern varied, Kitan Liao and Sung was the large country on 10th-11th century, but they all weakened at the early 12th century .Jin became the main force who le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East Asia, when the power of Jin declined rapidly from peak, the situation was the state of confrontations between the South Sung and Jin in the East Asian by the end of 12th century, then Mongol (Yuan) became the master of this region after Jin destroyed in 1234 .It determined the diplomacy of Sung that the politic pattern developed in the East Asian

The diplomacy thought of Sung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periods that based on political structure change and the major incidents in the East Asia .The first period: Emperor Sung_ Taizu and Sung_ Taizong period (960 -997), it was the initially age of the diplomatic thought;the second period: from Emperor Sung_ zhenzong ascend to contract “the Union of sea” at the second year of xuanhe (997-1120), the main line of the diplomatic thought of Sung was that the large country had the peaceful .After the covenant of Shan-yüan, this peace based on the axis of Sung and Kitan Liao relations. It was known as Xia build in 1038 , Xia started intrusion the border of Sung, it were the important trouble issues to Sung, so the diplomatic thought of Sung was more complex , on the one hand ,the army of Sung defended actively to Xia in order to ensure their border stability ; on the other hand , they want to attack and defeat xia; the third period: from “the Union of sea” to contract the treaty of Shaoxing (1120 -1141), the peaceful relations collapsed because the joint of Sung and Jin attack to Liao , Jin invasion Sung followed. The thought of surrender was dominant in the thought of Sung dynasty; the fourth period: from the treaty of Shaoxing to the Jin perished at the first year of duanping (1141 -1234). The situation was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Sung and Jin . It wa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hought of surrender and realism in the foreign ideas of Sung;the fifth Period: from the Mongolia massive the south to the south Sung destructed(1235 -1279), the army of Sung had a heroic resistant as soon as the army of Mongol intruded to Sung ,but then Sung collapsed. The capitulationism ideas gradually again was the mainstream thought.

There were four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ng diplomatic thought.Firstly, it had strengthening the internal defense while weakening the external one,as well, negative and passive on the foreign ideas;Secondly, it was the feature of pursuing peace actively;Thirdly, the pay attention to the moral influence on other country;lastly ,it had features of the concession and begging for surrender to powerful enemy. These features permeated the diplomatic thought of Sung, guide the policy of Sung foreign on the long-term, and had the imperfection of far-reaching.

The diplomatic thought of Sung mainly include four types, one was delegate as Fan-Zhongyan, Wang-Anshi, Li-Gang,Yue-Fei, they protected the country's advantage stoutly, defended actively, took the offensive, resisted the foreign aggression valiantly, they were the realistic thought; the second was delegate such as power queen and Si-Maguang, they had the thought of conservatism, consequence and

advocate via media. The third was as delegate as Sung-huizong and Tong-Guan, they had the idealism thought of divorced from reality, they didn't pay attention to reality power, optimistic naively, exaggerated the moral power of Confucius. The fourth was delegate as Sung-Qinzong, Qin-Hui, Jia-Sidao, they had the capitulationism thought who deserted the country's basic interests, weakness and compromise, gave up resist.

The government of Sung succeeded and developed the diplomatic of the previous one, hankering peace was the chiefly object of Sung diplomatic thought, vindicated the peace of fjam system by Wang-Dao thought, Sung Dynasty became the important power in the East Asia's politics order. But because of the conservatism and idealism thoughts, Sung Dynasty diplomatic thought fall into capitulationism and begging for peace while they were economy descend, civil contradiction quickness, weak of military strength.

Key Words: Sung Dynasty; Diplomatic Thought; Formation;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 Type;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I
绪 论	1
一、宋代外交思想的研究状况	1
二、选题意义与价值	9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12
四、创新之处	13
五、相关的基本概念	14
第一章 宋代外交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18
第一节 10-13 世纪东亚政治格局及其对宋王朝外交的影响	18
第二节 宋王朝建构的朝贡体系	32
第二章 宋代外交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38
第一节 宋代外交思想的分期	38
第二节 宋代外交思想的形成	40
第三节 宋朝外交思想的发展	43
第三章 宋朝外交思想的主要特点及类型	57
第一节 “守内虚外”，消极被动的特点	57
第二节 积极谋求和平的特点	59
第三节 行“王道”，重视道德感化的特点	64
第四节 对强敌妥协退让、乞求投降的特点	67
第五节 宋代外交思想的主要类型	71
第四章 宋代现实主义外交思想	73
第一节 范仲淹积极防御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	73
第二节 王安石“兼制四夷”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	84
第三节 李纲反对投降、坚决抵抗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	98
第五章 北宋保守主义外交思想	108
第一节 北宋临朝听政皇太后的保守主义外交思想	108
第二节 张洎“防守勿攻，敌去勿追”的保守主义外交思想	119
第三节 司马光的保守主义外交思想	127
第六章 宋代理想主义外交思想	137
第一节 宋徽宗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及转变	137
第二节 童贯联金灭辽，和平收复燕云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	145
第七章 宋代投降主义的外交思想	153
第一节 宋高宗的投降主义外交思想	153
第二节 秦桧“屈己救国”“绝意求和”的投降主义外交思想	162
第三节 贾似道的投降主义外交思想	171
结 论	178

参考文献.....	181
附录 1:	194
附录 2:	196
后记.....	203

绪 论

一、宋代外交思想的研究状况

中国古代历史连绵持续了几千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文明，在这个文明体系中，宋代无疑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宋代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很多人给予宋代以极高的评价。元代赵汭和郝经都把宋与汉、唐相比，称之为“后三代”。现代史学家邓广铭先生认为：“两宋时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²但是宋代在经济快速发展，科技不断进步的同时，还给人们以“积贫积弱”的印象，这种印象很大部分来源于宋朝在军事上的失败与外交中的软弱，特别是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的无奈与惨烈。

思想是指思辨能力³，亦称“观念”，即理性认识⁴，是思维活动的结果。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思想可以是系统性的，也可以是零碎的、不成系统的一些观念、想法。外交思想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外交思想是指人们对外交的想法，包括统治集团对外思想与民间对外部世界的观念。狭义的外交思想特指处于执政地位的对外思想，可以来自政治家的思想，包括一个国家领导者的思想，也可以来自思想家与外交家的思想。外交思想一般具有现实性，即明确的利益观和权力观；连续性，也就是有着历史的长期合理性；阶段性，不同阶段有着不同侧重点；

在宋代对外关系研究中，研究宋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著作较多，如宋与辽、夏、金之间的关系，这些论著大多数都长于对历史史料与历史事实的研究，涉及思想方面的不多，研究宋代外交思想的论文较少。外交思想主要是受到历史文化特性、国家实力、统治者个人因素等方面的影响。因此，有关宋代的文化、国家实力、对外关系等研究对于本文研究有着参考作用，下面我将这些相关成果，做简要回

¹ 黎虎先生在《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前言中关于古典外交与现代外交的区别，对中国古代基本的外交格局和体系进行了划分。本文的“外交”概念不受当今政治版图和狭义外交定义的限制，是在认同古典外交及其格局体系的基础上之外交。

² 邓广铭：《谈谈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 年第 2 期。

³ 辞源修订组：《辞源》，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1111 页。

⁴ 夏征农等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837 页。



顾。

民国时期，宋代对外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宋代外患、宋辽、宋金的战争，以及各种途径的救国斗争。代表性著作主要有：张荫麟《南宋亡国史补》¹，《北宋的外患与变法》²，作者研究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宋灭亡的原因，他的《宋太祖誓牌及政事堂刻石考》³，对宋之立国思想的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陈乐素《宋徽宗谋燕云之失败》⁴，详细论述了宋徽宗为复燕云所做的外交、军事上的努力及其失败；聂崇岐《宋辽交聘考》⁵是中国第一篇研究宋辽之间交聘制度的论文，详细考察了宋辽交聘的礼仪与时间；谢诒徵《宋之外交》⁶，是第一部以外交命名的断代史专著，阐述了宋代外交的政策，评述了宋对外关系中的重大事件；王桐龄《宋辽关系》⁷，是近代第一部详细论述宋辽关系的专著。这一时期研究宋与周边政权外交的成果颇丰，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处于抗日战争时期，面临着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激起学者从历史中去研究与探寻拯救国家的出路与斗争，去歌颂民族英雄的事迹，以鼓励国人坚持抗战的决心。

50年代至70年代，宋代对外关系研究。这一时期学者们主要对宋金、宋辽、宋夏关系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研究。

（一）大陆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50年代至70年代，学者们主要对宋金、宋辽战争及其战争中涌现的英雄人物进行了研究，其中重要的著作有：邓广铭《岳飞传》⁸全面阐述了有关岳飞事迹的史籍优劣和可信程度，并详细分析了宋、金双方的形势；沈起炜的《宋金战争史略》⁹论述了持续110年的宋、金两国战争史；何竹淇《岳飞抗金史略》¹⁰对岳飞的抗金思想提供了史料基础。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陆宋史研究相对沉寂，而这一时期台湾学者对宋辽、金关系研究成

¹ 张云台：《张荫麟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² 张云台：《张荫麟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³ 张荫麟：《宋太祖誓牌及政事堂刻石考》，载《文史杂志》，1942年1卷7期。

⁴ 陈乐素：《宋徽宗谋燕云之失败》，载《辅仁杂志》，1933年第4卷1期。

⁵ 聂崇岐：《宋辽交聘考》，载《燕京学报》1940年第27期，后来收入《宋史丛考》（上）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⁶ 谢诒徵：《宋之外交》，上海大东书局1935年版。

⁷ 王桐龄：《宋辽之关系》，载《清华学报》1927年4卷2期。

⁸ 邓广铭生前的三版《岳飞传》有较大的改动，第一版《岳飞传》由三联书店出版于1955年，第二版的《岳飞传》由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比前者更多地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干扰。在此基础上他又进行了修改，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了《岳飞传》增订本。

⁹ 沈起炜：《宋金战争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¹⁰ 何竹淇：《岳飞抗金史略》，三联书店1959年版。

果众多。

(二) 台湾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这一时期,台湾学者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姚从吾《东北史论丛》¹,作者对匈奴与西汉争夺东亚霸权进行了深入地思考,指出了辽金疆域沿革与地理因素对当时政治文化的影响;陶晋生《宋辽间的平等外交关系》²分析了澶渊盟约的缔订及其影响,论述了澶渊盟约缔结前后宋真宗对辽的外交思想,作者认为宋辽双方在澶渊之盟中互有所得,体现了一种平等外交关系;傅乐焕《宋辽聘使表稿》³,对宋辽交聘的制度、宋辽交聘的详细时间,交聘时所带物品做了详尽地考述;余又荪《宋元中日关系史》⁴,阐述了宋元时期中国与日本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主要关系;赵铁寒《宋金海上之盟始末记》⁵,详细研究了宋金海上之盟的史料及过程;王民信《辽宋澶渊之盟缔结的背景》⁶,对辽宋澶渊之盟之前,辽、宋双方的政治状况、军事力量及双方关系的发展进行了研究;蒋复璁《宋真宗与澶渊之盟》⁷,对宋真宗在澶渊之盟中的决策与心里活动进行了研究。除此之外,还有王止歧《南宋与金蒙二国》⁸,阎镐曾《宋夏关系研究》⁹等。

1980年代以后的宋代对外关系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是宋史研究发展的重要阶段,宋史界人才辈出,新研究方法的使用与新领域的开拓,推动了宋史领域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研究视野。主要研究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宋辽、宋夏、宋金关系的研究。赵永春《金宋关系史研究》¹⁰,《金宋关系史》¹¹,两本书对金、宋关系与宋金战争的主线、宋金关系的主流、战争的性质、宋金和战的人物进行了研究,在研究中得出了金宋关系的主流是和平的结

¹ 姚从吾:《东北史论丛》,台湾中正书局1959年版。

² 陶晋生:《宋辽间的平等外交关系》,载《沈刚伯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台湾食货出版社1976年版。

³ 傅乐焕:《宋辽聘使表稿》,载《史语所集刊》,1949年第14本,后又收录至《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

⁴ 余又荪:《宋元中日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⁵ 赵铁寒:《宋金海上之盟始末记》(上、中、下),载《大陆杂志》,1962年5-7期。

⁶ 王民信:《辽宋澶渊之盟缔结的背景》,载《书目季刊》,1975年第9期。

⁷ 蒋复璁:《宋真宗与澶渊之盟》,(上、中、下),载《大陆杂志》,1961年8-10期。

⁸ 王止歧:《南宋与金蒙二国》,载《醒狮》,1973年第10期。

⁹ 阎镐曾:《宋夏关系研究》,载《政大学报》,1964年5月。

¹⁰ 赵永春:《金宋关系史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¹¹ 赵永春:《金宋关系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论；吴天墀的《西夏史稿》¹，论述了西夏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对宋、夏关系进行了分析；李华瑞的《宋夏关系史》²，研究了宋不同时期对西夏关系的不同政策。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有影响的论文，王煦华、金永高《宋辽和战关系的几个问题》³、朱筱新《评辽在夏宋关系中的作用》⁴、任爱君《辽宋对峙格局破灭的文化意义》⁵、陶玉坤《辽宋和盟状态下的政治对抗》⁶、程兆奇《略论宋代的“恢复”情结》⁷、刘建丽《北宋御边政策的调整》⁸、《西夏与辽朝关系述论》⁹、徐红年《论辽宋战争性质》¹⁰、李卫东《欧阳修与北宋边事》¹¹、苗波《试论辽王朝的外交政策》¹²等，这些论文都为研究宋代外交思想提供了基础。

二是对交聘、外交制度与政策的研究。八十年代后，又有许多学者深入研究了宋辽、宋金的交聘制度。贾玉英《宋辽交聘制度论略》¹³，阐述了宋辽交聘制度的确立与演变过程，分析了宋辽交聘制度的组织结构及其职能，并对宋辽交聘使节的类别进行了详细划分。宋金交聘制度的论述还有赵永春《宋金交聘制度述论》¹⁴对宋金交聘使之名称、使命及其聘使往来之贡献作出了综合性论述；复旦大学的李辉在其博士论文《宋金交聘制度研究》¹⁵对宋金交聘的背景、南宋聘使制度、南宋国信使群体及其相关史料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吴晓萍《宋代外交制度史》¹⁶一书探讨了宋代外交制度的产生、发展、变化及影响；河南大学 2001 届研究生刘秀荣在其硕士论文《宋代外交使节略论》¹⁷中，对宋代使节的选任制度与管理制 度，以及在经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还有一些论文，如陶玉坤

¹ 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²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³ 王煦华、金永高《宋辽和战关系的几个问题》，载《文史》，1980 年第 9 期。

⁴ 朱筱新：《评辽在夏宋关系中的作用》，载《宁夏大学学报》，1988 年第 1 期。

⁵ 任爱君：《辽宋对峙格局破灭的文化意义》，载《北方文物》，1996 年第 3 期。

⁶ 陶玉坤：《辽宋和盟状态下的政治对抗》，载《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 年第 1 期。

⁷ 程兆奇：《略论宋代的“恢复”情结》，载《史林》，2001 年第 3 期。

⁸ 刘建丽：《北宋御边政策的调整》，载《甘肃社会科学》，2000 年第 3 期。

⁹ 刘建丽：《西夏与辽朝关系述论》，载《辽宁大学学报》，2005 年第 2 期。

¹⁰ 徐红年：《论辽宋战争性质》，载《北京社会科学》，1994 年第 1 期。

¹¹ 李卫东《欧阳修与北宋边事》，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9 年第 4 期。

¹² 苗波：《试论辽王朝的外交政策》，载《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3 年第 1 期。

¹³ 贾玉英：《宋辽交聘制度论略》，载《中州学刊》，2005 年第 6 期。

¹⁴ 赵永春：《宋金交聘制度述论》，载《金宋关系史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¹⁵ 李辉：《宋金交聘制度研究》，复旦大学 2005 届博士学位论文，www.cnki.net.

¹⁶ 吴晓萍：《宋代外交制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¹⁷ 刘秀荣：《宋代外交使节略论》，河南大学 2001 届硕士学位论文，www.cnki.net.

《辽宋对峙中的使节往还》¹，崔岩勤《试析辽圣宗的对外政策》²，李慧娟《苏颂与北宋的对外关系》³等，都对宋代外交思想提供了启示性的分析。

三是对宋与辽夏金之外政权的交往。在中国对外关系通史的研究中，包括了宋代对外的政治文化交流，著作有张维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⁴、芦苇《中外关系史》⁵、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⁶，陈玉龙《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⁷等。在古代东南亚史研究中有，陈智超《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⁸、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⁹、张奕善《东南亚史》¹⁰(上、下册)等等。在古代东亚关系研究中有，汪高鑫、程仁桃《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¹¹，汪向荣《古代中日关系史话》¹²，王勇《中日关系史考》¹³，陈尚胜《中韩关系史论》¹⁴、杨通方《中韩古代关系史论》¹⁵等，虽然这些通史对宋代涉及的内容不是很多，但将有助于考察宋代外交思想的根源及其后世对其的继承关系。除通史外，还有研究宋代与高丽、交趾、回鹘、大理等政权关系的论著，段玉明《大理国史》¹⁶全面论述了大理国的历史及其对外交往。近几年宋与越南、大理、日本、高丽关系研究的论文较多，如暨南大学2004届博士生邓昌友的论文《越南与宋朝关系研究》¹⁷，论文阐述了北宋与相丁氏、黎氏、李氏王朝的关系，南宋与交趾的关系，占城在双方交流中的地位，宋朝与越南经济文化交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研究宋与其他国家关系的论文，如李富森、董利江《宋朝与交趾的朝贡贸易》¹⁸、胡绍华《论宋朝以大理国为外藩的原因》¹、《大理国与宋朝关系新探》

¹ 陶玉坤：《辽宋对峙中的使节往还》，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² 崔岩勤：《试析辽圣宗的对外政策》，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³ 李慧娟：《苏颂与北宋的对外关系》，载《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⁴ 张维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⁵ 芦苇：《中外关系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⁶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⁷ 陈玉龙：《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⁸ 陈智超等：《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⁹ 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¹⁰ 张奕善：《东南亚史》，台湾编译馆1982年版。

¹¹ 汪高鑫、程仁桃：《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¹² 汪向荣：《古代中日关系史话》，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

¹³ 王勇：《中日关系史考》，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

¹⁴ 陈尚胜：《中韩关系史论》，齐鲁书社1997年版。

¹⁵ 杨通方：《中韩古代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¹⁶ 段玉明：《大理国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¹⁷ 邓昌友：《越南与宋朝关系研究》，暨南大学2005届博士学位论文，www.cnki.net。

¹⁸ 李富森、董利江：《宋朝与交趾的朝贡贸易》，载《新乡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²、梁利《从“联丽制辽”到“联金灭辽”》³、陈尚胜《宋朝和丽日两国的民间交往与汉文化传播》⁴、何晓芳《论程朱理学对朝鲜王朝的影响及作用》⁵等等，这些论文的中心多数仍然是宋的对外关系，侧重于思想研究的不多。

四是对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宋代外交思想与宋代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俯瞰宋代文化全局的专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出现，有姚瀛艇《宋代文化史》⁶，论述了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各种因素，阐述了新儒学的形成及影响；杨渭生《两宋文化史研究》⁷，论述了宋代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文化，特别强调宋王朝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从文化交流方面考察了国际文化交流，从宋代哲学的特点入手分析了宋代文化；陈植锷的《北宋文化史述论》⁸，深入地探讨了宋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宋学的发展及其诸阶段，提示了宋学的主题及影响；李泽厚⁹《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用大量的篇幅阐述了宋的儒学、程朱理学的发展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¹⁰，在第十七章中，论述了北宋政治调整与强化王权的政治思想，论述了两宋理学与功利学派的政治思想。

五是台湾学者相关的成果。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¹¹，剖析了宋辽关系中相关史实的真伪，论述了宋辽关系的历史背景，辽对宋政策与贸易，北宋庆历改革前后的外交政策，北宋朝野人士对契丹的看法，王安石的对辽政策，并对北宋联金灭辽政策进行了评估。他还在论文《宋、高丽与辽的三角关系：十至十一世纪》¹²阐述了宋、高丽与辽的政治文化交流，及其关系的互动；王民信《赵宋

¹ 胡绍华：《论宋朝以大理国为外藩的原因》，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² 胡绍华：《大理国与宋朝关系新探》，载《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2期。

³ 梁利：《从“联丽制辽”到“联金灭辽”》，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⁴ 陈尚胜：《宋朝和丽日两国的民间交往与汉文化传播》，载《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冬之卷。

⁵ 何晓芳：《论程朱理学对朝鲜王朝的影响及作用》，载《满族研究》，2001年第2期。

⁶ 姚瀛艇：《宋代文化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⁷ 杨渭生：《两宋文化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⁸ 陈植锷：《北宋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⁹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¹⁰ 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¹¹ 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3版。

¹² 陶晋生：《宋、高丽与辽的三角关系：十至十一世纪》，载《中韩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918—1146）》，台北韩国研究学会1983年。

与王氏高丽及日本的关系》¹，论述了宋与王氏高丽两国关系的渊源，从太宗伐辽时，王氏高丽“依违不从”，到契丹起兵，王氏高丽背离宋，后来又在辽的逼迫下，怀德朝宋等内容；廖隆盛《北宋对西夏的和市驭边政策》²，阐述了北宋运用经济手段，对宋夏关系进行调节的观点；黄宽重《南宋与高丽的关系》³ 提出宋朝和高丽之间具有实质性外交关系，南宋辽金之间有正式的榷场贸易，同时也存在走私贸易，两者间有互补性，南宋与高丽双方在政治文化中相互影响；梁庚尧《南宋对金的岁币外交》⁴认为如果南宋不对金进行岁币外交，可能会面临着覆灭的危险，岁币外交促进南宋王朝经济得到发展，但也造成了南宋王朝的积弱不振的局面。除此之外，还有王明荪《宋代的内外关系》⁵，王民信《宋夏金钱外交》⁶，蒋武雄《宋辽岁币外交与国运之关系》⁷等。

六是国外的相关成果。日本一些宋代政治文化方面研究的成果，对宋代外交思想的探索有一定的启示。如稻叶一郎《司马光的政治思想》⁸、有田颖右《朱子的国家哲学》⁹、松川健二《宋明的思想》¹⁰，土田健次郎《苏轼的思想轮廓》¹¹，藤井京美《王安石伯夷论考》¹²等。西岛定生《东亚世界与册封体制》¹³研究了以宋代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册封体制；金成奎的《宋代的西北问题与民族政策》¹⁴，对宋与辽、金关系及其民族政策进行了研究。衣川强《两宋王朝的国际关系》¹⁵，阐述了两宋时期对外交往的主要国家与交往的形；池田温的《东亚的文化交

¹ 王民信《赵氏与王氏高丽及日本的关系》，台湾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² 廖隆盛《北宋对西夏的和市驭边政策》大陆杂志，1981 年第 4 期。

³ 黄宽重：《南宋与高丽的关系》，载《中韩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918—1146）》，台北韩国研究学会 1983 年版。

⁴ 梁庚尧：《南宋对金的岁币外交》，载《历史月刊》，1992 年总第 56 期。

⁵ 王明荪：《宋代的内外关系》载《宋史教学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出版发行 1993 年。

⁶ 王民信：《宋夏金钱外交》，载《历史月刊》，1992 年总第 56 期。

⁷ 蒋武雄：《宋辽岁币外交与国运之关系》，载《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82 年 15 卷 8 期。

⁸（日）稻叶一郎：《司马光的政治思想》，法律文化社 1995 年版。

⁹（日）有田颖右：《朱子的国家哲学》，千里山文学论集，関西大学 1983 年版。

¹⁰（日）松川健二：《宋明的思想》，载《二松学舍大学人文论丛》，1999 年总 63 期。

¹¹（日）土田健次郎：《苏轼的思想轮廓》，中国社会文化学会 1997 年版。

¹²（日）藤井京美：《王安石伯夷论考》，载《日本中国学会报》，1994 年总 46 期。

¹³ 西岛定生：《东亚世界与册封体制》，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二卷，岩波书店 1962 年版。

¹⁴（日）金成奎：《宋代的西北问题与民族政策》，汲古书院 2000 年版。

¹⁵（日）衣川强：《两宋王朝的国际关系》，载《宋元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汲古书院 1996 年版。

流史》¹，研究了东亚文化与思想交流的主要问题。

其他国家的研究者，也对中国的古代外交进行了研究。印度G. K. Moorkerjee《外交：理论与历史》(Diplomacy: Theory and History)²，此书第一章中讲述了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着重介绍了中国古代的朝贡外交。外交通史的研究有前苏联B. H. 波将金等编著的《外交史》³；美国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⁴，重点研究了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对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事件进行了评述，并对中国的霸权传统进行了种种臆测。德国傅海波、英国崔瑞德等编著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⁵，全书共分为九章，前三章分别撰写了辽、西夏、金朝的建立及重大事件，后六章撰写了元朝的统治，用西方的视角对几个王朝的地位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傅海波另一著作《宋朝(960-1276年)的外交使臣》⁶，阐述了外交使臣的选拔、出行及作用，并对一些著名人物进行了分析研究。美国怀特·德维《十一世纪中国由战争到外交平等：宋朝对辽的外交关系》⁷，详细探讨中世纪中国与辽的战争，论述了宋辽外交的背景，1004年的宋辽战争的经过，澶渊和议订立的过程，特别是对宋辽间的外交形式、外交文书进行了研究（具体书目章节见附录1）。美国莫里斯·罗沙比的《同等国家中的中国：10-14世纪的中国及邻国》⁸，收录了王赓武、陶晋生、米歇尔·罗杰斯等十一位学者的论文，在西方汉学界有着一定的影响，这些论文内容非常广泛，勾画出了10—11世纪北部亚洲多国制的体系。（具体书目章节见附录2）

七是政治学理论的相关成果。一些政治学理论也将为宋代外交思想提供理论基础，如尼科松《外交学》⁹、摩根索《国家间政治》¹⁰、沃尔兹《人类、国家和

¹（日）池田温：《东亚的文化交流史》，吉川弘文馆2002年版。

² G. K. Moorkerjee. *Diplomacy: Theory and History*, Volume 1, Trimurti Publications, 1973.

³（苏）B. H. 波将金等：《外交史》，三联书店1979年版。

⁴ Fairbank, John 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⁵（德）傅海波：《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⁶ Frank, Herbert, *Diplomatic missions of the Sung state, 960-1276*.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1.

⁷ Wright, David Curtis, *From War to Diplomatic Parity in Eleventh Century China: Sung's Foreign Relations With Kitan liao*. Brill, 2005.

⁸ Rossabi, Morris Ed,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⁹（英）哈罗德·尼科松：《外交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¹⁰（美）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战争》¹、赵宝煦《政治学概论》²、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³、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⁴、金应忠与倪世雄合著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⁵、朱建民《外交与外交关系》⁶等。特别是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⁷，论述了春秋战国时期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及其流派，这本书虽然写的不是宋代的问题，但作为我国第一部研究断代外交思想的著作，它把历史学与国际政治理论融合起来，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范式（具体书目章节见附录3）。

八是重要人物研究。本论文后半部分将宋代外交思想按类型进行个案分析，个人的思想研究与人物研究有着很多的联系。一些人物研究的前期成果很多，如王安石、范仲淹、司马光研究他们的专著多达几十部，论文能够达到上千篇。为了更清楚地梳理与本论文相关的人物研究成果，本文把相关人物研究的前期研究成果放入了后面每节人物的个案分析中，进行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二、选题意义与价值

宋代对外关系是宋代政治发展的重要部分。随着宋朝政治经济的发展，与宋王朝有联系的政权很多，庞元英在《文昌杂录》中较为详细地进行了介绍，“东方有四”，“西方有九”，“南方十有五”，另外北方有二，西南有五蕃，⁸从中可以看出与宋朝廷交往的政权有三十五个，但还不能穷尽。《玉海》载宋太祖至宋高宗蕃夷朝贡者有四十三国⁹，其中有许多不包括在上述的三十五国之中，如波斯、大留、六谷、五溪等。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与宋交往的国家有四十余个，其中一些国家与宋距离较远，交通不便，来往不多，宋的主要交往国家仍然是它的邻国。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中叶，辽、北宋、西夏在亚洲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十二世纪中叶，形成了南宋、金对峙格局。两宋立国320多年间，宋一直倾

¹ K.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² 赵宝煦：《政治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³ 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⁴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⁵ 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⁶ 朱建民：《外交与外交关系》，台湾正中书局1978年版。

⁷ 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

⁸ （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862册。

⁹ （宋）王应麟：《玉海》卷153，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816-2817页。

全力与辽、西夏和金、蒙周旋。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研究者在宋代对外关系中比较强调宋朝对北方辽、金、元处于劣势地位。九十年代以后，研究者对北宋的经济、军事、文化的比较研究中，部分学者肯定了北宋与辽朝长期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尤其是宋真宗与辽朝订立“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关系一直处于这种较稳定的状态。南宋与金朝，除宋高宗统治的前十五年外，即“绍兴和议”后的长时期内，双方的实力实际不相上下，很难说谁处优势，谁处劣势。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宋、蒙联军攻灭金朝，蒙古军乘机南下攻宋，南宋军队英勇抵抗，直到1279年南宋亡国。宋廷在这种复杂环境下，其内圣外王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对力量均衡的国家也执行了保守主义的妥协政策。纵观宋代的对外交往，澶渊之盟、宋夏和议、绍兴和议、隆兴和议等，和约不断。这些和议的内容，从始至终贯穿着妥协与退让、甚至屈膝求和的特点，宋政府不得不以屈辱妥协方式换得边境的安宁。正如清人赵翼所说：“是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不和议而亡。”¹

为何经济、文化空前发达的宋代多数时期在对外交往上软弱妥协并最终亡于外族？是什么思想指导着宋对外政策？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有没有其他的外交选择？这些思想多大程度上对一千年后今天的外交思想有着影响？宋对外政策与外交思想关系着宋的生死存亡，成为宋代政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宋代外交思想的变化与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无疑是宋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一环，宋代外交思想的研究也会为我们今天的外交思想提供思考与借鉴。具体来谈，选择这个题目有着以下几重意义：

(一) 探讨宋代外交政策、外交活动背后的思想根源。研究古代王朝的外关关系，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一个热点问题，很多论文以“外交”、“对外交往”、“外交政策”等文字出现。但是宋朝对外关系的传统视点仍就是宋与辽、西夏和金的的关系，主要研究的范围是宋、辽、夏金的国家实力，战争性质、贸易关系及其战争中的重要人物等进行较为深入地研究。近几年来，虽然也有了关于外交制度的一些研究，而关于宋代外交制度的思想渊源的著作、论文却很少见到，更没有宋朝外交思想做出全面论述的专著。

宋朝外交思想的发展有很大变化，也有很多问题值得进行探讨，如“澶渊之

¹ (清)赵翼：《廿二史劄记校证》卷26，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年版，第553页。

盟”订立和约，保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澶渊之盟”对中原王朝的衰败有着什么样的影响？中原王朝在力量均衡的情况下，如果疲于战争就会以“和约”换和平吗？不论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那么隐藏在背后的思想是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答案可以是否定；在什么样情况下，答案可以是肯定。在中国的外交思想中，是不是有着费正清先生所分析的“害怕真正战争”¹的思想倾向？只要遇到外来强敌，在没有外来的支援下，最终的结果就是妥协。再如，在宋代的思想文化领域，经过前所未有的整合，中国传统儒学与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在本土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道教相互排斥、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产生了宋学，宋学继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遗产，吸取了外来文化的理论精华，对宋以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十分巨大，宋学对外交思想有什么影响？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探索我们今天外交思想的根源。

（二）借鉴政治学理论方法，拓宽历史研究视野。历史学曾经是史地一家、文史不分家、政史一家等，与诸多学科没有严格隔阂的，但是在学科细化以后，历史学越来越需要与其他科学对话，宋代政治史研究中也逐渐的构建出超越传统手法的新理论和方法论。只有把历史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相结合，才能拓展宋代历史的研究领域²，这种看法越来越被史学界认同，日本学者平田茂树在回顾日本对宋代政治史研究现状时提出：“仅就当代政治学理论而言，其理论由微观政治学、宏观政治学、国际政治学三个部分构成，因此，要对宋代的政治进行概括性掌握，自然需要引进微观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的手法”³。对宋朝外交思想的研究，是想把政治学理论引入历史研究的一种尝试。

（三）结合中国传统政治的特殊性，创新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中国的古代文明源远流长，但是在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的范畴里，却“失语”了。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发源可以追溯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的外交思想理论，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罗马时期的《费启亚里期法典》，恺撒的《高卢战记》等。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走向成熟，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没有从本土发生、发展，而是以借鉴外来理论为主，这种外来的理论，有时却无法诠释中国传统的外交思想。因此，在近几年来中国政治学界，开始探寻中

¹（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² 邓小南：《近年来宋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9期。

³（日）平田茂树：《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载《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国古代外交思想足迹。对断代史中的外交思想的思考，将有助于为建立中国独特的国际政治理论提供历史借鉴。

（四）揭示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特殊性，为现代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理论阐释。宋代的思想与文化对后世影响深远，如严复认为：“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¹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在外交上提出了一些新概念，如“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等，但是一些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一直心存疑虑，“中国威胁论”依然喧嚣不绝，探索中国古代外交思想也将逐渐修正西方关于中华对外关系的传统主张，以及对现代中国外交中的种种臆测。

基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原因，我想从原始资料出发，对宋代外交思想做出尝试性研究。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本文主要的研究思路如下：

首先在界定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对宋代外交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进行研究，把宋代外交思想分为五个时期，在时间跨度较长的时期中又分为几个小的阶段。希望通过按顺序、分阶段的研究，梳理宋代外交思想的发展过程，总结宋代外交思想的特点与规律性。在研究宋代外交思想发展过程中，把对外交思想的分析与当时国家实力与外交格局相联系，阐明每阶段外交思想的主流。

其次，在研究宋代外交的历史背景与发展过程的基础之上，分析宋代外交的主要特点及类型。突出研究宋代外交中“守内虚外”、“谋求和平”及对强敌妥协投降的特点，这些特点贯穿于宋代三百多年的历史，在宋代外交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最后，按宋代外交类型，进行个案研究。宋代持续三百多年，交往国家四十余个，宋代外交思想非常丰富，我认识到个人力量与学识有限，不可能把宋代所有外交思想全部涉及到，因此，通过总结宋代外交思想的类型，对某一时期内影响大，具有代表性的外交思想进行个案研究。在每个类型中，选择出两至五个人

¹ 严复：《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68页。

物的外交思想进行案例分析。这些人物有的是皇帝、听政的皇后，他们的外交思想直接决定着当时的外交决策。在个案研究中，还选择了某一时期里掌握重要行政权力、军事权力的宰相或重臣，这些人物在历史上有较多的“话语权”，他们的对外思想直接影响着本朝皇帝与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1. 历史比较法。在大量原始材料中选取有效信息，对宋初不同人物与不同阶段外交思想进行横向与纵向比较。通过比较，说明宋代外交思想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分析皇帝、垂帘听政的皇后、朝廷重臣不同层次的人物外交思想的差异性。

2. 逻辑分析法。搜集典型性的个案进行求共同性分析，运用归纳法从众多特殊人物的外交思想中，分析找到它们之间的共同性，继而得出宋代外交思想的基本走向。运用演绎方法来修正和扩大对个别事物的微观认识。

3. 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分析方法就是用辩证法分析具体的矛盾事物，包括了对立统一、质量转化、否定之否定等三种法则；运用辩证法分析宋代外交思想的各种问题，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转移，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考察分析；把宋代外交思想看做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贯彻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

4. 心理分析法，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曾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人的思想动机决定人的行动并改变着历史的面貌，强调历史学家的一项任务就是探求人物的心理和思想。运用心理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与个性特征，无疑能够获得宋代外交思想的深刻认识。

5. 计量法，运用历史材料中的一些数据，定量分析相关变化，把这些变化与宋代外交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说明外交思想的变化轨迹。

此外，论文在写作中力求将微观的考证与宏观的立论有机的结合起来。尽可能地结合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即注重学科之间的整合与渗透。

四、创新之处

（一）把宋代外交放在 10-13 世纪东亚政治格局中进行研究，可以宏观把握

宋代外交及外交思想在东亚政治格局演变中的发展、变化。宋王朝在东亚政治格局中，不是唯一的政治中心，10-11世纪的辽与北宋力量相当，成为格局中的另一力量中心，因此这一时期辽、北宋两个大国的关系成为格局变化的主导力量。12世纪初金迅速崛起，此后宋与金的力量对比，或占劣势地位，或旗鼓相当，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影响着北宋的外交思想。当金的力量成为格局中的“单极”时，宋的外交思想的主流是投降主义，当金力量下降，金与南宋对峙时，现实主义的抵抗思想与投降主义的求和思想在冲突中发展。

(二) 本文借鉴国际政治学的理论，把宋代外交思想分为四种主要类型，一是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积极防御、英勇抵抗外族侵略的现实主义思想；二是因循守旧，闭关自守、崇尚中庸的保守主义思想；三是脱离现实，认为儒家思想、道德的力量要远比实力重要的理想主义思想，四是背弃国家根本利益，软弱妥协，放弃抵抗的投降主义思想。把宋的外交思想进行分类，这是前人未曾提出的问题。这种分类只是大体上的总结归纳。有时某种类型的思想在一个时期占主流，有时某几种类型思想在争论中发展，从外交思想的分类中，可以梳理外交思想的来源及演变。

(三) 宋代外交思想的研究，从空间上扩展宋代政治思想研究的内容。外交思想属于政治思想的一部分，在宋代政治思想的研究中，重视国内政治思想的研究，而对宋代外交思想的来源、发展、结局的研究较少。

五、相关的基本概念

(一) “外交”的概念。《辞源》中对外交的解释是：“今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交涉为外交”。中国古代外交由原来的人臣私见诸侯或者个人之间的际往来，逐渐转向“对外的交往”。虽然古代没有现代意义的外交，但不等于中国古代没有外交，如果把外交看作是处理一群人和另一群人关系的正常行为，那它早在人类有历史记载以前就存在了。”¹黎虎先生在《汉唐外交制度史》中，阐明了古典外交与现代外交的区别，以及中国古代基本形成了外交格局和体系。“外交”还要确定“内”与“外”的概念。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某一历史阶段属于“外”的民族和地区，在另一历史阶段融合于中华民族之中；一些曾属于“内”

¹ (英) 哈拉德·尼科松：《外交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的民族和地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又以“外”的面目出现。“内”与“外”不仅是相对的，也是在变化中的。如果把古代中国界定为中原统一的王朝，相对宋朝来说，辽、金、西夏都已经不是周边附属的民族政权，而是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能与之长期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在宋代的外交思想中，不但要把它们包括进来，而且还要作为宋代对外思想的主要部分。虽然在今天看来两宋与辽、夏、金的关系与宋朝与高丽、日本、交趾等国的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国内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后者是国与国的关系，但对宋人而言，宋与辽、夏、金的关系和宋与交趾的关系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二)“中国”的概念。“中国”在历史上是一词多义。最初在周代铭文中，“中国”仅指京师。其后，人们又将它作为专指中原地区的地域概念。如《韩非子·孤愤》中说：“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无益于己也。”后来也有一些历史文献则把“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概念，而这种概念又往往成为历代统一的中原王朝的代称。如宋人朱彧《萍州可谈》记：“汉威令行于西北，故戎狄称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¹在本文中使用的“中国”不是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

(三)外交思想与外交政策、外交行动的关系。

外交思想与外交政策密切相关。广义的来讲，外交思想是指人们对外交的想法；外交政策是指政府具体的外交决定、措施等。一方面处于执政地位的外交思想指导、影响着外交政策的制定，民间外交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外交政策；另一方面一些外交思想通过外交活动产生或者体现出来，演化成了外交政策，如古代的“守内虚外”、“以夷制夷”、今天的“一国两制”，既是思想，也是政策。外交思想与外交政策主要有三方面的不同，首先外交思想是以人或集团为中心，包括各种层面思想，可以来自统治的最高层，也可以来自普通阶层的普通个人，而外交政策则是国家层面的。其次，外交思想较为宏观，而外交政策就相对比较具体。如宋庆历年间为了惩罚西夏，一度停止榷场贸易，给本来产品就短缺的西夏施加经济压力。在这里，停止榷场贸易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外交政策。而这个外交政策的出台，正是宋统治阶层产生了以经济手段遏制对手的思想。第三，外交思想可以实施，也可能在实践中并不实施。而外交政策一般都会现实中执行。

¹ (宋)朱彧：《萍洲可谈》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外交思想与外交行动，两者也有着一定的关联性。在外交中，如果执政者形成了一种外交思想，就可能出台一系列的外交政策，而外交行动正是对外交政策的执行。同时，一些外交行动也直接反映了外交思想。如一个强势国家对弱国的入侵，是一种行动，但也反映了强权主义的思想。

（四）四种外交思想类型的界定。

1、现实主义思想。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斯在总结古希腊的历史经验时，认为“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个人之间，利益的一致是最可靠的纽带”，这句总结性的言论成为现实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现实主义思想就是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国际事务是无序的，没有普遍被接受的行为准则，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外交的主要目的，反对把道德置于外交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国家实力才是决定一国在国际社会地位的关键所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为保护自身生存、领土主权和军事安全总要追求权力，为此主张采取一切可能手段包括武力、秘密外交等来实现国家利益。现实主义主张人性本恶，决定了冲突斗争是国际关系重要特征。现实主义理论充分地表现在国家利益至上、以及均势及地缘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中。在宋代外交思想中，现实主义思想主要是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积极防御、适时主动进攻，对外来入侵者坚决抵抗，反对妥协求和等。

2、理想主义。理想主义思想对人性的看法，与现实主义思想是相反的。理想主义认为人性本来是善良的，不是国家拥有强大的实力去维护着国家利益不受外来侵犯，而是道德和理性的忠诚和信义原则起到保障和平的重要作用。理想主义思想认为理想、理性或者说精神至高无上。理想主义思想还具有理想化习惯，倾向于以自我描述的理想状态来解释事物或期望事物采用自己理想的方式去发展。宋代外交思想的理想主义是指把儒家道德思想推之以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以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忠、信、敬等思想处理外交关系，运用道德感化手段树立宋王朝的威望。在国与国交往过程中，永恒的是利益，运用理想主义思想处理国家关系，可能会在短时期里起到一定作用，但长期来看，理想主义思想会遇到现实中的各种挑战，在充满矛盾的现实，理想主义思想也会出现嬗变，或者转向现实主义，或者转向投降主义。

3. 保守主义就是一味的对现状的保持和对传统的固守。宋代保守主义思想是指外交思想中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守内虚外、闭关自守、不思进取、崇尚中

庸。如果遇到外来侵扰，保守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积极进取、主动出击的思想相反，保守主义主张消极防御，只要能够维持现状，就打着“和为贵”的幌子，妥协让步，甚至转向投降主义。

4. 投降主义。投降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如何维护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南辕北辙。当国家利益受到侵犯或外敌入侵的时候，现实主义坚决维护国家利益，而投降主义为了个人私利，贪生怕死，背弃国家根本利益，竭力迎合外来侵略者的利益和需要，反对和破坏反侵略战争，散布亡国论调，对敌人妥协、屈服、投降。

第一章 宋代外交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自国家产生以来,就有了国与国的关系问题,伴随着文明的进步,国家逐渐增多,国与国的关系,自然就从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扩大到三角、四方以至多边关系,形成了某种国家与国家关系的格局或体系。在 10-13 世纪的东亚大陆上,除了汉族为主的中原王朝以外,东北地区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在西北地区有党项族建立的夏国,还有在 12、13 世纪初建国的金、元等,不同国家力量此消彼长,构建了东亚政治格局的发展与演变。这种格局的变化对赵宋王朝的外交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探索 10-13 世纪东亚政治格局,从宏观、整体的视角把握具有内在联系性的东亚世界,对于研究宋代外交及外交思想有着重要意义。

本章主要论述 10-13 世纪东亚政治格局的演变及其对宋王朝外交的影响;以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发展。

第一节 10-13 世纪东亚政治格局及其对宋王朝外交的影响

“东亚”有三种含义:“在地理上是指,亚洲被高山大漠一分为二的东部地区;在人种学上指蒙古人种(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除外)的栖居地;在文化上则指深受中国古代文明影响的地区。”¹在这三种含义中,前二者包含的地域范围最为广泛。本文中的“东亚”指广义的东部亚洲,即阿尔泰山、天山与喜马拉雅山脉以东的地区,这些山脉,形成了中国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和隔绝性,并形成了周边政权对外经济文化联系主要倾向于中原地区的特点。

在 10-13 世纪的四百年中,东部亚洲存在着至少四十余个国家政权及上百个部族、部落,虽然一些地区尚处于前国家社会,但是已经形成的国家中都具有固定的领土、居民、首领,并与邻近国家有着一定的交往,它们形成了东亚政治体系的基本单位。这些国家相互联系,构建了中世纪的东亚政治格局。

格局是各种力量对比与组合的结构。10-13 世纪东亚政治格局是指活跃于东亚政治领域并充当主角的国家政权之间在一定时期内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结构、状态。其核心内容是大国之间的综合力量对比关系和支配东亚的权力分配状况。东亚政治格局是一个历史范畴,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但这种格局也随大

¹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 页。

国间基本力量的对比和配置的变化而发生重大变化。

要想充当这一时期东亚政治格局“主角”必须具有影响亚洲政治发展的能力，它或者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或者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或者拥有先进的科技文化，各国之间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文化水平对比是构成亚洲政治格局的基础。10-13世纪东亚政治格局中的“主角”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10-11世纪强国是辽与北宋，12世纪前期辽、北宋力量相继消弱，金成了主导政治格局发展的主要力量；13世纪随着金、南宋的先后灭亡，蒙古（元）在13世纪的最后30年又成了主宰这一区域的大国。以“主角”为要件的力量中心是建构政治格局的支撑点，力量中心的变动和其相互间的互动影响着整个东亚格局的变动。

一、10-11世纪以辽、北宋为中心的东亚政治格局

960年宋朝建立，凭借着其先进的文化、强大的经济实力，必然在东亚政治格局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主角”，但它并不是唯一的“主角”。宋立国前，在它的北方已经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十世纪初的契丹族是以游牧为主的民族，英勇善战，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并占据着有利战略要地。由于宋、辽综合力量的强大，两个国家周围汇聚了一些朝贡国，这些因素决定了宋、辽成为主导东亚政治格局的主要力量。西夏建国后，虽然有着一定的军事实力，但其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实力、政治实力、文化实力较弱，在它周围没有形成朝贡圈，对外的影响力也有限，因此西夏不可能在东亚政治格局中占据核心地位。

（一）10-11世纪辽、北宋两国的实力

907年耶律阿保机在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林西林东之间）建国称帝，在他的领导下，辽很快完成北部中国的统一，继之进入经济、政治稳定发展时期。阿保机带领契丹人频频南下、西征，以开疆拓土，将阴山以南诸州县纳入辽朝版图，同时向西进军（今新疆地区），耶律德光即位后，又得到了后晋石敬瑭进献的燕云十六州，燕云地区地势险要，重要的地理位置使辽在地缘政治中占优势。辽控制着广阔的地域，宋统一中原后实际控制的版图比辽要小。在政治上，辽统治者利用一些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辽国制定一系列封建的典章制度，辽政权逐渐走上封建化的道路。由于辽的境内生活着众多民族，有汉人、原渤海人、契丹人和其它游牧民族，为适应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耶律德光制定了“胡汉分治

的制度，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¹辽学习汉族的政治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在经济上，辽有着发达的畜牧业，“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²繁盛的畜牧业为辽提供了大量的食物与战马。辽灭渤海国后，获得广袤的可耕地，很多地区“与汉人杂居，分地耕种”，³就此，汉人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传播到辽的广阔地区，为辽农业的发展造成了有利条件。辽在农业发展的同时，手工业也欣欣向荣，十世纪中叶的辽海地区，“编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⁴，其富庶已不下于燕云十六州了。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使辽国人口增加，辽初其五京的人口，有103万人口，“辽建五京，临潢，契丹故壤；辽阳，汉之辽东，为渤海故国；中京汉辽西地，自唐以来契丹有之。三京丁籍可纪者二十二万六千一百，蕃汉转户为多。析津、大同，故汉地，籍丁八十万六千七百。契丹本户多隶宫帐、部族，其余蕃汉户丁分隶者，皆不与焉。”⁵辽中期，辽的人口约达到四百万，户数在百万左右。⁶

宋初在政治上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为了防范藩镇割据局面再现，宋朝设置了参知政事、三司与枢密使一起削弱宰相权力，削减州、郡长官的事权，州郡的财权和兵权也都收归中央政府，把政治、经济权力集于皇帝一身。在经济上，北宋的社会经济获得迅猛发展，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宋代手工业作坊规模扩大，家庭手工业产品日益商品化，行业分工更趋细密，矿冶、纺织、制瓷、造船、造纸、印刷等生产技术和产量都超过了前代。宋代农业生产得到大幅提高，很多重要的生产工具进行了改进，如铁犁进一步改进，钢刃农具的创制和推广等，使农业生产发展迅速。⁷在文化上，宋代有着先进的文

¹（元）脱脱：《辽史》卷45《百官志一》，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85页。（以下不注作者与版本）

²《辽史》卷60《食货志下》，第932页。

³《辽史》卷37《地理志一》，第439页。

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雍熙三年春正月戊寅，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04页。（以下不注作者与版本）

⁵《辽史》卷36《兵卫志下》，第417页。

⁶ 研究辽朝经济、文化制度的重要著作有金毓黻的《宋辽金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63年版）；蔡美彪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张正明的《契丹史略》（中华书局1979年版）；杨树森的《辽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陈述《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这些著作对辽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发展状况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

⁷ 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30页。

化。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项的应用和发展，使宋代科技水平在世界上属领先地位。宋代重视教育，太学和各地的州县学、书院蓬勃兴起，散文、诗词名家辈出，其散文在四方传诵不衰。宋代“其经济文化多方面的成就，不仅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并且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产生深远的影响。”¹宋代强大的综合实力对亚洲东部政治格局有着重大影响，在宋王朝的周边地区，一部分国家政权对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仰慕，不但认同了北宋王朝为中原王朝的继承者，请求北宋王朝对他们册封，并定期向北宋纳贡，在北宋王朝周围，形成了众多的朝贡国，这些朝贡国进一步提高了北宋王朝在东亚地位，使北宋成为10-11世纪东亚版图上具有强大实力的一个“中心”国。

从北宋、辽的综合实力来看，在10-11世纪的东亚地区两国处于一个绝对优势地位。辽、宋作为两个力量中心，两国的政治与外交主导着东亚地区政治格局发展，决定东亚格局的稳定与动荡。

（二）辽、宋大国关系的发展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统一中原的策略是“先南后北”，在太祖灭北汉的过程中，契丹把北汉看作它的属国，或援北汉，或侵扰宋的边境，直到宋太祖开宝七年（辽景宗保宁六年，974年），双方才正式建交。双方都指对方先发起建交，辽朝史官是这样记载的：“七年春正月甲戌朔，宋遣使来贺。”²宋方也有记载，“开宝中，虜涿州刺史耶律琮遗书于我雄州刺史孙全兴，求通好曰‘兵无交于境外，言即非宜；事有利于国家，事（专）之亦可。’其文采甚足观。”³“辛丑，全兴以琮来上。上命全兴答书，并修好焉。”⁴此后，双方互派使者，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不论谁先发起的建交，说明了双方都重视着对方的发展，并且承认了双方的强大实力。但是五年后，宋太宗为统一燕云地区发动了对辽战争，宋辽关系断绝，两国时有冲突。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圣宗南侵，双方在澶渊（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城下对峙，最后订立澶渊誓书，宋每年向辽交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从此双方基本维持了和平的关系。在此后，宋、辽双方都把对方视为大国，宋在所有交往的国家中，对辽的待遇列于其他国之上，当时“皇朝之制，西北蕃部及契丹、高丽、东南蛮、西南夷及诸外蕃国来贡者，并对于崇德殿。契

¹ 朱瑞熙：《重新认识宋代的历史地位》，载《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第97页。

² 《辽史》卷8《景宗上》，第94页。

³ （宋）张师正：《杨文公淡苑》，《耶律踪求通好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⁴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开宝七年十一月辛丑，第328页。

丹使……他国使，或止就长春殿，皆于殿庭北向，跪奉表函，通事舍人受以进。南蛮、东夷、西南夷、海外国、西北蕃部对讷，复引对于崇政殿。……契丹、高丽、交阯使归，赴内朝奉辞，皆于崇德殿。其契丹使，诏升殿受书，他国书皆有司付之，其赐物有差。”¹可见，当时契丹使的地位列于其他国之上。两国的国书中，称之为“大宋”、“大契丹”，有时也“去其国号，止称南朝、北朝”，²治平三年“大契丹”改为“大辽国”，宋亦称之为“大辽国”，从称呼上来看，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并且都重视双方关系的和平发展。

宋辽基本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这一时期东亚政治的主线即是宋、辽关系及其宋、辽与其朝贡国的关系。虽然宋、辽双方都把对方作为外交中的重点，但他们中间仍有着一些冲突，如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乘宋、夏战争的机会向宋勒索分地。结果宋再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10万匹。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辽借口宋在山西边境加修堡垒，引起了辽的不安，要求与宋划界，宋只好又放弃了一些土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辽与西夏在某一时期的亲密关系，使宋、辽、夏之间构成了一个“大三角”关系，夏成为辽牵制宋的一个“法码”，宋为避免北边两面受敌，以宋、辽和平关系为基轴，力图避免双方发生冲突，使东亚政治格局也保持了总体和平的局面。

(三)、以辽、宋为中心的朝贡国

10-11世纪东亚形成了两大中心，在这两个中心周围，聚集了众多的朝贡国。这些朝贡国从政治地位上来讲，要比辽、宋弱小，常需借助两大国的力量，以保护本国的独立性。从经济上来讲，他们 also 需通过两大国的恩赐来获得经济的利益。

(1) 以辽为中心的朝贡国。

辽太宗如回鹘、于阗、高丽等。在地辽初“周有天下，不期而会者八百余国。辽居松漠，最为强盛。天命有归，建国改元。号令法度，皆遵汉制。命将出师，臣服诸国。人民皆入版籍，贡赋悉输内帑。东西朔南，何啻万里，视古起百里国而致太平之业者，亦几矣。故有辽之盛不可不著。”³辽的朝贡国主要为其接壤地区，具体如表1所示：

¹ (宋)李攸：《宋朝事实》卷12《仪注二》，台湾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20页。

²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2之17，中华书局1957年，第7700页。(以下不注作者及版本)

³ 《辽史》卷70《属国表》，第1125页。

表1 辽的朝贡国¹

时期	朝贡国
辽太祖	北汉、渤海、高丽、回鹘、新罗
辽太宗、世宗	女直、吐谷浑、乌孙、铁骊、赁烈、辖戛斯、回鹘、铁骊
穆宗	女直、铁骊
景宗	辖戛斯、回鹘、女直、于阗、夏
圣宗	女直、于阗
兴宗	女直、高丽、夏、回鹘
道宗	女直、高丽、夏、回鹘

《辽史》中记载的属国，有些只是一些周边的部族，如阻卜、突厥等，有些与辽建立册封关系，而有些并没有这种册封关系，只是与辽有过一、两次的联系而已，如“天赞二年，波斯来贡”；天赞三年，“大食国来贡”；“天赞四年十月日本国来贡，十一月新罗国来贡”²等，波斯、大食、日本只是偶尔与辽有着联系，这种联系并没有什么规律，甚至在上百年中，只有几次，并且，辽也没有对这些国家有任何的册封，因此它们都不应该属于辽的朝贡国。根据上表，可以看到辽的朝贡国有十余个，除下女直、高丽、西夏外，都集中在西域一带，这种情况与辽太祖西征有着很大关系，“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风悉降，西域诸国皆愿入贡。”³其中有一些朝贡国在某一时期，可能接受辽的册封，而另一时期却接受宋的册封；也有一些朝贡国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同时接受宋、辽两国的册封。

(2) 以宋为中心的朝贡国。

对比辽的朝贡国，宋的朝贡国家涉及地域更广泛、更稳定、时间持续更长一些，但不能因此而得出在当时宋的国际影响力就比辽大的结论。朝贡国的多少与国际影响力有一定的联系，但两者的关系又不成正比例的关系，宋太祖时朝的贡国要比同时期的辽景宗多，可是因为宋朝刚刚建立，其国际影响力还是无法与已经建国半个世纪之久的辽朝相比。宋的朝贡国如下表所示：

¹ 根据《辽史》卷70《属国表》，第1123—1128页整理。

² 《辽史》卷70《属国表》，第1127页。

³ 《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第1447页。

表2 宋朝不同时期主要朝贡国一览表¹

时期	朝贡国家	资料来源
太祖	高丽、定定、女真、龟兹、于阗、高昌、天竺、占城、三佛齐、交阯、大食、回鹘	玉海卷 153 《朝贡》
太宗	渤泥、波斯、日本、闍婆、吐蕃、西凉、渤海、高敞、占城、塔坦（卷 24）、高昌（卷 21）、高丽（卷 21）、三佛齐（卷 24）	玉海卷 153 《朝贡》 《长编》
真宗	丹流眉、蒲端、注犂、西天金城、勿巡、角厮罗 三佛齐（卷 55）、大食（卷 55）、占城（卷 57）、甘洲回鹘（卷 57）、龟兹（卷 73）	玉海卷 153 《朝贡》 《长编》
仁宗、英宗	涂渤、石龙蕃、夏国 龟兹（卷 108、110、120）、角厮罗（卷 100）、大食（卷 101、191 等）、于阗（卷 103）、三佛齐（卷 106）、交阯（卷 118） 占城（卷 109、174、182）、	玉海卷 153 《朝贡》 《长编》
神宗	拂菻、大理、真腊、施婆罗、董氈 于阗（卷 220、247、293、300、302、311、335 等）、三佛齐（卷 299）、占城（卷 277）、注犂（卷 283）、交阯（卷 292）、大食（卷 345）、	玉海卷 153 《朝贡》 《长编》
哲宗	高丽、于阗（卷 394、398、460、485、486）	
徽宗	蒲甘、青唐	玉海卷 153 《朝贡》
高宗	罗殿、罗斛、大理、蒲甘、交阯、占城、真腊、大食、高丽、日本、闍婆、三佛齐 安南（卷 151、156、168）、	玉海卷 153 《朝贡》 《要录》

¹ 根据《玉海》卷 153 《朝贡》与《长编》中的朝贡内容进行整理。

在两宋朝贡国具体数量的统计中，一般根据《宋会要辑稿·蕃夷》部分有关资料进行统计，得出了“与宋朝建立朝贡关系的国家共有 26 个，入贡次数为 302 次”¹的结论，但从表 2 中可以看到，宋的朝贡国多达 46 个，这显然比前人研究中的 26 个，要多出一些。在这些朝贡国中，有些国家对宋朝贡频繁，如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三佛齐（位于苏门答腊岛）、真腊（今柬埔寨）、阇婆（位于爪哇岛）、丹流眉（今泰国）、蒲端（今菲律宾）、摩逸（位于吕宋岛）、勃泥（今文莱国）、蒲甘（今缅甸中部），也有一些国家也仅是与宋有过几次联系，如神宗时期，层檀（今非洲桑给巴尔）、日本曾经遣使到宋，宋没有对这些国家有过任何册封，也没有形成一定的朝贡制度，甚至一些国家的到来，只是一、两次而已。如仁宗时到过宋的大留²，后来连宋人也无法考证它在何方。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前往中国朝贡的国家甚多，而获得册封者较少，中原王朝有选择地册封若干在当地相对强大而有影响的国家，作为控制或者影响一个地区的战略支撑点。这就使我们认定朝贡国有了一定的难度，如果我们除去与宋有过几次联系的国家政权，如波斯、涂渤、石龙蕃等，只计算与宋有一定朝贡制度和秩序的朝贡国，那么数字应该在 35 个左右。

中国通过对周边国家的册封，建构君臣隶属关系，也使“东亚各国存在着结构性关系。”³在 10-11 世纪，辽、宋关系构建了东亚政治格局的第一个层次；宋、辽与其朝贡国、相邻联系国的关系构建了东亚政治的第二个层次，另外，与宋辽有一定联系的国家建构了东亚政治的第三个层次。他们的关系如图 1 所示。

辽、宋与其朝贡国建构的第二层次关系可谓错综复杂。宋王朝在朝贡国中，享有至高的威信，宋皇帝“操威福之柄以驭普天，虽远在四方万里之外，莫不欲其令之则从，禁之则止，有以明好恶之所在而不敢违。”⁴但也有些政权时有叛离，如西夏本臣服于宋，宋仁宗时期，西夏叛宋，宋军屡次惨败，与夏结盟的辽趁机威胁宋廷，扬言：“我与元昊、高丽，连衡攻中原，元昊取关西，高丽取登、莱、沂、密诸州。”又曰：“高丽隔海，恐不能久据此数州，但纵兵大掠山东官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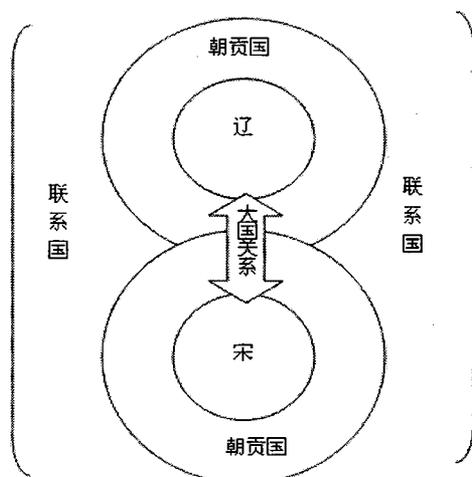
¹ 李金明、廖大珂：《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4 页。

² 《长编》卷 167，皇祐元年十二月戊子，第 4025 页。

³ （日）西岛定生：《東アジア世界と冊封体制》（《东亚世界与册封体制》），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二卷，岩波书店 1962 年版。

⁴ 《长编》，卷 504，元符元年十二月庚子，第 12022 页。

图 1 10-11 世纪东亚的政治格局



财物而去，我则取河东三十六州军，（与宋）以河为界。¹在宋与辽、夏、高丽的多角关系中，北宋依据中原王朝的惯例，积极地谋求主导地位，以打破孤立被动局面，然而在辽国的势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其外交战略多半是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多种因素的集合，使宋王朝面临着复杂的外交环境，“国朝西北有二敌，南有交趾，故九夷八蛮，罕所通道。”²北方有政治和军事上都很强大的辽，西北有西夏的“叛服不常”，宋廷一方面加强西、北边防；另一方面就是在外交上分化辽国，设法与高丽联络，联丽制辽。与此同时，宋廷也利用经济、文化上的优势，采取“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利用辽与西夏的矛盾，试图通过维持敌友之间的实力均衡来维护战略的平衡，使敌友力量对比保持平衡并相互制约。东亚地区各种力量的整合，逐渐打破了以中原文明为中心的局面，在这个历史背景下，随着北宋国内政治和国外形势的变化，对其他政权也保持一种务实的态度，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一再调整，外交思想上一改唐代的大气和张扬，变得更加谨慎和务实。

（四）11 世纪中后期，辽、北宋力量的衰落

辽的衰落是在辽道宗时期。辽道宗（耶律洪基）于 1055 年继承皇位，在位 46 年。辽道宗即位后，先后信用奸臣耶律重元，耶律乙辛等，后来这两位奸臣都因阴谋夺权被处死，当时统治集团内部争斗非常激烈，统治秩序混乱，国内矛盾众多。辽道宗笃信佛教，他派人广建寺塔、劳民伤财，又使社会矛

¹ 《长编》卷 150，庆历四年六月戊午，第 3652 页。

² （宋）蔡攸：《铁围山丛谈》卷 5，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96 页。

盾激化，辽国开始由强盛转向衰落。

北宋中后期，在政治上，国家行政效率低下，官员队伍庞大，朋党之争激烈，社会矛盾尖锐。国内土地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量小农破产，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明显。北宋政府通过科举考试、恩荫等方式，接纳大量文人进入到官僚系统中，每年投入巨额费用。北宋所采取的养兵、养官的制度，要耗费大量的赋税。‘冗官、冗费、冗兵给宋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财政匮乏，严重动摇了封建国家的统治基础。在军事上，由于辽宋的和平，使宋的军队不思进取，少于修炼，在加上文人领兵，将士更戍，战斗力极弱。这些因素都构成了北宋在12世纪初的衰落。

二、12世纪女真力量的崛起及宋金对峙

12世纪初，女真族是辽朝统治下的一个部族，就是这样一个弱势部族政权，建国后用了十余年的时间，推翻了政治、经济制度先进的辽与北宋，“以小取大，以寡取众”，²随后又迫使南宋王朝将淮水以北大片土地割让并俯首称臣。由此，金朝的疆域东北到日本海、库页岛，北到外兴安岭，西北到蒙古国，西以河套、陕西横山、甘肃东部和西夏交界南到秦岭淮河，金的疆土面积超过了辽与北宋。同时，高丽和西夏也在金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奉表称臣，金朝力量上升，在东亚政治格局中很快占据主导地位。

（一）金的崛起。女真人生活在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完颜阿骨打时期，不堪辽的压迫，辽天庆四年（1114年），阿骨打命女真各部人马誓师来流水（今拉林河）开始了反辽斗争。辽天庆五年（1115年），阿骨打称帝建国，“国号大金，改元收国。”³

女真建国后很快改变了文化落后的局面。⁴在宋人心目中金是夷狄中至贱者，

¹ 关于“冗兵”的问题可以参考以下论文：王育济的《论募兵制对北宋社会的影响》（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1）；王育济的《北宋“冗兵”析》（载《文史哲》1989.2）；程民生的《简述宋代募兵制的根源及确立》（载《史学月刊》1990年.4）；程民生的《北宋募兵制的特征及矛盾》（载《中州学刊》1989.1）等

² （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9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43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94页。

³ （元）脱脱：《金史》卷2《太祖阿骨打记》，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页。（以下不注作者与版本）

⁴ 金朝历史的发展可以参考以下论著：宋德金的《中国历史·金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著《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金国部分；李桂芝《辽金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版）；赵永春的《金朝兴衰的历史启示》（《江海学刊》2007年第2期）等。

制度极简略，但是女真族进入中原地区后，接触到先进的汉文化，采取了“全盘汉化”政策，对汉文化进行全面学习和吸收，迅速改变了原来文化、制度落后的面貌。金中后期在政治上，学习汉的典章制度，金太宗在天会元年(1123年)，始行科举以选拔人才，以提高金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金熙宗即位后，开始进行一系列政治改革，废除女真具有民族特色的勃极烈制度，建立起一套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以行台尚书省作为中央最高的军事管理机关，官制改革大大加强了皇帝的权威，提高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天眷二年(1139年)，熙宗命百官详仪制，前后七、八年间，对宗庙、社稷、祭祀，尊号、溢法、朝参、车服、仪卫及宫禁制度等等方面制定了周密详尽的礼仪制度。经过几十年，金“典章诰命皆彬彬可观，”《文艺传序》云：“金用武得国，无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列于唐宋之间，有非辽所及者，以文不以武也。”¹

在经济上，金太宗至熙宗时期随着领土的扩大，中原地区的先进农业经济技术北移，被金广泛采用。中原地区的一些农作物在金的大片地区栽培，粮食作物和蔬菜、水果等品种均有增加，同时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使用，使粮食产量大大提高，也加快了金的经济积累。

在军事上，女真族是一个崇尚骑射的民族，战胜攻取多善骑射，“故能以少击众，十余年间，灭辽取宋，横行无敌”。²冷兵器时代，骑兵与步兵的战斗力的差距很大，女真骑兵队伍的威力曾令辽、北宋、西夏以及高丽等国感到畏惧。女真兴起，首先征服了契丹统治下的渤海人，之后开始攻辽，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使辽军接连惨败。这时北宋王朝尚未意识到女真人兵锋所及，迟早要威胁到自身安全，反而图谋火中取栗，企图趁契丹人国力衰微，疆土日蹙之际，联金灭辽，收复由辽朝占领的燕云地区，与金订立“海上之盟”。辽在金的打击下，辽之“天下郡县所失几半，生灵涂炭”。³辽天祚帝被迫逃入天德、云内一带的夹山地区。金宋结盟后，在与辽的战斗中，金洞察到北宋王朝军事力量的虚弱，在攻辽的节节胜利中，金太宗吴乞买按照金太祖“中外一统”⁴的遗训，在天会五年(1127年)，以各种借口大举南下，一举占领北宋的都城东京，俘虏了北宋的徽、钦二帝，灭亡了北宋，占领了原属北宋的山东、河北广大地区，至此在东亚政治格局中，金

¹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8，第258页。

²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8，第258页。

³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1《天祚皇帝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页。

⁴ 《金史》卷2《太祖阿骨打记》，第26页。

朝取得绝对优势地位。

（二）金宋对峙格局的形成。金的衰落与兴起一样迅速，金代从章宗泰和年间开始由盛转衰，章宗时崇尚奢侈，政事多坏，娱情声色，上下苟安，国力大衰。章宗以后的皇帝多不思进取，贪图安乐，“宴安自处”，“淫纵自肆，且讳言过恶，喜听谀言。”¹随着享乐思想的滋长，金朝官员逐渐变得不务政事，不思进取。在经济上，女真人入主中原后，生产形式没有完全封建化，保留了大量奴隶制，以及奉行以女真为本的民族歧视政策，使中原的农业生产发生了倒退，粮食产量与人口增长不能成正比，经济上出现了财政匮乏、府库严重空虚的情况。在军事上，金朝连年用兵，边境多敌，外患严重。1190年、1191年，西夏接连侵入金国边境，到宣宗执政的时候，金朝的局势更是危急，在新兴的尚处于落后阶段的蒙古军队的进攻下，每战辄败，望风奔溃，最后不得不仓皇南迁。南宋与金朝，除宋高宗统治的前十五年外，即“绍兴和议”后的长时期内，随着金朝实力的下降，金宋双方的实力实际不相上下，形成了宋金对峙的局面。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直到1234年金灭亡之前，宋金力量一直处于均衡的时期，在这个格局变化中，南宋朝廷内部对金的外交思想也发生了转向。宋廷中从以投降求和为主，到对金主战与求和两派力量旗鼓相当，在此期间主战派收复失地，减除岁贡的思想得到实践，直至同意与蒙古联合，共同攻金。

三、13世纪初蒙古的兴起与灭金后在东亚占据主导地位

在金统治时期，蒙古族向金称臣纳贡，金朝末期，蒙古族迅速发展起来，并于1206年建立了蒙古国。相对于金、宋来说，蒙古是一个落后政权。成吉思汗在贫穷落后的形势下，迅速崛起，很快“灭国四十，遂平西夏”，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挺进欧洲，建立了举世罕见的“奇勋伟绩”，²后经太宗窝阔台、宪宗蒙哥以及世祖忽必烈等几代人的努力，又先后灭亡了金朝和宋朝，迫使高丽等国称臣纳贡，成为威震欧亚的大帝国。

1、蒙古族的迅速崛起

蒙古原为唐代室韦的一支，居于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后迁至不儿罕山（今蒙古肯特山）一带，发展为许多部落。12世纪末，自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

¹（宋）刘祁：《归潜志》卷12《辩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7页。

²（元）脱脱等：《元史》卷1《太祖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5页。（以下不注作者与版本）

后，蒙古迅速崛起。蒙古的兴盛与其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紧密相关，蒙古军队的骑兵，就其速度快、威力强而威慑欧亚大陆。成吉思汗曾在他所统辖的地区内，将“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这些军队“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¹具有亦兵亦牧的特点，既可保证军队的物资供应，又使军队得到了锻炼。自1206年成吉思汗叛金自立，开始进攻金朝的北方，数年间，畏兀儿、哈刺鲁等邻部先后降附。嘉定二年（1209年），成吉思汗率军大举进攻西夏，强悍的蒙古骑兵进转西夏都城兴中府（今银川），西夏被迫纳女请和，蒙军暂时撤退。嘉定十二年（1219年），铁木真远征花刺子模，要求西夏出兵，但被西夏拒绝了。宝庆元年（1225年），成吉思汗即以此为由，再次率军攻西夏。西夏都城被围，虽西夏军民奋勇抗击，仍寡不敌众，于宝庆三年（1227年）六月投降元。西夏灭亡。

2、宋、蒙联军攻灭金朝

蒙古于嘉定四年（1211年）开始攻金，兵分三路破华北各地。嘉定七年（1214年），金宣宗向蒙古乞和，并将金都迁至汴京（开封）。嘉定八年（1215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军占领了金中都（北京）。金朝实际控制地区只限于河南一地，统治危机加重。在绍定四年（1231年）蒙军渡过黄河，进入河南，围攻汴京。金朝汴京守军经过近十个月的坚守后，弹尽粮绝，金哀宗逃离汴京。为更快的打败金，蒙古几次派使，向南宋提出了两国联合共同对金作战。宋廷看到金朝即将灭亡，在绍定五年底（1232年）双方达成协议，南宋与蒙古共同攻金，蒙古答应灭亡金朝后将河南归还南宋。次年六月，金哀宗逃至蔡州（河南汝南），十月蒙古军与南宋军队合围蔡州城。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金哀宗传位完颜承麟，完颜承麟即位之日，宋、蒙两军攻入蔡州城，金哀宗自杀身亡。完颜承麟也死于乱军之中，金朝遂亡。

3、宋抵抗蒙（元）的战争。

宋蒙联军作战，使蒙古对宋虚弱的军事有了深入地洞察，蒙军开始觊觎南宋的土地。金亡后，河南的归属问题没有约定，蒙军主力虽然从河南北撤，但并无放弃河南之意。宋军于端平元年五月开始北上，以收复汴京。七月进驻汴京的郊外，守汴京城的多为原金降将，对蒙古军的残暴杀戮极其不满，就以城来献，使

¹ 《元史》卷98《兵一》，第2508页。

南宋轻而易举的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故都，但这时的汴京已经被蒙军烧杀劫掠成为了一片废墟。收复汴京后，宋军又开始进取洛阳，但遭遇蒙军的伏击，南宋军队入洛失败。

端平入洛揭开了宋蒙战争的序幕。从端平二年（1235年）至嘉熙二年（1238年），蒙军在出师西征的同时，分兵三路侵宋，南宋军队全力抵抗，双方互有胜败。端平二年（1235年）东路军进攻江淮地区，中路军进攻襄阳，西路军从甘肃出发，入侵四川。南宋组织军队对蒙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端平三年西路蒙军合兵50万攻入汉中，九月，在阳平关（今汉中西南）宋军大败。蒙古军长驱入蜀，一月之间，成都府、利州及潼川三路俱陷。除夔州一路外，西蜀几乎全部失陷。蒙军入侵的各城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当年冬，蒙军主力撤出四川。嘉熙三年（1239年）八月，蒙古军再次入蜀，宋将孟珙分军屯守入蜀的各要隘，抵御蒙军，使蒙军不能东进，遂退兵。中路蒙军于端平三年（1236年）南侵，在蒙军强大的进攻下，重镇襄阳失陷。随后，宋京西南路一府八州，除金州（陕西安康）外，全部相继沦陷。后来孟珙从四川率援军北上，几次挫败蒙军，收复了襄阳、樊城等城镇。东路军于端平二年至嘉熙二年（1238年）南下在湖北、安徽等地拉开战事，但是被宋军合力抵御，蒙军败走。

嘉熙二年（1238年）之后，宋蒙战争虽然仍在继续，但战事有所缓和。淳祐元年（1241年）窝阔台病死，蒙古内部为争夺汗位展开激烈斗争，蒙古重心是维护现有地盘的稳定上，把南侵的战略推迟。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淳祐十一年（1251年）蒙哥继位。蒙哥继位后，蒙古的统治集团内部稳定后，开始继续逐渐把战略重点移向南宋。宝祐五年（1257年），蒙哥下诏大举侵宋。蒙哥主力入大散关，至开庆元年（1259年）蒙哥的进攻受到了南宋激烈的抵抗，蒙军伤亡很大，蒙哥在战斗中受伤，不治而死。景定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为了对付与其争夺汗位的阿里不哥，忽必烈无暇南侵，到咸淳三年（1267年），蒙古统治阶层内部的斗争结束后，忽必烈决定起兵消灭南宋王朝。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改蒙古国为“大元”。次年南下的元军在长江中游京湖地区与宋拉开战事，咸淳九年（1273年）夺取长江中游的门户襄樊。随后元军又兵分两路大举南侵，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德祐元年（1275年）蒙古军队与南宋军队在丁家洲（今安徽铜陵东北）展开决战，宋军大溃。至此宋军主力大部被歼，

士气大失。三月，蒙古军队占领导健康，并完成了对临安的包围，在强大的军事攻势下，德祐二年（1276年）二月宋恭帝出降，南宋灭亡。

从十三世纪三十年代起，南宋、金对蒙（元）这一劲敌处于劣势的地位，虽然南宋与蒙（元）宋的战争经过了四十余年，南宋倾全国之力对蒙（元）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南宋之所以能够比金存在时间多了四十年，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南宋军民的奋勇反抗，二是蒙古统治阶层内部进行的半争，延缓了他们南下的计划。从窝阔台病死至蒙哥下诏大举侵宋，中间历经了16年，从蒙哥战死又到忽必烈下诏侵宋，中间又经过了12年，中间的缓和期达到了28年。南宋其实真正去抵御蒙古军队大规模进攻的仅十余年，并且从1267年忽必烈南侵就开始胜少败多。不可否认，从蒙古灭金，（蒙）元在东亚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元朝幅员之广袤，地域辽阔，“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¹元帝国幅员辽阔，亦曾盛极一时，海陆交通，畅达无阻。元帝国统治者虽继承了中原王朝的“朝贡”体系，但元要建立的是“蒙元”秩序，用武力去征服四方的决心，使元朝七征朝鲜；两次远征日本；三次西征，侵入西亚，远达东欧。蒙古军队兵锋所至，摧枯拉朽，建立起横跨欧亚的大汗国。南宋灭亡后，元朝已经不仅是东亚的霸主，而且是世界第一强国了。

纵观四个世纪以来东亚格局的转变，从北宋、辽两个中心到金的崛起与宋金对峙，再到蒙（元）的独霸东亚的格局，格局的演变使宋王朝不得不被动地调整其外交政策、思想，以适应这种变化，其外交政策在东亚政治体系中一直处于内敛态势。虽然宋的地位在东亚格局中，呈现出了渐进下降的趋势，但东亚存在的“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册封体制”²却一直维持下来。

第二节 宋王朝建构的朝贡体系

朝贡体系，也被称“封贡体系”、“宗藩体系”、“册封体制”、“天朝礼治体系”、

¹ 《元史》卷58《地理一》，第1345页。

² （日）西岛定生：《東アジア世界と冊封体制》（《东亚世界与册封体制》），日本东京岩波书店1962年版。

¹ “华夷秩序”²。所谓朝贡体系，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流时形成的特殊的外交、贸易、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流的制度和秩序。外国、外族向中国赠呈礼物称“朝贡”，中国向外国、外族回赠礼物称“回赐”。早在 20 世纪初日本学界对古代中国朝贡关系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了。内藤湖南就曾根据“文化移动中心说”理论来解释东亚历史就是中国文化向周边国家扩张，以及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文化扩张做出反应的历史。³二战后西岛定生在内藤湖南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册封体制论”，他认为册封体制在意识形态上是传统的“中国中心论”的反映，在制度上是中国国内身份制度的外延。⁴滨下武志将朝贡制度演绎为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要模式，他认为“以中国为核心的与亚洲全境密切联系存在的朝贡关系即朝贡贸易关系，是亚洲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唯一的历史体系，必须从这一视角出发，在反复思考中才能够推导出亚洲史的内在联系。”⁵堀敏一则在批判地继承西岛定生“册封体制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新的东亚世界论，古代东亚世界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并以松散的结合为媒介的世界帝国，至于中国王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则是一种多元的状况，既包括隶属性的册封（如对朝鲜），同时还有对等的盟约（如吐蕃）、单纯的朝贡（如日本），甚至还有羁縻关系。⁶除此之外，还有田村实造⁷、菊池英夫⁸等都对朝贡体制进行了研究。

朝贡体系起源于先秦的分封制，秦汉以后，进一步发展，到隋唐时期已初具规模，宋代的朝贡体系更加完善。

一、宋代以前中原王朝构建的朝贡体系

“朝贡体系”源起于中国古代邦国关系体制——畿服制。畿服制始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合体制。相传“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远近贡入赋棊”⁹“贡赋”这一象征着政治的臣属关系，标志着广大地域内的部落已经联结为围绕着一个权力中心的政治共同体。至西周之时，畿服制进一步发展完善。

¹ 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87 页。

²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载《北京大学学报》，1998 年第 6 期。

³（日）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全集》第 6 卷，东京筑摩书房 1970 年版。

⁴（日）西岛定生：《中国古代国家和东亚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3 年版。

⁵（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⁶（日）堀敏一：《中国与古代东亚细亚：中华的世界与各民族》，岩波书店 1993 年版；《东亚世界的形成——中国与周边国家》，汲古书院 2006 年版。

⁷（日）田村实造：《中国征服王朝的研究》，同朋舍 1985 年版。

⁸（日）菊池英夫：《宋高丽制度史研究》，汲古书院 1992 年版。

⁹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尚书正义》卷 6《禹贡》，《十三经注疏》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空前规模的秦帝国，这个帝国对外持强硬立场，北逐匈奴，南取闽越，积极向外拓展。其指导思想并非讨伐异族，而是基于统一天下的雄心，然而，国内的酷刑重典造成内部矛盾激化，不旋踵间，秦王朝崩溃于一旦，秦帝国仅为日后的朝贡体系建立了一个框架。

汉承秦制，建立了前后延续四百载的两汉帝国，汉初鉴于国内民生凋敝的现实，实行与民休息政策，不遑经营边疆，面对北方匈奴，基本上处于被动的守势。到汉武帝时代，政治经济繁荣昌盛，中外交流空前发达，接受外来的“朝贡”成为体现领导权的重要标志。因此中原政权对外的总目标就是“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¹，使外部政权对汉王朝臣服，建立以中国王朝的中心领导地位，确定周边各国同中国的尊卑秩序，以及各国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和礼仪规范。汉丞相黄霸等人提出：“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²也就是说，对于外臣，最重要的是他们前来参加中原王朝的重要活动，例如元旦、封禅等，以表示政治服从。册封成为朝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包括授封号、颁印玺、赐冠带等。汉王朝东与朝鲜、日本，南与占城、南海诸国及天竺半岛，西与西亚的安息和欧洲的大秦，建立起了广泛的交流与联系，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朝贡体系。对于不向汉朝贡且威胁汉的国家安全的政权，汉王朝通过“多事四夷”大规模出击，达到“单于守藩，百蛮服从”³的局面。建元六年（135年），汉武帝用重兵征伐匈奴，把它们纳入汉的朝贡体系，以维护汉的国家安全。

唐代的国力要远超前朝，特别是贞观之治，达到了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周边政权或仰慕唐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向唐朝贡。唐高祖李渊明确主张，对朝贡国“尽抚育之方，宏仁恕之道”至太宗贞观以后，“声教远被，自古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⁴在此背景下，“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⁵。同样，并不是所有周边国家对唐表示臣服，位于唐朝西北的突厥对唐时有侵扰，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征讨，最后解除了突厥的威胁，唐朝树立了大国威信，奠定了在西域的统治地位，形成了“诸

¹（汉）高诱注：《淮南子》卷1《原道训》，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5页。

²（汉）班固：《汉书》卷78《萧望之传》，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282页。

³（汉）班固：《汉书》，卷76《韦贤传》，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26页。

⁴（唐）杜佑：《通典》卷188《边防四》，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852页。

⁵（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二年正月戊申，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253页。

蕃诣阙，请太宗为大可汗¹的格局。盛唐时期，与中国建立朝贡关系的多达“七十余番”²，蕃国朝贡，“中国有报赠、册吊、程粮、传驿之费，东至高丽，南至真腊，西至波斯、吐蕃、坚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谓之‘八蕃’，其外谓之‘绝域’，视地远近而给费”。³“报赠”即对朝贡国贡品的酬答与赐赠，除此之外，经常遣使修好的朝贡还有新罗、百济（均在朝鲜半岛）、日本、林邑（今越南）、泥婆罗（今尼泊尔）、骠国（今缅甸）、赤土（今泰国）、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诃陵（今印尼爪哇）、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波斯（今伊朗）等国都与唐朝有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

宋人评论说：“唐之德大矣。际天之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⁴唐朝俨然成为东亚世界的唯一主宰。⁵

二、宋代的朝贡体系

宋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一方面，它在北方辽、西夏、金政权的攻击下，处于守势，另一方面，它具有异常繁荣的社会经济，凭着博大的思想文化，先进的政治制度，使宋王朝在东亚占据重要地位。宋朝为了扩大中原王朝的政治影响，对外交往中实行“厚往薄来”的招徕政策，使宋继承并发展了隋唐以来的朝贡体系。宋在构建其朝贡体系时，多是用道德与经济的手段，而不是用武力的手段。“从十到十三世纪，中国并没有教条地强迫外族服从这个体系。宋朝是这一段时期重要的朝代，它能比较弹性地处理对外关系。”⁶周边国家通过建立和发展与中国封建王朝的朝贡关系，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好处，“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⁷与宋王朝稳定的朝贡关系，成为一些政权追求的外交目标。如上节表 2 所

¹（宋）王溥：《唐会要》卷 87，中华书局 1955 年版，第 1589 页。

²（宋）王溥：《唐会要》卷 49，中华书局 1955 年版，第 860 页。

³（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 221《西域传下·大食传》，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6264 页。

⁴（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 219《北狄传·渤海传》，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6180 页。

⁵ 唐代的中外交流史可以参阅以下论著：李斌城：《唐代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 1979 年版。

⁶ Morris Rossabi.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 - 14th Centur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3.

⁷（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31《四裔考八》，中华书局 1986 年影印“十通”本，第 2602

示，宋时海外诸国朝贡不绝，与宋朝建立定期朝贡关系的国家共有三十余个，若从入贡的次数来考察，北宋前期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最为密集，正如史载：“二圣(太祖、太宗)以来，四裔朝贡无虚岁。”¹ 宋的朝贡国东北有高丽，东南有占城、交趾、三佛齐、真腊等，宋代与马来半岛诸国关系也相当密切，如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和元丰五年(1082年)，位于今日文莱的渤泥国，曾两次遣使来北宋修贡；²咸平四年(1001年)丹眉流国王遣使来华朝贡，双方互赐珍贵礼品。³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今日菲律宾群岛中的摩逸国(即麻逸)载宝货至广州海岸。南印度科罗曼德海岸的注辇国，在其国书中表示主动加入宋的朝贡体系，曰：“窃念臣……世居夷落，地远华风，……是敢倾倒赤诚，遥瞻丹阙。任土作贡，同蝼蚁之慕膻；委质事君，比葵藿之向日。”⁴至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六月，注辇国亦贡方物。据统计，朝贡比较频繁的有：交趾来华朝贡45次，高丽41次，占城56次，三佛齐33次，于阗34次，龟兹31次。⁵朝贡体系在宋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由于金不断南侵，南宋疆土日蹙，宋高宗时朝贡国多在东南亚一带(如表2所示)。尤其是南渡以后，一切倚办海舶，促进了海上丝路的繁荣，海上商路的发展与繁荣，刺激了沿途许多港口的兴旺。朝贡国除传统的东南半岛上的国家外，更多的南方邦国也开始纳入到宋的朝贡体系。南宋时朝因国势衰微，对上述国家的册封并不具君臣主从关系的真实内涵，而朝贡的贸易功能更加突出，宋朝政府除在贸易方面对贡物“估价酬值”外，还常对朝贡国国王、贡使进行额外赏赐，亦称“给赐”、“加赐”等，以加强与朝贡国的关系。

朝贡体系是10-13世纪东亚政治的一种重要模式，虽不足以涵盖古代东亚世界的各种关系形态，但主要内涵具有礼仪性与贸易性，维持宗藩体系不仅靠国家的实力，而且越来越依赖于贸易。宋王朝所建构的朝贡体系，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用先进的文化与制度建构东亚世界的政治权利和文化中心，用一种体系来确保东亚秩序及其和平稳定，这也决定了宋代外交思想的基本方面，不是追求征服和

页。

¹ 《长编》卷85，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庚申条，第1951页。

² 冯承钧：《诸蕃志校注》卷上，《渤泥国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7页。

³ (元)脱脱：《宋史》卷489《外国传五·丹眉国》，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100页。(以下不注作者与版本)

⁴ 《宋史》卷489《外国传五·注辇传》，第14097页。

⁵ 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83-587页。

奴役，而是采用和平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安全，通过道德原则来树立其领导地位，扩大中原王朝的影响。

第二章 宋代外交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宋朝建立后，面临与汉唐不同的东亚政治格局，无国力之绝对优势，无地利山河之险可守，有的却是藩镇割据、地方势力强大之传统，所以宋的外交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儒家外交理念，另一方面也必须另辟蹊径。宋太祖、太宗时期形成了宋外交思想的基本理念，以后的皇帝根据外交格局的变化、国家实力、重大事件的发生、个人的意志等因素继承、阐发、改变着宋初的外交理念。

本章主要论述了宋代外交思想的主要分期，把宋代外交思想演变分成五个时期；宋代外交思想在形成中的核心思想；宋代外交思想在宋中后期的发展与演变。

第一节 宋代外交思想的分期

外交思想是在特定的时期内，人们在外交方面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因此，外交思想是非常复杂的，且有着发展、演变的过程。影响宋代外交思想的因素有很多，如东亚政治格局的变化、国家实力、重大事件的发生、宋统治阶层内部思想文化的流变、外部强国对中原王朝政策的变化、不同皇帝的执政风格、皇帝身边近臣的思想等等，因此，宋代外交思想的演变是由“合力”促成的。对宋代外交思想分期的划分，仅仅依据一个因素肯定是不科学的，而所有的因素全部考虑进去，又会产生分期的复杂多变性，为保证科学性、统一性，我们把重大事件的发生（如皇帝的即位、协议的签订、王朝灭亡等）、东亚政治格局的变化作为主要依据，把宋代外交思想分成以下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宋代外交思想初步形成时期。宋太祖、太宗时期（960年—997年）应是外交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他们确立了各种内、外政策，形成了“祖宗之法”，对后世外交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个时期：真宗即位至宣和二年（997年—1120年）宋金订立“海上之盟”。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后，宋的外交思想主线是以宋、辽国关系为基轴，和平发展大国关系的思想。这一时期起点是真宗即位，主要考虑到“澶渊之盟”有着起因与结果，是一个时间段的事件，辽大规模进攻宋是在真宗即位时，所以以真宗即位划为开始的界线。宋金订立“海上之盟”，联合攻辽，标志着“澶渊之盟”盟约的瓦解，宋、辽一百多年来和平关系的结束。这一时期，如果细分，还可以

分为以下四个小阶段。

第一分阶段：宋真宗即位至西夏建国（997年—1038年），为宋、辽关系平稳发展阶段，宋的外交思想涌现出因循守旧，遵守成法的保守主义思想。

第二分阶段：西夏建国至元丰八年（1038年—1085年），这一阶段宋仁宗、宋神宗力图突破守旧的外交思想，积极对外交流，扩大朝贡体系。宋在维持与辽的和平关系时，对西夏产生了积极防御、“推回”其进攻所获利益的现实主义思想。

第三分阶段：元祐元年至元祐八年（1086年—1093年），这一阶段，宋之外交思想，从积极防御又退回到消极防御，并且在实力较弱的情况下，希望用“德化远及”的理想主义方式，获得和平。

第四分阶段：绍圣元年至宣和二年订立海上之盟（1094年—1120年），这一阶段对外一反消极防御的状态，对夏战争取得重大胜利，从这种胜利中获得了自信，使宋产生了输辽岁币为辱的思想，为了废除岁币，收复失地，宋统治者萌发了宋金结盟的理想主义思想。

第三个时期：从“海上之盟”至绍兴和议（1120年—1141年），宋金攻辽，宋辽一百多年的和平关系崩溃，金对宋的大规模入侵，宋的政治腐败导致军事无能，宋军很快溃败，投降主义的思想占主导地位。北宋末期南宋初宋徽宗、钦宗、高宗的投降主义思想，一脉相承，他们父子的思想有着很强的联系性，因此不宜断然分开。同时也应该注意到，随着国力的衰弱，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开始对南方国家政权积极贸易，向南发展关系，以贸易获得实际利益。

第四个时期：从绍兴和议至端平元年金亡（1141年—1234年）。这一阶段，宋金对峙，力量较为均衡，投降主义思想与现实主义的抵抗思想在冲突中发展。此时有抵抗派战斗的胜利，使金在压力下订立减少宋岁币的“隆兴和议”（隆兴二年，1164年），也有投降主义占主流的时候，嘉定元年（1208年）订立的增加岁币的“嘉定和议”。这一时期南宋与金战争的连绵不断，也使对外战略思想收缩，朝贡国急剧减少。

第五个时期：从端平二年蒙古军入侵宋至宋亡（1235年—1279年）。在蒙古军队大举南侵下，宋军一溃千里，投降主义逐渐在朝廷中占上风，成为主流思想。这一时期军事外交的主要对象是新兴的蒙古，外交中的欺瞒、拖延、求和、

直至投降，虽有陆秀夫、文天祥拼死抵抗者，但也无法扭转最后灭亡的结局。

如前所述，根据影响宋外交发展的不同因素，可能划分的时间界线不一，并且思想的流变是复杂的，连续的，更给分期带来了可变性。这五个阶段的分期，也不可能是唯一的划分方式，但从这五个阶段分期，可以更直接明确地观察到宋代外交思想变化的路径。

第二节 宋代外交思想的形成

鉴于五代军阀割据，武人跋扈为害天下的政治教训，宋初制订了一系列重要的内对、对外政策，这些基本国策为后世的宋代皇帝所奉行，影响贯穿整个宋代，对外交思想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一、对强势政权“守内虚外”、消极防御思想的形成

宋初加强中央集权制度，以三司、参知政事削弱宰相的权力，加强皇权。在中央设枢密院，“凡天下兵籍、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悉归枢密院，”¹把统兵权与调兵权一分为二，形成所谓“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²每遇战事，则朝廷委派将帅，枢密院发令调兵，枢密院调兵必须到御前画旨，三衙据令派兵，此举旨在使各方面相互牵制，以防武人专权。在对外关系上，宋太祖保持对意外事变的戒惕心态，以制度的平缓调适换取边境的稳定。他在统一战争中，对已经建国五十余年，且非常强势的辽国采取防御的策略，所谓“来则掩杀，去则勿追”，³避免与辽直接发生大规模军事交锋，以防御为主。这种思想在宋太宗时期进一步发展。宋太宗灭亡北汉后，决定乘胜向燕京进军，想一举收复燕云，完成统一大业。可是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到雍熙三年（986年）三次攻伐燕云都遭到了失败，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严重的恐辽情绪，太宗再也不愿意谈论收复燕云之事，彻底丧失了与北方游牧政权交战的信心，“自是宋不敢北向”。⁴

两帝“守内虚外”、消极防御思想的形成，与近臣的思想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¹ 《宋会要辑稿》，《职官》14之2，第2688页。

²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2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0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05页。

³ 《宋史》卷266《钱若水传》，第9168页。

⁴ 《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第1803页。

赵普在太祖、太宗时，两次入相，他的保守外交思想直接影响了两帝。太祖时曹翰曾献取幽州图，太祖征询赵普意见，赵普反对攻幽州，他问太祖：“翰可取，孰可守。”太祖说：“以翰守之。”赵普又问道：“翰死，孰可代？”太祖听后，考虑了半天，最后说道：“卿可谓远虑矣。”并且“帝自此绝口不言伐燕”。¹当然，曹翰也未必就真能收复幽州，但赵普以无人代翰守之为名反对北伐，其实是一种消极保守的思想。雍熙三年，太宗派大军出讨幽蓟，赵普上疏力谏，说出兵是“劳师费财，诚无益也”，“所得者少，所丧者多”，因此政权要稳定下来就要“终身以轻动为戒”²。赵普是开国第一相，为宋的建国立下汗马功劳，他的思想对太祖、太宗产生了重要影响。

外交上，宋朝对辽朝改为保守防御政策，以求苟安。因为太宗在“斧光烛影”里继承了帝位，在收复燕云的战争中，因战争混乱，传闻有将士谋拥立德昭的事情，使太宗在心理上蒙上阴影，害怕太祖诸子、其他兄弟夺其皇位。这些因素都促使宋太宗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对外采取消极防御政策。淳化二年（991年），女真提出辽的兵力阻隔了来宋朝贡之路，请宋帮助攻伐辽时，宋太宗拒绝了女真的请求，并对大臣意味深长的谈到“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³宋太宗逐渐把注意力由外部作战转向内部的巩固，特别是着手解决皇室内部的问题，“事为之防，曲为之制”，⁴从此，太宗开始把内部问题作为执政的主要问题，对辽采取守势，实行战线收缩，事实上承认了辽对幽云地区的占领。至此其“守内虚外”思想渐趋完备，并作为“祖宗家法”影响着后世。⁵“守内虚外”的保守主义对外思想，虽能有效地维持内部统治的长期稳定，但长期无战事导致军事训练懈怠，也造成了对外军事能力低下，直接导致了边防过于软弱，无力抵挡少数民族政权的进攻，以至于辽或金的军队能够长驱直入。

二、在朝贡体系内的“内圣外王”思想

虽然宋初形成了对强敌的“守内虚外”，消极防御思想，但同时也继承了中

¹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6，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9页。

² 《宋史》卷256《赵普传》，第8940页。

³ 《长编》卷32，淳化二年八月丁亥，第719页。

⁴ 《长编》卷17，开宝九年十月乙卯，第382页。

⁵ 关于“祖宗家法”，可以参考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年版。

国古代的“内圣外王”思想。“内圣外王”是中国古代王朝一个重要外交思想，即追求“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宋代皇帝潜意识中把“内圣外王”作为其外交理想目标。宋人“内圣外王”思想是希望建立以宋王朝为中心，“四夷归附”、达到外族政权归化、尊崇中国为“天朝上国”的目的，并用儒家的纲常伦理道德来约束四方政权，从而保证中国在朝贡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内圣外王”思想，使宋皇帝愿意对一些国王、贡使予以册封。为获得“内圣外王”的心理优势，宋初即对朝贡国有着一套严格礼仪，如朝贡国一般须备国书，即所谓“奉表”，见到宋朝皇帝后，要行叩拜礼等。在继承汉唐传统的朝贡国后，为达到“四夷来服”的目的，宋太宗曾经派人招其他政权向宋入贡，如雍熙四年(987年)他曾“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处赐之”，¹以建构宋在朝贡体系中的领导地位，达到“内圣外王”的外交目标。

三、重文抑武政策，对后世外交思想的影响

北宋是从五代发展而来，宋初统治者对五代武人干政、飞扬跋扈的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宋太祖曾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²宋初通过“兴文教，抑武事，”³欲“以文化成天下”。⁴为此，宋太祖一方面通过“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⁵的政策，解除了武臣的权力，另一方面“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⁶由此加强中央集权，基本解决了自唐后期以来的武人专横，藩镇割据的问题。开国之初，由于功臣宿将的存在，重文轻武政策的消极作用尚不明显。对兵力较弱的南方诸国，包括北汉，还能取得军事胜利。但在宋初对辽作战中，就显出它的端倪了。宋太宗不信任武将，战前对将领赐阵图，后来又实行“更戍法”，将帅、军队频繁调换，直到熙宁变法之后，推行“将兵法”，才改变了以前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抑武的另一个方面就是重视文人的作用，文官在诸如考核、磨勘改官、俸禄等方面都优于武官，进而文人掌兵，有些不知

¹ 《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第3364页。

² 《长编》卷13，开宝五年十二月乙卯，第293页。

³ 《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壬戌，第394页。

⁴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48《经籍考七十五》，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十通”本，第1956页。

⁵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宋太祖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⁶ 《宋史》卷436，《陈亮传》，第12940页。

兵的文人带兵打仗，结果可想而知。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一方面使宋的军事力量渐衰，在以后面对金、元大规模进军时，宋军一战即溃，军事力量薄弱，宋廷在外来入侵者的不断打击而无反手之力，也促使后世的统治者产生了“和议”与投降的思想。另一方面，文人治国，也使宋朝以儒家道德文化治国，抑制武将群体和军事因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应有的影响，把内部统治的道德思想延伸至对外思想中，对外以“和为贵”，“以德服人”，使理想主义外交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四、“祖宗家法”对后世外交思想的影响

宋初制订的“祖宗家法”，使后世因循遵守，形成了外交思想中的保守主义。“祖宗家法”，“它既包括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统治应该循守的治事态度；既包括贯彻制约精神的规矩设施也包括不同层次的具体章程。从根本上讲，它是时代的产物，是当时的社会文化传统与政治、制度交互作用的结晶；其出发点着眼于‘防弊’，主要目标在于保证政治格局与统治秩序的稳定。”¹据说宋太祖登基后，立下几条家规祖训刻在太庙里，新皇帝登基都须先礼拜受戒，“祖宗家法”作为基本国策，真宗、仁宗、英宗都“嗣守其法，益以完密，”²至道三年（997年）四月，宋真宗继承帝位，制书中强调说：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³英宗在嘉祐八年（1063年）即位诏中，也说“夙奉圣颜，备闻圣训，在于庶政，悉有成规，惟谨奉行，罔敢废失”。⁴“祖宗家法”为后世的宋代皇帝所奉行，影响了整个宋代外交。太宗之后的多数皇帝对祖宗家法机械遵循，祖宗之法不可变，一直难以逾越旧有的框架，对外思想中重防御，轻进攻；重德化，轻武力；外交思想中不考虑政治格局的变幻，一味循规蹈矩，使宋代外交思想时常陷入保守主义。

第三节 宋朝外交思想的发展

真宗即位后，辽军时有南下，对此宋统治者一筹莫展，惟有被动应战。景

¹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9页。

²（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52《兵考四》，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十通”本，第1327页。

³（宋）李攸：《宋朝事实》卷41，台湾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863页。

⁴（宋）李攸：《宋朝事实》卷2，台湾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2页。

德元年(1004年),辽萧太后与辽圣宗倾全国兵力南下,试图以重兵突击河北,然后长驱直入,问鼎中原。宋真宗从寇准之议,亲征,双方在澶渊城下对峙,经宋降将王继忠从中斡旋,次年双方订立澶渊盟约。从澶渊之盟到宋金“海上之盟”,在这一时期里,宋、辽两个大国建立起了和平友好的关系,“澶渊之盟”成为宋、辽关系中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宋和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基础。

一、“澶渊之盟”对宋外交思想发展的影响

澶渊盟约订立前,宋真宗与辽达成和解的心情非常迫切,他认为:“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遗之货财,斯可也。所虑者,关南之地曾属彼方,以是为辞,则必须绝议,朕当治兵誓众,躬行讨击耳。”¹很明确,宋真宗谈判的底线为不割地,至于金钱、财物则不惜代价,就在此时,宰相寇准建议进一步扩大战果,真宗回答:“数十年后,当有捍御之者”²,可见宋真宗把和谈作为首选出路,其对辽的恐惧心理昭然若揭。其实,当时真宗亲征,辽已经为强弩之末,“契丹西畏大兵,北无归路,兽穷则捕搏,物不可轻,余孽尚或稽诛,奔突亦宜预备。大河津济,处处有之,亦望量屯禁兵,扼其要害,则请和之使,不日可待。”³因此,宋力量并不弱于辽,却订立了给予辽一定经济利益,有失“体面”的盟约。

澶渊盟约具体内容如下:

维景德元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共遵诚信,虔守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穡,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掘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谨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⁴

从誓书内容看,除了宋对契丹的赠与岁币外,其他规定对双方都具有同样的约束力。如互不容纳叛亡,互不骚扰边界,互不增加边防设备及开挖河道,辽军撤退时,宋军在沿途不得进行邀击等。以“澶渊之盟”为基础,宋辽建立起和平

¹《长编》卷57,景德元年八月癸酉,第1269页。

²(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21《契丹盟好》,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5页。

³《宋史》卷306《孙何传》,第10100页。

⁴(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0《宋真宗誓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

关系，“澶渊之盟”对宋代外交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从澶渊之盟到宋金订立“海上之盟”，北宋逐渐形成了以宋、辽国关系为基轴，发展和平的大国关系的思想。“澶渊之盟”后，两国每岁互派使臣，贺岁使、贺生辰使来往不绝，这种关系仅是两大国之间互有的，第三国不能享受。以两国关系为基轴，是指宋把与辽的关系放在所有对外关系的中心地位，宋人认为盟约保证了宋与辽关系的和平发展。苏辙曾经指出，澶渊之盟“稍以金帛啖之，虜(辽)欣然听命，岁遣使介，修邻国之好，逮今百数十年，而北边之民不识干戈，此汉唐之盛所未有也”¹。韩维也曾经指出，“自澶渊讲好之后，十有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庶者，其源盖出于此。”²，认为“澶渊之盟”对宋朝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保障作用。但宋朝廷内也有部分大臣反对给辽岁币，对此宋真宗曾对身边的朝臣说：“自契丹约和以来，武臣屡言敌本疲困，惧于兵战，今国家岁赠遗之，是资敌也。”对此，真宗批评道：“武臣无事之际，喜谈策略，及其赴敌，罕能成功，好勇无谋，盖其常耳。儒臣岂不知利害耶，前代多用儒将，然亦难其才也。”³宋真宗反对武臣们提出的给辽岁币是资助敌人的观点，认为这些武臣不能打胜仗，却好发议论，他认为宋、辽关系的和平发展，还是要由盟约来保证。

第二，北宋统治者产生了对外“输财议和”，轻视防御、放松武备的思想。统治者从“澶渊之盟”中，片面地获得了一种启示，即：通过金帛赎买的办法也能够消弭边患，并且代价比用兵更小，因此真宗及后世都把议和作为解决边患问题的一个良好途径。宋真宗与辽议和后，景德二年(1005年)宋、夏又订立了和约，宋廷承认李德明占有银、夏、灵诸州的既成事实，封其为西平王，授定难军节度使，李德明同时也接受了辽国的册封，为大夏国王，在宋辽之间寻求生存发展的空间。西夏在与宋朝议和的前提下，悄悄兼并土地，扩张势力，而真宗朝对西夏的扩张一直采取姑息妥协的政策，美其名曰：“姑务羁縻，以缓争战”⁴，即姑且同意西夏表面称臣的做法，以求避免战争。对于宋廷的“输财议和”的思想，富弼曾经沉痛地指出：“国朝以兵得天下，震耀武威。太祖皇帝待北敌仅若

¹ (宋)苏辙：《栞城后集》卷11《历代论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1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80页。

²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5，绍兴二十三年九月庚子，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698页。(以下不注作者与版本)

³ 《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丁卯，第1528页。

⁴ 《长编》卷63，景德三年五月庚申，第1403页。

一族，每与之战，未尝不克。太宗皇帝因亲征之衄，敌志遂骄，频年寇边，胜败相半。真宗皇帝嗣位之始，专用文德，于时旧兵宿将，往往沦没，敌骑深入，直抵澶渊，河朔大骚，乘輿北幸。于是讲金帛啖之之术，以结欢好。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而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议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搢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敌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¹富弼的以上议论，说明澶渊之盟使宋辽之间达到了和平，可是又产生了宋真宗朝以来，当国大臣，论和之后，武备皆废的严重问题。宋仁宗朝对夏交战时，武备废弛的严重后果遂暴露无遗。兵众力弱，兵士平时缺乏训练，习于骄惰，禁军领取粮饷，甚至要雇人挑运；陕西沿边的骑兵，不能披甲上马。兵士平时坐食军储，一旦有警，则不堪一击。在与夏的作战中，宋军败多胜少。苏轼对此评论曰：“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无意于兵，将士惰偷，兵革朽钝，元昊乘间窃发，西鄙延安、泾原、鄜府之间，败者三四，所丧动以万计。”²“输财议和”，不惜用财富换取和平，在军备废弛的情况下，最后堕落为不顾国家利益，投降乞和的思想。

第三，为扫除“澶渊之盟”的心理阴影，积极鼓励海外国家来宋朝贡的思想。“澶渊之盟”虽维持了宋辽一百多年的友好关系，但当时宋真宗心理失衡，为了摆脱这种心理，真宗用封禅大典来炫耀国威。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为庆祝所谓的天书降临，宋真宗于泰山行封禅之礼，大食、三佛齐、占城等国贡使受邀携带贡物参加了这一仪式，四年后，宋廷又在汾阴祭地神后土，应邀参加的有交趾、蒲端、蒲婆等国贡使，与此同时，宋政府也不再只是消极地等待外国来华朝贡，而是积极派遣使者出洋招贡，对来华使臣，给予较高规格的接待，并赐以服饰、礼品，授以官爵等，这些措施不仅能招揽外商，增加政府收入，也宏扬了宋王朝的国威，既显示了本朝的国力，又扩大了政治影响，有助于扫除了“澶渊之盟”给予辽岁币之耻辱。此后，神宗朝、徽宗朝皆曾鼓励海外国家前来朝贡，尽管这些举动也带有“壮朝廷之威灵，耸外夷之观听”³的思想，但对继承与发展宋初的朝贡体系有着积极作用。

¹ 《长编》卷 150，庆历四年六月戊午，3639-3640 页。

² (宋) 苏轼：《苏轼文集》卷 37《代张方平谏用兵书》，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89 页。

³ (宋)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原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593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816 页。

第四，宋的外交思想涌现出因循守旧，遵守成法的保守主义外交思想。宋真宗即位时通过制词表明了内政外交之态度：“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¹又经常表示：“朕谨遵圣训，绍继前烈。”²随着“澶渊之盟”的订立，宋、辽间一百多年和平关系的维持，更使后来的执政者继承守内虚外、消极防御，引“澶渊之盟”为先例，以财富换和平，对外来入侵不敢反击，息事宁人的保守思想。

总之，“澶渊之盟”维持了宋、辽大国关系长期和平的局面，但给宋朝外交思想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这些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影响如在“澶渊之盟”后，在东亚政治格局中形成了宋、辽大国和平相处，以保安定的思想，同时也使宋廷产生了积极对外交流，扩大朝贡国的思想。消极的影响有宋代后世统治者存在着过分依赖议和，轻视武备建设的思想，从而在边防上长期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并且长期的和平，使后世执政者产生了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

二、“守内虚外”保守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后，两个大国间基本保持了一种和平关系，宋统治者认为边患已除，而国内矛盾尖锐，地方污吏盘剥民众，民力益困，百姓愁苦，财政匮乏、盗贼猖獗等，在这一形势下，统治者更加坚定了“守内虚外”的思想，朝廷内外“言边事者盖以万计……其间大抵欲保疆守境，爱民节用者多矣”³，当时朝廷内部多数官员主张对外采取较为温和的防御性策略，以保证宋朝边境的安定。

宋仁宗时，元昊称帝，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向北宋发动一系列战争，当时北宋驻扎在陕西的兵员达三十万，却分成四路，边防线长达五百里，虽每路士兵不下七、八万人，但除守城寨兵卒之外，各路不过三万人而已，敌人则集中骑兵，动则十余万，大举进攻。知渭州的尹洙说：“贼（指西夏）数犯寨，必并兵一道，五路帅之战兵不满二万人，而当贼昊举国之众，吾兵所以屡为贼困者，正由城寨多而兵势分也。”⁴宋廷虽在宝元、庆历年间，用夏竦、韩琦、范仲淹等重臣驻守西北，他们也确实采取了许多积极对敌的方法，但仍未能打破守御的劣势。宋与

¹ 《长编》卷 41，至道三年四月乙未朔，第 863 页。

²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 3《祖宗圣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7 页。

³ 《长编》卷 133，庆历元年九月辛酉，第 3176 页。

⁴ 《宋史》卷 295《尹洙传》，第 9837 页。

灵活进攻的西夏军队大战三次，都以宋军的失败而告终。西夏军甚至以宋的失败作诗，投于宋境，讽刺说：“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¹康定、庆历年间宋军的惨败与宋长期以来的“守内虚外”政策有着直接关系，因为“澶渊之盟”后的和平，使守内的军队惰于训练，士兵“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也，其势不得不骄惰。今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军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²士兵疏于训练，纪律松弛，号令不明，一旦发生战争，把这些军队调入前线作战，想在作战中获胜利，何其难也！

宋神宗即位后，希望能够“包制夷敌”，想突破“守内虚外”的思想，开疆拓土，虽有所收获，曾收复了一些军事要塞，但对西夏两次进军遭受到惨重的失败，元丰四年（1081年）宋神宗分兵五路进取灵武，“夏人决黄河水柜（溃）以灌吾垒，兵将冻溺饿饥，不战而死者数十万人”。又一次是用吕惠卿推荐的徐禧主持筑永乐城，“夏人以大兵破之，自禧而下死者十余万人”，宋神宗为之“当宁恸哭，宰执不敢仰视。”³经此打击，宋神宗逐渐打消了进攻的念头，回到以防为主的原路。元祐时期司马光还等还给西夏土地。从北宋宣和到南宋时间，随着强敌的入侵，基本上都把“守内虚外”的消极防守作为御敌良策。南宋绍兴年间吏部侍郎沈介上奏曰：“臣窃惟今日之虑，莫若备敌之策为急，顾今大患有二，一曰国论不定，二曰威令不行，二患不能去，虽备敌将有所不可也。”“备敌之策不过有三，征也，和也，守也，征固力所未能，和则理难必恃，亦守而已，”⁴他认为御敌有三种方式，或者采取征伐，或者选择和平，或者利用守御之法，国家的外交指导思想要早些论定，他认为在这三种方法中，守御之法最切实可行，希望把守作为备敌之策，并且轻易不要改变这一思想。

虽然真宗及后世的统治者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保守主义外交思想，但在强烈的外来冲击下，宋朝廷内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富国强兵、积极防御，不畏强敌的现实主义思想。

三、现实主义的积极进取思想

¹（宋）周辉：《清波杂志》卷2，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2页。

²（宋）欧阳修：《文忠集》卷59，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0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61页。

³（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5，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2页。

⁴《三朝北盟会编》卷226，绍兴三十一年正月，第3371页。

北宋自仁宗时期，内忧外患十分严重，当时“国家纲纪隳颓，法令宽弛，赏罚不立，善恶不分，体弱勢危，可忧可惧。”¹武装反抗接连爆发，自然灾害也频频袭来，整个国家出现了水旱作、民力困、财用乏、“边疆外叛，盗贼内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宋廷既不能有效地抗击夏的侵扰，又无力镇压农民的反抗，统治者从维护北宋王朝的统治出发，以范仲淹为代表，多次提出了“富国强兵”、对夏“以夷攻夷”的思想，以钳制西夏，确保边境的安定。如范仲淹提出“贼大至则明斥候，召援兵，坚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则厄险设伏以待之，居高估入中及置营田以助之。”²并且积极进攻，获得不少胜利，如康定元年(1040年)冬十月癸未，“鄜延钤辖朱观等袭西贼洪州界郭壁等十余寨，破之。环庆钤辖高继隆等出兵攻西贼经纳、旺穆等砦，破之。”³宋一方面使用武力解决夏的入侵外，另一方面对夏使用了经济手段，元昊称帝的第二个月，宋廷就诏令沿边禁绝与西夏互市，第二年二月又废除了保安军榷场，同年六月，宋仁宗下诏削夺元昊的一切官爵，撤销所赐国姓，同时，宋廷也加紧边塞军事力量的部署，以求最终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

熙丰变法期间，以宋神宗和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推行积极进取的政策。神宗即位后，对辽、西夏持强硬态度，他对每年输辽岁币，多次表示反对，“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后之志……一日，语及北边事，曰：‘太宗自燕京城下军溃，北人追之，仅得脱，凡行在服御宝器尽为所夺，从人宫嫔尽陷没，股上中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竟以箭疮发云。盖北人乃不共戴天之仇，反捐金缯数十万以事之为叔父。为人子孙，当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⁴于是，神宗积极储备财富，以图收复大业，他揭诗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日成戎捷。”⁵表现了神宗收复失地的思想。王安石也分析了北宋中期的外交积弊“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⁶北宋中期皇帝都谨守陈规而不敢有逾越改制之心，所以百年之间没有亡国的忧患，也没有出现盛世。“赖非夷

¹（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100《论盗贼事宜札子》，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版，第595页。

²《长编》卷134，庆历元年十一月乙亥，第3201页。

³《长编》卷129，康定元年冬十月癸未，第3051页。

⁴（宋）王铨：《默记》卷中，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3-44页。

⁵《宋史》卷179《食货志下一》，第4371页。

⁶（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40《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北京图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6页。

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在外交思想中，王安石建议神宗扫清萎靡怯懦、因循保守之思想，改变以防为主的战略，把对外目标定位于“兼制夏国，恢复汉唐旧境，此乃基本”、“包制四夷。”¹当时，有一些大臣坚决反对拓边的思想。如张方平指出：“及太宗平并州，欲遂取燕蓟，自是岁有契丹之虞，曹彬、刘廷让、傅潜等数十战，各亡士卒十余万。又内徙李彝兴、冯晖之族。继迁之变，三边皆扰，而朝廷始旰食矣。”再往后，“真宗之初，赵德明纳款，及澶渊之克，遂与契丹盟，至今人不识兵革，可谓盛德大业。”张方平的主张是借鉴祖宗时的历史经验，不要听从边臣的“开拓之议”。²神宗、王安石突破保守思想的阻力，熙宁四年至六年（1071年-1073年），宋夏之间的“熙河之役”取得胜利，宋朝向西北拓地一千多里。宋朝政府实行的积极防御、适时进攻的现实主义，扫除了宋外交中暮气沉沉、因循守旧的风气，这种开创性的思想在西夏关系初具成效，夏暂时停止了对宋的进攻，并几次向宋入贡。

四、投降主义外交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从“海上之盟”（1120年）至绍兴和议（1141年），这一时期随着宋、辽和平关系的破裂，金逾盟而对北宋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北宋军队溃不成军，金占领北宋东京，俘获徽、钦两帝，宋投降主义思想占据绝对地位。宋代投降主义外交思想最早萌芽于真宗时期的“澶渊之盟”，在订立盟约前，宋廷内部就出现过以官僚王钦若、陈尧叟为代表的“求和”派，主张真宗去金陵或四川，以避辽军的锋芒。到后来，以宋、辽势均力敌，而签订输辽岁币的“澶渊之盟”，不能否认有着对辽妥协退让的一面。

宋徽宗开始与金交往时，就有“屈己”之意，他在一些大臣的建议下，同意与金人联合灭辽，收回燕云等地，但又主动提出将每年给辽的50万岁币转送于金，一开始就没有与金在对等的条件下进行平等交往。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金人撕毁宋金海上盟约，发动了攻宋战争。战争刚刚爆发，宋人就积极谋求与金人议和。宋人先后派遣马扩、沈瑁、李邕等出使大金军前，表示愿意将燕京（今北京）等地交还金朝，仍旧以宋辽边界“白沟为界，增添岁币”³，以乞求金人同意议和。宋钦宗与其父亲也是一样，他在靖康元年（1126）以割让太原、中山、河

¹ 《长编》卷231，熙宁五年三月戊子，第5613页。

² 《长编》卷259，熙宁八年正月乙卯，第6321页。

³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6，引《南归录》，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96页。（以下不标注作者与版本）

间三镇，每年向金人交纳岁币二百万贯以及交纳犒军费，以期望金人退兵。金军第二次侵宋之时，宋钦宗先是以割让黄河以北地区的条件乞求金人同意议和，接着则以向金人称臣为条件，乞求金统治者存留宋朝社稷，金人对此皆置之不理，在钦宗投降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北宋走向最后的灭亡。宋高宗即位之后，不但没有吸取宋徽宗和宋钦宗一意向金人投降而亡国的教训，反而不惜一切代价，向金人乞求议和。他还为这种投降主义，冠冕堂皇地道出一个“高尚”的理由，即投降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迎还二圣（宋徽宗和宋钦宗），还认为自己向金人求和，符合“澶渊之盟”的讲和精神。他曾说：“真宗与契丹通和百余年，民不知兵；神宗虽讲武练兵，实未尝用。朕自始至今，惟以和好为念”，¹在此“高尚”的理由掩饰下，宋高宗大肆对金投降乞和。建炎二年（1128年）二月，宋高宗一边弃东京南逃，一边派遣宣教郎户部尚书刘洵等人出使金朝，五月又派遣宇文虚中和杨可辅等人使金求和，十一月又派遣魏行可和郭元迈等人使金乞和。建炎三年（1129年）五月，宋高宗逃到建康，再次派遣洪皓等人出使金朝，向金人表示“愿去尊号，用正朔，比于藩臣”²，乞求金人对南宋政权的承认。宋徽宗、钦宗、高宗竭尽所能，对金人求和投降的思想，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外交思想。虽然李纲、宗泽、岳飞等抵抗派对金的入侵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但在强大的投降求和势力的挤压下，他们最终的结局或被诬谤，或被贬谪，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伤害，可见当时的抵抗派的处境是何等的艰险，他们的抵抗思想往往被投降主义的思想所湮没。

五、投降主义思想与现实主义的抵抗思想在冲突中发展

从绍兴和议（1141年）至端平元年金亡（1234年），宋金双方军事实力处在均衡状态，双方互相对峙，宋投降主义外交思想与现实主义的抵抗思想相互交织。这一时期金宋和战问题在南宋政府中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王夫之评价说：“宋自南渡以后，所争者和与战耳”。³这时有许多重臣提出了积极备战，坚决抵抗的思想。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三十年（1160年）出使金朝的黄中、贺允中等人回朝亦提出备战的建议：“彼国治汴京，役夫万计，此必欲徙居以见逼，不可不

¹ 《要录》卷159，绍兴十九年三月丙寅，第2583页。

² 《要录》卷23，建炎三年五月乙酉，第484页。

³ （清）王夫之：《宋论》卷13《宁宗五》，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34页。

早自为计”¹，“敌势必败盟，宜为之备”。²庆元元年（1194年），宋宁宗即位，他希望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重用外戚韩侂胄，并从嘉泰三年（1203年）起，在军事方面进行了一些准备措施，还一度起用了主战派陈亮、辛弃疾、叶适等人，陈亮一生念念不忘“君父之仇”，“国家之耻”，视徽钦二宗北狩，宋廷偏安为奇耻大辱，极其痛心疾首。他曾经伏阙上书，开篇即言：“臣窃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之所钟也，人心之所会也，衣冠礼仪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岂天地之外夷狄邪气之所可奸哉！”他坚决反对求和苟安，他说“一日之苟安，数百年之大患也。”³陈亮认为求和意味着年年输送岁币，长此以往，国力虚空，民财几尽。国家将大量资财拱手相送，至使夷狄势力增强，势难驱除，因此凡主张通和者都是为了求得一时之安。长年苟安一隅之地，财资虽广，国力日衰，再加上领兵将帅多是庸碌之辈，根本无力收复失地，而且长期苟安，人缺少斗志，收复中原的向往日渐淡漠，又怎能实现中兴大业。浙东安抚使辛弃疾见辽宗皇帝时曰：“言敌国必乱必亡，愿属元老大臣预为应变计”⁴。叶适也曾经上奏：“先虑预算，思报积耻，规恢祖业”。⁵在现实主义的抵抗金国、光复宋地的思想影响下，宁宗深受鼓舞，嘉泰四年（1204年）宁宗甚至出封樁库黄金万两，以待赏功，密作北伐部署和准备，为了激励抗战派将士，嘉泰四年五月，宁宗追封岳飞为鄂王。开禧二年（1206年）四月，宋宁宗为进一步鼓舞士气，打击朝廷内主和派，又削去秦桧的王爵，将其谥号改为“缪丑”，追论秦桧主和误国之罪。开禧二年使臣、边将不断传来消息，“皆谓金、鞑相持，遗黎内附，若乘机进取，可以尽复故疆”，⁶在这种情况下，五月，宁宗下诏伐金，宋军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宋金战争全面展开，史称“开禧北伐”，宋军纷纷出击，主动进攻，但是战争进程没有一帆风顺，相反，宋军多是失败而归，“丙寅（开禧二年作者注）始出师，一败涂地不可收拾；百年教养之兵一日而溃，百年葺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盖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⁷。开禧三年（1207年），在战

¹ 《要录》卷181，绍兴二十九年四月壬辰，第3011页。

² 《要录》卷184，绍兴三十年三月辛卯，第3086页。

³ （宋）陈亮：《陈亮集》卷1《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页。

⁴ 《宋史》卷474《韩侂胄传》，第13774页。

⁵ （宋）叶适：《水心集》卷1《上宁宗皇帝劄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6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0页。

⁶ （宋）魏了翁：《鹤山集》卷1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7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39页。

⁷ 《宋会要辑稿》，《兵》29之46，第7315页。

和问题上，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更加激烈了，“自兵兴以来，蜀口、汉、淮之民死于兵戈者，不可胜计，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意犹未已，中外忧惧”，“军国空虚，州县罄竭，”¹叶适等抵抗派反对无准备的冒进，也不主张徒糜国费，而主张依靠人民，层层设防，以达到驱除金军，规复故疆。开禧北伐失败，金兵气焰昌盛，宋廷主和派又大肆活动起来，他们完全屈从于金的残忍旨意，以韩侂胄的人头为首要交换条件，再次向金乞和。韩侂胄死后，宁宗重用史弥远、钱象祖等投降派人物，与金订立“嘉定和议”。嘉定和议的具体内容如下：两国界如从前，依靖康故事，世为伯侄之国，增岁币为三十万两，索韩侂胄首以赎淮南地，改犒军钱为银三百万两，金以还原来占宋之地归宋，嘉定和议之后，奉行投降思想的史弥远从礼部尚书拜右丞相，兼枢密使，从此掌权 26 年，投降主义思想在南宋占上风，南宋国力从此更加衰竭。

六、投降主义思想的结局

端平元年（1234 年）宋、蒙联合灭金后，南宋出兵欲收复河南失地，遭蒙军伏击而失败。次年，蒙军在西起川陕、东至淮河下游的数千里战线上同时对南宋发动进攻，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宋蒙战争，大体可以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宋端平二年蒙军大举南下至咸淳三年忽必烈决定消灭南宋王朝（1235 年—1267 年）；第二阶段从咸淳三年忽必烈下诏伐宋至南宋灭亡（1267 年—1279 年）。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中，蒙军大举入侵，南宋政府组织力量进行了抵抗，在战斗中南宋军队与蒙古军队互有胜负。

这时投降主义思想在朝廷中仍有一席之地，南宋军队与蒙军交战时，不战而降的将士也屡见不鲜，如端平三年（1236 年），蒙军攻襄阳，宋军出逃，襄阳城陷；嘉熙三年（1239 年），蒙军侵蜀，袭击成都，占领汉、邛、简、眉数州，如入无人之境。开庆元年（1259 年）贾似道以枢密使兼四川宣抚大使身份组织大军守鄂州，大军至鄂州，未及与蒙军战斗，即与忽必烈议和，私许蒙军土地与钱财，虽在贾似道的期瞒下，议和内容并没有得到执行，但成为以后蒙军执意武攻，拒绝议和的重要理由。宋蒙战斗中，也涌现出了众多英勇抵抗的南宋将领，如江西、湖北路制置使孟珙，多次抵抗住了蒙军的进攻，淳祐二年（1242 年）“元兵至三川，珙下令应出戍主兵官，不许失弃寸土。”帝问和议事，孟珙对曰：“臣

¹ 《宋史》卷 474《韩侂胄传》，第 13776 页。

介胄之士，当言战，不当言和。”¹说明了他保卫国土，至死不渝的决心。淳祐六年（1246年），当孟珙看到南宋当权派根本没有抗击蒙军，收复中原的决心时，珙叹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²淳祐二年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的于玠，全面负责四川的防备，当时四川的部分地区已为蒙军占领，他慨然“当手挈全蜀还朝，其功日月可冀”³。开庆元年（1259年）钓鱼城守军在主将王坚及副将张珏的协力指挥下，击退了蒙军，重伤蒙哥汗。除下这些抵抗的将士外，四川利州守将曹友闻、郢州守将李复明、文州守将刘锐、通判赵汝向、四川安抚制置副使用权彭大雅等众多将领都对蒙军的入侵，进行了坚决抵抗，他们的英勇行动鼓舞了抵抗派的抗蒙斗争，反抗侵略，坚决抵抗的现实主义思想与求和投降主义思想相抗衡。

在战争的第二阶段，随着贾似道的当权，南宋的抵抗派纷纷被贬，投降主义的思想占据了主要地位。

咸淳九年（1273年）元军破樊城，随后势如破竹，南宋大片土地失守，在南宋垂危的关头，德祐元年（1275年）贾似道亲出督师，率南宋军主力开赴前线，大军还未与蒙军正式交战，他便迫不及待地与蒙军议和，被元军拒绝后，不得不与元军在丁家州决战，战斗刚刚开始，宋军不战而溃，南宋水、陆军主力损失殆尽。面对元军的大举进入，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陈宜中和谢太后没有利用聚集在临安城外的十余万勤王军进行最后的抵抗，而是多次向元军求和，却都被元军拒绝。南宋统治者求和不成，仍不愿意放弃求和投降路线，不积极组织军民抵抗，反而逃跑求生。景炎元年（1276年）正月，南宋朝廷拒绝张世杰、文天祥提出的背城一战、以图求存的建策，一面送益王赵昀、广王赵昺南逃，一面遣使向元军请降。这期间虽有文天祥率军反攻江西，各地义军纷起响应，但终因势孤力单，败退广东，1279年元军在崖山全歼南宋军队，二月宋恭帝赵显率百官于临安降元，南宋亡。

这一时期的投降主义思想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南宋后期的投降主义思想与南宋军队的实力弱小，元军的强大、残暴有关。南宋能够抵抗蒙（元）达四十余年之久，如前所述，主要原因

¹ 《宋史》卷412《孟珙传》，第12374页。

² 《宋史》卷412《孟珙传》，第12380页。

³ 《宋史》卷416《余玠传》，第12469页。

是蒙（元）对宋发动进攻有着阶段性，因为内部统治阶级的斗争，灭亡南宋的战略被推迟。南宋军队与（蒙）元的实力有着较大差距。如果在此期间蒙古没有西征北伐，如果集中力量灭亡宋，宋（蒙）元的战争是无法进行四十年。特别是咸淳三年以后，在元军猛烈的攻城占地中，南宋统治者自己也认为以南宋军队之力，根本不是元军对手，与其早晚都要投降，还不如早些投降以降低军队人员的损失。

第二、贾似道擅权用事，打击有实权的将士，使一些将士更弦易张。贾似道用“打算法”，以核诸兵费之名，把一些与其有矛盾的将领或贬谪，或杀害，这使一些将领选择了投降蒙古。如宋将刘整在受到贾似道的排挤后降蒙，并向忽必烈献“先攻襄阳，经汉水突破长江”的计策。

第三、南宋末年的投降与北宋末、南宋初的投降主义一脉相承。虽然在南宋也有着现实主义的抵抗派，但投降主义思想一直在南宋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些思想对南宋末期产生了巨大影响，南宋初、中期的投降主义思想给予后期有着示范作用，南宋的三次议和，都保持了赵宋王朝的延续，使南宋后期也把投降作为了一剂“良药”，认为只要给予元一定的土地与财富，统治者就能够苟安。

第四，理学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宋理宗时确定了理学的正统地位，理学对南宋后期的外交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理学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思想系统，理学对外交思想有积极影响的一方面，如朱熹曾经认为“金虏于我有不共戴知之仇，则其不可和也”，所谓讲和者，有百害无一利。”他斥责投降派，“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者”。对秦桧“欲食其肉而寝其皮”，而对抗战派岳飞，则认为“直是忠勇也。”理学的这些思想，起到了激励南宋人对外来入侵进行抵抗作用。但是后来，朱熹感叹南宋局势无望，转入消极的一面，开始不愿意过多谈论政事，推崇理学的士大夫们读朱熹集注的《四书》，还有《太极图》、《近思录》等，他们认为“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国捍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以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为俗吏”，对于战争的准备，宣扬“其备不在乎边境而在乎朝廷”，认为“整顿边防，充实府库，训练士卒……都不值得考虑”，¹否定一切作战准备，在宋金、宋元矛盾尖锐的情况下，理学思想也成为南宋统治阶级推行投降政策的思

¹（宋）周密：《志雅堂杂钞》卷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0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想基础，具有明显的消极作用。南宋末期的贾似道，更是打着尊崇道学的旗号，把这些理学家，列据要津，终至于“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¹而后已。

¹（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道学》，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182 页。

第三章 宋朝外交思想的主要特点及类型

从宋代外交思想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宋代外交思想突出表现为以下四个主要特点，一是“守内虚外”，消极被动的特点；二是积极谋求和平的特点；三是外交思想中重视道德感化的特点；四是在强敌面前妥协退让，求和投降的特点。这些特点渗透于宋的外交思想中，长期指导着宋的外交政策，且影响深远。

第一节 “守内虚外”，消极被动的特点

宋初吸取了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削平藩镇，减少地方军队、扩大中央禁军，从太宗朝后期统治者开始呈现出“守内虚外”，以防内为主，对外则消极被动的特点。宋太祖时期为减少与辽发生事端，多次告谕边民不得出塞，以保安定为主。遇到辽军进犯，也只是命令宋军将其驱逐出境，不得追击，扩大冲突。宋太宗在收复燕云受挫后，为巩固皇位，明确提出了“守内虚外”的思想，为阻止辽的侵扰，太宗朝采取开挖沟渠，以防御的姿态遏制辽兵南下。太宗朝时，“守内虚外”，消极防御的思想在大臣广泛存在，如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左拾遗、直史馆张齐贤在谈到燕云地时，上疏曰：“契丹不足吞，燕蓟不足取。自古疆场之难，非尽由于敌国，率由边吏扰而致之。”他认为：“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乎！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¹张齐贤认为要以内部稳定为主，不要边吏滋生事端，也不要争燕蓟失地，对外只是防范就可以了。太宗端拱年间的参知政事张洎也提出，“练兵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御备，去则勿追”，“不以城邑小大，咸浚筑垒，分师而守”²，即宋朝在边界只限于防守，很少或完全不要主动出击，而是筑城来守御，其消极防御的思想彰明较著。澶渊之盟后，随着国内矛盾的加剧，军事力量渐弱，后世统治者在处理对辽、西夏、金的关系时，都把“虚内守外”、以防为主的思想作为他们外交思想的基础，宋朝外交思想与汉唐相比，保守的重内轻外思想取代了积极进取、外向的精神，造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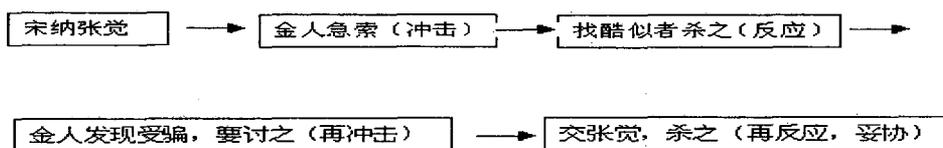
¹ 《长编》卷21，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辛卯，第484-485页。

² 《长编》卷30，端拱二年正月癸巳，第667页。

了宋在对强国外交中显得分外怯懦和萎缩。

宋的消极防御与被动退让紧密相关，在北宋末与南宋整个时期，外交思想被动性非常明显。宋的外交一般都是受到外来的入侵后，进行抵抗，在外交谈判时也是对方提出要求，而宋王朝被动答应要求。如在宋纳张觉后，宋金外交中非常清楚的表现了这一被动的过程。辽将张觉降金后，又转而降宋，金要求宋交出张觉。从下图中，可以看到整个过程是“冲击—反应—再冲击—再反应的过程，事件最后以宋被动地妥协退让而告终。”

图2 宋纳张觉事件中的“冲击——反应”



在这个过程中，宋不论是否交出张觉，都是将金人得罪了，如果不能得罪金人，一开始就该慎重对待，轻易接受张觉的请降后，就应该对金的责难有所准备，能够承担起事情的责任，而宋在外交中，一直是在外来的冲击下，进行反应的。再如宣和五年(1123年)，金人以攻下燕京为名，要求增加岁币及犒军银。徽宗虽感到金人欲壑难填，但也无可奈何。他说：“女真贪暴，残民害物，虽黄巢不如，讵能久耶？然彼既入关，先据燕地，朕恐为后患，不惜增百万以啖之，且解恤目前之纷也。”¹不断的退让，使金人鄙视宋的无能，引起了金人的贪欲，促使金人发动了对宋的全面进攻。

因为中国古代外交中不乏消极被动、妥协退让，直至投降求和的事例，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中华文明缺乏内在动力去突破传统框架，它只能在巨大的冲击下，被迫对西方做出反

¹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5，宣和五年三月一日甲寅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1-1422页。

应”，¹在此理论的基础上，费正清认为在外交上，只有外来入侵者，给予中国冲击，中国才能作出反应，中国害怕真正的战争。“中国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化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²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也许可以概括某一个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与思想，并不能以偏概全的来诠释全部中国的历史，更不能来说明将来的中国外交思想模式。中国历史中，有些时期可能在外来的冲击下，统治阶级的外交思想充斥着消极被动，甚至妥协投降的特点，如北宋末年南宋初期，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与思想似乎能够验证“冲击—反应”模式，但必须注意到的是，中国更有英勇不屈、反抗外来侵略者的现实主义思想，而这类思想是积极主动，即使没有冲击，也能主动的行动，“冲击—反应”模式无法解释中国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因此也只能是一种片面的理论。

第二节 积极谋求和平的特点

古代中国以农业为主，社会倡导“天人合一”的思想，侧重和谐，认为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是和，宇宙的正常状态也是和，这种状态即为“太和”³。《论语·学而》中率先提出了“和为贵”思想：“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友好相处、互助平等的精神，成为古代中原王朝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中国古代王朝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是和平的文化影响，而非武力的征服和领土的扩张；是国际体系的领导者和维护者，而非统治者和掠夺者。”⁴宋代继承了前代“和为贵”思想，并且将这种思想贯穿于整个朝代的外交之中，成为外交思想的主要特点。“和为贵”的思想包括宋对大国关系和平相处的冀求；以财富换取和平的思想；在朝贡体系中，不干涉别国内政，以诚待人，厚加慰抚的和平思想等。

一、和平思想贯穿着整个宋代

宋太祖时期，在对辽关系中，一直遵奉“和为贵”的思想。在“上(宋太祖)

¹ (美) 费正清等：《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32-453 页。

² *Su-yu Teng and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1.*

³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52-253 页。

⁴ 韩昇：《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及其基本原则》，载《学术研究》，2008 年第 8 期。

欲敦信保境”¹，“国家自祖宗以来，不急于边疆之功，以爱民安人为上急而已”，“昔太祖但以丰财练兵保境为事。”²宋太祖在统一中原的过程中，多次与辽开展了外交活动，对如何收复辽控制下的燕云地区，宋太祖“讨平诸国，收其府藏，贮之别府，日封椿库，每岁国用之余，皆入焉”，打算“俟所蓄满五百缗，遣使北虏，以赎山后诸郡；如不我从，即散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³宋太祖设置封桩库，积蓄金帛，首先希望通过“赎买”的方法，解决燕云问题，以保持与辽的和平关系，表现了他对辽关系中的和平愿望。太宗即位后，在继续完成国内统一的过程中，对其他政权也有着“和平为上”的思想，他经常对近臣曰：“朕每读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代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⁴淳化五年（辽统和十二年，994）八月、九月，太宗两次遣使至辽议和，关于求和条件，他曾谓宰相曰：“朕览史书，见晋高祖求援于契丹，遂行父事之礼，仍割地以奉之，使数百万黎庶陷于契丹。冯道、赵莹，位居宰辅，皆遣令持礼，屈辱之甚也。敌人贪婪，喝之以利可耳，割地甚非良策。”⁵太宗希望宋、辽之间能够达成和议，并把和议的底线定为“不割地”，从中可以看出太宗淳化年间对于宋辽和平的渴望。对于宋的请求，辽圣宗虽未允，但此后亦对边将加以约束，下令不许“随意入宋剿掠”⁶。

宋初“和为贵”的外交思想，也时常从大臣们的奏折中呈现出来。在契丹频频入寇的情况下，雍熙四年（987年）太宗诏询文武御戎之策，殿中侍御史赵孚奏议曰：“臣愚以为不用干戈，不劳飞挽，为万世之利者，敢献其说，惟明王择之。古者兵交，使在其间，飞矢在上，走驿在下。盖礼道信义，自有典常，不可废阙也。此时犹须行礼命之书，通和之事，自然驯致率服，永无战争，复三皇道德之风，广一统太平之业。上嘉之。”⁷端拱年间太仆少卿张洎上疏言边防事时曰：“审睹天下之形势，忧患未已，唯与之通好，或可解纷。”⁸由此可见，宋

¹ 《长编》卷2，建隆二年十月丙申，第54页。

² （宋）张方平：《张方平集》卷18《对诏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28页。

³ （宋）王辟之：《澠水燕谈录》卷1《帝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

⁴ 《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十月辛丑，第528页。

⁵ 《长编》卷26，雍熙二年春正月丙戌，第594—595页。

⁶ 《辽史》卷12《圣宗三》，卷13《圣宗四》，第132—146页。

⁷ 《长编》卷28，雍熙四年四月己亥，第635页。

⁸ 《长编》卷31，淳化元年六月丙午，第702页。

初统治者外交思想中突现“以和为贵”的特点。真宗即位后询问治国方略，王禹偁上疏陈五事，第一件事就是“谨边防，通盟好，”真宗认同王禹偁的观点，把“以和为贵”作为外交思想的重要原则。真宗在景德元年与订立澶渊之盟，以金帛换取了和平，“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¹议和以后，双方基本保持了和平的安定局面，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宋人对“澶渊之盟”后北宋、辽双方的和平局面及北宋方表现的和平精神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太祖开万世之基，太宗定四海之难，而和戎戢兵以致太平者真宗也。”²

仁宗即位后，西夏建国，并不断侵扰宋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仁宗派兵讨伐西夏。随着宋夏战争形势的变化，和戎主张逐渐得到了最高统治者及当政者的认可。庆历元年（1041年），知谏院的张方平反对宋夏兵戎相见与宋对夏经济封锁，上奏曰：“臣尝就自边来者询贼中事，多云贼为寇三年，虽尝得逞，而绝其俸赐，禁诸关市，今贼中尺布可直钱数百，以此揣贼，安得不困？但其势未能自通，宜因郊赦，特示招来，愿陛下计而行之”，宋仁宗看后说：“此吾心也”³。从庆历三年（1043年）开始，宋廷开始准备与夏议和，欧阳修总结了人们对和议的几种意见：“今公卿士大夫忧国者，人人各为陛下深思远虑，惟恐庙堂之失策，遂落戎人之奸谋，众口纷纷，各有论议。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则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纾患。一曰羌人险诈，和而不肯罢兵，则与不和无异，是空包屈就之羞，全无纾患之实。一曰请和之后，不过欲退而休息，训兵选将，以为后图；然以河朔料之，才和之后，因循废弛，为患转深。一曰纵使元昊称臣，西边减费，然犹有大可忧者。北敌必揽通和之事以为己功，过有邀求，遂兴兵革，是暂息小患于关西，复生大患于河北。臣忝为耳目之官，见国有大事，旁采众论，虽有异同，然大抵皆为就和则难，不和则易，不和则害少，和则害多。”⁴经过这些分析，欧阳修要求仁宗要集百官廷议，慎重从事，后来他在几次上奏中，都坚决反对与夏议和。朝廷中韩琦、范仲淹、孙甫等许多重臣都与欧阳修的态度一致，如谏官孙甫言：“窃观与西人议和，其利一而其害有四。且西边宿兵以来，国用空

¹ 《宋史》卷173《食货志·农田》，第4163页。

² 《要录》卷138，绍兴十年十月丁丑，第2217页。

³ （宋）张方平：《乐全集》，卷20《请因郊祀肆赦招怀西贼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⁴ 《长编》卷142，庆历三年七月乙酉，第3403页。

耗，而民力匱乏，今若与约和，则边兵可減，科斂可省。其为利一也。”四害即“（对辽）但增岁賂。”“（对夏）賂遗之厚，彼必专力以制二蕃，强大之势，自兹以始。”“今其势大屈，若复安逸，则他时之患，不可枝梧矣。”“因议和弛备，复如曩日。”¹在各种阻力下，仁宗还是以“和为贵”的思想出发，在庆历四年（1044年）与夏正式达成协议，每年给与西夏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对此，仁宗于庆历四年冬十月庚寅给赐誓诏曰：“联临制四海，廓地万里，西夏之土，世以为肺。今乃纳忠悔咎表于信誓，质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诸子孙，无有渝变。申复恳至，联甚嘉之。俯阅来誓，一皆如约。所宜明谕国人，藏书祖庙。”²从赐誓诏书中，表现了仁宗希望与夏弃之兵戈，和平相处的思想。

宋真宗、仁宗时期的和议，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是“和为贵”思想被后世继承，而另一方面“和为贵”的思想也造成了北宋末年与南宋年间，非常严重的以金帛换和平的思想，最后甚至演变成了无条件投降的思想。北宋末年，靖康之役失败后求和，“重蒙金诺，与国通和。帝谓‘发肤亦所不惜，况于金帛，岂复有辞！’”³最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南宋初年，在金兵的追赶下，高宗多次派人去与金议和，金人对南宋提出的一切条件，南宋都会无条件答应。当时议和之声鼎沸，如绍兴八年（1138年）枢密副使王庶提出讲和为上，他上奏曰：“且以目今金人利害言之，讲和为上，遣使次之，用兵为下。何以言之？金人自破大辽，及长驱中原，几三十年矣，所得土地，数倍汉唐，所得珠玉子女，莫知纪极，地广而无法以经理，财丰而恃势以相图，又老师宿将，死亡殆尽，主幼权分，有患失之虑，此所以讲和为上也。”⁴中书舍人孙覿也上奏曰：“臣熟思之，莫如议和为上策，彼顿兵观阙之下，见天子宫室城池苑囿之大，而西兵日至，正疑惧不测之时，陛下戒诸将坚壁固守，不施一镞、不交一刃，使野无所虏掠，然后与之议和，必竦然听命，卷甲而归，足以示德矣。”⁵“以和为贵”的思想在南宋时期外交中，可以说不绝于耳，虽彰显了宋代外交思想一贯和平的特色，但对外来入侵不敢抵抗，抛弃国家利益，不惜割地，无条件的“以和为贵”，只能墮落

¹《长编》卷145，庆历三年十一月辛巳，第3500-3501页。

²《宋大诏令集》卷233《赐西夏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08页。

³（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卷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03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⁴《要录》卷123，绍兴八年十一月丁未，第1988页。

⁵《三朝北盟会编》卷62，靖康元年十一月七日，第970页。

为屈己乞和的投降主义，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与唾弃。

二、朝贡体系中的和平思想

在朝贡体制中，中国与贡国的关系基本遵奉了不侵略、不干涉内政、“厚往薄来”的和平思想，朝贡国是否与中国往来、是否向中国进贡，是自由选择，而不是用武力获取，朝贡体系内的“和为贵”思想是建立在儒家伦理观上，以仁、义、礼、德、信等为基础，在外交中不仅“以诚待人”，还要“以理服人”，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矛盾。如太平兴国年间，交州与占城发生战斗，不断有占城人来附宋朝，宋都妥善安置，后来“交州欲以占城俘九十三人来献，上令广州止其俘，给衣服资粮遣还占城，诏谕其王。”¹在朝贡中，宋廷历来都是“厚往薄来”的原则，朝贡国携带贡品来朝，宋皇帝的回赐一般都远远厚于贡品，如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吐蕃诸戎以马来献，上召其酋长对于崇政殿，厚加慰抚，赐以束帛。”²淳熙五年（1178年），三佛齐国入贡“计其值二万五千缗，回赐绫锦罗绢等物银二千五百两。”³元丰三年（1083年）正月，诏：“高丽国王每朝贡，回赐浙绢万匹，须下有司估准贡物乃给，有伤事体。宜自今国王贡物，不估直回赐，永为定数。”⁴元祐二年（1087年）正月，于阗来贡，“诏于阗国黑汗王贡方物回赐外，余不以有无进奉，悉加赐钱三十万”。⁵“厚往薄来”的原则，显示了宋王朝外交思想的和平特色，这种“以和为贵”的思想，不但加强了与朝贡国的关系，也使朝贡体系得以巩固与延缓。

三、和平思想的来源

儒家思想为基轴的中华文明对外关系强调和谐，主张中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不以暴力去迫使周围诸国的降服。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占有了十分突出的位置，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较周边地区先进，使中国人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没有物质缺乏的困境感，中国人所具有的温和、平实、兼爱、非攻、求安定的性格，“协和万邦”、“天下太平”、“家和人贵”的理想社会就成了古代中原王朝追求的对外目标。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也反对打破现行秩序和成规。中庸之道特别强调安于现状：“素富贵，

¹ 《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64，第7745页。

² 《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九月庚午，第553页。

³ 《宋史》卷119《宾礼四》，第2814页。

⁴ 《宋会要辑稿》，《蕃夷》7之36，第7857页。

⁵ 《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17，第7722页。

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¹目前是什么状况，就安于什么状况，不羡慕份外的东西。特别是南宋中后期理学思想有了发展，理学中特别主张“和为贵”，“和而始安”，理学在对“礼之用，和为贵”的阐述中，提出“不做作而顺于自然便是和”、“吾心安处便是和”²。追求和平是宋代外交思想的主要特点，但不是说宋代外交思想具有此特点，就不会出现战争，宋代也与其他政权时有战争爆发，而这些战争一般都是在外来的侵扰下，不得已而反击。如对真宗、仁宗时期的战争，宋人邵伯温作了如下客观评价，“本朝唯真宗咸平、景德间为盛，时北虏通和，兵革不用，家给人足。以洛中言之，民以车载酒食声乐，游于通衢，谓之棚车鼓笛。仁宗天圣、明道初尚如此，至宝元、康定间，元昊叛，西方用兵，天下稍多事，无复有此风矣。元昊既称臣，帝绝口不言兵。庆历以后，天下虽复太平，终不若天圣、明道之前也。”呜呼，仁宗之兵，应兵也，不得已而用之，事平不用，此所以为仁欤！”³在宋代的战争中，宋廷一般都是被动回应外来的侵扰，一旦有一线和平的曙光，宋廷会不惜金帛，以“和为贵”，选择和平。

中国古代外交思想中的和平特色，也被一些国外研究者关注，如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其《中国问题》一文中就曾提到，尽管中国发生过很多次战争，中国人天生的面貌仍是非常平和，他们的和平主义深深地扎根于他们思辩性的观点之中，也基于他们不想改变他们所看到的一切事物这一事实。”⁴有宋一代，求稳定、求和平的思想成为主流，“以和为贵”、“天下太平”的和平外交思想贯穿了整个时代，和平也成为外交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节 行“王道”，重视道德感化的特点

宋代统治者外交思想中特别注重以道德感化，即通过行“王道”，达到其外交目标。“考其祖宗立国初意，以忠厚仁恕为基，向使究其所为，勉而进于王道，亦孰能御之哉？”⁵表现了宋自立国开始，统治者希望通过“行王道”，用道德感

¹ 董志英注释：《大学 中庸 孝经》，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4 页。

² (宋) 朱熹：《朱子语类》卷 28，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52 页。

³ (宋)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 3，中华书局 1997 年，第 23-24 页。

⁴ 柳卸林：《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3 页。

⁵ 《宋史》卷 126《食货上一》，第 4156 页。

化的方法，实现“内圣外王”的外交目标。

一、行“王道”实现“内圣外王”

“古代中国多数时期中外交方式都是内敛式的以‘礼’感召，而非进行以霸道手段的对外征服，对外关系行王道”。¹行“王道”是以中原王朝为中心，建立起一种伦理道德规范。把“仁义”、“德化”的原则运用于处理对外关系上，凭借文化优势，依托国内的政治原则和道德理念去建立朝贡体系道德与价值准则。

“王道”与“霸道”相对立，宋人对“王道”、“霸道”有着明确的概念。李觏提出“所谓王道，则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谓霸道，则有之矣，尊京师也”²他认为“王道”、与“霸道”的区别是指立国者的地位不同，不是义利的不同。南宋秦桧也对“王道”、“霸道”有着这样的论述：“书生喜论王、霸，臣谓推诚任贤，是为儒学施于有政，是为王道。挟术任数，是为杂学施于有政，是为霸道。”³高宗认同他的看法。用“王道”还是“霸道”来达到“内圣外王”，宋人也有过争论，李觏主张义利并行，王霸并用，以此强国，反对只讲王道，不知霸道的俗儒之论，但是更多人提出行“王道”的思想。如太宗至道年间，对灵州是守，还是弃，通进银台司封驳事田锡上疏，“晓谕之意，以苏息万民为意，取舍之谋，以优恤万民为谋。令边敌知取舍之谋，使中外知损益之理，示朝廷之大体，表王道之至公”⁴，提出灵州不论坚守而是放弃，行“王道”之公平至为重要。南宋绍兴时期的右丞相留正曾曰：为国而或王或霸，治道之所出者，同源异派耳，霸政虽曰驳杂，而有纲纪，有政事，恩威足以使民，势力足以强国。如管仲、晏子所以用于齐国者，谓之不纯于道德则可，举而谓之挟术任数则不可，人而挟术任数，邪孰甚焉，未有不乱天下者。”⁵反对在对外关系中的“霸道”。不论宋人如何争论，其实最高统治者皇帝的选择一直是非常明确的，因为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祖宗之法”的遵奉，再加上军事力量的薄弱，两宋皇帝的外交思想中更加注重道德感化。

二、实现道德感化的主要途径

以“德”、“仁”对其他政权进行道德感化，是宋外交思想中融贯始终的一

¹ 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34 页。

² （宋）李觏：《李觏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372 页。

³ 《要录》卷 148，绍兴十有三年二月丙寅，第 2379 页。

⁴ 《长编》卷 42，至道三年十一月己巳，第 891 页。

⁵ 《要录》卷 148，绍兴十有三年二月丙寅注，第 2379 页。

个特点，“仁”即处理人际关系的精神指导，“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把人性中的“仁”推之以外交关系中。程颐、程颢继承儒家的传统仁政思想，把仁政作为王道政治的根本，他们说：“王道之本，仁也”，¹“治今天下，犹理乱丝，非持其端，条而举之，不可得而治也。故臣前所陈，不及历指政治之阙，但明有危乱之虞，救之当以王道也。”“人君欲附天下，当显明其道，诚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发政施仁，使四海蒙其惠泽可也”²。只有施行仁政，才能像理顺乱丝一样治好天下。“德”即推行道德外交原则，用道德的约束来代替“利害权衡”，在儒家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圣贤政治和道德治国。《中庸》、《大学》提出“修身”为治国，平天下之本。如《中庸》中提到：“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大学》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把“修身”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强调统治者要“为政以德”，朱熹对德的解释为：“德字从心者，以其得之于心也。”德是道德上的善心，如果能从心里体现这种仁心，也就具备了德。他说“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其象如此”，用好的德行执政，就能达到“人自归仰，如众星拱北辰”³的效果。行仁政，以德服人，是王道，才能使人心悦诚服，方能实现“近者悦，远者来”。

宋外交中始终如一贯穿着道德感化，“内圣外王”不是依靠武力取得，而是用“仁”、“德”的思想来感化其他政权，最终达到和平相处的局面。如至道年间吏部郎中、直集贤院田锡上疏时所言“若道尊德盛者，陛下劳谦以师之，才高识远者，陛下推诚以友之；友之则四友斯来，师之则三师可至。师道见尊，则天下何忧不理；王道得友，则天下何虑不宁。”⁴元祐年间著作郎罗处约所谈到的“陛下虔恭劳神，厉精求理，力行王道，坐致太平。”⁵宋王朝现实的地缘环境是复杂多变的，对其他政权来讲，“仁”、“德”有时是不能够满足他们对现实利益的要求，以道德感化的思想来达到“内圣外王”，保持宋王朝的中心地位，得到众多朝贡国的尊重与顺服，不免有着理想主义的成份，这些“理想”也必然

¹（宋）程颐、程颢：《二程文集》卷6《上仁宗皇帝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34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47-649页。

²（宋）程颐、程颢：《二程粹言》卷下《君臣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69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13页。

³（宋）朱熹：《朱子语类》卷23《为政以德章》，中华书局1986年，第534页。

⁴《长编》卷41，至道三年七月丙寅，第875页。

⁵《宋史》卷440《罗处约传》，第13033页。

会在异族政权的欲望中破灭。

第四节 对强敌妥协退让、乞求投降的特点

有宋一代，经济繁荣发展，科技文化领先世界，但在与辽、西夏、金、蒙古的战争中，却屡战屡败，被动挨打，妥协退让、乞求投降成为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外交思想中的另一个特色。

一、 妥协退让的特点

自从宋太宗对辽战争失败后，放弃了主动进攻的战略方针，开始对辽妥协退让。太宗端拱年间宰相李昉提出了“深以屈己修好，弭兵息民”，¹宋廷遂尝试与辽议和。洎真宗即位，“惩丧师之衄，遂下诏边臣，寇至但令坚壁清野，不许出兵。纵不得已出兵，只许披城布阵，又临阵不许相杀。贼知我不敢出战，于是坚壁之下，不顾而过，一犯大名，一犯澶渊，是故虽无丧师之失，而有长驱之患。”²景德元年，真宗听到辽军大举进攻的消息后，惊惶失措，虽在寇准的劝谏下，勉强亲征。辽军孤军深入，长途跋涉，疲惫不堪，先锋大将萧挞凛被射杀，士气受到挫伤，辽军主动议和，在此有利的形势下，真宗仍然妥协退让，签订了每年给予辽岁币的澶渊盟约。“澶渊之盟”虽在以后达到了宋、辽上百年的和平历史，但是，在当时宋人的思想里，“澶渊之盟”是一种耻辱，就连主和派王钦若也曾经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³真宗为消除“澶渊之盟”的耻辱，达到心理平衡，他与王钦若等伪造“天书”，东封西祀，大造宫观，制造祥瑞。继真宗上台的仁宗，也不过是守成之君而已。宋仁宗庆历二年，宋夏战争如火如荼，辽国趁机遣使强迫宋王朝割让关南地，对此，仁宗没有坚决拒绝，反而以“北朝所欲，不过租赋尔。朕不忍多杀两朝赤子，故屈己增币以代之。”⁴仁宗派使臣与辽进行交涉，以宋王朝的妥协退让，向辽增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才幸免了契丹族的入侵。神宗时期，熙宁七年(1074年)，辽主以河东路沿边增修戍垒，有着“包制四夷”远大志向的

¹ 《宋史》卷 265《李昉传》，第 9137 页。

² 《长编》卷 153，庆历四年十二月乙卯，第 3729 页。

³ 《宋史》卷 281《寇准传》，第 9531 页。

⁴ 《宋史》卷 311《富弼传》，第 10251 页。

王安石，却有着“若争小故，恐害大计”，“小事不计较”¹的妥协、退让的想法，最终宋王朝还是承认了辽国侵略的既得战果。宋神宗想收复以前被西夏获得的失地，先胜后败，永乐之战惨败后，更不言进取。哲宗时，西夏索五州地，在众臣的“若朝廷姑务息民，推天地之大德，曲示含容，抑群情之忿怒，不与丑羌计较，”²的议论下，统治者妥协退让，还地“示德”，却使西夏的得陇望蜀，宋、夏不得不战。宋徽宗妄图借金的力量恢复燕云地区，由于军政的腐败，加上将收复燕云的希望全部寄托在金人身上，所以在缔结盟约过程中，宋朝始终表现出外交上的软弱和妥协。宣和四年(1122年)十月底，赵良嗣在与金的谈判时，提出“钱物则不较”，³为以后金人无休止的索取提供了心理暗示。

二、无原则的乞和投降思想

北宋末年，在金人的入侵下，宋统治者的外交思想也从妥协退让，发展成了乞和投降。大敌当前，徽宗、钦宗不是团结一致，积极抵抗，而是互相猜疑，求和投降。金人占领东京，索巨额金银，宋钦宗即不顾实际情况，无原则的同意了金人的无理要求，命人四处搜刮，为金筹钱。面对金人残暴肆虐，钦宗不是积极组织东京外的勤王军队，进行抵抗，而是多次向金致书，语言卑微、无原则的不惜一切进行求和，如靖康元年(1126年)闰十一月二十六日，宋钦宗致书金国相元帅、皇子元帅：“久蒙恩惠，深用感铭。不省过尤，尚烦责数。比者大兵累至城下，危然孤垒，攻击何难？及已登临，犹存全爱，方图请命，更辱使音，特俾安心，仍无后虑，感极垂涕，夫复何言！谨遣右仆射何桌、济王栩、中书侍郎陈过庭求哀恳告，切冀收兵。天雪沍寒，敢祈保啬。”同日，又写《宋求再造书》，“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国相、元帅军前：“李若水等到，特惠书诲及传面谕意指，备悉宽仁，感刻难弭。已依宠谕，遣右仆射何桌、济王栩、中书侍郎陈过庭前去请命，更望再造，保安宗社，爱全生灵，不胜恐惧哀祝之至。”次日又有《宋求哀请命书》“所有欲约事目，一一谨即听从，便当歃血著盟，传之万世。”⁴其不顾一切的投降行动，并没有使国家免于灾难，反而使国家沦亡，二帝“北狩”。

¹ 《长编》卷234，熙宁五年六月丙子，第5692页。

² 《长编》卷403，元祐二年七月丁丑，第9825页。

³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1，宣和四年十一月一日丙辰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

⁴ (金)佚名：《大金吊伐录》，《宋求再造书》《宋求哀请命书》，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84页。

南宋高宗基本沿袭了徽宗、钦宗的逃跑投降的思想，高宗在南京即位后，逃跑投降的思想严重，宗泽、李纲等抗战派一再要求他回到东京，但他慑于金朝的兵威，他一路逃亡，远离东京。从建炎元年至七年，七年间主要的时间都在逃避金人的围攻，靖康二年五月朔，（高宗）即皇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十月，逃至扬州。三年二月，渡江逃至杭州。十二月，自明州逃到了海上。四年正月，又逃至温州。四月，逃至越州。绍兴二年正月，又逃至临安，四年十月，又逃至平江。五年二月，还临安。六年九月，又逃至平江。七年四月，逃至建康。八年二月，复还临安。¹在不断逃跑的过程中，高宗也在不断向金求和，宋建炎三年（1129年）五月，宋高宗由杭州进驻江宁，改名建康府，派洪皓向金宗翰求和，八月，再派杜时亮为使求和，且致书左副元帅宗翰，略曰：“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此所以思思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远涉，而后为快哉。”²南宋政权稳定后，高宗继续对金称臣，奉行求和投降的外交思想，重用秦桧，残酷排斥、打击主战派，与金签订割地投降的绍兴和议，士大夫们不以为耻，反而阿谀奉承高宗以“仁胜”，“敌起兵三十年，用人如牛羊，杀人如草菅，而陛下视民如伤，不惮屈已增币俯约讲和之请，冀与天下休息，此仁胜也”。³在此之后，宋在金、元的入侵下，宋统治者很少有积极反击，多数是迟钝被动地挨打，败亦求和，不败亦求和，与金相继签订了隆兴和议、嘉定和议。联元灭金后，南宋在元的强大攻势下，依然行走在求和投降的老路上，但“求和投和”抵抗不了蒙古的铁骑，腐败没落的南宋王朝在元的进攻下崩溃了。

三、宋代外交妥协退让、求和投降思想的主要原因

第一，长期以来“守内虚外”的结果。

军事上守内虚外政策，造成北宋边防空虚，军队战斗力下降。宋政府用主要兵力驻守内地，以镇压人民的反抗，而仅以少量兵力驻防边境，在边境上实行消极防御的政策，尽管北宋政府豢养了百万军队，也阻挡不了辽、西夏的进攻。宋与辽、夏多次作战失利后，北宋政府只能屈已求和。正如王夫之所指出的，“宋之猜其臣也，甚矣！鉴陈桥之已事，惩五代之前车，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

¹（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5《中兴定都本末》，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9页。

²《要录》卷26，建炎三年八月丁卯，第524页。

³《要录》137，绍兴十年七月乙卯，第2201页。

即到高宗，微弱已极，犹畏其臣之强盛，横加侵削。”¹

第二、最高统治者的软弱无能。

宋神宗之后的皇帝，生当末造，缺乏经纶济世之才，没太祖、太宗那样的满腹韬略，也不及神宗具有创新的改革信念，在性格上懦弱无能，对强大的辽、金、元政权产生了恐惧的心理，这种心理是滋生妥协、退让、屈服的肥沃土壤。如高宗作为人质在金营中看到了女真兵马的野蛮残酷、横行无忌，对金朝存满恐惧。同时高宗有着办事惟简，行动惟静的性格，曾对近臣说：“昔人有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朕尝躬行此语。”并且要求大臣们“亦当效曹参之清静”²。高宗性格中的软弱，愿意清静，害怕麻烦，与对金的恐惧，其结果就是自始至终把议和视为救命稻草，畏缩、退让、一味的对金屈已求和。

第三，继承儒家思想中的“和”、“仁”、“无为而治”等思想。

儒家思想中的“和”、“仁”等思想，使宋统治者有着“和”为上，息事宁人，对外族政权的进攻与不合理要求，不与之计较，能忍让就忍让，特别是澶渊之盟后，北宋统治者认为经济手段可以代替军事手段，并且其代价和危险性要比军事行动低得多。宋人对此议论曰：“我宋之安，景德之役也。靖康之役，亦景德之役误之也。景德王师一动而诛挾览，契丹不能渡河也，三从遂使靖康坐守京城，而觐敌之不渡河。景德不战而和，欲和者敌也，遂使靖康坐视敌之深入，而独意和好之可久。景德既和，诏边郡无邀敌归，所以示大信也，遂使靖康敌人议割吾之三镇，而犹纵敌不追。其守不足以为谋，其和不足以为信，其纵不足以为德，准（寇准）之言，至是验矣。”³说明了景德之役用金帛换来的和平，对后世的影响。导致北宋以至南宋统治者往往采取“岁赐”或“纳岁币”，以妥协退让，避免对外作战，来换取和平。

第四，安于现状，以财富换和平的思想。

两宋时期，我国的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城镇繁荣，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人们则：“太平日久，化合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处于和平中的宋人，对战争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感，安于现状、稳定是他们首要的需求，

¹（清）王夫之：《宋论》卷10，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97页。

²《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戊戌，第2287页。

³（宋）吕中：《宋大事记讲议》卷7《契丹》，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68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0-261页。

甚至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在这种大环境下，享乐思想大行其道，也滋生了妥协退让，以财富换和平的思想。

第五节 宋代外交思想的主要类型

从宋代外交思想的发展与特点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宋代外交思想的四个主要类型，一是遵守“祖宗之法”、墨守成规、“守内虚外”、消极被动的保守主义思想；二是重视道德感化，用“王道”的方法，实现“内圣外王”目标的理想主义；三是在强敌面前妥协退让，逃跑求和的投降主义；四是与投降主义相对立的现实主义，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积极抵抗外来入侵，反对求和投降。

以上四种宋代外交思想的类型，有些类别从词语中就能非常明确的知道所指代思想是什么，如投降主义。而有些类别却感到比较陌生。运用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保守主义等词汇对宋代外交思想进行分类，一是借鉴了今天国际政治学中对古代及现代主要国际政治思想流派的分类方法。古代现实主义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公元前五世纪，古罗马的希罗多得、古希腊的修昔底德，古代理想主义思想的起源也可以追溯至公元前四、五的古希腊的柏拉图。虽然对古代思想的分类产生在近代，但古代政治思想产生时间很早，并且今天的政治思想是在其基础上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近代的分类方法对思想本身并无任何改变，只是为了便于今天对古代思想的分析研究。二是10-13世纪期间，两宋思想文化快速发展，从宋代外交思想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现实主义、投降主义、理想主义、保守主义等思想类型还是比较清晰可辨的。

因为宋代外交思想的复杂多样性，这些类别在任何时期、任何人身上都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复杂多变的，只是为了更好的对外交思想进行研究，这种分类将对于宋代外交思想的个案研究、类别研究、发展过程研究都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

外交思想的复杂性，也使这些分类的类别之间时有交叉。如“和为贵”的思想，重视和平的构建，从思想归类中可以归于理想主义，而如果从宋代外交思想的发展中，又可以把它归于遵守成法，保持现状的保守主义。

另外，人的思想也是在发展变化，如一个人在某一时期，可以有着理想主义的思想，当理想主义破灭后，会转而变为投降主义的思想。也有的人思想中，有着不同类型的思想。如当金人兵临城下时，一些人就是彻头彻尾彻尾的投降主义，而当军事威胁暂时解除时，这些人又转而变成了现实主义的抵抗派。一个时期也

不可能只有一种思想存在，而是这几种类型的思想并存，只是在某个特定时期，一种思想可能会占据主流地位。不论在古代，还是在今天的政治思想中，这些类型思想的交叉都是存在的，这些交叉与重叠给外交思想的分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在以下各章的外交思想分类研究中，仅从思想类型及个人思想的主要方面进行分析与研究。

第四章 宋代现实主义外交思想

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源远流长，公元前四百年修昔底德在其著名的历史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提出了现实主义原则性的问题，如政治生活具有现实性，重视权力，不用道德标准来评价国家的行为等。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荀子、张仪、苏秦等，也提出了部分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如文种把国家复兴、复仇和霸权作为外交的最高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外交可以不择手段。尽管现实主义思想出现的很早，但直到 20 世纪美国国际政治理论家汉斯·摩根索才把这些古代现实主义思想归纳为“古典现实主义”。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几个核心论点是：无政府状态是世界体系的基本特征；各自独立的，以利己主义为中心的行为体在缺乏公共权威的状态下互动。国家追求自身安全或权力，国家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追求权力，各国间的利益冲突与实力不均使国家间权力斗争不可避免，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国家总希望获得比别国更多的相对权力，一国相对他国的权力膨胀，必然产生扩张野心。

虽然宋代以外交“积弱”而著称，但是纵观整个朝代，也存在着一些具有远大抱负，坚决维护国家利益，英勇抵抗外族侵略的现实主义者，其中以范仲淹、王安石、李纲、岳飞等为代表，他们的积极防御、立足于战，坚决与敌进行斗争的思想，构建了宋代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

第一节 范仲淹积极防御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千百年来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他推行庆历新政，开创北宋改革之先河。他守边四年，情系庶民，一心为国，殚精竭虑，其外交思想经过实践检验，成为仁宗时期现实主义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欧阳修曾经评价他：“于陕西军民恩信，尤为众所推服”¹，西夏王元昊称他为：“龙图老子”²，甚至百年后，高宗依然感叹他熟知边事，“智勇兼资，练达边事”³。学术界对范仲淹的著述较多，如方健《范仲淹评传》¹，

¹（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 13《上仁宗乞令韩琦居中范仲淹在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13 页。

²（宋）王辟之：《澠水燕谈录》卷 2《名臣》，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4 页。

³《要录》卷 26，建炎三年八月戊申，第 519 页。

分析了范仲淹政治、哲学、军事、经济、文学、教育思想和人才观，在第二章《军旅生涯》中，论述了范仲淹经略陕西、宣抚河东的基本事迹，分析了范仲淹的攻守、防御的军事思想；曲延庆《先忧后乐范仲淹》²，介绍了有关范仲淹的政绩、故事与诗词，本书在政绩编中论述了范仲淹的守边经历，如延州御边，御夏和羌、论攻守策；颜庭锐《宋初新政名臣范仲淹》³也论述了范仲淹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的经历。论文主要有李华瑞《北宋仁宗时期联蕃制夏政策论述》⁴，认为仁宗时宋政府通过控制河西诸族政权来实现联蕃制夏，又通过招诱安抚，给以田土，使之成为直接与西夏作战的武装力量。李清凌《北宋治理西北边疆民族的思想与实践》⁵，其中在蕃官思想中，指出抚御和汉化蕃民，招纳团结其首领等。以范仲淹为名的今人著作较多，但一般都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对范仲淹的一生进行了论述，这些著作对范仲淹外交思想涉及不多。前人主要研究了范仲淹的治理西北边疆的相关思想。本节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范仲淹的积极防守思想，宋廷“正统”论、以及其外交中的忧患意识等作进一步的探讨。

范仲淹生于端拱二年（989年），皇祐四年（1052年）卒，字希文，祖籍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夏兵围延州，召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七月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今延安），担负起了西北边地御敌抗夏的重任。庆历元年（1041年）四月，范仲淹改知耀州，五月迁知庆州（甘肃庆阳），迁左司郎中，为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庆历三年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卒谥文正，人称范文正公。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西夏王德明死，子元昊继位，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建立了西夏国，党项的势力迅速发展，领域已“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倚贺兰山以为固”⁶。元昊称帝后，向宋廷提出“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⁷的要求，宋廷甚怒，在宝元二年

¹ 方健：《范仲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² 曲延庆：《先忧后乐范仲淹》，齐鲁书社2002年版。

³ 颜庭锐：《宋初新政名臣范仲淹》，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⁴ 李华瑞：《北宋仁宗时期联蕃制夏政策论述》，载《河北学刊》，1989年第6期。

⁵ 李清凌：《北宋治理西北边疆民族的思想与实践》，载《河西学院》，2008年第1期。

⁶（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33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⁷（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7，《康定元昊扰边》，丛书集成续编第40册，上海书

(1039年),下诏削去元昊官爵,除籍属,揭榜于边,并募人擒元昊。宋夏之间关闭榷场,禁止互市,宋夏关系破裂。康定元年(1040年)元昊发动了宋夏延州之战,宋军主将不辨敌情,中了西夏军设下的埋伏,被围困在三川口(今延安市枣园镇西约20公里处),全军覆没,主将刘平、石元孙被俘,只有延州城侥幸免于陷落,但也被夏军围困了一月有余。“东西四百里无藩篱,人心危恐”¹,形势异常严峻。在此危难之际,北宋朝廷起用了范仲淹。康定元年(1040年)五月,宋廷任命韩琦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为陕西安抚副使知延州,韩琦负责泾原路防务(泾原路治所在渭州,即今甘肃平凉),范仲淹负责鄜延路防务(鄜延路治所在延州,即今延安),组建成西北前沿新的防线。范仲淹守边三年间,在调查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对夏积极防御的思想。

一、积极防御,主动进攻的思想

康定元年,北宋朝廷面临西夏的进攻,是防守还是进攻,宋朝众臣议论纷纷,有人主张分五路进讨,有人则攻、守举棋不定,而范仲淹认为敌占据有利战略位置,不能冒然进攻,在严边城,实关内,坚壁清野的积极防御基础上,适时进攻。康定元年五月,范仲淹在深入前线实地调查后,上奏提出其积极防御思想:“兵家之用,先观虚实之势,实则避之,虚则攻之。”“为今之计,莫若且严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²宋军在边城严阵以待,使夏军没有机会进攻,这样二、三年后,夏军自然就疲惫而战斗力削弱了,等到夏军众心离叛之时,宋军就可以趁机进攻了。在上奏中,范仲淹反对冒然进攻,主要理由是:北宋数次战败,边疆残破,民不聊生,北宋军备松弛,兵士训练未精,将帅无谋;宋朝军队在数量上虽然要大大超过西夏军队,但是,缺乏精兵良将,军心涣散,战斗实力反而远不如对方,另外,地理环境不利于劳师远袭,如果想讨伐元昊,要长距离地穿越沙漠的荒凉地带,粮草军需供应都非常困难,在具体分析西夏与宋的具体状况后,范仲淹认为冒进则对宋极为不利,对夏的政策,还应以守为主,辅以适时的主动进攻才是良策。

负责泾原路防务的韩琦与范仲淹的主张不同,在三川口战争失败后,他依然没有放弃主动进攻的思想,欲五路进兵,速战速决,彻底歼灭西夏军主力。庆历

店出版社1994年版。

¹ (宋)曾巩:《隆平集》卷8《参知政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37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3页。

² 《长编》卷127,康定元年五月甲戌,第3012—3013页。

元年二月（1041年），韩琦上奏曰：“诚以昊贼据数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万，余皆老弱妇女，举族而行。陕西四路之兵，虽不为少，即缘屯列城寨，势分力弱。”北宋与夏的边防线绵延千里，陕西兵力分散，“彼势常专，我力常散”，造成了宋军在前线的失败。而宋军“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不敢与敌。中夏之弱，自古未有。”¹韩琦认为宋的总兵力虽数倍于西夏，却兵力布署分散，西夏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宋军的据点，造成了宋军的几次失败。如果宋军不全线出击，一举歼灭西夏的主力，而是以防为主，坐以待毙，就显得太软弱了。前线主帅夏竦起初赞同范仲淹的意见，后来转而支持韩琦。

范仲淹对韩琦全面出击的战术坚持认为不可，韩琦希望范仲淹在思想、军事上与自己保持一致，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他派秦州通判兼经略判官尹洙去说服仲淹，“（韩琦）约范公以进兵。范公曰：‘我师新败，士卒气沮，当自谨守，以观其变，岂可轻兵深入耶？以今观之，但见败形，未见胜势也。’洙叹曰：‘公于此乃不及韩公也，韩公尝云：‘大凡用兵，当先置胜负于度外’，今公乃区区过慎，此所以不及韩公也。’范公曰：‘大军一动，万命所悬，而乃置于度外，仲淹未见其可。’”范仲淹坚持在与西夏的战斗刚刚失败的情况下，全线出击是冒险的行动，这时最好的办法是谨慎防守，静观敌情，不轻易出兵。²韩琦没有与范促淹达成共识，按其原有战略思想出发，遂举兵入西界，兵至好水川，元昊设伏，宋军经过英勇战斗，有近万人阵亡，大将任福亦死于难，好水川宋军溃败，宋师“将校士卒死者万三百人，关右震动。”³韩琦的全面进攻之策略在西北再次受挫。

在宋军两次重挫后，范仲淹进一步思考了御夏方略，庆历元年十一月他上奏朝廷的《上攻守二策状》，对其“积极防御”的守边策略，进行了全面地阐述。

首先，范仲淹认为全面主动进攻与被动防守都不能使宋军处于有利地位。西北前线以往的攻守策略，或冒进，或应付，或被动，皆未得“适中”良策，宋军若兴兵深入，采取进攻态势，“诸路进讨，则兵分将寡，气不完盛。绝漠风沙，迷失南北，馈运辘重，动有钞掠。”⁴轻敌冒进，兵力分散，粮草难继，劳师远袭，终归会失败；而夏军长于集中兵力攻击，宋平时要处处设防。有的将士面对

¹ 《长编》卷131，庆历元年二月丙戌，第3099页。

²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7，中华书局1983年，第82页。

³ 《宋史》卷485《夏国上》，第13997页。

⁴ 《长编》卷134，庆历元年十一月乙亥，第3200页。

来犯之敌，奉命被迫进攻，以求牵制敌军，而将帅大多没有作战准备和方略，往往避实就虚，剽掠对方的虚弱之处，以夸耀功绩；无实际军事效用，因此宋军不宜采取深入敌境、大举进攻的方针。但如果宋军采取完全的防守态势，则又是完全被动，因为守边将士，大多不是当地土兵，久戍必定思念家乡和亲人，军心不稳，粮草依赖远途输送，长期以往，民力困乏，难以为继，可见被动防守，也非良策。

其次，范仲淹认为防守要有积极的态度，后备物质要自力解决。在防守中不能坐等敌人进攻，还要在敌人没有发起进攻之时，采取积极主动的防敌之策。积极防守，还包括在后备物质供应上，要自行解决。对此，他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如建立“筑寨”“营田”制度。“筑寨”，即宋军努力修固边城，在边城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把修建的新城寨，作为北宋的前沿阵地。“乃大为城寨，以据其地”，“俟城寨坚完，当留土兵以守之，方诸旧寨，必倍其数”。¹筑寨使军需能够自给自足，解决了长期以来军备物质依赖于远途运输的问题，加强了边界地带的军事力量。范仲淹主持修筑寨堡，修复金明寨、万安城，鄜延路青涧城、环庆路大顺城等，并收复了塞门寨等军事据点，这些城寨在防御西夏的军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延州的外围军事防线整体上得到加强。范仲淹认为建立“营田”制度有助于减轻朝廷向边地运输物资的负担，解决了长期困扰御边的后备物质供应问题，同时还可以产生御边安民的综合效应。“臣观今之边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营田，据亩定课，兵获羨余，中糈于官，人乐其勤，公收其利，则转输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兵徙家塞下，重田利，习地势，父母妻子共坚其守，比之东兵不乐田利，不习地势，复无怀恋者，功相远矣。倘朝廷许行此道，则委臣举择官员，约古之义，酌今之宜，行于边陲，庶几守愈久而备愈充，虽敌人时为边患，不能困我中国。”²在筑寨营田的同时宋军精练士卒，夏军如果大举进攻，宋军则扼险坚守，使他们无隙可乘，锋芒受挫，无功而返，夏国的经济就会贫乏，军队斗志也会逐渐消失，到那时就可迫使夏与宋讲和了。

再次，范仲淹主张在积极防御的同时，要适时发动局部的主动进攻。进攻的目的是为了构筑起更好的防御体系，适时的局部进攻应该成为积极防御的有效组成部分。范仲淹要求主动进攻夏方切入北宋境内的阵地，消灭以往宋、夏战争所

¹ 《长编》卷 134，庆历元年十一月乙亥，第 3201 页。

² 《长编》卷 134，庆历元年十一月乙亥，第 3203 页。

遗留的隐患，如延、庆二州之间的金汤（在陕西志丹县西）、白豹（在甘肃华池县北）、后桥（在甘肃华池县东）等地，使宋朝军马便于应接，进退有据，有效地拦住元昊的先锋力量。适时主动进攻，有力的打击了西夏军队，赋予了宋之防御体系的主动性与灵活性。

范仲淹认为攻与守要依据具体情况而定，“兵家之用，先观虚实之势，实则避之，虚则攻之。”¹他主张夏兵来得多就守，来得少就打，有机会进攻就进攻，每占一处，就在那里筑城修寨，训兵营田。这种步步为营，伺机而动的战略，才能保证西线边防的持久和稳固。

最后，范仲淹明确提出了对夏的主要战略思想。宋对夏要积极防御，防御的目的不是为了进攻夏，而是为了保证宋边境不受侵扰和边民能够安心生产。因此范仲淹认为对夏的主要战略思想就是：“国家用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匮”，“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富实，鸡鸣犬吠，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²击退入侵，还边疆和平，各族百姓和平共处，安乐生活，朝廷无穷兵黩武之举。事实上，当时北宋王朝确实无力大规模地进攻西夏，何况分路并进，兵力分散，指挥策应能力薄弱，物资供应困难，有力的防御确实要比冒进的进攻切实可行得多。

范仲淹在“积极防御”的思想指导下，整顿军队，选练精兵，严格训练，军队面貌一新，应变能力和作战能力大大提高。同时，他派遣军队，在延州周边主动出战，落实“以攻为守”的策略，给予夏军很大的威慑力，西夏军队相戒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指原知延州的范雍）老子可欺也。”³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元昊兴兵十万再次入侵，宋军在定川砦溃败，范仲淹接到军报之后，依据各路主动出击，相互策应的积极防御原则，亲自率众六千，由邠、泾援之，闻夏军已出塞，才返回。“始，定川事闻，帝按图谓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⁴好水川和定川砦的惨败，证明韩琦冒险进攻的方针难以收效，迫使宋仁宗主动放弃了进攻方针，改而采取范仲淹的积极防御攻之策。

二、以夷制夷的思想

¹ 《长编》卷 127，康定元年五月甲戌，第 3012 页。

² 《长编》卷 134，庆历元年十一月乙亥，第 3103 页。

³ 《长编》卷 128，康定元年八月庚戌，第 3036 页。

⁴ 《宋史》卷 314《范仲淹传》，第 10272 页。

“以夷制夷”即利用周边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利用一方之力，而克另一方之势的策略思想，即“以蛮夷伐蛮夷，中国之形也”¹，其主旨是建立备边御敌的统一战线，共抗“蛮夷”。前人对北宋“联蕃制夏”思想有过一些研究，如胡建华《北宋前期“以夷制夷”政策初探》²，论述了“以夷制夷”政策实施的原因及措施。周原孙《范仲淹御夏策略及措施》³，论述了范仲淹团结蕃部首领，招纳属羌的措施等等。在这里将进一步论述范仲淹“以夷制夷”的思想及效果。宋仁宗景祐、宝元年间（1034年—1038年），为讨西夏，宋采用了“以夷制夷”的战略，联络的西北地区少数部族政权主要有唃廝囉、于阗等国，如景祐时封唃廝囉国王为保顺军节度观察留后。宝元年间加封唃廝囉为保顺军节度使，兼邈川大首领。唃廝囉为了报答宋朝政府的奖擢，也为了其自身的发展，曾多次表示要“讨平夏以自效”⁴，并屡以奇计破元昊。范仲淹运用“以夷制夷”的思想，团结羌人，采取了以羌人制西夏的策略思想。宋王朝对陕西沿边居住着的羌人采取了抚绥的政策，其中有部分归服宋朝，组成蕃兵，帮助宋朝守边，被称之为“熟户”或“属户。”元昊反宋后，羌人熟户在元昊的武力威胁下，又纷纷归服西夏，成为内侵的先锋。许多北宋边防统帅，也不时率兵攻入羌人居住地区，因而激化了羌汉之间的民族矛盾。范仲淹认为在边境杀戮老弱羌人，使羌汉矛盾激化的做法十分错误，对沿边羌人，应采取“招抚”的政策，争取羌人，孤立元昊，达到巩固边防的目的。熟户蕃部“皆能辛苦，熟于战斗，如抚驭之间恩威得所，大可防托边界，减得兵马。”⁵为了把熟户安定下来，范仲淹对熟蕃，多方给以慰问、安抚，遭战争洗劫流离失所者则拨给土地妥善安置，缺少口粮的按月支给，缺少农具种子的，官为贷借。对外逃的熟户和来投顺的羌人给以土地、粮食，生活上加以照顾，把他们安置下来。他对蕃酋非常信任，“诸蕃质子，纵其出入，无一人逃者。蕃酋来见，召之卧内，屏人彻卫，与语不疑。”通过范仲淹等人的努力，终于使熟羌听从于宋廷，战争中愿意为之效命，羌汉民族间的关系，大为改善，“初，西人籍其乡兵者十数万，既而黥以为军，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罢，

¹ 《宋史》卷273《何承矩传》，第9331页。

² 胡建华：《北宋前期“以夷制夷”政策初探》，《中州学刊》，1988年第1期。

³ 周原孙：《范仲淹御夏策略及措施》，载《康定民专学报》，1990年第1期。

⁴ 《宋史》卷492《外国传八》，第14161页。

⁵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25《上仁宗乞令陕西主帅并带押蕃部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8页。

独得复为民。其于两路，既得熟羌为用，使以守边，因徙屯兵就食内地，而纾西人粟免之劳，其所设施，去而人德之兴，与守其法不敢变者，至今尤多。”¹从此，元昊的侵宋活动，兵尚未发，已有羌人前来报告，因而使北宋的防务大大改善。“诸羌皆受命，自是始为汉用矣”²在范仲淹的“招抚”政策感召下，归服元昊的羌人，又纷纷回归北宋。他对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贼亦不敢辄犯其境，”³从而使元昊更加孤立，“招抚”之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三、宋为正统的思想

1038年元昊称帝，建国号为大夏，定都兴庆府。对此，宋朝廷议论汹汹，多认为西夏反复无常，叛离了宋，主张以禁绝贸易的方式，从经济上困弊元昊。宋廷消其封号，下诏擒拿元昊，西夏遂开始大举进攻宋，虽胜多败少，但是夏累年用兵，国内经济萧条，战争又使民众大量伤亡。

庆历二年（1042年），元昊遣前所执塞门寨主高延德求通和，范仲淹见到延德以后，感到元昊并未真正想议和，又无表章，所以不敢闻于朝廷，自为《答元昊书》书。从这部文件中，可以清楚的看到范仲淹以宋朝廷为正统，对元昊的叛立持反对态度。

范仲淹在答书中严厉谴责了元昊自立为帝的行为，认为宋真宗时期，李德明受封于宋廷，宋真宗待之甚厚，“待先大王以骨肉之亲，命为同姓，全付夏土，旌旗车服，极王公之贵，恩信隆厚，始终不衰。”而元昊却“不知真宗皇帝有天地之造，违先君之誓书，不避本朝，并建大位。累遣使人告于朝廷，中外之人莫不惊愤，咸欲收行人戮于都市。皇帝诏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岁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顺之功，岂以一朝之失而骤绝之？’皆不戮而还。假有诸蕃之长抗礼于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他认为元昊称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⁴在这里范仲淹强调宋朝皇帝的正统地位，希望元昊能够削去僭号，接受宋的封号，以宋为正统，回归到以宋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中。

范仲淹在答书中向元昊说明了北宋对西夏的和平意愿，希望元昊考虑其内部人民的生死，与宋重建和平。在答书中范仲淹阐述了宋对西夏和平的思想。“天

¹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21《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版，第791页。

² 《宋史》卷314《范仲淹传》，第10271页。

³ 《宋史》卷314《范仲淹传》，第10272页。

⁴ 《长编》卷130，庆历元年正月戊寅，第3085-3086页。

子遣某经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无战，不杀非辜，王者之兵也。’”在说明宋不想与夏进行战争后，范仲淹指出“和则两利、战则两伤”的事实和道理：“朝廷以王者无外，有生之民皆为赤子，何蕃汉之限哉？何胜负之言哉？……莫若通问于大王，计而决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众。”¹他敦促夏元昊“以爱民为意”，放弃战争，削去帝号，维护汉羌各族的和平生活，这对双方都有很多“美利”。在这里，范仲淹既看到了战争给各族人民带来的创伤和痛苦，又切盼实现汉羌民族的和解，

范仲淹认为，元昊去帝号，尊敬宋廷，将对元昊来讲有许多好处。比如元昊将会“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宋朝廷每岁必有物帛之厚赐等。但是元昊对于范仲淹的这些分析，不以为然，因为自立为王子，他就认为“英雄之生，当帝王耳，”²一时的议和，只是想蓄养精锐，伺机再战。庆历三年二月对于元昊的不改僭号之请，韩琦、范仲淹等认为不能够答应，理由有三点，第一，元昊世代受朝廷爵命，又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功劳，“鸿名大号，天下之神器，岂私假于人哉？”因此不能开此先例。第二，在宋朝的公文与军民的语言中，常称元昊为贼，从此称呼中人们可以区分逆顺之别，如果承认了元昊称帝，此后公文与军民语言或当有西朝、西帝之称，这时如果有汉人因不得志，归于元昊，则宋就没有安定的日子过了。“彼多得汉人，则礼乐事势，与契丹并立，交困中国，岂复有太平之望邪？”³第三，有人认为元昊为蕃人，没有侵占中国之心，只不过自尊于诸蕃尔。但是拓跋圭、石勒、刘聪、苻坚、赫连勃勃等，都是从异域徙居中原。还有李克用父子，是沙陀人，进居太原，后都西洛，这些情况都是“汉人进谋诱而致之。”⁴宋军在定川战败后，元昊作伪诏谕镇戍兵民，有定关辅的言论，因此汉人反叛后，不乐于处在外域，必谋侵据汉地，所得城垒必使汉人守之，如果朝廷承认了元昊僭号，在汉人叛离者的教唆下，会使元昊有进驻中原的野心。范仲淹以宋朝廷为正统，认为元昊称帝，打破了原来的政治格局，西夏的势力发展，将会成为交困中国的一种力量。所以，希望能够通过不承认元昊称帝的方式，遏制西夏的发展。但是随着宋在西夏进攻中的军事失败，宋朝廷给予夏岁币，其

¹（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卷10《答赵元昊书》，李勇先、王蓉贵校点，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6-249页。

²（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30《夏元昊拒命》，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51页。

³《长编》卷139，庆历三年二月乙卯，第3349页。

⁴《长编》卷139，庆历三年二月乙卯，第3350页。

实也就默认了西夏已经脱离了宋的朝贡体系，成为当时一个独立的王朝。

四、忧患意识与范仲淹的外交思想

范仲淹幼年时代父母双亡，历经坎坷，饱受困苦，生活在社会底层，使他体会到百姓的疾苦，自称“出处穷困，忧思深远，民之疾苦，物之情伪，臣粗知之”，¹这些经历成为范仲淹外交忧患意识的来源之一。

澶渊之盟后，宋王朝的内部政治表面上呈现出一片和平景象，经济迅速发展而边备废弛，早在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就为国家武备不坚而远忧，他提出：“国家文经武纬，天下大定……今休兵二十余载，昔之战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战事”，“人不知战，国不虑危，岂圣人之意哉？而况守在四夷，不可不虑”²。他认为在和平时期，也要居安思危，他的外忧一是来源于政府因为暂时的和平，而没有考虑到周边的不安全隐息；二是和平时期持续时间长，军队中没有了能够战斗的将士，范仲淹“远忧边患”，提出“善安国者，当太平之时不谓终无危乱，于是有教化经略之备焉”。他在给宰相吕夷简的信中进一步分析国家之忧患：“皇朝罢节侯，署文吏，以大救其弊，立太平之基。既而四夷咸宾，忘战日久，内外武帅无复以方略为言，不复有四方之志，一旦戎狄叛常，爰及征讨，朝廷渴用将帅，大患乏人，此文之弊也。”³“为四方无事，京师少备，因循过日，天下可忧”⁴他力陈：“天下久平则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则武备不坚，武备不坚……则戎狄或乘其隙矣；贤材不充，则名器或假于人矣。”⁵进而提出防御戎狄者，要大力培养将才。天圣五年(1027年)仲淹上万言书，痛陈时弊，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针对当时“天下久平则倚伏可畏，兵久不用则武备不坚”的严峻形势，向朝廷提出了“育将材，实边郡”的建议。范仲淹的精辟论述，揭示了当时社会繁荣、安定表象中潜伏着的严重外患危机，并提出了防患的具体办法，这在当时一片歌舞太平的朝廷中极其罕见。

¹ (宋)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卷17《让观察使第三表》，李勇先、王蓉贵校点，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8页。

² (宋)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卷9《奏上时务书》，李勇先、王蓉贵校点，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页。

³ (宋)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卷11《上吕相公书》，李勇先、王蓉贵校点，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页。

⁴ (宋)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奏议》卷上《再进前所陈十事》，李勇先、王蓉贵校点，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40页。

⁵ (宋)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卷9《上执政书》，李勇先、王蓉贵校点，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页。

范仲淹外交中的“远忧”，主要是忧虑宋北部的辽、夏两个邻国对宋安全的隐患，辽在宋夏冲突中，想利用西夏对宋的战争，而牵制宋。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为整个国家的外患而忧：“今二虏至强，四方多事，兵戈未息，财利已乏，生民久困，苛政未宽，设有饥馑相仍，盗寇竞起，将何以定？天下可忧。”¹庆历年间范仲淹经略西北，宋夏之间几次大的战斗，宋皆以失败而告终，出现了夏攻宋守的局面，范仲淹为西北战事而忧，他“痛心疾首，日夜悲忧，发变成丝，血化成泪”²。庆历四年（1044年）因为范仲淹积极的防御政策在西北的实施，导致元昊虽胜而国内经济衰退，人民反战，不得不与宋议和，这时仲淹向仁宗仍提出对夏要有长久之虑，“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国家之忧，须罄乌菟，少期补助。其元昊来人到阙，伏望圣慈于纳和御侮之间，审其处置，为圣朝长久之虑，则天下幸甚！”³

当时朝廷中一些重臣对于仲淹对西夏的忧虑并不以为然，如右正言余靖言：“朝廷所以威制天下者，执赏罚之柄也。今天下至大而官吏弛事，细民聚而为盗贼，不能禁止者，盖赏罚不行也。若非大设堤防以矫前弊，则臣忧国家之患不在夷狄，而起于封域之内矣。”⁴他认为外患不足忧，内患要重于外患。

范仲淹对宋与契丹的关系，也充满忧虑。他认为宋辽虽为盟国，但也要时刻有辽逾盟的忧患意识，不能因为一时的和平，而忘记敌情的反复。“敌情翻复，自古非一。以四十年恩信，尚不能结之，恐非有限之货能足无厌之心，此可大为之防，盟誓不足恃也。”如果辽逾盟，宋城池又不坚固，辽的兵力将会直抵澶洲，“河朔地平，去边千里，敌骑豪健，昼夜兼驰，不数十日可及澶州。”⁵景祐中范仲淹知开封府，就建议坚固洛阳城池以备急难，既而又请求坚固东京的防御设施。当时契丹也有逾盟的行动，言事者请从仲淹之请。吕夷简谓：“契丹畏壮侮怯，遽城洛阳，亡以示威，必长敌势。景德之役，非乘輿济河，则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诏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张虚声耳，未足恃也。城洛阳既弗及，请速修京城。”议者多附仲淹议。“臣谓东京根本也，

¹（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奏议》卷上《再奏乞两府兼判》，李勇先、王蓉贵校点，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9页。

²（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卷18《让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表》，李勇先、王蓉贵校点，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3页。

³《长编》卷139，庆历三年二月乙卯，第3354页。

⁴《长编》卷141，庆历三年五月甲子，第3389页。

⁵《长编》卷136，庆历二年五月戊午，第3261页。

北都枝叶也，虽先朝曾有北都之行，当时有宿将旧兵，尝经大敌，然犹上下忧疑，盘桓而进。今太平已久，人情易动，又无宿将旧兵，不可不过虑也。”¹范仲淹不但提出辽可能逾盟的忧虑，也提出了具体的御辽措施，加固京城，以防御辽的进攻，虽然朝廷没有完全采纳范仲淹的建议，但是范仲淹的现实主义御辽思想，在朝廷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对于内忧与外患的关系，范仲淹认为内忧重于外患，并且内忧也会引起外患。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宋夏局势刚刚和缓，宋仁宗便将范仲淹调回东京，升任为参知政事，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道主持朝政。范仲淹认为宋朝国家内部存在的问题太多了，他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修武备等十项改革主张，他主持的改革是向宋王朝内部的积弊开战，目的是解决内忧与外患的困扰。他认为奸邪之凶，甚于夷狄，“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内防奸邪。夷狄侵国，奸邪败德。国侵则害加黎庶，德败则祸起萧墙。以知奸邪之凶，甚于夷狄之患。伏惟圣明常好正直，乃杜奸邪，此致理之本也。”²范仲淹把对外防务不力与宋朝政府的弊政联系起来。他就任参知政事后，就实行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在整顿吏治，抑制兼并，减轻百姓徭役，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又把“修武备”当作改革的重要一环。庆历改革虽然只实行了一年多时间，就在保守派攻击下失败了，但新政的目的之一，就是解除内忧而减轻外患，新政对西夏起到了巨大的威慑和遏制作用。

第二节 王安石“兼制四夷”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

王安石与其变法经常被人们相提并论。在九百余年的历史变迁中，思想各异的人们对王安石变法及其个人评价大相径庭，主张改革的人歌颂他，指责变法的人斥骂他。元祐元年（1086年）苏轼撰写了《王安石赠太傅敕》的制词，评价王安石：“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引其言；瑰玮之丈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³制词给予王安石高度评价。

¹《长编》卷136，庆历二年五月戊午，第3263页。

²（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卷9《奏上时务书》，李勇先、王蓉贵校点，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205页。

³苏轼：《苏轼文集》卷38《王安石赠太傅敕》，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77页。

而朱熹曾论安石“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¹对于王安石变法的措施是利民还是害民，是惠民还是侵民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并延续至今。虽然王安石变法研究的成果，已经汗牛充栋，但对于王安石外交思想的研究，却为之不多。主要研究成果有梁启超《王安石传》²从王安石成长的时代背景出发，论述了王安石新法之内容及其得失，对诬陷王安石的论述进行了大量的辨析。邓广铭《王安石——中国 11 世纪时的改革家》³，后经大幅修改，再次出版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⁴展示了熙宁变法改制的图景，全面客观地阐述了王安石的人格、政绩、气度和胆识，清除近千年来以莫须有的罪名丑化他的种种谤言谤语、虚枉记载，该书部分章节，对王安石的对外策略进行了论述，如在第三章的第二节论述了王安石吞灭西夏契丹统一中国的战略设想；在第五章王安石对待敌国外患的决策中，论述了王安石全力支持王韶对西蕃诸部的招讨，及在契丹统治者两次制造衅端时的对策。李祥俊《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⁵分析了王安石对各派学术思想的评价、论述，揭示了王安石本人的学术观点，考察了其学术思想的主导精神以及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马振铎《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哲学思想》⁶，论述了王安石的天道观、运动观、人性论、唯物主义反映论和唯心主义“圣智论”等；李之鉴《王安石哲学思想初论》⁷阐述了王安石的生平、著作和所倡新学学风，“王安石‘以思为主’的认识论王安石的后学等问题。张宏杰《北宋变法名相王安石》⁸、李勤印《王安石》⁹采用文学创作的手法，描述了王安石变法及其引退后的生活逸事。王安石熙宁八年（1076 年）第二次任相期间，对于宋、辽、夏三方的关系有着大量的思索，其开创性的现实主义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政治思想史上抹下了重彩的一笔。安国楼《王安石的民族思想与民族政策》¹⁰，从宋辽边境“两属”地的争执、边区蕃

¹ 《宋史》卷 327《王安石传》，第 10553 页。

² 梁启超：《王安石传》，海南出版社 2001 年版。

³ 邓广铭：《王安石——中国 11 世纪时的改革家》，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⁴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版。

⁵ 李祥俊：《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⁶ 马振铎：《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⁷ 李之鉴：《王安石哲学思想初论》，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年版。

⁸ 张宏杰：《北宋变法名相王安石》，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⁹ 李勤印：《王安石》，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

¹⁰ 安国楼《王安石的民族思想与民族政策》，载《广西民族研究》，2002 年第 1 期。

汉土地的典买、边区民兵的组织以及边区开拓四个方面，论述了王安石在周边民族问题上所持的平等立场、开放思想和采取的一些改革政策，分析其在民族问题的处理方面所表现出的积极、进步的一面。虽然研究王安石的著作较多，但对王安石外交思想缺乏系统的分析，如对王安石外交思想的来源、发展过程、整体状况涉及的较少。

王安石，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七年（1047年）知鄞县，皇祐三年（1051年）通判舒州，至和元年（1054年）王安石调任群牧判官，嘉祐二年（1057年）任知常州，后改任提点江南东路刑狱。王安石在基层十余年的任职经历，使他深入地了解了基层政府的低效率运转与百姓生活的艰辛，为他以后推行的改革提供了实践经验。嘉祐四年（1059年）王安石被诏为直集贤院，不久便改任三司度支判官，成为管理国家财政的重要官员之一。熙宁元年（1068年），为翰林学士，次年为参知政事，三年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熙宁七年（1075年），因变法遭受到保守派的攻击，安石辞相，改任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熙宁八年（1076年）二月，复拜相，加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安石继续呕心沥血推进变法，但时仅半年，又再次辞相，任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次年，改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元祐元年（1086年）卒，赠太傅。

宋太宗朝以后形成了先内后外、重文抑武的政策，对内千方百计地加强镇压和防范。对外在外来侵扰中却步步退让，直至屈己求和。真宗、仁宗谨守太宗朝制定的国策，朝廷上下笼罩着浓厚的怯懦怕战气氛，特别是宋辽澶渊之盟、宋夏庆历和议之后，朝廷在政治上因循守旧，苟且偷安，习成风俗，导致边备松弛，武事尽废。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¹的大无畏气概，开始冲破这种陈腐的观念，彻底改变北宋王朝长期以来“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处境，决心救国家积弱之势，排除阻力，反对屈和。

一、王安石外交思想的哲学基础

“人性本无善恶”，是王安石外交思想的哲学基础。现实主义认为“人性恶”。这个基本的观点与古代国家政权的对外政策紧密联系，从“人性恶”推论出，由

¹ 《宋史》卷327《王安石传》，第10552页。

于人生来具有权力欲望，因此国家会受到人性支配，也必然“对权力贪得无厌”，为获取更多的“权力”而进行战争，并且古代社会，各政权、部族其实共同构成了一个无政府状态的体系，国家之上不存在统治权威，因此国家只能以“自助”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安全，而出发点则是权力与利益。这个无政府体系的主要驱动力是每一国家的内在权力意志，所有政权都“充满敌意”。在中国思想史上，儒、道、墨、法的学者无不关心“人性”的问题，在儒学的内部，有关人性的问题讨论的中心议题是论证人性是善还是恶，如孟子认为“人性善”，荀子认为“人性恶”，韩愈的“人性善恶混”等等，他们皆着眼于将伦理价值的善或恶与人存在的本质合而为一，这是王安石坚决反对的。王安石在阐明“道德之意”的过程中，对“性命之理”非常重视，专门撰著了《礼乐论》、《原性》、《性说》、《推命》等文章来加以探讨，并有大量文章论述“性善性恶”的问题。人们把他的这些关于人性的思想，归并于他的哲学思想，而恰恰是他的哲学思想，奠定了其外交思想的基础。

王安石将自己关于人性的观念归宗在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论点上，他持自然人性论的观点，人自然的形体是“性”之存在的依附之处，离“形”则无性矣，由此视角出发，王安石以人的“好恶”为性，所以说：“夫人之为性，心充体逸则乐生，心郁体劳则思死，若是之俗，何法令之能避哉！”¹王安石实际上是以人的自然生理属性为人性，即人天生就有对能使自己“心充体逸”之事物的追求本能，也有对使自己“心郁体劳”之事物躲避的本能。王安石还认为，人之“好恶”的本能，并不能以善、恶言，因为这是人之内在的本性，是无有善恶的。人好者或恶者的本能只有反映在外，与事物相接，显之以行为时，才会分出善与恶来。这样，王安石就把人之自然属性与社会伦理的道德评价区别开来了，在方法上开拓出探讨人性论的新思路。在王安石看来，孟子的性善之论和荀子的性恶之论皆是以人之情论“性”，并非是论人之“性”，人性本无善恶。可见，王安石在批评诸子的人性论时，明确表达了人性不能以善恶言的看法，可现实中的人却肯定有善有恶，王安石指出，此皆出自人之喜、怒、爱、恶、欲之情，其本身亦无善恶，只不过在接于物而动时，才显现为善或恶。所以，从存在的本体人性而言，人人都是相同的；而从后天的所“习”来看，人们就区分出好坏善恶了。

¹（宋）王安石：《王安石全集》卷33《风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页。

根据王安石的人性观,宋北部的契丹与西北的西夏,虽时常侵扰北宋之边境,但主国政者本性不为“善”,也不为“恶”,只是在具体问题中,表现出“善”与“恶”的两个方面。在表现出人性“善”的一面中,还是可以在具体问题上以人情计之,晓之以理。熙宁七年(1074年)二月壬申,宋神宗谓安石曰:“契丹若坚要两属地,奈何?”安石曰:“若如此,即不可许。”宋神宗曰:“不已奈何?”安石曰:“不已亦未须力争,但遣使徐以道理与之辩而已。”宋神宗曰:“若遽交兵奈何?”安石曰:“必不至如此。”宋神宗曰:“然则奈何?”安石曰:“以人情计之,不宜便至如此,契丹亦人尔。”只要“契丹亦人”,即是有讲理的一面,有伦理的约束,所以对于由宋控制的两属地,坚持不给,契丹也会从“理”的一面考虑,不会为此而出兵。同时,宋毕竟是一“大国”,也没有惧怕契丹之理。安石曰:“今地非不广,人非不众,财谷非少,若与柴世宗、太宗同道,即何至为李氏。若独与李氏同忧,即必是计议国事犹有未尽尔,不然即以今日土地、人民、财力,无畏契丹之理。”¹从人性无善恶的基础出发,王安石认为不能以为契丹恶,而惧怕它,不敢于与之讲理,如果与契丹讲理,契丹也会从自身的考虑,做出一定的让步。

二、 王安石外交思想的最低目标与最高目标

北宋的外患主要是辽和西夏,从太宗收复燕云的失败,到真宗与辽订立“澶渊之盟”,再至庆历四年(1044年)仁宗与西夏议和,战争的失败,使北宋最高统治集团中的人,不论先后更换了多少次,总都是一致的认为,“不但契丹不能触动,西夏同样也不敢去触动了”²王安石为相后,其外交思想的最低目标就是“无惧于夷狄”,不对辽、西夏示弱、示怯。这个目标涤荡了北宋对外萎靡怯懦的思想。

熙宁五年,王安石与神宗商谈边事的对话中,充分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王安石认为周边的政权已经衰弱,由中原王朝调控天下,制服这些周边政权,不是什么难事,王安石反复向神宗皇帝说明这一观点。他说:“陛下聪明齐圣,忧勤恭俭,欲调一天下,兼制夷狄,极不难,要讨论大计而已。”神宗答道:“粮不足,兵亦不足,又无将帅”。要想“兼制夷狄”难度很大。王安石认为多用钱帛高价收粮,即可以解决粮不足的问题,百姓人口众多,一有战事,募兵即可;

¹ 《长编》卷 250,熙宁七年二月壬申,第 5752 页。

²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228 页。

所以“方今之患，非兵粮少，亦非无将帅也。若陛下能考核事情，使君子甘自竭力，小人革面不敢为欺，即陛下无为而不成，调一天下兼制夷狄，何难之有！”神宗听完，非常高兴。¹

王安石认为，虽然宋朝表面上有着粮草不足、兵少、无将的局面，但是从来有报负的君主，都是起于穷困之中，所以对于表面上的弱势不需要妄自菲薄，特别是这些不足，又都能够通过改革，改变这些局面。

王安石外交思想中有着“无惧于夷狄”的底线，因此他积极主战，不对辽、西夏示弱、示怯。在王安石看来，周边政权的衰弱，给宋制服这些政权提供了良好的时机，宋不仅要扫除外交思想中的怯懦，藐视敌国，还要敢于战斗，并且树立起必胜的信心。他屡次向神宗谈到：“陛下富有天下，若以道御之，即何患吞服契丹不得？”²“契丹无足忧，彼境内盗贼尚不能禁捕，何敢与中国为敌？”³

熙宁五年三月，枢密院论及夏国事时，认为西夏占优势地理位置，能够聚集兵力，这些是宋方不具备的，因此宋不能制服西夏。王安石对此给予驳斥，并分析了宋朝有胜于西夏之优势。王安石对比了宋与西夏的综合实力，宋有明君、贤臣，这都是可以取胜于西夏的重要因素，如果再有一二万精兵就可以战胜西夏的老幼疲惫之旅。“彼虽倾国以十万众犯边，而老幼疲惫不能者皆在其间，我若有一二万精卒则足以胜彼。但我将帅今亦非其人，率苟且，兵虽众而不训练，朝廷举动往往不合事机，此所以不能胜彼，非彼无可胜之理也。”⁴王安石也指出现在之所以没有战胜西夏的原因，不是西夏不可战胜，而是宋朝自身少将、兵虽众而不训练等原因。

长久以来，在宋朝统治阶级内部，有着浓厚的为防内乱而不敢还击外来侵扰的思想，如富弼、韩琦在辽向北宋挑衅的情况下，多次提出少生事，多退让，希望求和的思想。神宗刚刚继位，富弼与他谈边事中，就提出：“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⁵。熙宁八年，辽无礼要求重新划定地界时，富弼上奏说：“若朝廷乘忿便欲深入讨击，臣虑万一有跌，其害非细，更或与西夏

¹ 《长编》卷 232，熙宁五年四月壬子，第 5628 页。

² 《长编》卷 235，熙宁五年秋七月戊子，第 5701 页。

³ 《长编》卷 248，熙宁六年秋十一月戊午，第 6046 页。

⁴ 《长编》卷 231，熙宁五年三月戊子，第 5613 页。

⁵ 《宋史》卷 313《富弼传》，第 10255 页。

为犄角之势，则朝廷宵旰矣。”¹富弼害怕辽与西夏的联合，使北宋两面受敌，又怕对外战争引起内乱，因此希望神宗皇帝以人民生活的安定考虑，退让以保暂时的安宁。对于此事，韩琦认为解决的方法是：“遣使报聘，优致礼币，开示大信，达以至诚，具言朝廷向来兴作，乃修备之常，与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无，岂有他意，恐为谍者之误耳。”²韩琦、富弼都历任几朝重臣，他们对辽、西夏的关系中，妥协忍让，以求和平的思想在朝中有着相当的影响，他们的思想与王安石的“包制四夷”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王安石外交思想的最高目标就是“调一天下，兼制夷狄”，以“四夷为弱”，“包制四夷”。熙宁五年九月雄州报辽欲以兵来立口铺的事情，神宗为此深为忧虑，王安石为神宗分析道：“四夷皆衰弱，数百年来，未有如今日。天其或者以中国久为夷狄所侮，方授陛下以兼制遐荒，安强中国之事。”³安石在宋与周边政权的对比中，说明“四夷皆衰弱”，鼓励神宗强国以实现最后制夷的目标。同时，王安石也并不盲目的乐观，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包制契丹仍有难度。王安石认为“累世以来，夷狄人众地大未有如今契丹，陛下若不务广规模，则包制契丹不得。”又说：“欲大有为，当论定计策以次推行。”⁴王安石看到了契丹虽然开始衰弱，但毕竟是大国，北宋不能忽视这种强大势力的存在。熙宁五年神宗与王安石谈及北边事时，神宗说：“今契丹主虽庸，然所凭藉基业大。”安石回答道：“若无操略，国大适足以为之累，缘大物大材不能运故也。彼国大，非吾所当畏。”⁵安石分析了契丹虽大，但大有大的托累，因此宋有制服契丹的机会。

王安石“调一天下，兼制夷狄”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大大冲击了朝廷中持稳保守的对外思想，如富弼等人反复说明：“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议，无容心于其间。”⁶公议就是被王安石称之为“流俗”的舆论倾向，王安石希望对外大有作为之心，在一开始便与躬守祖宗家法的北宋政治保守势力产生矛盾，他的外交思想与新法一样，也时常受到保守派的攻击。

三、为实现外交思想的最高目标，必须进行富国强兵的改革

¹ 《长编》卷 262，熙宁八年夏四月丙寅，第 6393 页。

² 《长编》卷 262，熙宁八年夏四月甲子，第 6390-6391 页。

³ 《长编》卷 238，熙宁五年九月丙午朔，第 5788-5789 页。

⁴ 《长编》卷 236，熙宁五年闰七月戊申朔，第 5726 页。

⁵ 《长编》卷 235，熙宁五年秋七月戊子，第 5701 页。

⁶ 《宋史》卷 313《富弼传》，第 10254 页。

宋神宗即位时，面临着内部财政匮乏、社会矛盾剧烈，外部对夏战争失利的局面，这种局势引发了王安石的思考，嘉祐三年(1058年)他在写给宋仁宗的《言事书》中，指出北宋王朝内外交困的形势。“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惴惴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¹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为相后，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了变法。把内政改革放在优先的地位，认为要扭转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必须从改革现有的“法度”入手，澄清吏治，扭转举朝苟且偷安之颓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然后择将练兵，整军经武，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

从熙宁、元丰间所颁新法来看，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理财”而采取的措施，包括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方田均税诸法；二是为强兵而采取的措施，包括保甲、保马、将兵诸法及军器监的设置等。三是学校教育与科举改革。“理财”的主要途径在“治农”，“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²，论“节财用”则“以减兵最急”。例如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间，他得知陕西路用兵之费数额巨大，便上言神宗：“西事稍弭，边计正当措置。天下困敝，惟兵为患，若措置得兵，即中国可以富强，余皆不足议也”。³减兵省费不是弱兵，而是采用更有力的强兵措施。王安石在变法中以“保甲法”、“将兵法”为主干，进行汰弱、将兵、保甲、户马、保马，置军器监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增强军队的实战能力。“保甲法”将边防民兵制度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伍保法”结合为一而建立起来，使农民忙时务农，闲时操戈，兵农合一，逐步削减募兵，王安石将募兵与民兵作了比较，认为“今募兵大抵皆偷惰顽滑不能自振之人，为农者皆朴力一心听令之人，以此较之，则缓急莫如民兵可用”⁴。王安石坚决主张废除募兵制，实行“保甲法”，他指出：“今养兵虽多，及用则患少，以民与兵为两途也”，“倘不能理兵稍复古制，则中国无富强之理。”⁵保甲法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元丰四年九月，宋神宗下令募熙河民兵，保卫兰州，从而粉碎了西夏军队的进攻，保甲兵成为禁军的重要辅助力量，达到

¹ (宋)王安石：《临川文集》卷39《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0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81-282页。

² 《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庚午，第5350页。

³ 《长编》卷231，熙宁五年三月甲申，第5610页。

⁴ 《长编》卷236，熙宁五年闰七月壬戌，第5743页。

⁵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53《兵考五》，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十通”本，第1334页。

了与正规军相参作战的目的，有利地推动了禁军的整顿和改革。将兵法是根据仁宗时范仲淹在防御西夏侵扰中，将鄜延路 1.8 万军队，配隶六将，平时负责训练，战时轮番出战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将兵法的实质，意图在于不破坏皇帝的绝对军权的前提下，部分地解除对武将的过度控制。此法实行后，军队自成体系，“皆制在将官”，其逐州总管以下及知州、知县皆不得关预，这就有助于地方行政系统的束缚，相对提高武将的职权及其主动性，有利于对军队的训练，而当时所置的重要将帅，几乎有三分之二是布署在河北、陕西边防线上，这也相对扭转了前此“守内虚外”的形势，增强了北宋的对外防御能力。

王安石致力于富国强兵，认为“且胜夷狄，只在闲暇时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财谷富，兵强而已。”¹他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最终制服西夏和辽，彻底改变北宋王朝长期以来惧于夷狄的屈辱处境，从而实现“鞭笞夷狄，尽复唐之故疆”²的目标。在这些改革的措施下，军队的力量得到了加强。熙宁年间，由王安石一手提拔的大将王韶，率宋军取得熙河战役的全胜，收复河湟熙河、岷、叠、宕等州(陕西、甘肃、青海一带)故汉地二千余里，歼敌近万，招抚民众三十余万，获得了庆历以来对西夏的重大军事胜利。

针对王安石的富国强兵，以制夷狄的主张，很多士大夫持反对意见。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反对无故对外征伐。司马光在《谏西征疏》中说：“自古以来，国家富强，将良卒精，因人主好战不已，以致危乱者多。况今公私困竭，将愚卒懦，乃欲驱之塞外，以捕狡悍之寇，其无功必矣。岂惟无功，兼后患甚多，不可尽言也。”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厉兵秣马相反，他希望能够通过国家“内部举百职，修庶政，安百姓，实仓库，选将帅，立军法，练士卒，精器械，八事皆备，然后可以征伐四夷。今此八事未有一者胜于曩时，而况关中饥馑，十室九空，为贼盗者纷纷已多，县官仓库之积，所余无几，乃欲轻动大众，横挑猛敌，此臣之所大惧也。”³司马光认为内部出现的危机还没有解除，尽量避免对西夏发生冲突。王安石把富国强兵的目标在于征伐四夷，且在改革初有成效之时，积极主战，这是司马光所反对的，他们认为内患要大于外患，以防内为主，而外患则尽量用“德”服人，而不采用武力。宋人对这两种外交思想的议论纷纷，相持不下，这些争论

¹ 《长编》卷 220，熙宁四年二月庚午，第 5350-5351 页。

² (宋)佚名：《韩魏公家传》卷 10，巴蜀书社 2000 年版。

³ 《长编》卷 218，熙宁三年十二月癸未，第 5314-5315 页。

甚至延续至今，依然不能使支持者与反对者相调和。在评判两种不同观点时，不能简单的认为主战即是爱国的，不愿使用武力即是投降妥协，因为外交实践是极为复杂的，在某种情况中，也许主战强硬的立场就比“德”服人获取更多的利益与安全，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中，可能也会出现以“德”服人比武力征伐更有成效。

熙河之役的胜利，展示了王安石的富国强兵，制服四夷目标的部分实现，但是这种作用也是有限的，元丰四年（1081年），西夏国主秉常被迫提出向宋割地求和，被夏国梁太后囚禁。七月，神宗派五路大军大举进攻西夏，都遭遇失败，特别是永乐之战，全军覆没，神宗废食而泣下，安石制夷之梦遭到了严重挫折。

四、 处理宋、契丹、西夏三角关系的基本外交思想

宋朝经济发达，但军事战斗力量相对薄弱，在冷兵器时代，步兵与骑兵的攻击力量不可同日而语，这使辽、夏两国时而有联合攻宋的愿望。如何制服两个强大的政权，成为宋神宗处心积虑的事情。王安石从先易后难，先制弱后制强的思想出发，提出经略契丹必先制夏，此所谓“断契丹之右臂”。¹王安石认为北宋应把主要力量对付西夏，因此，他提出制夏不能失去时机，若等到夏辽相结相援而后图之，就为时晚矣。安石说：“诚如此陛下必欲经略夏国，及秉常幼稚之时，正宜汲汲。古人进德修业欲及时，缘天下事机，变动无穷，及可为之时不可失也。”²王安石认为，适时对夏的进攻，并取得军事胜利，将会制止辽的挑衅，同时争取时间，以防御辽的进攻。随着熙宁年间，对夏战争的节节胜利。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鼓励神宗说道：“以尝胜之众布之陕西，则陕西之兵人人有胜气，以其气临夏国，不足吞也，吞夏国则中国之气孰敢干挠。”³希望神宗尽快实现“包制夏国”的愿望。

王安石在“包制夏国”的思想中，已经看到了西夏给北宋带来的困扰和麻烦远远大于辽，西夏地处偏远，地形复杂，北宋与西夏战争持续时间长，投入人力与物力多。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王安石“包制夏国”的思想中，也有理想主义的成份。西夏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包制夏国”有着较大的难度。“包制夏国”意味着北宋在战争中与战后都要承担着巨大的开支。宋政府是否能长时间的支付

¹（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5，中华书局1983年，第41页。

²《长编》卷237，熙宁五年八月壬辰，第5769页。

³《长编》卷276，熙宁九年六月丁亥，第6740-6741页。

这些开支?“包制夏国”虽然能够使北宋在外交上得到暂时的胜利,但从长期来看会影响到北宋政府的国内经济状况。

熙宁间,宋忙于西夏边事,辽也希望从中渔利。熙宁五年,辽与宋又因口铺事交涉,北宋最高统治集团中的多数人,担心辽与西夏联合,君臣惊慌失措,王安石上言:“臣窃观方今四夷,南方事不足计议,惟西方宜悉意经略,方其国弱主幼,又无纪律,时不可失。经略西方当善遇北方,勿使有疑心,缘四夷中强大未易兼制者,惟北方而已。”神宗对此提出疑问:“若能兼制夏国,则契丹必自震恐,岂非大愿!”安石力劝神宗:“夏国非难经略,愿陛下策画安出尔。”冯京认为:“夏国与契丹唇齿之国,必相边结求援。”安石解释道:“盖经略敌国,必制胜于无形之中如举秋毫,故不再籍,不三载而已举矣。若不能如此,致其相结相援而后图之,非善计也。”¹面对辽的挑衅,王安石认为还是要以经略西夏为主要目标,并且为了防止辽、西夏的联合,就要暂时善待辽,守盟约,不铢锱必较,使辽对宋没有戒备之心。不久,王安石在对神宗论及口铺事时,指出“陛下若能经略夏国,即不须与契丹争口铺,契丹必不敢移口铺。若不能如此,虽力争口铺,恐未能免其陵傲。”²王安石对西夏、辽的战略,使西夏与辽终未有联合进攻宋。先制西夏,也使宋能够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虽最后没有达到王安石预想的目的,但其充满现实主义的处理北宋、辽、西夏的“大三角”关系的攻略思想,对后世外交有着借鉴意义。

五、王安石“包制西夏”的外交思想

北宋与西夏自签订“庆历和议”以后二十余年,基本上维持了一个较为和平的局面,但到宋英宗时期,双方关系又因不断发生冲突而紧张起来。治平三年,夏国主谅祚“举兵犯庆州,又寇大顺城。”³翌年,宋将种谔取绥州,于是宋夏矛盾升级,战争一触即发。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和西夏皇帝秉常相继嗣位,秉常即位时年仅七岁,他的母亲梁氏摄政,起初西夏请求用安远,塞门二砦换取绥州,宋廷虽口头答应,但未付诸实践,因而在熙宁三年(1070年)八月,西夏点集“国人七十以下,十五以上”号称二十万之众,从庆州侵入北宋,攻围大

¹ 《长编》卷 236 熙宁五年闰七月己巳条,第 5752 页。

² 《长编》卷 237,熙宁五年八月丁酉,第 5772 页。

³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 128《附录六西夏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382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827 页。

顺城、柔远寨等军事要地，“与官军日夜接战”，一时“陕右大震”¹。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提了制服西夏的一系列外交思想。

（一）、稳住阵脚，静重待敌的思想

熙宁三年（1070年）西夏点兵后，有探报称，西夏向契丹求援，神宗忧西人深入，王安石分析了西夏与契丹的具体情况，认为契丹不会出兵，即使出兵，北宋也不用惊慌，以静重待之。安石对神宗说：“夏贼若果借兵于契丹，即不为得计，恐其不至如此。”当时，有探报称契丹发兵三十万往西夏边界。神宗非常担心地问安石契丹是否真的可能发兵。安石回答神宗：“虽有此，不足怪……夏国主幼，妇人用事，忿而无谋，或请师于契丹，则为契丹计，虽许之，何为不可？可以挠中国，而无损于我，契丹优为之，但恐其无远略，不能出此。”²王安石指出夏国的弱点，认为契丹不会为保卫西夏派军队深入到北宋边界，因此不会答应西夏的要求，但是神宗还是担心夏、辽会联袂来攻，王安石向神宗谈到：“陛下诚以静重待之。虽加一契丹，于边事亦不至狼狈。若欲进取，非臣所知。且我坚壁清野，积聚刍粮以待敌，则敌未能深为我患。而彼两国集于境上，其刍粮何以持久？我所患者，在于刍粮难继而已！爱惜刍粮，无伤民力，而以静重待敌之衅，则外患非所恤也！”³王安石“以静重待之”，待敌人有可乘之隙时，然后进行进讨，以实现西夏臣服之目的。

（二）“招纳生羌”以断西夏之右臂

王安石认为要制服西夏，先须制服居处于西夏以南的吐蕃部落（即宋人所称“生羌”），此所谓“断西夏之右臂”。这种方略弥补了庆历年间范仲淹进筑横山以断西夏左臂的不足。其中对生羌木征讨伐时，安石表示“若此举未胜，必须再举，胜而后已。凡经略边夷，当从事于易。木征最为易者，或不能决胜，即士气沮坏，敌情轻我，难复言经略矣。”神宗说：“西人敢来助否？”安石说：“元昊、谅祚或敢来，今决不敢也。”⁴安石认为对于占据军事战略要地的“生羌”，要先易后难的各个击破，这样宋与西夏之间，就有了有着缓冲作用的“中间地带”，可以有效地阻止西夏的南侵。

¹（宋）彭百川：《太平治绩统类》卷15《韩绛宣抚陕西》，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40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06页。

²《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庚午，第5350-5351页。

³《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庚午，第5350-5351页。

⁴《长编》卷236，熙宁五年闰七月戊辰，第5751页。

熙宁四年至六年（1071年-1073年），宋朝洮河安抚使王韶攻占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岷（今甘肃岷县）、叠（今甘肃迭部）、宕（今甘肃宕州）等州，受抚蕃部三十余万帐，拓地一千多里，韶上言：“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余万口。”王安石非常高兴地对神宗说：“韶如此诚善，今三十万众若能渐以文法调驭，非久遂成汉人，缘此本皆汉人故也。”神宗说：“木征须早剪除。”安石说：“岂但木征，董毡、夏国皆在我措置而已，诸路自可高拱无事。”“渐夺横山之地，又傍取熙河以制之。”王安石收复熙河以断西夏之右臂的方略已基本实现，王安石认为熙河之役的胜利，可以一洗仁宗与夏庆历和约的耻辱，逐渐把制服西夏的希望寄托在对熙河的经营上。熙宁五年王安石和神宗谈话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王安石认为：“今所以招纳生羌者，正欲临夏国，使首尾顾惮，然后折服耳。”神宗听后说：“此所谓‘图大于细，为难于易。’”王安石答道：“仁宗仁恩在群臣可谓深厚，夏国陵侮仁宗最甚，群臣欲报仁宗，当以夏国为事，使夏国推屈，乃所以刷仁宗之耻也。”¹熙河之役的顺利进展，大大增强了王安石经略西夏的信心。从此以后，王安石在处理与西夏交涉中，也不像以前那样小心翼翼，而常常是强者对弱者的口气。王安石对西夏的态度由“柔静”逐渐转向强硬。

（三）“与夏人绝，即明绝之”

熙宁四年（1071年）初，宋军在横山筑城囉兀，西夏发起反攻，陷抚宁堡，围顺宁寨，将士千余人皆投降了。神宗从安石等言，诏弃罗兀。罗兀之役后，西夏遣使请和，许多大臣认为“速欲开纳西人，则示之以弱，彼更倔强。”王安石则以为“当明示欲和，以怠其志，徐与之议，以坚其约，此攻敌人心之道也。”²熙宁五年知延州赵离提出乘夏人不注意，占据生地修筑堡寨，执政大臣都以为赵离不会妄作，“宜从所乞”，只有王安石说：“今若要与夏人绝，即明绝之，要与和，即须守信誓。既约彼商量地界，遽出不意占据生地，非计也。兼我所以待夷狄不在数里地，此数里地不计有无。”³王安石说明在与西夏的外交中，要光明正大，不搞小的动作，宋即使要与夏关系绝裂，要明确的说明原因，如果宋希望与夏发展正常关系，就要守以前订立的约定，他认为对于趁西夏不注意时，占西夏一些土地的事情，没有什么大的用处。

¹ 《长编》卷 230，熙宁五年二月癸亥，第 5596 页。

² 《长编》卷 221，熙宁四年三月甲辰，第 5387 页。

³ 《长编》卷 232，熙宁五年四月丙寅，第 5632 页。

六、怀柔与斗争并用的对辽外交思想

宋神宗时期，宋与西夏之间的战争，使辽政权认为自己有了可趁之机，一次次地向北宋进行政治要挟，辽移其口铺，并要求重新界定三州地界，实际上是想把辽的地界向南推进。对于辽制造的衅端，王安石主张采取怀柔与斗争两手并用的对策。

熙宁五年闰七月，太原府探报“北界欲用兵力移口铺于距马河南十五里安置”，熙宁六年（1073年）开始，辽向北宋提出，北宋在蔚、应、朔三州边界所设营垒等侵占了它的领土，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确定。这两件事情都使宋廷内部一时议论纷纷。王安石多少宽慰神宗说：“此事不足烦圣虑”，“契丹无足忧者”，对于辽为什么会移口铺这一具体事件，王安石分析认为三个原因，即“或是因边吏语言细故，忿激而为此；或是恐中国以彼为不竞，故示强形；或是见陛下即位以来经略边事，以为更数十年之后，中国安强，有窥幽燕之计，即契丹无以枝梧，不如及未强之时先扰中国，以为绝迟则祸大，绝速则祸小，故欲绝中国，外连夏人以扰我。”¹王安石认为对于契丹的挑衅，一方面要用怀柔的手段，包括守约，与契丹不能轻易的断绝关系，以使辽不致于联夏攻宋；另一方面对辽进行坚决的斗争，要怀柔与斗争并举。王安石认为辽虽然有一定的实力，但对自己“境地内盗贼尚不能禁捕，何敢与中国为敌？”因此北宋不能畏惧辽，他向神宗提出：“外敌强则事之，弱则兼之，敌则交之。宜交而事之则纳侮，纳侮而不能堪则争，争则启难。故曰：‘示弱太甚，召兵之道也’。”²王安石认为辽也只是形强，北宋不能对辽示弱，这样会长敌人的志气，而召至敌人的进攻，对辽要进行一定的斗争，斗争的方法是加强守备，以待敌。具体在辽立口铺的问题上，王安石指出当务之急是修军备，而不用过于计较口铺的小问题，他对神宗说：“大抵应口铺事，当宽柔徐缓，修中国守备当急切。以臣所见，口铺事不足计，惟修守备为急切。”³王安石认为在对辽关系上，应从宏观的、长期的战略眼光考虑，不必在具体细节问题上斤斤计较，最主要的是不向辽示弱，做好战备，发展好宋王朝的军事，与辽进行长期的斗争。

对于王安石处理口铺的思想，一些臣僚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文彦博等认为辽

¹ 《长编》卷 262，熙宁八年四月癸亥，第 6372 页。

² 《长编》卷 262，熙宁八年四月癸亥，第 6372 页。

³ 《长编》卷 238，熙宁五年九月丙午朔，第 5787 页。

要坚决拆除在宋境设立的口铺，如果辽拒不拆除，就要与辽进行斗争，甚至不惜与辽一战。文彦博与王安石在神宗面前曾这样争论：文彦博说：“交兵何妨？”安石回答：“河北未有备，如何交兵无妨？”彦博又说：“自养兵修备到今日，如何却无备？”神宗反对说：“朕实见兵未可用，与契丹交兵未得。”彦博答道：“契丹若移口铺，侵陵我，如何不争？”安石认为：“朝廷若有远谋，即契丹占却雄州，亦未须争，要我终有以胜之而已。”彦博反对说：“彼占吾地，如何不争？占雄州亦不争，相次占瀛州又不争。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¹文彦博认为辽移口铺，起事端，宋廷要出兵，以惩辽，否则口铺不争，会有更多的地方落入辽的手中。王安石认为不必因口铺而大动干戈，韬光养晦、专修武备，实力增加后，自然最后的胜利属于宋。王安石的这个观点，后来被人认为主张弃地，邓广铭先生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中，对邵伯温在《闻见录》中记载的王安石“将与取之，必固与之也”的弃地之说，进行了辨识与批判，认为邵伯温编造了王安石的弃地说，并被李焘不加考证的运用，而对于王安石是否主张弃地，“在北宋一代的官私记载中，只能找出有力的反证，却绝对找不到任何一条旁证来。在北宋晚年新旧两派互相倾轧、斗争的长期过程中，指陈王安石的‘罪言罪行’的人大有人在，却也并无一人涉及此事，这岂不完全可以证明，邵伯温的这条记载，完全是由他恶意虚构的一种无耻谰言吗？”²王安石希望宋能经略契丹，在口铺、地界事件中，主张暂时不对辽用兵，而把精力用在增强宋的军事实力上，以取得最后“制辽”的胜利，因此王安石对辽思想怀柔与斗争相结合，具有战略性、长期性，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三节 李纲反对投降、坚决抵抗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

十二世纪初，东亚格局出现了剧烈的动荡，先是宋金联盟攻辽，后来联盟破裂后，女真人大举南下侵宋，金军攻城占镇，势如破竹。宋人面对勃兴的女真，措手不及，惊恐未定之时，金已占领了山西、河北、河南的大片土，并兵临东京城下。这时投降主义思想在朝廷内占据上风，在国家危亡的时刻，李纲被召回朝廷，他以现实主义的思想，修军政，制夷敌，适时地举起了抵抗的旗帜，成为两

¹ 《长编》卷 238，熙宁五年九月丁未，第 5791 页。

²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238 页。

宋之间宋金战争中主战派的领袖人物。李纲虽屡遭贬谪，但他毫不屈服，英勇抗敌，其现实主义的战守策略与凛凛气节，被后人视为爱国主义的典范而彪炳史册。

李纲生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卒于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年），字伯纪，福建邵武人，别号梁溪先生。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进士及第，政和五年（1115年）任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不久即因议论朝政过失，被罢去谏官职事。宣和元年（1119年），上书要求朝廷注意内忧外患问题，被宋徽宗赵佶认为议论不合时宜，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宣和七年（1125年），金军兵临东京城下，李纲被召回朝，任太常少卿。钦宗即位后，升李纲为尚书右丞，任亲征行营使，负责东京的防御，因他坚决反对向金割地求和，被罢官。东京军民愤怒示威，迫使宋钦宗收回成命，李纲才又被起用。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相），但仅七十五天，就被驱逐出朝，不久贬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继又流放到海南岛的万安军（今广东儋县东南），直到建炎三年（1129年）底才获自由。绍兴二年（1132年）二月至绍兴三年，李纲任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兼知潭州，后罢为提举西京崇福宫，又于绍兴五年至七年任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绍兴十年去逝（1140年），赠少师。李纲的经历波澜曲折，他始终不渝地反对投降、坚决抵抗的思想，与当时众多投降派格格不入，但正是这些不畏艰难的抵抗，才使南宋统治渐趋稳定，从而使南宋得以与金人相抗衡，为南宋一百多年的统治打下了基础。近人对李纲的研究主要有王开堂《李纲政绩述评》¹，论述了李纲在政治上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及措施的实行。王丽华《试论李纲的抗金策略与措施》²，论述了李纲反对投降；防惩叛乱；坚持战守的策略，主要措施有：建立军区、联络义军、加强战备等；浙江大学张丰的硕士论文《李纲研究》³，对李纲生平遭贬原因及与张浚关系两个问题作详细考究论辩，并对李纲的诗文创作进行了解读。李永康《试论李纲在南宋初期抗金斗争中的地位》⁴，指出李纲在南宋初建时期及对抗金斗争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节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分析李纲反对求和投降，坚决进行抵抗，重视人民力量，肯定“澶渊之盟”等思想。

一、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的思想

¹ 王开堂：《李纲政绩述评》，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² 王丽华：《试论李纲的抗金策略与措施》，载《江汉论坛》1996年第7期。

³ 张丰：《李纲研究》，2007年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www.cnki.net。

⁴ 李永康：《试论李纲在南宋初期抗金斗争中的地位》，载《运城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再次围攻东京，宋廷弥漫了屈辱投降的气氛。由于宋朝皇帝赵佶、赵桓父子以及朝廷多数大臣都是主张求和与逃跑的投降派，因此，坚决维护国家利益成为李纲对金思想的重要内容。

首先李纲坚决反对弃城而逃。

靖康元年（1126年）金将斡离不兵渡河，宰执李邦彦议请钦宗皇帝暂避敌锋，太宰白时中认为都城不可能守住，也劝皇帝放弃都城。李纲认为京城是宗庙社稷的象征，决不能放弃，大敌当前，只可进，不可退，朝廷必须“整饬军马，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¹金军即将包围汴京城之时，钦宗再次欲弃城南逃，李纲看到禁卫已经整装待发，乘舆服御皆已陈列，眼见逃亡将成事实，李纲急切的入见钦宗并劝告：“六军之情已变，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岂肯舍去，万一中道散归，陛下孰与为卫？且虏骑已逼，彼知乘舆之去未远，以健马疾追，何以御之？”听了李纲的分析，钦宗最终决定放弃南逃的行动。为稳定了军心，李纲又传旨给左右：“上意已定，敢有异议者斩！”²在情况危机的关头，李纲不畏惧强敌的进攻，阻止皇帝与重臣的逃跑，准备领导军队与金人进行决战，但是当时朝廷内部投降求和之思想弥漫，能把生死置之度外，坚决支持李纲的大臣可谓寥寥无几。皇帝虽然留在东京，但因为投降主义思想作祟，没有积极号召各地“勤王”军与东京守军一起，奋勇抗敌，而是罢免李纲的官职，对金妥协投降，最后都城沦陷、自身不保。

建炎之初，高宗在南京（在今商丘）即位，投降派以“巡幸”为名，又劝说高宗南逃。李纲坚决反对，他上奏说：“宗社朝廷一迁，天下之势，必有偏而不起之处，中原摇动，卒难复安。”³他认为如果朝廷放弃了中原，金人会趁机侵扰内地，盗贼蜂拥而起，皇帝再想回到中原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高宗没有接受李纲的建议，仍想逃奔东南。李纲又二次上奏：“胜天下者必以势，而据地利莫肯先退者势也；盖天下者必以气，而尽人力事莫肯先屈者，气也。”⁴李纲针对高宗怯敌心理，劝高宗不能节节退让，说明不论在哪里建都，都会面对金人的进攻，因此要坚守南京，不要一逃了之，要是放弃了南京，虽然会有一时的安逸，但是后面的祸患会更多，但是对于李纲的劝说，高宗不以为然，还是选择了放弃中原，

¹ 《三朝北盟会编》卷 27，靖康元年四月五日，第 416-417 页。

² （宋）李纲：《李纲全集》卷 171，《靖康传信录上》，岳麓书社 2004 年版，第 1578 页。

³ （宋）李纲：《李纲全集》卷 58，《议巡幸》，岳麓书社 2004 年版，第 637 页。

⁴ （宋）李纲：《李纲全集》卷 63，《议巡幸第二札子》，岳麓书社 2004 年版，第 673 页。

退居东南一隅。

其次，李纲坚决反对割地。

靖康元年，李邕使金议割地，李纲上奏：“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¹金人包围汴京后，宋欲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给宋，李纲极力反对。靖康元年金要求遣大臣至军中议和，李纲请行。钦宗认为李纲性刚烈，不适于与金谈判，想派遣李棨去议和，李纲分析道：“安危在此一举，臣恐李棨怯懦而误国事也。”钦宗不听，竟使棨往。金人须金币以千万计，求割太原、中山、河间地，以亲王、宰相为质。棨受事目，不措一辞，还报。对此，李纲从实际情况出发，他说：“所需金币，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镇，国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国？至于遣质，即宰相当往，亲王不当往。若遣辩士姑与之议所以不可者，宿留数日，大兵四集，彼孤军深入，虽不得所欲，亦将速归。此时而与之盟，则不敢轻中国，而和可久也。”²李纲认为三镇是重要的战略要地，要据理力争，绝对不能失去。可是一味投降的钦宗根本听不进李纲的建议，他表面抚慰李纲，暗中却与金人订立交割誓书。事后，李纲上《乞议不可割三镇劄子》，他痛陈：“方今金人退师已远，挟质以往，必期于得地而后已，如三镇果下，则异时河北、河东，必不能守。密迹畿甸，宗社可忧。”³但不久，钦宗仍下了割地诏书。李纲再上《乞措置镇札子》后，策划利用护送金兵的机会，中途阻击，不幸又被主和派破坏。他在《上钦宗乞廷议守御四事》说：“然而金人本约亲王至河而反，今已爽约，又沿路屠戮，横尸满野，则和议盟约已不可守，异时既得三镇，别求衅端，不旬日而至城下，其患岂浅乎？”⁴李纲痛陈，金人不可信，即使他们得到三镇，而不守约定，再生其他求地的事端，那么更是大患，因此，寸地不可轻易割给金人。

再次，李纲坚决反对投降议和。

在李纲看来，金是南宋的“仇仇之邦，不共戴天”⁵在这种背景之下，我方“卑辞厚币，屈体以求之”，他们不仅不会理会我们的诚意，而且还会“邀我以

¹ 《宋史》卷 358《李纲传上》，第 11242 页。

² 《宋史》卷 358《李纲传上》，第 11244 页

³ （宋）李纲：《李纲全集》卷 43《乞议不可割三镇札子》，岳麓书社 2004 年版，第 518 页。

⁴ 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 142《边防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版，第 1611 页。

⁵ 黄淮，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435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401 页。

必不可从之事，制我以必不敢为之谋”，这样和议最终不会成功，只会破坏我们的“自治自强之计”¹。李纲在总结靖康时期的失策时说：“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镇之地，许不可胜计之金币以议和，惩劫寨之小衄而不战，和与战两失之。……自古夷狄之祸中国，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并守策失之，而卒为和议之所误也。”²李纲认为在战败的情况下，进行无原则的割地、纳币进行议和，是不足取的。他认为这种投降式的议和，不会得到长久的和平，即使获得和平，也只能是暂时的，因此他坚决反对议和。李纲劝说宋高宗，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向金派遣和议使臣了。他认为：“昔金人与契丹二十余战，战必割地厚赂以讲和，既和则又求衅以战，卒灭契丹，今又以和惑中国。”³李纲认为宋要接受辽的教训，不要再与金和议，即使金主动提出议和，也是为了麻痹宋，如果宋与金议和，不但要割地、纳款，而且当金力量恢复后，又会挑起战争。

建炎元年六月李纲作为主战派的领袖人物，被朝中占多数的主和派（如耿南仲、白时中）所仇视，他们以李纲为妨害“主和大政”的罪魁祸首，一再对其抵毁离间，终将李纲调离京师赴任河北。绍兴八年（1138），李纲罢官闲居，他听说王伦偕金使以“诏谕江南”为名来宋议和约，又预料金人要提出种种要求，他急切地上奏：“臣在远方，虽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敌为此名以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诏书，欲陛下屈体降礼以听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班示郡县，二也；必有约束，欲陛下奉藩称臣，禀其号令，三也；必求岁赂，广其数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为界，淮南、荆襄、四川尽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从其一，则大事去矣。”⁴对于“金人欲尊大之礼”的要求，李纲认为澶渊之盟规定，宋君为兄，契丹主为弟，当时“尊大”在宋方。为应一时之急，则不妨尊金主为兄，宋君为弟，他提醒高宗倘屈体降礼，权时之宜以听其“诏令”，则君臣之分定矣，千万不能同意。对于“（金人）欲厚邀岁币”，李纲认为：“当答以旧约，以燕云归中国，故岁币所以加倍于大辽；今（金人）既败盟，尽取燕云之境，岂可复增岁币？为两朝赤子之故，不敢爱惜，且如旧约，已为过厚。至于欲割地，则祖宗境土，为人子孙，当固守之，虽尺寸之地，岂可割

¹ 《宋史》卷 359《李纲下》，第 11266 页。

² （宋）李纲：《李纲全集》卷 58《议国事》，岳麓书社 2004 年版，第 635 页。

³ 《要录》卷 6，建炎元年六月庚申，第 142 页。

⁴ 《要录》卷 124，绍兴八年十二月戊午，第 2010 页。

以遗人？”¹李纲认为金人如有以上五项要求，一个也不能答应金使，其实表明了他坚决反对投降、反对议和的态度。

二、坚决抵抗的现实主义思想

李纲反对投降、防惩叛乱，都是为了坚持抵抗。宣和七年（1125年）冬，金兵两路攻宋，完颜宗望（斡离不）率领东路军直逼宋都东京。宋廷一派慌乱，钦宗与执政大臣有着强烈的求和思想。李纲则反对求和，赞成亲征与坚守。

首先，李纲从人性的观点，认为北宋无法满足金人的贪婪，战是必然的趋势。李纲上奏言：“金人贪婪无厌，凶悖已甚，其势非用师不可。且敌兵号六万，而吾勤王之师集城下者已二十余万；彼以孤军入重地，犹虎豹自投槛阱中，当以计取之，不必与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绝饷道，分兵复畿北诸邑，而以重兵临敌营，坚壁勿战，如周亚夫所以困七国者。俟其食尽力疲，然后以一檄取誓书，复三镇，纵其北归，半渡而击之，此必胜之计也。”²李纲认为金将斡离不一支部队，深入宋腹地，如果扼住交通要道，再对金人坚壁清野，然后消耗其实力，用兵十万分道袭之，断其归路，则宋的败亡也许可能挽救。

其次，李纲认为在战的前提下，可以进行防守，进而得到和平。正确处理战、守、和三者的关系，正是抗金致胜的前提和关键。李纲认为：“虽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则何以战？虽有坚甲利兵，弗能战也，则何以和？以守则固，以战则胜，然后其和可保。不务战守之计，惟信讲和之说，则国势益卑，制命于敌，无以自立矣！”³这就是说，能守才能战，能战才能和。当金人已分路南侵，大军尚未渡河之际，李纲上奏《论御寇用兵劄子》，陈述了“捍御大寇二十事”。在第一事中就提出“今来金国入寇，合为固守之策”，并作了具体规划：“遣帅命将，召募兵夫，广张声势，联营接垒，屯驻要害之地，坚壁深堑，勿与争锋，待其粮竭气衰，徐议攻战，绝其饷道，扼其归路，使虏惊顾，一鼓破之。”⁴李纲始终认为，长期的和平来源于自身的实力，若在敌人力量薄弱，孤军深入后，进行攻战，使敌人不轻视中国，和平才能够持久。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纲率领东京军民及时完成防御部署，亲自登城督战，击退金兵。这时，四方勤王之师渐有至者，种师道、姚平仲亦以泾原、秦凤兵至。金帅完颜宗望见无力攻破东京，在宋廷答应割

¹（宋）李纲：《李纲全集》卷42《论御寇用兵札子》，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510页。

²《宋史》卷358《李纲传上》，第11244页。

³《三朝北盟会编》卷105，建炎元年六月二日，第1598页。

⁴（宋）李纲：《李纲全集》卷42《论御寇用兵札子》，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510页。

让河北三镇之后，遂于靖康元年(1126)二月撤兵。

第三，李纲在组织东京保卫战的同时，与主和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北宋灭亡后，宋高宗赵构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举起了赵氏王朝的大旗，鉴于李纲的声望，高宗诏令李纲入朝，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相)，辅助朝政。李纲一入相，就代表抗战派向高宗上陈十议，曰国是、巡幸、赦令、僭逆、伪命、战、守、本政、责成、修德。其中心思想就是反对和议，与主和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出卖国家利益的人要严加惩办，收复失地，修明正务，扩大军事力量。他指出：“今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自治，专以守为策，俟吾政事修，士气振，然后可议大举。”¹李纲还指出不惩处张邦昌等卖国贼，只能是丧失民心，仁人沮志、金人喜而国人怨，南宋也就很难立国长久，要求罢免张邦昌等人，并表示只要张邦昌在朝一日，则决不与之同列朝堂。在李纲的努力和推动下，高宗才下了决心，贬滴张邦昌，永不叙用。

第四，李纲积极组织抗金，为加强抗金斗争的力量，他推荐坚决抗战的人担任抗金要务。如他推荐老臣宗泽出任东京留守，去东京整修防御设施；又力主设置河北招抚司和河东经制司，支持两河军民的抗金斗争，并推荐张所和傅亮分别任河北招抚使、河东经制副使。他还针对北宋以来军政腐败，赏罚不明等情况，颁布了新军制二十一条，着手整顿军政。他认为强兵的出路在于“修政事，信赏罚，明是非，别邪正，招来人材，鼓作士气，爱惜民力，顺导众心为先。数者既备，则士奋于朝，农安于野，谷粟充盈，财用不匱，将帅辑睦，士卒乐战，用兵岂有不胜者哉。”²李纲认为通过这些方法，能够改变南宋“军政不修”的状况。

绍兴五年正月，高宗下诏问攻战、守备、措置、绥怀之方，李纲遂进呈《奉诏条具边防利害奏状》，他劝告宋高宗要居安思危，不可一退再退，李纲在奏章中指出：“愿陛下勿以敌退为可喜，而以仇敌未报为可愤；勿以东南为可安，而以中原未复、赤县神州陷于敌国为可耻；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而以军政未修、士气未振而强敌犹得以潜逃为可虞。则中兴之期，可指日而俟。若夫退避之策，可暂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则失一步，退一尺则失一尺。往时自南都退而至惟扬，则关陕、河北、河东失矣；自惟扬退而至江、浙，则京东、西失矣。

¹ (宋)李纲：《李纲全集》卷174《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上》，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611页。

² 《要录》卷110，绍兴七年四月丁未，第1785页。

万有一敌骑南牧，复将退避，不知何所适而可乎？”李纲认为“宜于防守既固，军政既修之后，即议攻讨，乃为得计。”他反对投降派“闲暇则以和议为得计，而以治兵为失策；仓卒则以退避为爱君，而以进御为误国。”¹为此，他希望首诛叛逆，褒扬忠义，续贬主和诸臣，恩恤勤王将士，诏河北固守，设忠义巡社，任用抗战将领，经略两河。李纲现实主义的抵抗思想与取得的巨大成就，使高宗亲笔褒谕他“精忠许国，诚节表时，虽在燕闲之中，不忘开济之事”²。

三、人民是抗金的力量之本

随着北宋的灭亡，两河地区（今河北，山西一带）大部分沦陷，被女真攻占的地区和抗金前线的农民为了反抗女真贵族的残暴统治，纷纷组织起自卫武装。建炎之初，李纲亲眼见到朝廷虽割三镇，但三镇兵民仍坚持固守，从而看到人民抗金的巨大力量。他认为像这类声势浩大、向心力强的人民武装，正是抗金斗争中必须依靠的力量。李纲认为河北、河东是国家屏障，对那里的人民自卫武装，建议朝廷给予名号，以及必要的军需器械，招抚朝廷视为“群盗”的祝靖、薛广、党忠、阎仅、王存等十多万人，依着新军制，把他们改编。同时，建议朝廷在河北设招抚司、河东设经制司。任命在人民和义军中有威望、受拥护的张所、王理分别为“河北招抚使”、“河东经制使”。李纲认为选派将领，经略两河，增援义军，一方面可以防止金人招抚义军，另一方面又可资义军御敌之力，收复失地。在这之后，义军的斗争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各义军首领皆自投招抚司和经制司帐下效力，于是“两河响应，忠义民兵首领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皆附之。”³义军互相配合，声势强大，给金人以沉重的打击和极大威胁。“河东之民心怀本朝，所在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号，金兵之在河东者，稍稍北去，金之兵械亦不甚精，但心协力齐，奋不顾死，以故多取胜，然河东之人与之稔熟，略无所惧，又于泽、潞间劫左副元帅宗维寨，几获之。”⁴义军相继收复了石州、陕州等许多失地。两河地区的斗争，已汇集为收复故土规模浩大的军事行动，东京一带便成了重要的战略地区，义军首领王善、杨进、王再兴、李贵、王大郎等纷至效用，出没于京东、西，到处袭扰金人、收复城池，抗金斗争如火如荼。宗泽曾上奏高宗说：“山寨忠义之民，相应者不啻百万，……愿陛下早降回銮之诏，……

¹ 《宋史》卷 359《李纲传下》，第 11265 页。

² （宋）李纲：《李纲全集》卷 79，《亲笔诏书》，岳麓书社 2004 年版，第 807 页。

³ 《要录》卷 9，建炎元年九月乙卯，第 226 页。

⁴ 《要录》卷 9，建炎元年九月壬辰，第 212 页。

中兴之业，必可立致。”¹

两河及东京义军的积极作战，使抗金事业取得了巨大战绩。宗泽、张所、傅亮等领导的两河人民对金人的有力打击，使女真贵族在中原已站不稳脚跟，惶惶然欲北归。李纲能够利用人民的力量，积极对金人进行抵抗，这在当时的统治阶层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统治阶层中不少人还是以“严守内部”的思想，害怕人民起来反抗赵氏王朝，不敢发动人民去反抗金国。

四、李纲对“澶渊之盟”的评价

“澶渊之盟”不论在宋代还是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中，都具有里程碑的作用。“澶渊之盟”，宋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多。李纲对“澶渊之盟”持肯定的看法，表现出他希望中原政权与其他大国之间关系和平相处的愿望。李纲在《论守御札子》中说：“臣窃观自秦汉以来，制御戎狄，未有得上策者，惟本朝与契丹为澶渊之盟，守之以信，结之以恩，百有余年，边境晏安，兵革不用，和好之笃，古所未有。”²可见他对“澶渊之盟”保持宋辽一百多年的和平局面，给予了极高评价。李纲在《制虏论》中亦云：“当时盟誓之信，皎如日月，约束之严，曲为之防，通使有常时，赠贿有常数，燕犒有常礼，仆从有常制。其慰荐抚循，交际威仪，俯仰拜起，纤悉备具。故能结欢修好百有余年。并边之民，不识兵革，振古以来，所未尝有，谨守盟约，虽传之万世可也。故曰：得御夷狄之全策，惟本朝为然。”在李纲看来，澶渊盟约的订立，使宋辽两国建立相对和平的关系，双方互相往来，一切都按照约定执行，使两方免于战争，边民安居乐业，澶渊盟约成为“御夷狄之全策”。从中可以看出李纲希求用盟约的规范，来实现和平与安定的思想。李纲还曾经做诗，歌颂宋辽结盟：

天骄自昔难羁縻，凭陵中夏侵北垂。
秦城万里堑山谷，汉女远嫁为阏氏。
赫然武帝事征伐，天下骚动士马疲。
古来制御无上策，本朝镇抚诚得宜。
祖宗守边有良将，胡骑远遁不敢窥。
澶渊之役起仓卒，当时众议何其危？

¹ 宗泽：《宗忠简集》卷1《奏乞回盩仍以六月进兵渡河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2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27页。

² （宋）李纲：《李纲全集》卷46《论守御札子》，岳麓书社2004版，第535页。

莱公庭争乃亲讨，貔虎百万从六飞。

弩机暗发虏酋殒，震怖屈膝祈完归。

欢盟从此到今日，生灵休息诚赖之。”

中间桀傲邀岁赐，悬河之辩亦莫支。

笃生郑公为民社，一言剖决遂不疑。

莱郑之功实终始，配食太庙铭鼎彝。¹

两首短诗，表达了李纲对澶渊之盟的看法，他认为在北宋军事强大的情况下，进行英勇的战防，然后采取和，这是能够与当时与北宋平起平座的辽国保持和平的最上策，这与他的“以守则固，以战则胜，然后其和可保”²的思想一致，他认为只有国家实力强大了，才能够保证百姓生活安逸，才能使国家长久和平。

北宋朝廷面对金的入侵，朝廷内外屈服求和的思想成为主流，而李纲以现实主义的精神，竖立起一面反对投降，坚决抵抗的旗帜，对北宋末年与南宋初的抗金具有重要的意义。宋朝中后期已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最发达的时期，而金国尚处于十分落后的奴隶社会，女真贵族的对宋战争，其目的就是为了掠夺土地、奴隶和财富。因此，女真贵族的南下具有掠夺、奴役中原人民，破坏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明，使社会倒退的性质。李纲的抗金，在客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反对金国侵扰，进行民族自卫的要求。李纲作为全国抗金斗争的领导者，他驰骋疆场，运筹帷幄，且卓有成效，不仅使立国之初的南宋军民有所倚赖，而且也远慑金人之心，“纲负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为社稷生民安危。虽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诚义气，凛然动乎远迩。每宋使至燕山，必问李纲、赵鼎安否，其为远人所畏服如此。”有论曰：“以李纲之贤，使得毕力殫虑于靖康、建炎间，莫或挠之，二帝何至于北行，而宋岂至为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则安，用小人则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恶危。”³由李纲的抵抗而获得的金国的尊敬来看，在对待外侮的问题上，软弱投降遭到的是敌方轻视与猥亵，与之俱来的还有更沉重的打击，而给予入侵者坚决的抵抗与回击，才能得到对手的尊重与屈服。

¹ 李纲：《李纲全集》卷12《题富郑公画像二首》，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44页。

² 《三朝北盟会编》卷105，建炎元年六月二日，第1658页。

³ 《宋史》卷359，《李纲传下》，第11274页。

第五章 北宋保守主义外交思想

保守主义就是一味的对现状的保持和对传统的固守。宋初，太祖、太宗吸取历史教训，制订了一系列的对内对外政策，并作为基本国策予以执行。这些基本国策也为后世的宋代皇帝所奉行，影响着整个宋代的内政与外交。宋代统治者遵循“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思想，其外交思想中呈现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保守主义思想。

第一节 北宋临朝听政皇太后的保守主义外交思想

有宋一代，共有九位后妃十次临朝听政，有的皇太后垂帘时间很短，听政仅具象征意义，如绍熙五年（1194）六月孝宗驾崩，太皇太后吴氏以 80 高龄“于梓宫前垂帘，宣光宗手诏，立皇子嘉王为皇帝。翌日，册夫人韩氏为皇后，撤帘”。¹有的皇太后则实权在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仁宗朝太后刘氏和哲宗朝太皇太后高氏，分别听政了十一年和八年多，是宋朝听政时间最长的两位太后，拥有着当时政治、经济、外交的大权。宋人对听政皇太后有“纲纪四方，进贤退奸，镇抚中外，”²“朝庭清明，华夏绥定”³的评价，这些溢美之词，并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出听政皇后对外关系的全部情况，其对外思想值得研究。前期在对宋代后妃的研究中，付海妮《宋代后妃临朝不危政原因浅析》⁴，分析了宋代后妃不危政与宋代家法的严密，士大夫阶层的监督抵制，对外戚的防范以及后妃自身的约束有很大关系；张明华《北宋宣仁太后垂帘时期的心理分析》⁵，研究了高后仇恨王安石变法的社会背景与心理因素，探索了她的心理因素对当时政策的影响；肖建新《宋代临朝听政新论》⁶认为宋代皇后依靠的最基本统治力量是文臣，这是她们合法听政，守成而治的重要根源；《学术月刊》2001 年第 8 期朱子彦《宋代垂帘听政制度初探》⁷，对宋代垂帘制的缘起，嬗变及防范后妃、外戚篡位乱

1 《宋史》卷 243《后妃下》，第 8648 页。

2 《长编》卷 198，嘉祐八年三月甲申，第 4801 页。

3 《宋史》卷 242《后妃上》，第 8625 页。

4 付海妮：《宋代后妃临朝不危政原因浅析》，载《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 年第 1 期。

5 张明华：《北宋宣仁太后垂帘时期的心理分析》，载《洛阳师范学院》，2004 年第 1 期。

6 肖建新：《宋代临朝听政新论》，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 年第 4 期。

7 朱子彦：《宋代垂帘听政制度初探》，载《学术月刊》，2001 年第 8 期。

政的措施作了具体论述；《河北学刊》1994年第1期张邦炜《两宋无内朝论》¹，论述了内朝的含义，提出两宋无内朝的原因；《江汉论坛》1994年第4期杨果《宋代后妃参政述评》²，论述了宋代后妃参政时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对赵宋君主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补充作用。李华瑞《论宋哲宗元祐时期对西夏的政策》³，研究分析了元祐时期北宋政府对西夏政策的转变及失败。罗家祥《元祐之政剖析》⁴，对元祐时期的吏治、民族政策进行了分析，客观地评价了司马光为相时的功过。这些论著主要研究了宋代后妃听政的特点，处理内政的方法及其个人品德与心理路径。本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北宋临朝听政皇后对外思想中的保守主义及原因作进一步的研究。随着时代变迁，女性政治家不断增多，女性执政与男性执政的思想与风格的差异性引起人们的关注，而这些差异性有部分与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与文化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绍述先王、守内虚外：听政皇后对外思想之圭臬

宋代听政皇后多以太后和太皇太后身份，并获先皇遗诏或皇上的请求进行听政。她们根据诏旨，拥立和扶持年幼病弱的皇帝，在原有政治框架基础上进行统治，其对外思想之原则就是绍述先王，遵守成法、守内虚外。

宋代听政皇后为维护国内政治的稳定，保证皇权的顺利过渡，更是严守“祖宗家法”。刘太后听政以后，“宫掖间未尝妄改作”，⁵废除先朝所变之法，并要求此后听断依祖宗旧规。英宗去世后，神宗即位。曹太后听政，她处理政事的方法是“颇涉经史，多援以决事”，坚决地主张“祖宗法度不宜轻改”。高皇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她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复祖宗法度为先务，且令亟疏可用者，”⁶把重新恢复祖宗旧法作为最重要的工作。元符年间听政向后也在听政后重用保守派，恢复祖宗旧法。

在“祖宗家法”的支配下，北宋皇太后在垂帘听政之时，“守成而治”是其内政的特点，“守内虚外”是其保守主义外交思想的基础。她们将修德治内看作是治国的根本，认为内患远重于外忧，只要治理好内部自然就可获得外部的和平。

¹ 张邦炜：《两宋无内朝论》，载《河北学刊》，1994年第1期。

² 杨果：《宋代后妃参政述评》，载《江汉论坛》，1994年第4期。

³ 李华瑞：《论宋哲宗元祐时期对西夏的政策》，载《中州学刊》，1998年第6期。

⁴ 罗家祥：《元祐之政剖析》，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5期。

⁵ 《宋史》卷242《后妃上》，第8641页。

⁶ 《宋史》卷242《后妃上》，第8621页。

因此，国家施政应集中精力防御和治理“内患”，对外执行“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守内虚外”的基本准则。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北宋听政皇太后在对外关系中，继承了前代外交的格局、外交方式与礼制。十世纪中叶，辽、宋成为东亚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形成了宋、辽双方互视对方为最重要的交往对象的格局。宋初，宋把与辽国的关系列于与其它国关系之上，北宋听政皇太后把宋辽关系作为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在刘太后听政的十一年间，关于宋对外交往的国家与地区的条目一共有八十八条，其中就有四十二条记载了宋与契丹关系，尚无其他大国可以受到如此重视，可见辽在宋外交中的重要地位。这期间宋辽双方的关系一方面是建立在澶渊盟约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听政皇后继承前代对辽交往的方式，以每年几次互派贺岁使作为宋辽关系发展的主要手段。如正月时，互派贺正旦国信使，在双方皇帝生日之时，派贺生辰国信使。在外交礼制上，北宋临朝皇后可为严格遵守。如天圣初，契丹使萧从顺请见太后，认为辽朝母后临朝听政时，常接见宋朝使臣，而宋的女主上朝却“垂帘”，不能看清太后的“尊容”，再三恳求见太后，仍不得见。¹在绍述先王，因循成法的准则下，外交礼制中微小变动的请求，也会遭到拒绝。如天圣五年（1027年），契丹遣萧蕴贺乾元节，萧蕴提出升其位的要求，“蕴出位图指日：‘中国使者至契丹，坐殿上，位高，今契丹使至中国，位下，请升之。’”当时刘太后与其他臣僚认为这是一件小事情，准备同意萧蕴的请求，但是馆伴使程琳认为：“此真宗皇帝所定，不可易。”²刘太后以礼制随前朝及担心契丹使进一步提出其它要求的角度考虑，最终也没有同意契丹使的要求。

刘太后听政后，每年在形式上数次派遣国信使与辽交往，在外交中“守内虚外”的保守主义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当时在宋辽的交往互动中，宋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只有当辽主动向宋提出具体要求时，刘太后才会被动地寻找解决途径，其解决方法小心谨慎，以宋辽边境安定为主要目的。如天圣二年（1024），契丹大势阅兵，声言要攻打幽州。当时朝廷人心浮动，有些人认为应该加强战备，勤练士兵，积极备战。但是如果这样做，必然会引起辽国的不安，造成双方关系的

1（宋）王称：《东都事略》卷5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38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33页。

²《长编》卷105，天圣五年四月辛巳，第2439页。

紧张气氛。当时枢密副使张知白提出：“契丹修好未远，今其举兵者以上初政观试朝廷耳。岂可自生衅邪？若终以为疑，莫如因今河决，以防河为名，万一有变，亦足应用。”¹刘太后采纳了张知白的建议，没有过多久，契丹果然在边境退去，这次事端也就此平息了。从这个事件中，可以洞察出刘太后对外谨小慎微，希求稳定的思想。

北宋皇太后听政时，墨守前代对外部安全环境的认知，守内虚外，对新形势、新变化毫无洞察。在刘太后听政期间，西夏得到辽与宋两国的封号，力量不断上升，对宋的边境构成了威胁，刘太后没有居安思危地认识到存在的威胁，因此也没有任何对西夏的积极应对措施。当时人们对宋夏关系关注很少，《续资治通鉴长编》在刘太后听政的十一年间，记载宋与西夏关系的条目仅有四条。从后人对天圣年间宋夏关系的反思中，如夏对麟州城外屈野河地带侵耕事件，还是可以看出西夏的野心。屈野河西地在麟府两州的西面，西南接银州，西北与西夏相连。天圣年间，西夏开始改变屈野河西地区宋夏的边界。

“天圣初，州官相与讼河西职田，久不决，转运司乃奏屈野河西田并为禁地，官私不得耕种。自是民有窃耕者，故辄夺其牛，曰：‘汝州官犹不敢耕，汝何这至此？’由是河西遂为闲田，民犹岁输税，不得免，谓之草头税。自此故稍耕境上，然亦未敢深入也。及元昊之叛，始插木置小寨三十余所于道光、洪崖之间，盗种寨旁之田，比至纳款，所侵才十余里。是时，朝廷以更定誓诏，不欲与敌分明界至，乃令修河滨堡。”²遂使屈野河西至夏界六十里之内的大片土地成为“闲田”。初时，夏人所侵才十余里，但由于宋夏双方对这里的边界存有争论，西夏便蛮横地坚持“我马足所践，即为我土”。而宋为避免边境生事，严禁边吏过屈野河西，“西人初犹顾望未敢，岁数之后，习知边吏所为，乃放意侵耕。”致使“自银城以南至神木堡，或十里、或五七里，皆为敌田矣”。³对于西夏力量的增长，视而不见，没有察觉到西夏的野心，也根本没有预料到西夏对宋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刘太后去世六年后，宋夏战争爆发，由于宋军人不习战争，前线防备日久失修，在战争中遭到惨败。

曹皇后在嘉祐八年（1063）以太后的身份权同处分军国事，她听政时，“不

1（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8《仁宗朝契丹议关南地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34页。

²《长编》卷185，嘉祐二年二月壬戌，第4470页。

³《长编》卷185，嘉祐二年二月壬戌，第4472页。

立生辰节名，不遣使契丹。”¹以这种方式来表明，自己不恋权位，积极还政，听政的规格低于章献明肃刘太后。后来，元符年间听政的向皇后随“慈圣故事”，²不立生辰节名，不遣使契丹。这种“不立生辰节名，不遣使契丹”是两位听政皇后对于内政节礼的考虑，但宋辽两国间来往贺岁使的减少，无疑将会影响宋辽信息的沟通与交流。她们的这种举措，其实也显示出她们重内政而轻外事的保守主义思想。

二、闭关自守、崇尚中庸的保守主义思想

北宋听政皇太后在处理对外关系中，闭关自守，倾向保守。北宋中期对外交往范围比宋初大大缩小。随着宋统一大业的基本完成，与宋王朝有联系的国家与地区众多，刘太后听政时，与宋有联系的除了辽与西夏外，仅有高丽、龟兹、角厮罗、交趾、甘洲回纥、三佛齐等国家与地区，他们与宋的联系是一年或数年朝贡一次。当时一些国家也有与宋交往的要求，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建立起官方关系。如日本天圣四年，明州言：“日本国太宰府遣人来贡方物。”³因为当时来人没有持本国的表章，刘太后下詔，让他们就地返回，在后来的数十年中，中日政府之间没有交往。

高太后垂帘听政，在外交上奉行闭关政策，把远交海外看作无益于国家的“弊政”。如元祐间苏轼曾经上奏：“熙宁以来，高丽人屡入朝贡，至元丰之末，十六七年间，馆待赐予之费不可胜数。两浙、淮南、京东三路筑城造馆，建立亭馆，调发农工，侵渔商贾，所在骚然，公私告病，朝廷无丝毫之益，而夷虏获不货之利”。⁴高太后基本赞同苏轼的观点，政府减少了高丽使节的待遇，所谓“自明州以来州郡待遇礼节，率皆减旧”。⁵降低高丽使节的待遇，甚至怀疑高丽为辽探听宋的情报，给宋丽关系投下浓重的阴影，元祐时期官方的宋丽关系逐渐陷入冷淡状态。

崇尚中庸，在争端中保持中立的思想。北宋听政皇太后，在处理对外关系中，想通过中庸的思想，达到“柔远人也，怀诸侯也”的目的。刘太后听政时期，在辽丽关系中，保持不偏不倚。天禧二年（1018年）辽朝向高丽发动了大规模战

¹ 《宋史》卷117，《礼二十》，第2775页。

² 《长编》卷520，元符三年春正月庚辰，第12368页。

³ 《长编》卷104，天圣四年十月庚辰，第2424页。

⁴ 苏轼：《苏东坡全集》卷14《论高丽进奉状》，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99页。

⁵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4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7页。

争，迫使高丽向己称臣纳贡，高丽希望宋朝能鼎力相助，因而也几次向宋朝请求军事、政治支援，但宋朝为了维护澶渊之盟换来的宋辽和平，保持中立，不敢出师相助，高丽被迫从乾兴元年（1022年）开始采用辽朝年号。天圣年间，高丽又遣使入宋，“称不愿附契丹而愿附朝廷，朝廷终不允纳，虽然，观高丽款附之切，如渴者望饮，如饥者望食，无一日而忘也”。¹宋方因害怕契丹的反对，而不敢让高丽归附，直接造成了以后高丽基本不再向宋遣使，宋丽双方正式使节往来中断达四十余年。

高太后听政时有着在朝贡国中保持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元祐七年（1092年），占城受到交趾的侵入，占城要求宋讨伐交趾。占城与交趾两国有旧怨，也都是对宋朝贡的国家，如果宋答应了占城的要求，将会与交趾交恶。为保证在两国之间保持中立，宋答复占城：“交趾见今入贡，不绝臣节，难议兴师。”²处于中庸的立场，对占城与交趾不偏不倚，可以保证宋的利益不受到损失，应该值得肯定。可是，中庸并不是总与宋的国家利益一致。元祐八年（1093年），于阗因受到夏国的侵犯，请讨夏国。当时西夏已经派军十万，进攻熙河兰岷、鄜延路与环州，宋夏已经处于交战之中，答应于阗的要求，有利于加强与于阗的关系，使夏遭受来自于两方面的压力，对夏有一个起码的威慑作用，但是中庸思想仍主导着高太后，她在于阗与西夏中间选择了中立，拒绝了于阗的请求，使西夏对宋的侵扰更肆无忌惮。

三、妥协退让、乃至主动弃地的保守主义思想

今天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与男性平等，在和平与战争中，女性与男性选择的倾向性相同。但是赵宋王朝临朝听政的女主在对战争与和平的选择中，各种因素促使她们的第一选择是和平，甚至不惜用妥协与退让达到和平。只有在敌手咄咄逼人的进攻中，最后才会选择反抗。

刘太后听政伊始，为使边境安定，命令“缘边城寨首领等谨守疆场，无得生事。”³契丹看到宋孤儿寡母，对宋有了觊觎之心。天圣初年，契丹遣使要借塞内地牧马，向宋挑衅，对这个非分的要求，众多大臣都心存疑惑，不知道如何应付。刘太后在大臣中广泛征询意见，大臣王钦若认为：“不与则示怯，不如与之。”刘

¹ 《长编》卷 150，庆历四年戊午，第 3651 页。

² 《宋会要辑稿》，《蕃夷》4 之 33，第 7730 页。

³ 《长编》卷 98，乾兴元年三月丙申，第 2277 页。

太后表示疑虑：“夷狄豺狼，奈何延之塞内？”王钦若进言：“虏以虚言相恐惕耳，未必敢来，宜密詔曹玮，使奏乞整顿士马，以备非常。”¹太后最后采纳了王钦若的意见，同意契丹进行塞内牧马，又命知定州的曹玮加强战备，虽然最后契丹没有敢进入塞内，但刘太后面对辽的挑衅，妥协退让，害怕发生冲突也为以后宋辽关系埋下祸根。

“妥协退让，害怕冲突”的思想也主导着刘太后对西夏的政策。随着西夏力量的增长，特别是西夏王李德明的长子李元昊对宋交往思想的转变，开始了侵犯宋边境的行动。天圣六年（1028年），西夏派军队向甘州发动了进攻，并夺得甘州。在战事日紧的情况下，天圣八年（1030年），瓜州王又以千骑降于夏。宋、夏关系恶化，在夏对宋进攻之时，刘太后不奖励战功，不鼓舞将士锐气，反而要求他们以安定为目的，对西夏妥协退让。明道元年（1032年）德明卒，宋赠其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又派尚书度支员外郎朱昌符为祭奠使，皇太后赐赠绢七百匹、布三百匹等，²以表示宋方的抚慰，期望用宋的仁义道德去感化西夏国主，但事与愿违，刘太后刚刚去逝，西夏就开始大规模进攻宋朝。“初围延州，执刘平、石元孙于三川口，康定元年（1040年）也。明年，败任福于好水川，福死之，庆历元年也。又明年，寇镇戎军，败葛怀敏于定州寨，执怀敏，丧师皆无虑十余万”³这几次战争，虽发生在刘太后去逝后，但是刘太后垂帘听政时对夏的妥协退让，为夏得寸进尺埋下祸根。西夏在天圣年间，秣马厉兵，增强实力，当时宋夏之战，已经初现端倪。

元丰年间，宋神宗两次兴师进攻西夏，虽然失败，但给了西夏以强大的打击。宋朝于熙河路设置了兰州，鄜延路设置了塞门、安疆、米脂、浮图、葭芦五寨，这些城寨在军事上的地位十分重要，甚至控扼关中的咽喉，阻断了西夏南侵之路，这些城寨的设置使西夏寝食不安。高太后垂帘听政后，为求和平，害怕冲突，不惜主动归还宋军夺取的西夏边寨，失去了熙丰年间获取的战略优势地位。元祐年间宋政府单方面停止了熙丰时期实行的拓边政策，对夏采取守势。

高太后听政之初，西夏借遣使吊唁神宗的机会，提出了归还塞门等城寨的要求。”针对是否弃地，高太后诏令大臣条陈利害，朝廷内部展开了激烈地争论，

1（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7，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8页。

2 《宋史》卷485《夏国上》，第13991页。

3（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9，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8页。

司马光、文彦博等赞成弃地。司马光认为：“此数寨者皆孤僻单外，难以应援，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垦，地非险要，不足以守御。”¹宋朝占据这些边寨，徒分屯兵马，坐费草粮，长途运输后备物质，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些城寨，中国得之不但无利，而且还有很多害处，如“深入其境，近其腹心，常虑中国一朝讨袭，无以支吾，不敢安居，是以必欲得之，不肯弃舍。”²文彦博不仅赞同放弃军事要塞，甚至要求放弃熙河路和兰州，文彦博认为以前主张得到这些边寨的大臣，主要为了妄希功赏，欺罔朝廷，为国生事，取怨敌人。现在西夏秉常派人来要这些城寨，朝廷就应该把地再赐给西夏，可使西夏不再怨恨宋朝。文彦博还认为这些城寨对宋来讲并不是特别重要。他上奏提出“今所得堡寨并兰会，并荒徼沙漠之地，本无城邑人烟，惟是朝廷创筑城垒，屯兵戍守，岁费百万以上，困竭中国生民膏血，以奉无用之地，俱恐不能支久，却须自弃。”“臣亦闻议者谓地界被求而与之，亦用兵，不与之，亦用兵，语尤欺罔，但向去欲免主义不与起衅之责，且秉常来求我，如其意而得之，必须感戴恩德，三数年间当且保无事。”³司马光与文彦博最后得出一致结论，不如把这些城寨还给西夏，既能表示朝廷的仁义恩惠，又不用耗费财力。

吕大防上书坚决反对弃地。他认为提出弃地的大臣，并没有深思熟虑，特别是对朝廷无力供馈边寨粮草之说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绥、兰之地皆并塞美田，增招民兵垦辟以足食，则供馈之费省，专事守计，少存战兵，则骑兵可大减矣，其增招民兵，垦辟旷土，分守战之计，减供馈之费。”⁴吕大防久在边防，深知这些城寨的战略意义，提出在绥兰土地肥沃之处，招民兵开垦，自给自足，既可免朝廷供馈之费，又可省用骑兵。吕大防的务实建议，并没有得到高太后的首肯，高太后在“和平为上”的思想指导下，最终选择弃地。元祐二年（1087年）七月，北宋政府明白表态：“前后用兵以来，其因而所得城寨，彼此各不曾交还。今来所请，不惟前例甚明，理难顿改，兼访在朝之论，皆谓义不可从，然朕独以永乐之师陷没者众，每一念此，常用恻然。汝倘能尽以见存汉人送归中国，复修贡职，事上益恭，仍戡边酋，无犯疆塞，则朕必释然，于尺寸之地，复何顾惜。

¹ 《长编》卷 365，元祐元年二月壬戌，第 8749 页。

² 《长编》卷 365，元祐元年二月壬戌，第 8749 页。

³ （宋）文彦博：《潞公文集》卷 26《论西边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1100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第 729-730 页。

⁴ 《长编》卷 366，元祐元年三月丙子，第 8791 页。

当议特降指挥，据用兵以来所得地土，除原系中国旧寨及顺汉西蕃领土外，余委边臣商量，随宜分画给赐。”¹宋最终同意了夏人请地的要求。但事态的发展并没有象高后、司马光、文彦博想象的那样，西夏对宋归地感恩戴德，而是随着宋夏议定地界，发生了连续的冲突。地界久议不能决，“（元祐）三年春，夏人以兵数万压泾原，杀掠弓箭手千人而去。朝廷既隐不问，又遣刘仲冯往赐策命，夏人受礼倨慢，以地界为词，不复遣使入谢，仍再以兵犯泾原。四年，仍复遣使来贺坤成，且议地界。朝廷急于怀柔，即指挥不候分画地界，先以岁赐与之。”²高后希望用儒家思想中“以和为贵”与“仁义”的精神，使西夏感谢宋给予的恩赐，使双方在今后的时间里保持和平。但是土地并没有换取和平，反而进一步扩大了争端。西夏以塞门、兰州不在归还之列作为借口，连续发兵攻宋。元祐六年（1091年）四月，西夏军队进攻熙河兰岷、鄜延路；六月，举兵十万入寇；闰八月，十五万人围神木等寨；九月，围麟、府三日，杀掠不计，鄜延路都监李仪等尽没。高太后把抗击视为“生事”，认为容忍能够换取和平，严令宋将不许抵抗，都监李仪等因为违背朝廷旨意，进入夏人境内作战，不仅死者没有得到封赏，就连那些为朝廷卖命死里逃生的人也遭到了降官处罚。朝廷甚至下诏：“州民为寇所掠，庐舍焚荡者给钱帛，踏稼者振之，失牛者官贷市之。”³高太后姑息养奸、怀柔妥协的做法助长了西夏侵略的嚣张气焰，使宋西北边境居民的生命及物质财产遭到巨大损失，高太后对夏用土地换取和平的理想主义遭到失败。

四、北宋听政皇太后外交思想形成的主要原因

北宋听政皇太后保守主义的对外思想使宋的对外交往呈收缩态势，其怀柔妥协、害怕冲突的思想又使辽、夏得寸尽尺，其对外思想的内敛性与辽朝承天太后的思想相比，大相径庭。辽承天太后“习知军政，澶渊之役，亲御戎车，指麾三军，奖罚信明，将士用命”。⁴景德元年（1004年）辽承天太后与辽圣宗率20万大军倾国南叩宋廷，大军自幽州取道保州（今河北保定）南下，势如破竹，直抵宋朝军事重镇澶州城下，迫使宋签订了澶渊之盟。承天太后继承了游牧民族英勇强悍的传统，解决了“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⁵等威胁其统治的主要问

¹ 《长编》卷382，元祐元年七月丙子，第9313页。

² （宋）苏轼：《龙川略志》卷6，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5页。

³ 《宋史》卷17《哲宗纪》，第323页。

⁴ 《辽史》卷71《后妃传》，第1202页。

⁵ 《辽史》卷71《后妃传》，第1202页。

题。与承天后铁的手腕相比，北宋听政皇太后的对外政策可谓处处被动。影响北宋听政皇太后对外思想的因素较多，除下必须遵循太祖太宗的“祖宗之法”外，还与北宋中期的军事实力、儒家思想中的仁义道德观念、男尊女卑意识及生长环境密切相关。

北宋有多位后妃临朝听政，但母后临朝只是非常时期的权宜之举，一旦皇帝亲政条件成熟，母后即当还政。因此宋代后妃听政，只是一个政权的临时过渡，听政皇后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发展经济或积极拓边，而是维护皇权的顺利平稳过渡。为了维持国内安定，减少政权实施中的阻力，墨守成规，严守“祖宗家法”才是她们最好的选择。如果她们象辽承天后那样，处理内政或外务超越传统，四处征伐，必会遭到朝中大臣的强烈反对，造成内部混乱。“祖宗之法”的“守内虚外”思想把内部稳定放在执政的首位，这与宋代后妃听政保持皇权平稳过渡的任务相一致，“守内虚外”的保守主义思想遂成为她们外交思想中的重要原则。

宋听政皇太后对辽、夏的妥协退让与宋中期的军事实力有关。宋初太祖为防范五代以来的武人专权、藩镇割据问题，采取了崇文抑武政策，文人掌兵权，限制武将权利，在军队中实行“更戍法”，对作战将领临受“阵图”等，这些措施严重消费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从宋太宗三次攻燕云失利，到真宗在澶渊城下订立和约，说明在宋辽的军事力量对比中，呈现着“辽攻宋守”的态势。北宋听政皇太后对宋的实力心知肚明，因此不惜用礼义怀柔的手段，避免与军事力量强大的辽、夏发生冲突。

传统儒家思想的男尊女卑是北宋听政皇太后对外思想中呈现出保守主义思想的根源。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一直强调男尊女卑的纲常伦理，对于女权、女性干政问题持强烈的防范意识与反对态度。历来后妃干政被称为“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宋人总结了唐代武后称帝、韦氏乱政的教训，认为“巍巍巨唐，女后乱之，奸臣坏之，宦官覆之。”并指出：“奸臣不可使专政，女后不可使预事，宦官不可使任权。”¹后妃干政一旦出现，便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抵制，在这种情况下，皇后听政的对外思想，必然有着内敛性，处处小心谨慎、息事宁人、中庸保守等特点。

北宋听政皇太后的对外思想与她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与自身生长环境密切相

1 (宋)石介：《徂徕集》卷18《唐鉴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11页。

关。听政后妃虽能“母仪天下”，但从小受“三从四德”的教育，生活范围非常狭窄，直接影响到她们的思维方式与处事态度。宋朝对女子之防尤严，为了防范皇后与外戚干政，后妃不能自由出宫会见外戚。刘太后虽执掌权柄，想回自己娘家，但左司谏刘随奏疏谏止，最后“太后纳其言，自后不复再驾。”¹后妃也必须严守宫门之禁，不能与外界交往。宋代“宫门之禁，法最严密”，外戚是不能随便出入宫禁的，“外家男子，旧毋得入谒。”²神宗时因怜惜太皇太后曹氏年迈，其弟曹佾亦老，特在曹氏面前“数言宣使人见”，曹氏总是不答应。后来总算同意入见，却又“趣遣出”，并告诫其弟：“此非汝所当得留。”³大臣与后妃的交往更是被禁止的。宋刑法对私下为宫廷内外互通消息者，处罚非常严重。“私共宫人言语，若亲为通传书信及衣物者绞，其不承敕而擅开闭者绞。”⁴这种封闭的环境，限制了听政后妃的视野，压抑了她们的个性，特别是这些局限性使使她们几乎丧失了独立、创新的思维。虽有一天，她们垂帘听政，仍旧缺乏对外事务的经验、开拓进取的精神与长远战略的眼光。狭隘的生存空间决定她们的对外思想因循成法，倾向保守。

北宋听政的四位皇后，生长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对战争有所畏惧。澶渊之盟后，宋辽维持了一个世纪的和平，和平的外部环境，使人的意识中丧失了战争斗志。苏轼批评当时的形势，正是如此：“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软？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自无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所不测。

1（清）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3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4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2（清）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卷30，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3（清）稽璜：《钦定续通志》卷7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39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06页。

4（宋）窦仪：《宋刑统》卷73，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8页。

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¹北宋中期这种相对和平的环境，也使听政皇后不愿轻言兵事。

北宋听政的皇太后对外思想中同时充斥着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主要来源于传统儒家学说的仁义观，春秋时期管子就认为：“审吾疆场，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无受其资；而重为之皮币，奉之以车马，以骤聘眺于诸侯，以安四邻，则四邻之国亲我矣。”²归还从邻国夺来的土地，确定双方边界，退还邻国给予的资财，还要以本国的财物作为礼物经常访问邻近的国家，才能亲近邻国。归还夺取的土地。儒家学以仁政服人，保民，行德利天下，这种仁义应该是“交邻国之道”，能够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儒家的仁义观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之上，相信人性善良，战争给人们带来无穷灾难，善良的人性都不愿陷入战争。仁义观无疑忽视了人性中恶的一面，忽视了利益对人的影响。北宋听政皇太后在儒家仁义道德的基础上，追求对外关系的“和平至上”，必然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第二节 张洎“防守勿攻，敌去勿追”的保守主义外交思想

张洎（公元934年—997年），旧字师黯，后改偕仁，滁州全椒人（今安徽全椒）人，在南唐时，与大名鼎鼎的南唐主李煜形影不离，历任南唐礼部员外郎、知制诰、中书舍人，清辉殿学士，“中外之务一以谂之”，³参与机密，恩宠第一。南唐归宋后，宋太祖朝时张洎官拜太子中允，迨太宗朝，洎凭着才华横溢而平步青云，又成为宋朝皇帝的宠臣，先后擢拜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与寇准同列。张洎在雍熙至端拱年间，是宋政坛上的耀眼“明星”。在北宋有着强烈的收复幽云之心，契丹不断骚扰宋界的形势下，张洎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政治家，几次上奏言边事，他提出了防守勿攻和弃地妥协的对外思想，其思想在太宗朝有着一定的代表性，直接影响着宋太宗朝的外交思想。

一、张洎外交思想产生的现实背景

宋统一战争有着血雨腥风，不论是统一者还是被统一者，都曾经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战争中一帆风顺的胜利，能鼓舞人的士气，越战越猛，而如果出现接

1（宋）苏轼：《苏轼文集》卷7，中华书局1986年，第582页。

²左丘明：《左传》，卷十八，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236页。

³《宋史》卷267《张洎传》，第9208页。

连失利，甚至溃不成军，将产生畏战心理，进而丧失进取精神。南唐主李煜与张洎的亲密关系，造就了洎在南唐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南唐的覆亡与张洎的防御思想有着一定关系。宋围攻金陵，宋与南唐的兵力强弱悬殊，南唐没有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甚至在战争降临之时，张洎与南唐国主还在“兄弟宴饮，作妓乐”在战争中张洎仅限于“坚壁以老宋师”的消极防御政策，想通过固守城池，来拖垮长途奔袭的宋军，在防守中没有任何主动出击的行动。当城池危亡之时，张洎劝李煜勿降，劝谏的思想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张洎引符命云：“玄象无变，金汤之固，未易取也。北军旦夕当自引退。苟一旦不虞，即臣当先死。”¹张洎对于金陵是否安守，没有知彼知己，从宋统一的战略考虑，也没有进行双方实力对比分析，而是盲目的根据天象与金陵的地理位置进行臆断，张洎理想主义的消极防御思想使南唐难逃灭亡的命运。张洎希望争取外援，以挽救岌岌可危的南唐政权，他用蜡丸帛书求救于契丹，蜡丸帛书被宋军截获，在宋军猛烈的攻击下，南唐江山轰然坍塌。南唐灭亡，作为国之主谋的张洎有着不可推却的责任，金陵城失陷后，张洎与同僚陈乔相约自刎，陈乔自缢，张洎失约，最后与李煜共同被俘。张洎归宋后，认为自己必死无疑。太祖见到张洎后，对其声色俱厉，指责他教唆李煜不降，并拿出张洎写的救兵帛书。洎大义凛然的对答到：“实臣所为也。犬吠非其主，此其一尔，他尚多有。今得死，臣之分也。”张洎辞色不变，使太祖深为奇之，贷其死，谓曰：“卿大有胆，不加卿罪。今之事我，无替昔日之忠也。”²拜太子中允。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出使高丽，告以北伐。从高丽复命后，张洎受命出知相州，而后徙至贝州，在贝州的时间虽然很短，仅半年时间，但当时的贝州地处河北重镇，使张洎有了守边防患的基层经验。张洎在太宗朝虽平步青云，从中书舍人，累官至翰林学士，给事中、参知政事，但南唐灭亡与死里逃生的经历，如梦魇时时盘绕着张洎心灵深处，使他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在十余年后，依然有“几忆汤师役梦魂，醉吟想在落花村”的诗句。因为这种记忆，张洎逐渐形成了做事保守谨慎，无为而治的风格，在对外思想中，保留了南唐时消极防御的保守思想，对外防守为主，明哲保身，而丧失了积极进取，主动进攻的精神。综合分析，他的对外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下面依次予以论述。

二、“防守勿攻，敌去勿追”的保守主义防御思想

¹ 《宋史》卷 267《张洎传》，第 9208 页。

² （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 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 页。

张洎凭着才华出众，在太宗朝不断升迁，成为皇帝近臣，伴随着行政职务的上升，他几次上奏言边事，其思想对皇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端拱二年（989年），契丹不断侵扰宋边境，宋太宗下诏给文武群臣，“各陈备边御戎之策”。上章的有温仲舒、张洎、王禹偁等。户部郎中张洎上章：“伏自北戎犯顺，累载于兹，其故何哉？盖中国失地利，分兵力，将从中御，士不用命也。”¹他非常重视自然天堑对国家安全的保护作用，认为高山大河的自然屏障可以使国家处于相对安全地位，宋朝的地缘政治与汉唐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对外思想中必须易旧谋新。汉唐时期有地形险阻，崎岖蜿蜒的高山峻岭是历代王朝赖以屏障的地缘优势，后晋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与辽，河西走廊又为西夏占据，使燕蓟以南千里平原，没有名山大川的阻挡，使宋朝丧失地利。收复幽蓟，是重新得到地利的有效行径，只要幽蓟在契丹手中，宋朝就不能高枕无忧。

在地缘政治发生变化后，传统防御方法失去了作用。张洎认为传统御敌有四种模式，一是“度塞以戍兵”，二是“和亲而结好”，三是“诱部落以分其势”，四是“要盟誓以固其心。”²但是在张洎看来这四种模式，只有“盟誓以固其心”仍可运用。用通好之策，与契丹结好，可以使边境的人民安宁生活，使国家边境巩固，但是如果贪得无厌，错误就在契丹，到时朝廷再去讨伐，连“天下闺闱女，亦当为陛下荷戈执戟，效死于战场矣，况六军之人哉！”³张洎与契丹通好的想法，只能是一厢情愿，宋与辽的主要矛盾是关于燕云十六州的领土归属问题，宋、辽已经把对方作为主要竞争的对手。辽为牵制宋，开始着手与夏结盟。从雍熙二年（985年），在宋军第二次进攻燕云时候，辽封李继迁为夏国主，并把义成公主嫁给他。二者实质上形成了军事同盟关系。这种军事同盟关系的主要斗争对象无疑是宋，在这种情况下，张洎与辽通好的设想，显然是不可能的。

张洎在摒弃传统对外模式的同时，又认为当时的用兵之策，有着许多弊端。他指出宋朝采取把兵力派驻在各个城邑，分城寨驻兵守边事实上造成了用一个城邑的兵力而去抵抗一个国家的军队，最后必然寡不敌众，因此，张洎提出，“练兵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⁴的思想，后来张洎又进一步地阐释

¹ 《长编》卷30，端拱二年春正月癸巳，第666页。

² 《长编》卷30，端拱二年春正月癸巳，第666页。

³ （清）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1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34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79页。

⁴ 《长编》卷30，端拱二年春正月癸巳，第666页。

了这种思想。在淳化元年（990年），张洎上奏：“夫御戎之道有三焉，前代圣贤论之详矣。缮修城垒，依凭险阻，训戎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策之上也。偃革囊弓，卑辞厚礼，降王姬而通其好，输国货以结其心。虽屈万乘之尊，暂息三边之戍，策之次也。练兵选将，长驱深入，拥戈铤而肆战，决胜负于一时，策之下也。”¹张洎的保守主义消极防御思想彰明较著，即宋朝在边界只限于防守，很少或完全不要主动出击，当打退来犯之敌后，也不要进行追击，使战争规模不至扩大。如果张洎的这种用兵之策用于实践，辽骚扰宋边境，或能抢夺物质，或能占领城镇，辽将是永远的获利者。辽在利益的驱使下会把这种小规模战争不断持续下去，或者进行更大规模的战争。在消极防御的同时，张洎又提出在契丹与宋的军事分界地，建三个大镇，设置重兵，设置重兵的目的，不是为了进攻，而是以重兵来弥补失地利之弊，使这三镇“隐若长城”，起到威震的作用。在设三大镇的基础上，再选精骑，作为探报之兵，观察敌方动静。

端拱二年（989年），宋边境威虏军粮草告急，太宗诏定州路都部署李继隆发镇定大军送辎重，户部郎中张洎上奏，发展了边境地区建大镇，废罢小的军事集聚点的建议。他认为：“古者筑边城聚兵众，盖所以控要害之地，制外戎之侵故。周城朔方，汉取河湟，唐筑受降临淄等城，即其事也。隔阂夷夏，终古赖焉。今闻威虏军等置在平川，地非险阻，带甲之士不满万人，议者谓国家比创此军，以捍蔽定州，此军若废，则北戎立至城下。臣以为议者不究事实，盖谋虑之过焉，今请以敌势言之，若犬戎举十万之众，长驱深入，量留数千骑营于威虏等军城隍之侧，则威虏等军闭垒不暇，岂能出城野战哉？贼略地则既无邀截之期，贼攻城则自有败亡之祸，而望藩屏、镇定，不亦难乎？是知威虏等军，废之非有利于北戎，置之又无益于邦国。”张洎最后建议：“凡在边境军垒，其甲卒不满三万人以者，宜从废罢”。²张洎的建议虽被太宗采纳，“诏废威虏，寻复之。”³张洎的这种主张具有保守消极的一面，因为太宗时辽对宋的侵袭只限于一些小规模，而在边境设置重镇，也许可以阻击大规模的袭击，却不能保证分散居留点的安全，也不利于战争中战略战术的灵活发挥。

右拾遗、直史馆王禹偁与知制诰田锡提出了与张洎不同的建议。王禹偁提出

¹ 《长编》卷31，淳化元年六月丙午，第701-702页。

² 《长编》卷30，端拱二年六月戊子，第683页。

³ （宋）《九朝编年备要》卷4，端拱二年七月，第62页。

解除外患，最重要的是“在外任其人，而内修其德矣”，¹在外任其人中提出了五项措施，即给将臣以实权；积极伺遼边事，罢用小臣；行间谍以离之，因衅隙以取之；以夷狄攻夷狄；下哀痛之诏，以感激边民。这五种措施，切中利害，积极主动，力图改变宋对辽外交中的被动地位。田锡指出对外不仅要示以德，也要立威。他认为：“自古制御蕃戎，但在示之以威德。示之以威者，不穷兵黩武，不劳人费财。示之以德者，比之如犬羊，容之若天地。或来朝贡，亦不阻其归怀，或背欢盟，亦不怒其侵叛。”²田锡提出的示德与立威并重的思想，虽有一些理想化，但立威与妥协、消极相对立，立威在对外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张洎防守勿攻思想的形成，一是与宋朝当时不能收回幽云，丧失地利有关。其次，张洎认为虽然国家的兵马精壮，甲兵坚利，但是有制度不去遵循，将不识兵，兵不识将，而使战斗力大减弱。张洎强烈要求严格按照军队规定去严格规范军队的纪律，但他自身也感到执行军法的困难。如果战斗力不能得到提高，必然不敢轻言主动出击。再次，如前所述，张洎的保守防御思想，与本人的经历有着密切联系。

三、内修政经，外勤戎略，先内后外的保守思想

宋太祖建立政权后，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在内政上强化专制统治，加强战备，在外交中重视边防建设，内政与外交发展相对均衡。宋太宗几次伐辽的失败，使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有了严重的恐辽情绪，张洎等近臣提出了先理内，后攘外的思想，再加上皇族内部的矛盾，以及与李继迁在灵州战争的失败等，这些因素促使太宗在内政外交中逐渐形成了守内虚外的思想。

张洎在端拱二年（989年）的上奏中，一方面说明内政对外交有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对内政与外交在宋廷政治生活中进行了排序，即内政是第一位的，外交位于内政之后，是第二位的。张洎认为国家的内政是决定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的最重要因素。针对当时朝廷大兴土木、冗员过多，以至于严重影响收复燕云等失地，张洎向太宗提出革除内政弊病：“伏愿陛下思安危之大计，念攻守之良谋，内修政经，外勤戎略，罢天下不急之务，停土木之功，减官吏之冗员，省赐

¹ 《长编》卷30，端拱二年春正月癸巳，第672页。

²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45《总议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4页。

賚之优泽，收聚财货，训练师徒。”¹ 解决好了这些问题，才能够有效的组织力量，抵御外来的进攻。为有效抵御契丹的侵扰，还要使边民心向朝廷，他提出边民的生活与内地的人民生活迥然不同，边民生活在战火中，生活尤其不幸，因此国家要对这些人有优惠的政策，他请求朝廷对边民减免秋夏两税，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朝廷对他们的体谅，使人民拥护朝廷，从而依靠他们抵抗侵略。张洎认为内政对外交有重要影响，只有把这些国家内政问题解决好了，才能更好的解决外患问题，但他没有洞悉到外交对内政的互动关系，没有认识到外交对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张洎提出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和出发点，应先理好内，才能应对外。张洎之所以把内政放在第一位，是因为他觉察到内政中积累了众多矛盾，如宋初正逐渐形成的“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以及冗官、冗兵等弊政，张洎认识到这些问题不能解除，将威胁到赵宋王朝的统治。

四、弃地妥协的思想

宋初军事实力强大，继泉、漳献地之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李继捧献夏州地，宋授以彰德军节度使。对不愿奉命的李继迁，雍熙元年（984年）宋军突袭其盘据点，擒获李继迁的母亲与妻子。但是李继迁依靠辽国，不断扩大势力，侵袭宋边境。宋对李继迁的攻击，从积极应战到弃地妥协，在政策转变中，张洎上奏弃灵州地，成为弃地妥协的主要代表。

至道二年（996年），西夏李继迁侵灵州，宋朝为了保住灵州，押送军粮四十万到灵州，结果被李继迁抢走，宋军缺少粮草，“将士丁夫，相枕而死”²李继迁却士气大增，率部进攻灵州，灵州城池虽坚，粮草却少，在李继迁的围攻下，太宗下诏宰相吕端等献策。吕端曰：“灵武军储乏少，贼党又据瀚海津要，环庆路不通，臣思以为朝廷宜于麟府、丹延、环庆三道各发劲卒，约轻賚径走平夏，攻取继迁帐幕，继迁必顾惜巢穴，望风引退，如此则灵武之围解，饷道得通矣。”³，太宗对吕端的主张心存疑虑，时为参知政事的张洎提出放弃灵州的主张，并详细论述了放弃灵州的四个原因。首先李继迁据于有利的地理位置，居无定所，骑兵又流动性大，如果派大量的军车去攻击他，不见得能找到李继迁的主力，而运送后备军粮时，又会遭到李继迁军队的劫夺。其次，灵武处于沙漠地带，军队

¹ 《长编》卷30，端拱二年春正月癸巳，第671页。

² 《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一月丁卯，第1095页。

³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2，丛书集成续编第40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行走在绵延七百里的荒漠中，长途跋涉，将受渴乏，无水就会投身于死地，更谈不上与继迁的军队作战了；再次，灵州受攻之后，土地荒芜，人丁减少，甚至到了“田畴日荒，樵苏绝路，负户而汲，易子而食”¹的地步，这样的不毛之地，也失去了以往备御的意义。第四，如果解救灵州之围，朝廷每年都要召发甲兵，运送粮草，到时会驱使其他镇的百姓，以供应灵武一方，使无辜之民，膏涂原野，这样将加重无辜百姓的负担。综合以上四点原因，张洎认为：“继迁或成或败，未足致邦国之安危，灵武或存或亡，岂能系迁隅之轻重。得失比较，理甚昭然”²。张洎最后得出结论：灵武的得失，对于朝廷来讲，并不重要，失去此地，对朝廷没有什么坏处，得到它反而是沉重的负担。纵观宋初三十余年中，提出弃地的大臣真是寥寥无几，张洎为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这样的观点呢？张洎在上奏前，吕端就认为：“洎不过揣摩陛下意尔，必无骨鲠之言”。“帝默然”。³对于是否放弃灵武，太宗的心理极其矛盾，张洎作为参知政事，体察到了皇帝的这种心理。但是短短几天，太宗对放弃灵武的思想又转变了，当看了张洎的上奏，太宗不悦，并对向敏中说：“张洎上言，果为吕端所料，朕以其奏付之矣。”⁴张洎能讲出这番道理却不是偶然的，这不是他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汉以来儒家管理边疆的经典理论，就象张洎引经据典提出的汉武帝弃造阳，高祖统一弃王险之城的事实，但只是裁取了历史上一些特殊事件，断章取义为他的妥协投降作辩护，使弃地戴上一张体面的“面纱”而已。

五、张洎外交思想的影响

张洎的“防守勿攻，敌去勿追”的消极防御思想对宋太宗有着一定影响。宋太宗三次攻伐燕云都遭到了失败，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收复燕云的战争中，宋军丢盔弃甲，被杀万余人。宋太宗“窃乘驴车逃去”，丢弃物资“不可胜计”。⁵这场战争使太宗感受到了辽的强大实力，但太宗依然没有放弃收复燕云的计划，在雍熙三年（986年）再次进攻燕云地区，辽先在歧沟关大败宋军，后在陈家谷又俘获宋军将领杨业，宋王朝收得燕云的战争再次受阻，辽军乘胜进入宋境，抢

1 《长编》卷 39，至道二年五月壬子，第 835-836 页。

2 《长编》卷 39，至道二年五月壬子，第 835-836 页。

3 王称：《东都事略》卷 3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382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242 页。

4 钱若水：《宋太宗实录》卷 78，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9 页。

5 《辽史》卷 9《景宗纪下》，第 102 页。

掠边民。这时宋太宗锐气耗尽，这次战败也成为宋初对外思想的一个“分水岭”，从此，宋太宗再也不愿意谈论燕云之事，外交上对辽改为保守防御以求苟安。宋太宗不但采纳了张洎废罢甲卒不满三万人以上的边境军垒的建议，而且在对辽防守中，采用了张洎的“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的思想。宋军在河北沿边的平原上，西起保州，东至泥姑海口，利用河渠塘泊，筑堤储水，作为屏障，曲曲弯弯九百里。置寨二十六，军铺一百二十五，士兵三千余人，“缘边战棹司自淘河至泥姑海口，屈曲九百余里，此天险也。太宗置砦二十六，铺百二十五，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余，部舟百艘，往来巡警，以屏奸诈，则缓急之备，大为要害。”¹以防辽国骑兵的入侵。对于辽军的入侵，“但令坚壁清野，不许出兵，继不得已出兵，只许披城布阵，又临阵不许相杀。”²结果束缚了军队的手脚，守边将领们只好得过且过，真正敢于对辽军作战的将领就屈指可数了。

在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上，张洎主张“内修政经，外勤戎略”，他用大量的笔墨阐述了先理好内政，才能更好解决外患问题。端拱二年（989年），知制诰田锡更加明确的提出：“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安”³的思想，宋太宗的思想受到这些近臣的影响，不久，他明确提出了“守内虚外”的思想。在此思想指导下，对辽由攻到和，而辽对宋的北伐则耿耿于怀，向宋摆开了进攻的阵势进行威胁，并帮助李继迁继续削弱宋的力量。宋太宗的“守内虚外”思想成为后来嗣君所谨守的、不敢逾越的内政外交的原则，在北宋中后期的外交思想中有着深远影响。

张洎的弃灵武之说，也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三月，李继迁大举会合蕃邦各部，进攻灵州。李沆继张洎之后提出放弃灵州，李沆说：“继迁不死，灵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将，使部分军民空垒而归，如此，则关右之民息肩矣。”⁴其言与张洎如出一辙，宋真宗没有采纳李沆的建议，最后灵州陷落在西夏的手里，宋真宗得知后又后悔最初没有接纳弃灵州的建议。李继迁攻下灵州后，将灵州改为平西府，成为他政治活动的中心，并以此为基地，开始向西扩展势力。由此看来灵州并不是象张洎所说的那样，不毛之地，得之无益。相反灵武是军事要地，失去灵武会增强李继迁的实力，使宋在与西夏交往中处于被动局面。

¹ 《宋史》卷273，《何承矩传》，第9329页。

² 《长编》卷153，庆历四年十二月乙卯，第3729页。

³ 《长编》卷30，端拱二年春正月癸巳，第678页。

⁴ 《宋史》卷282《李沆传》，第9539页。

第三节 司马光的保守主义外交思想

司马光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元祐元年（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今山西夏县），一生经历了北宋的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宰相。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司马光进知制诰，因固辞，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就任龙图阁直学士，留知谏院。神宗即位，又被擢为翰林学士，后拜为枢密副使，熙宁三年（1070年）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因对王安石变法有不同意见，主动辞职后，任西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等。哲宗元祐元年二月，拜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九月去逝，赠太师、温国公，谥曰文正。司马光辅佐四朝，生前勤政爱民、忠直敢谏，用人惟德而德高望重，在他死后，“京师人罢市往吊，衣以致奠。”“哭者如哭其私亲，”¹受到人们的广泛爱戴，其政治思想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今人研究司马光的论著较多，其中与司马光外交思想有关的研究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司马光华夷观的研究。二是司马光民族关系方面的思想。主要研究成果有李昌宪《司马光评传》²，在第七章《治国思想》中阐述了司马光先内后外的政治主张；唐兆梅《论司马光处理民族关系的主张》³明确提出了司马光“交邻以信”的睦邻方针，主张把“笃行信义”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准则，并提出了部分有利于国家的带有战略性的安边之策，但同时也有着历史的局限性；周方高、薛治国《关于司马光民族观的若干思考》⁴，认为司马光提倡民族和睦观、民族平等观，有着民族诚信观；山东大学2008届硕士生刘加志的论文——《司马光的华夷观——以资治通鉴为中心》⁵，概述了司马光华夷观形成的背景与华夷观的主要内容，指出司马光华夷观中有着以中国为本，四夷为末的尊卑观；华夷一体的睦邻观；服怀叛讨，御之以道的制夷观；治以良吏恩威并举的安边观。郑炜《略论司马光的民族关系思想》⁶认为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主要由怀柔优于征伐、“御之得其道”、先治其内而后立功于外三大部分构成。这些论文虽部分阐

¹ 《宋史》卷336《司马光传》，第10769页。

² 李昌宪：《司马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³ 唐兆梅：《论司马光处理民族关系的主张》，载《中州学刊》，1993年，第3期。

⁴ 周方高、薛治国《关于司马光民族观的若干思考》，载《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⁵ 山东大学2008届硕士生刘加志的论文——《司马光的华夷观——以资治通鉴为中心》，www.cnki.net.cn。

⁶ 郑炜：《略论司马光的民族关系思想》，载《烟台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述了司马光的对外思想，但对司马光对外思想的来源与评价较少。

宋王朝在外交上，北面受辽国的进攻，西北受西夏的劫掠，为使北部边境不受侵扰，先后与辽、西夏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换取暂时的和平，对此，司马光以儒家政治理论为基础，理论联系实际，在他的各类奏议之中，阐述了其外交思想。另外其主要外交思想也表现在他主编的恢宏巨著《资治通鉴》之中，《资治通鉴》记载了有关国家兴衰，民生休憩的事件，其为目的就是“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¹，在《资治通鉴》中记载中原王朝与其他政权的深厚历史叙述中，贯穿着司马光的一系列外交思想。

一、先内后外、重内轻外的保守主义思想

司马光的外交思想，继承了宋初务盛内，不求外，内本外末的“守内虚外”思想。他认为：“古圣王之治天下，必先内而后外，安近以服远”。²把“先治其内而后立功于外”的作为其外交思想中的基本原则。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具体阐述了这种思想，即在一般情况下，要慎于边事，他批评“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而天下溃畔”，赞扬汉文帝“偃武行文，当此之时，断狱数百，赋役轻简”。批评汉武帝“厉兵马以攘四夷，天下断狱万数，赋烦役重，寇贼并起，军旅数发”而造成了“老母寡妇饮泣巷哭”的悲剧。司马光明确的认为：“圣人起则后服，中国衰则先畔，自古而患之”³。因此，中国要先把内部的事情处理好，才能使周边的政权信服，反之，如果不修内务，而挑衅四方，则会走向衰落。

司马光认为，北宋积弱，国力不支，腹背受敌，国内“民力凋敝，仓库虚竭，将帅乏人，士卒不练，”国外“夏国既有愤怨，屡来侵寇，祸胎已成。”⁴在内乱与外患并至的时候，则要先安内而后攘外。司马光提出“国家今日内政未修，不可遽谋边事”。⁵治平四年（1067年）司马光上《横山疏》中详细阐述了这一观点：“自尧舜禹汤文武之王，下至齐桓晋文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内而立功于外者也，”认为当“以拊循百姓为先，以征伐四夷为后。”⁶针对当时内政紊乱的局面，他提

¹（宋）司马光：《传家集》卷17《谢赐资治通鉴序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09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77页。

²（宋）司马光：《传家集》卷17《遗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09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0页。

³《资治通鉴》第28卷，孝元皇帝初元二年，第903-904页。

⁴《长编》卷205，英宗治平二年六月己酉，第4970页。

⁵（宋）司马光：《司马光奏议》23卷《横山上殿札子》，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7页。（以下不注作者与版本）

⁶《司马光奏议》23卷《论横山疏》，第252-253页。

出了修八政的主张，即：“莫若收拔贤俊，随材受任，以举百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修庶政；慎择监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绝浮费，沙汰冗食，以实仓库；询访智略，察验武勇，以选将帅；申明阶级，翦戮桀黠，以立军法；料简骁锐，罢去羸老，以练士卒；完整犀利，变更苦窳，以精器械。”这八个方面既包括了内政的治理，也包括了军备的整饬，司马光认为只有这八项政策得修，然后方能“惟陛下之所欲为，复灵夏，取瓜沙，平幽蓟，收蔚朔，无不可”。¹ 根据国家的现实情况，司马光认为国内大治是处理边疆问题的先决条件，只有国家富足、政治清明、人才济济、将良兵强，才能考虑去消除来自于外部的威胁。在国家积弱、军备松弛的情况下，如果一味外求，穷兵黩武，只能弱国贫民。

司马光的奏章与王安石“包制西夏”的思想可谓相差甚远。虽然两人都生活在北宋中期，当时宋王朝的统治已经弊病丛生，内部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财用不足，开支巨大，百姓困苦，人民起义风起云涌。司马光与王安石都看到了当时宋政府内外交困的政治局面，可是，国情不是决定他们思想的根本性原因，他们解决国内政治局面的方法却有很大不同。如对宋中期的时局，司马光有着精辟论述：“一官至数百人，则俸禄有增而无损矣，又近岁养兵，务多不务精，夫兵多而不精，则力用寡而衣粮费。至于颁赐外廷之臣亦皆逾溢常数，不循旧规。”²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社会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冗官”、“冗兵”以及赏赐不节。而王安石则认为，社会贫困的主要原因是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合理，而使开源不足。司马光与王安石在相同的国情下，对外思想一个充满着保守，而另一个却有着扩张与征服。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分析矛盾的轻重缓急与先后次序及认识问题的深度不同，也造成了他们处理对外问题时，有着不同的思想。

对于神宗讨伐西夏的计划，司马光认为是一种狂想，他上奏说：“关中饥馑，十室九空，为盗贼者，纷纷已多，县官仓库之积，所余无几，乃欲轻动大众，横挑猛敌，此臣之所大惧也”。³ 在这种内部矛盾剧烈的情况下，他谏责宋神宗征伐西夏的作法是“不师虞舜周宣之德，反慕秦皇汉武之所为”⁴。他告诫神宗：“自

¹ 《司马光奏议》23卷《横山上殿札子》，第257页。

² 《司马光奏议》卷8《论财利疏》，第87页。

³ 《司马光奏议》卷28《谏西征疏》，第308页。

⁴ （宋）司马光：《传家集》卷17《遗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09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0页。

古以来，国家富强，将良卒精，因人主好战不已，以致危乱者多矣！¹他乞请“罢拓土开境之兵，先阜安中国，然后征伐四夷”²，如此则“朝廷得休息戍兵，安养百姓，待国力完备，家给人足，然后奋扬天威，讨贰柔服”³充分体现他先内后外的思想。

“先修内政，后谋边事”，实际上就是全面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具有强大实力后，在外交上必然占据优势地位。但是，以先修内政为由而对辽、夏采取羁縻政策，甚至放弃既得的利益，是否真的能使辽、夏感动，从而“鼓舞抃蹈，世世臣服？”⁴事实证明，在宋王朝不能占有优势的情况下，以忍让羁縻换取和平只能是空想罢了，先修内政而后谋边事的保守主义思想，很容易陷入没有原则的委曲求全，妥协退让。

二、恩信怀柔、待之以礼的思想

司马光有着浓重的儒家思想，继承了孔子的“去兵去食，不可去信”的思想，他在总结历朝安危盛衰的历史教训中，明确提出了诚信相待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思想。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充分肯定历史上那些恪守盟约与诺言的王者贤人，极力反对恃强弃信，并多次提到“信”的原则，如“夫信者，人君之大宝，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⁵“王者临御四夷，当叛则威之，服则怀之，使信义之明皎如日月。”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盛赞唐太宗“以仁恩结庶类，以信义抚戎夷，莫不欣然负之无力。”⁶但是北宋国困兵弱，边疆问题严重，战不能胜，与汉唐的强大有着很大不同，在这种实力不强的情况下，司马光主张对少数民族政权施以“恩信”，以阻止战争、安定边疆。司马光的“御之恩信”，恩为给予他们钱财，甚至不惜土地以示恩，来达到阻止战争、消除边患之目的。在推恩的同时，还要施以信，即讲信用。司马光曾对真宗与和契丹订立和约给予高度评价，希望仁宗信守和约，“契丹未和亲之时，戎车岁驾，疆场日骇，乘輿暴露于澶渊，敌骑凭陵于齐、郢、两河之间，暴骨如莽”，“先帝深惟安危之大体，得失之至计，亲屈帝王之尊，与

¹ 《司马光奏议》卷28《谏西征疏》，第309页。

² （宋）司马光：《传家集》卷45《应诏言朝政阙失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09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19页。

³ 《司马光奏议》35卷《乞未禁私市先赦西人又札子》，第385页。

⁴ 《司马光奏议》35卷《论西夏札子》，第381页。

⁵ 《司马光奏议》卷25《论召陕西边臣札子》，第277页。

⁶ 《资治通鉴》卷197，太宗贞观十七年，第6139页。

之约为兄弟……陛下承统，一遵故约……是以兵革不用，百姓阜安，垂六十年。”¹英宗治平四年（1068年），西夏嵬名山因荒歉所部人饥畜死很多，宋青涧城守将种谔乘机派人诱降嵬名山，掳其酋领兵民，占领西夏军事重镇绥州。对此，司马光于熙宁二年（1067）六月，上疏反对宋廷趁火打劫，失信于夏，他说：“国家以信义臣畜戎狄自有余年，前日种谔等举而弃之，兴兵掩其不备，以邀一时之功，仅能得不食之地白余里，饥虏万余人耳。”²

针对契丹的骚扰，司马光提出要再三的晓谕道理，不要轻易动武。他在上奏中提到：“伏望陛下严戒北边将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渔船柳栽之类，止可以文谍整会，道理晓谕。使其官司自行禁约，不可轻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晓谕不听，则闻于朝廷，虽专遣使臣至其王庭，与之辩论曲直，亦无伤也。若又不听，则莫若博求贤才，增修德政，俟公私富足，士马精强，然后奉辞以讨之。可以驱穹虜于漠北，复汉唐之土宇。”³在对外关系上以信义当先，排斥从实际利益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很容易被对方看成软弱可欺，而恩信论也会显得迂腐。对于德与力、恩信与征伐，哪一个更能获取利益，司马光有着明确的认识。司马光继承了孟子的：“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之思想。⁴他认为恩信怀柔，要比武力征伐更强大。对于恩信之德与征伐之力，他进行了具体比较：“臣闻周书称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盖言诸侯傲很不宾，则讨诛之，顺从柔服，则保全之，不避强，不陵弱，此王者所以为政于天下也。”⁵他认为汉高祖，宋太宗的征伐负出了沉重的代价，而真宗用怀柔却有着良好的结果。“以舜禹之明征三苗，而三苗逆命，商高宗之贤伐鬼方，三年乃克，汉高祖之雄杰为冒顿所围，七日不火食。”“及真宗即位，会继迁为罗潘友所杀，真宗因说涤其罪，吊抚其孤，赐之节钺，使长不毛之地，迄于天圣明道四十余年，为不侵不叛之臣，关中户口滋息农桑丰富”由是观之，“征伐之于怀柔，利害易见矣”。⁶从恩信怀柔与武力征伐的结果来看，司马光认为前者要比后者效果好的多。但是，司马光仅仅看到了恩信怀柔获得成功的一面，没有

¹《司马光奏议》卷9《论赵滋第二札子》，第102页。

²《司马光奏议》卷25《论召陕西边臣札子》，第277页。

³《司马光奏议》卷18《北边札》，第202页。

⁴焦循：《诸子集成 孟子正义》卷3《公孙丑上》，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05页。

⁵《司马光奏议》卷16《备边札子》，第173页。

⁶《司马光奏议》卷23《论衡山疏》，第253页。

看到历史上也有恩信怀柔最后失败的事例，不幸的是，在元祐元年间，他用恩信怀柔的方法，还西夏地，得来的不是西夏的感恩戴德，而是对宋的进攻与侵扰。

仁宗康定元年与庆历年间，在宋与西夏的战争中，宋军损失惨重。司马光总结宋军失利的原因，得出对西夏施以恩信才能安定边疆的结论。他指出：“夫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以来，国家富强，将良卒精，因人主好战不已，以致危乱者，多矣！”¹司马光认为国家富强、将良卒精、尚不敢轻言征伐，以北宋“公私困竭、将愚卒弱”的现状，不但不能取胜，甚至会招致更大程度上的国家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以恩信怀柔戎狄，固本修政，以待时机，不可妄行讨伐，招致亡国大祸。

司马光认为怀柔少数民族政权除了做到御之以恩信，还要待之以礼，不能违反礼的原则。对外交中违反礼的人，他大加批判，如他几次上书要求贬谪对外失礼的高宜、赵滋等边臣。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夏国主遣使入宋，延州使高宜为押伴，对使者非常傲慢，夏使者受辱而诉于朝。司马光请朝廷加罪高宜，宋廷不仅不惩罚高宜，反诬使者无礼。第二年，西夏出兵扰边，以示抗议。当时，赵滋治雄州，“专一以强悍治边”，对辽使傲慢无礼，不尊旧式，司马光屡次上书弹劾边臣赵滋，“刚愎狂妄、任意生事、骄倨辽使”。²为此，司马光于治平二年（1065年）上奏道：“国家当戎夷附顺时，好与计较末节，以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祸生于高宜，北狄之隙起于赵滋，而朝廷至今未省寤，犹以二人所为为是，而以循理守分为非。”³他认为如果北宋官员若都像高宜、赵滋那样对待其他政权傲慢无礼，妄兴事端，只能使“战斗之端，往来无穷矣”。⁴显而易见，司马光认为宋朝应有大国气度，礼遇使臣，对其他政权主张以和睦为主，凡涉及边疆民族之事应持慎重态度，尽量减少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同时，司马光也认为西夏对宋应尽臣礼，他认为国家对西夏来则以宾客待之；不来则一无所问的态度是不正常的，既然西夏称臣于宋，就应当贡节修备。当他听说神宗不予接见入吊英宗的西夏使臣时，就立即上奏章：“臣谓何惜紫庭数步之地，使之稽首拜伏，瞻仰清光。庶几得识陛下神武之姿，知必能镇服西海。归至其国，转相告语，使其蜂蚁之众，心服气沮，不敢窥边。此所谓‘上兵伐谋，不待战而屈敌’者也。”

¹ 《司马光奏议》卷 28《谏西征疏》，第 309 页。

² 《司马光奏议》卷 9《言赵滋第二札子》，第 102 页。

³ 《宋史》卷 336《司马光传》，第 10760 页。

⁴ 《司马光奏议》卷 18《北边札子》，第 202 页。

¹司马光希望通过恩信与礼制而达到使周边国家信服的目的。“御之得其道则附顺服从，失其道则离叛侵扰，固其宜也。”²

司马光发展了先秦儒家“德化远及”思想的内涵，推崇以德化人，反对肆意挑动战争。神宗皇帝当政期间，为占据军事要地，巩固边防，宋边将趁西夏国内乱之时，攻取西夏边地，设立了米脂等六处营寨。元祐元年元月，西夏借遣使吊唁神宗的机会，提出了归还塞门、米脂等六个城寨的迁腐要求。针对是否弃地，朝廷内部展开了激烈地争论，司马光写信给三省、枢密院说：“不和西戎，中国终不得高枕”。³为了与西夏实现和平，他上奏哲宗，请求退还以前所略西夏之地，他认为：“此数寨者皆孤僻单外，难以应援，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垦，地非险要，不足以守御。中国得之，徒分屯兵马，坐费草粮，有久戍远输之累，无拓土辟境之实，此众人所共知也。王师既收灵州不克，狼狈而还，卒疲食尽，身亡颇多。”更重要的是“掠人之地，罪曲在己，只能速祸取灾，招致兵乱，使“天下骚动”，“虽有米脂千寨也于事无益”。⁴认为把米脂等寨归还于夏，不但可以得到夏的尊重，取得和平，而且人民也会因此得到休憩。

司马光希望先内后外，恩信怀柔、德化远及，为避免冲突，归还西夏六寨，这些思想是儒家德政思想在对外问题上的体现，同时也反映了华夏农耕民族视战争为不祥之物，以和为贵、重防御而轻进攻的对外思想，这种思想虽有时会得到正面的效果。如因司马光的怀柔政策，元祐元年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⁵但是因以德服人本身存在的一些严重缺点，如少数民族可能会在某一阶段会因为宋的德行而感动，保持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而因世界的无序性，当被具体的实际利益所驱动，而又决心以现实的军事力量以实现本国的利益时，这种“德治”的思想，有时只能是一厢情愿，甚至会很快在外来入侵中遭遇失败。元祐二年（1087年）宋放弃实际控制中的塞门、米脂等寨，西夏并没有因为宋的“恩”、“德”、“信”而感谢宋，放弃夏对土地的无止境要求，而在宋归还土地的后，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入侵，司马光“德治”思想的缺陷显而易见。

¹ 《司马光奏议》卷10《夏国入吊札子》，第120页。

² 《资治通鉴》56卷，灵帝建宁二年，第1817页。

³ 《长编》卷365，元祐元年二月壬戌，第8754页。

⁴ 《司马光奏议》卷35《论西夏札子》，第383页。

⁵ 《宋史》卷336《司马光传》，第10768页。

三、“屈己爱民”、“少征伐”的外交思想

司马光有着“以和为贵”、“少征伐”的思想。不愿意看到在战争中百姓流离，妻离子散、无数生灵涂炭。他在《资治通鉴》中多次提到战争中百姓伤亡哀痛之状，在汉高祖与项羽的战斗中，他描写到“与项羽战荥阳成皋之间，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夷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¹汉太祖五年冬十月，汉王追项羽至固陵的战争中，“边民死亡系获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说明战争对人民百姓的影响与伤害。他在《通鉴》中也多次表达了安边要以百姓的富足稳定为基础的思想，说明安边与安民的关系，他认为“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慌，人不自保，而欲远事边外”，²只能使外患招致更危险的内忧，祸起萧墙。在近悦和远服之间，“以拊循百姓为先，以征伐四夷为后”。³因为安民在先，安边在后，司马光认为真宗放弃战争，与辽订立澶渊之盟，是爱民之举，治平二年(1065年)他向宋英宗的上书中完整地阐述了这一观点：“臣愚窃惟真宗皇帝亲与契丹约为兄弟，仁宗皇帝赦赵元昊背叛之罪，册为国王，岁损百万之财，分遗二敌，岂乐此为之哉？诚以屈己之愧小，爱民之仁大故也”⁴当司马光谈及神宗用种谔两次出兵西夏而败时，他也提到百姓的伤亡：“是以顿兵灵武，力疲食尽，自溃而归，执兵之士，荷粮之夫，暴骨塞外，且数十万筑堡永乐，怠忽无备，纵寇延敌，阖城之人，翦为鱼肉，曾未足以威服敌人，而中国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厌截截谗言，思番番良士，乃下哀痛之诏，息兵富民，奄弃天下，此臣所为痛心疾首，泣血追伤者也。”⁵他认为神宗时期急功近利的对外政策，是百姓贫穷的重要原因，他痛切地指出：“当此之际，国家惟宜镇之以静，省息诸事。减节用度，则税自轻，徭役自少，捕负自宽，利率自止。四患既除，民力自足，民财自饶，闾里自安，流亡自还。”⁶司马光从“怀民以仁”的人本思想出发，不主张对西夏战争。

四 “叛则讨之，服则舍之” 及以经济手段遏制敌人的思想

¹ 《资治通鉴》卷 11，太祖高皇帝五年，第 352 页。

² 《资治通鉴》卷 44，武帝建武二十三年，第 1417 页。

³ 《司马光奏议》卷 23《横山上殿札子》，第 257 页。

⁴ 《长编》卷 205，治平二年六月己酉，第 4969 页。

⁵ 《长编》卷 363，元丰八年十二月乙丑，第 8690 页。

⁶ 《司马光奏议》卷 28《谏征四疏》，第 308 页。

司马光的外交思想是以保守为主,但其思想中也时而有着现实主义思想的闪烁。他的“少征伐”也不是一味地,无条件地反对用兵,相反在《通鉴》中多处阐述了“叛则讨之,服则舍之”的思想。他认为:“先王之政,叛则讨之,服则怀之。”¹又说,“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²,他提出“王者之于(御)夷狄,叛则讨之,服则舍之”,³认为这是圣王处理与其他政权关系的一个准则。

“叛则讨之,服则舍之”界定了与其他政权之间战和的条件,叛是讨的前提,如果其他王朝侵犯中国,或是发动叛乱,就应该兴师致讨,这是维护华夏尊严必须的手段,反之,如果其他政权并没有对华夏造成现实的威胁,就不应该对他们用兵。“服则舍之”,舍是服的结果,如果其他政权表示了顺服,就应该停止战争,由震之以威,改为怀之以德,而不是穷追猛打,对其进行彻底的征服。在时机、条件和理由都很成熟的情况下,权衡内外敌我的轻重强弱,“奉辞讨伐”,进行有准备有把握的反击,不战则已,战则必胜,以收长远的威服之效。司马光认为“王者之于戎狄,或怀之以德,或震之以威,要在使之不犯边境,中国获安,则善矣。”⁴战争的目的只是将使之不犯边境,达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中国获安。如果国贫民弱,征伐不利,叛不能讨,只能任人欺侮、自取其辱。

对于西夏犯边,司马光认为可以用军事防御与经济封锁相配合,迫使西夏臣服,从而达到边境安宁的目的。自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宋置保安军榷场以来,宋夏边境贸易不断发展,双方交易数额巨大,非法的边境贸易更为兴盛,司马光曾指出:“近岁法禁疏阔,官吏弛慢,边民与西人交易者,日夕公行。彼西人,公则频遣使者,商贩中国,私则边鄙小民,窃相交易。虽不获岁赐之物,公私无乏,所以得偃蹇自肆,数年之间,似恭似慢,示不汲汲于事中国,由资用饶足,与事中国时无以异故也。”“今必欲严禁边民与西人私市,须权时别立重法:犯者必死无赦,本地分吏卒应巡逻者,不觉透漏,官员冲替,兵士降配;仍许人告,捉获赏钱若干,当日内以官钱支給,更不以犯事人家财充。”⁵鉴于宋与西夏贡使贸易频繁,西夏获利巨大,经济上,西夏对北宋存在巨大的依赖性,司马

¹ 《资治通鉴》第56卷,灵帝建宁二年,第1817页。

² 《资治通鉴》第12卷,高祖八年,第383页。

³ 《资治通鉴》第23卷,昭帝元凤四年,第773页。

⁴ 《司马光奏议》第23卷《横山上殿札子》,第257页。

⁵ 《长编》卷365,哲宗元祐元年二月壬戌,第8752—8753页。

光认为要达到困绝西夏的目的，必须同时禁绝西夏与宋的边境贸易。对于禁绝贸易的困难性，司马光提出要立严法、从重处置私自进行贸易的边民，同时择派良将守御边城，就可以做到困迫西夏的目的。经济封锁、禁私市是司马光对外关系中，以经济的手段遏制西夏，但是司马光没有料到的是，如果对西夏进行经济封锁，西夏可能被逼困而用武力挑战宋王朝，以打破经济封锁。

不可否认，司马光的外交思想是非常复杂的，他的思想中有“守祖宗之法，”重内轻外、“不可遽谋边事”的保守主义，同时也有着恩信怀柔、德化远及、怀民以仁等理想主义的思想，也有着不得已之时进行讨伐的现实主义思想。这些思想都存在于司马光的外交思想中，它们之间且并不是对立矛盾的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的，如司马光的理想主义的儒家理论付之于外交实践时，演化成了因怕人民的伤亡，而不言战争的保守主义思想了，但是综观司马光的外交思想还是以保守主义为主流。

第六章 宋代理想主义外交思想

理想主义就是强调人性本善，把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忠、信、敬等原则作为外交的主要思想。具有理想主义外交思想的统治者认为思想、道德的力量要远比实力重要，他们想象其他政权一定能够被儒家处世原则所感化，因此在应付外来的欺凌时，始终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继而不惜在权益上做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理想主义是一种超脱现实的政治理念，缺乏实证的精确的研究，具有不可克服的缺陷，宋代的理想主义在遭受到失败后，最终转化为投降主义思想。

本章主要论述宋徽宗、童贯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及产生这种思想的原因。

第一节 宋徽宗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及转变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哲宗崩逝，继立皇储成了宋朝廷的大事，向太后主张立神宗的第十一子赵佶，宰相章惇认为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表示反对，知枢密院事曾布首先附和说：“章惇未尝与臣等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¹，于是赵佶被向太后、曾布等扶上皇位，即宋徽宗。赵佶生于元丰五年（1082），卒于绍兴五年（1035年），他是一个生性理想浪漫、贪图享乐而不言责任的纨绔子弟。他即位时是北宋政治生活中各种矛盾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关键时段，是北宋王朝走向垂危直至覆灭的重要时期之一，当时朝廷内部朋党相争，互相倾轧，经济连年灾荒，民不聊生。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吏部侍郎张舜民在上疏中说：“自军兴已来，关中岁饥，流亡孳饿，十室九空……长安、陕、华米斗一千，廊延麦面一称二贯三百，皆足陌也。”² 宋朝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辽逐渐衰弱，而女真完颜部酋长阿骨打举起了反抗辽统治的大旗，建立金国，力量迅速发展起来。宋徽宗执政前期，即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至大观四年（1110年），有着浓厚的保持宋朝大国地位的思想。他崇尚熙宁年间积极拓展、稳定边

¹ 《宋史》卷22《徽宗四》，第417页。

² （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33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43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92页。

睡的思想。从政和元年（1111年），他开始在对夏战争的一些胜利中自我陶醉起来，认同了联金攻辽的理想主义思想，且在重和元年（1118年），与金达成“海上之盟”，开始走上亡国之路。宋徽宗在北宋王朝即将灭亡之时，其思想从理想主义迅速转向了妥协退让，卑躬屈膝的投降主义。

今人研究宋徽宗论著主要如下：任崇岳《宋徽宗：北宋家国兴亡实录》¹采用传记特写和历史评论相结合的表现手法，描述了宋徽宗为政时期的重要事件及其才华横溢的艺术人生，他认为宋徽宗继位初期，整顿吏治，礼贤纳谏，勤于政事，欲使国家振兴，徽宗借金亡辽，并无大错。任崇岳《宋徽宗·宋钦宗》²论述了宋徽宗屡开边衅，穷兵黩武，对西夏与河湟吐蕃的战争，联金攻辽，引狼入室等事件。赵永春在《金宋关系史》³的前两章中，研究了宋金联合灭辽及金与宋对等结盟并居主导地位，宋金战争的开展。杨小敏《从宋金结盟过程看北宋晚期腐败政治》⁴认为宋政治腐败及外交的失误，宋金结盟反而给徽宗君臣带来了亡国辱身的无尽悔恨。除此之外，近年来出版了一些宋徽宗的传记，这些传记一般用文学通俗的方法，撰写了宋徽宗所经历的政治与生活，诸如朱学勤主编的《宋徽宗》⁵、冯国超《宋徽宗》⁶，这些著作以介绍宋徽宗的生平及主要政治、生活事件为主，没有把宋徽宗的外交思想纳入研究范畴。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于宋徽宗本人的思想没有深入地挖掘，一些对徽宗为政时的分析，也不是十分客观。

一、宋徽宗早期崇尚熙宁外交、树立宋王朝大国地位的思想。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二月甲辰，向太后撤帘，宋徽宗开始亲政。宋徽宗对外思想是崇尚神宗熙宁时期，开疆拓土地，夺取战略要地，恢复神宗时期的边界，建立大国形象，立下不朽丰绩。因此，他执政伊始，开始加强战备，针对河北边境储备不多的情况决定，“出内库及诸路常平钱各百万，备河北边储。”⁷宋徽宗给宋夏战争中失利的将领论罪，一贬再贬，以起到杀一儆百，告诫群臣

¹ 任崇岳：《宋徽宗：北宋家国兴亡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² 任崇岳：《宋徽宗·宋钦宗》，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³ 赵永春：《金宋关系史》，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⁴ 杨小敏：《从宋金结盟过程看北宋晚期腐败政治》，载《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8 年第 4 期。

⁵ 朱学勤：《宋徽宗》，远方出版社，2002 年。

⁶ 冯国超：《宋徽宗传》，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 年版。

⁷ 《宋史》卷 19《徽宗一》，第 361 页。

的作用。建中靖国元年十二月癸丑，追贬与西夏战争中弃湟州的人，贬韩忠彦为崇信军节度副使，曾布为贺州别驾，安焘为宁国军节度副使，范纯礼分司南京。次年八月丁未朔，再论弃湟州罪，贬韩忠彦为磁州团练副使，安焘为祁州团练副使，范纯礼为静江军节度副使，削蒋之奇秩三等。¹

崇宁三年（1104年），宋发兵十万，大举进攻青唐（今青海西宁），次年（1105年），辽派遣萧良来，为夏人求还侵地及退兵，被宋拒绝后，西夏进攻宗砮、延砮、湟州北，都被宋一一击退，宋恢复了宋神宗统治时期的疆土，改熙河兰会路为熙河兰湟路。夏被迫向宋入贡，在表面上看宋外交似乎获得了空前的成就。大观二年（1108年），宋朝又攻占了积石军（今贵德西）、洮州（今甘肃临潭）等地。大观元年（1107年）夏国开始向宋入贡，至政和七年（1117年）夏国一共入贡五次。²由此，宋在朝贡体系中树立了大国威望。宋在西夏战争中上了上风，宋徽宗在童贯、王黼的诱说下，开始筹划联金攻辽，收复燕云十六州，企图建立前所未有的丰功伟业。

二、联金攻辽理想主义思想的起源及发展

（一）联金攻辽思想的萌发

燕云十六州自归辽后，中原王朝丧失了抵御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燕云反成了辽人牧马南下的根据地。自燕京至黄河之间坦平无碍，利于骑兵驰骋，使宋人无险可守。燕云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从宋太宗三次攻辽取燕云失败后，便深沟高垒，不再作进攻之举，而辽国牧马南寇，无时或已。从真宗到哲宗五朝对此地虽有强烈的收复愿望，却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徽宗时期，辽逐渐衰败，金人反辽并且势力迅速崛起，徽宗在童贯、蔡京的怂恿下，想乘金人崛起并屡败辽兵之际，完成祖先未竟之业，消除边患、收复燕云。政和元年（1111年）童贯出使辽，有燕人马植向童贯献上联合女真灭辽之策，在童贯的大力推举下，政和五年（1115年）马植（后被赐赵姓，改名赵良嗣）投奔北宋，献计灭辽。他说：“女真恨辽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莱涉海，结好女真，与之相约攻辽，其国可图也”，又说“辽国必亡，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

¹ 《宋史》卷19《徽宗一》，第368页。

² 《宋史》卷21《徽宗三》，第410-416页。

壶浆来迎。”¹

徽宗虽心有所图，但起初对此表现谨慎，不愿破坏宋辽双方已有的百年盟约，告诫边将不要随意生事。政和七年（1117年）二月二十七日，徽宗仍下诏：“朝廷与北界和好，今逾百年，近者沿边累奏北界讨伐女真、渤海，久未帖定，可依屡降处分，约束沿边不得妄动，亦不得增添人马，别致惊疑。”²七月，当徽宗听说女真进攻契丹已过辽河之西的消息后，态度始有较大改变。诏令王黼、童贯计议。徽宗问起两人北方情况时，王黼上奏说：“中原故地，久陷戎虏，今日天相陛下。成此大功，若不乘时，恐有后悔。”徽宗听后笑着说：“众皆不可，卿独可之，难以施行，姑俟他日。”“然意已属黼矣”。³

联金攻辽的思想，最早由马植提出，又被童贯、王黼两位接受，后来在他们几个人的竭力鼓动下，原来没有这种思想的徽宗，也随着辽金的战事而逐渐认同了联金攻辽的思想，才下定决心放弃与辽的盟约，与金联合共同伐辽。徽宗改变主意，主动与金联合的思想，主要受到下面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在童贯、王黼等近臣的怂恿下，怕金攻下辽后，燕云落入金的手里，于是仓促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贯倡之，黼成之，安中赞助之”，仅几天，徽宗“决意行之。”⁴从徽宗的思想上来讲，是有着投机成份。二是，宋徽宗在对西夏用兵的胜利中，想进一步推进开疆拓土的成果，希望完成前世未竟的事业，而获得盖世的英名，是功利主义的思想，推动他决定联金攻辽。在这二种原因的驱使下，宋徽宗决定以与女真市马为名，令人访其事体虚实。派遣高药师等以往探问。宣和二年（1120年）三月，徽宗下诏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赵良嗣及忠训郎王环为使副出使金国，商议夹攻契丹，求燕云地、岁币等事，这就有了宋金“海上之盟”。

（二）联金攻辽受到广泛的反对

徽宗结金图辽的消息传开，在大宋朝野引起轩然大波。反对者从士大夫到普通百姓，他们纷纷上书，说明联金攻辽不可行。知枢密院事邓洵武疾呼“百年盟誓，一朝弃之，何以令吾民告敌国乎？诚恐兵革一动，中国昆虫草木，皆不得而休息矣”。⁵太宰郑居中请求朝廷谨守澶渊盟誓，冒然开战，后患无穷。大臣宋

¹ 《宋史》卷472《赵良嗣传》，第13734页。

² 《宋会要辑稿》，《蕃夷》2之31，第7707页。

³ （宋）周辉：《清波别志》卷上，知不足斋丛书版，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页。

⁴ （宋）周辉：《清波别志》卷上，知不足斋丛书版，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页。

⁵ 《三朝北盟会编》卷1，政和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第9页。

昭上书论北界利害，乞守宋辽盟誓，认为女真决先败盟，将成为中国的祸患，到时候河北之民“将于涂炭之中”¹宣和四年(1122)八月，参议官宇文虚中上书“论收燕山利害”，提醒最高统治者：“若西夏大兵助送旧酋(指辽天祚帝)不能入燕，不得志而归，蓄怒乘虚却于陕西，河东出没牵制作过，其利害如何?将有纳侮自焚之祸。”²甚至普通百姓上书反对轻举兵端。政和八年五月，广安军平民安尧臣上书乞寝燕云兵事，“方今天下之势，危如累卵，奈何陛下不思所以固本之术，委任奸臣竭生灵之膏血，欲奉强胡改作，敌以取必争之地，使上累圣德，此亿兆所同忧也。”³

高丽国王听到宋与金有结盟的意识后，让在高丽的宋朝御医给徽宗捎口信，“闻朝廷将用兵伐辽，辽兄弟之国，存之足为边扞，女真狼虎尔，不可交也”。⁴劝徽宗要防备女真的无信。契丹为金人攻击，穷蹙无计，辽天祚帝遣其臣韩昉来见童贯、蔡攸于军中，提出“愿除岁币复结和亲，且言金人本远小部落，贪婪无厌，蚕食旁近五、六十国，今若大辽不存，则必为南朝忧，唇亡齿寒，不可不虑。”⁵具有理想主义思想的徽宗在极大的诱惑面前，根本听不进去这些道理，联金灭辽在实施前，其结果就已经被人们预料到了，不幸的是这些预料终成了现实。

(三) 徽宗依靠金军，宋军为辅，攻取燕云的思想

宋与金联盟，双方商定，联合攻下燕云地区，宋答应把原来每年“赐给”辽的五十万岁币银绢交给金。其实谁能攻下燕云，当时是一个未知数，宋在作战之前，就答应给金银绢，说明宋徽宗对辽的恐惧心理，把宋攻取燕云的希望冀于金军。宋建国后失去了燕云高山峡谷的屏障，宋边境地带是一马平川，时刻受到南下骑兵的威胁，也正是失去地利的的原因，使宋徽宗心中有着惧辽情绪。在事实上，一百多年来宋对辽的岁币络绎不绝，随着宋经济的衰退，宋在经济上感到压力；在心理上，也觉得不体面与厌烦。当时太宰郑居中知道联金攻辽的事情时，指责蔡京“何以遂兴此举”时，京曰：“上厌岁币二十万匹两，故有此意。”⁶联金攻辽，宋答应把给辽的岁币转给金，徽宗感到给辽岁币不体面且厌烦，给金岁币会

¹ 《三朝北盟会编》卷8，宣和四年六月三日，第108页。

² 《三朝北盟会编》卷9，宣和四年八月丁亥朔，第128-129页。

³ 《三朝北盟会编》卷2，政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第20页。

⁴ 《文献通考》卷325《四裔考二·高句丽》，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十通”本，第2560页。

⁵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页。

⁶ 《东都事略》卷10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38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65页。

体面到哪里呢？宋徽宗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因为辽作为一个大国，即使力量衰弱，也不是一击即溃，因此联盟之初，宋徽宗对宋军独立战胜金没有把握，希望依靠金军，宋军辅助，夺取燕云之地。

宣和四年（1122年）正月癸酉，金人破辽中京。按宋金“海上之盟”的约定，金取辽的中京大定府，宋取辽的燕京析津府，灭辽之后，宋把过去每年给辽的岁币转给金国。但宋朝爆发了方腊起义，加上听说辽朝已知宋、金“海上盟约”的活动，害怕遭到辽朝报复，宋徽宗“深悔前举，意欲罢结约”，没有如约举兵。八月在宋军攻城失利的情况下，徽宗明确地对金国使者说，希望金军破辽军，“燕人无主，止是四军领兵为边患，乃挟女主猖獗，岂金国可容！早禽之为佳”。¹

（四）、盲目出兵，欲借金人收复燕云的理想主义思想

宣和四年（1122年）夏四月，当金军占领辽朝的中京，又破其西京大同府以后，宋徽宗认为辽亡已是大势所趋，故命太师童贯为宣抚使，蔡攸副之，勒兵十五万以巡边。宋徽宗给童贯收复燕云的上中下三策，即“如燕人悦而取之，因复旧疆土，上也，燕王（耶律淳）纳款称藩，次也。燕人未复，按兵巡边，下也。”²宋徽宗错误地估计了燕云地区的人们对宋的态度。从宋军取燕云地区的战争进程，可以得出下面的基本认识，辽对燕云地区的统治已经二百多年，多数居民已经承认了辽对此地区的统治，而对宋却不了解，在辽仍未灭亡之时，大多数人认为还是维持现状为好。剩下的少部分人对宋的态度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与辽有隙者，如郭药师，准备献城归宋；另一部分，与之相反，是要与城共存亡命。童贯以“吊兵伐罪”为理由，鼓动燕云地区民众回归宋政权，但在燕云的辽军队不仅没有投降，反而大败宋军。宣和四年（1122年）十月，先是童贯败于白沟，接着是“郭药师与高世宣、杨可世等攻燕，萧斡以兵入援，战于城中，药师等屡败，皆弃马縋城而出，死伤过半。”十月甲寅“刘延庆自卢沟河烧营夜遁，众军遂溃”，³宋军进攻燕京不果，童贯邀请金军夹攻燕云，金军攻克辽中京大定府。当阿骨打听到宋军在燕京城下败退、统军将领逃跑的消息后，轻蔑地对宋使马扩说：“契丹疆土，我得十九矣，止燕京数州之地，留与汝家，我以大军三面掩之，

¹ 《三朝北盟会编》卷9，宣和四年九月十三日，第129页。

²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1《天祚皇帝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0页。

³ 《宋史》卷22《宋徽宗四》，第410页。

令汝家俯拾，犹不能取。”¹ 宋的懦弱，使金开始有了攻宋的野心，金兵攻燕云，并劫掠一空，要了一百万“代税钱”后才交还给宋，这种结果无疑是对宋徽宗平燕云三策的巨大嘲讽，徽宗本想依靠金军的力量，用和平的方式，兵不血刃的攻取燕云，最后却如此狼狈，说明徽宗“平燕云”三策是对燕云基本状况的彻底误解，对本国军事战斗力缺乏根本的认识，徽宗一如既往的浪漫主义渗透于外交之中，必然带来更多的可悲可叹之事！陈乐素评价道：“徽宗感于历朝之受此压逼，偶闻金崛起于满洲，屡败辽师，认为良机之至，遂欲因其力以收复燕云，除百余年来之大患。然当时之君臣实闇弱庸陋，不自量力，事先无缜密之计划与充分之准备，临时仓卒弥缝应付，措施乖谬；……然则金既灭辽，占据燕云后，宋能否遏止其南侵之野心？实则依当时之国力及内政而论，战亦亡，恐不战亦亡，不过迟早之分耳。”²

宋徽宗联金灭辽，本想大申国威，恢复旧疆，哪知金国的铁骑却以摧枯拉朽之势颠覆了北宋王朝。前人在研究宋徽宗时期政事时，有一种观点是宋徽宗的联金灭辽并没有什么大错，只是没有加强战备，以致被金灭亡。其实每一个重大外交决策的产生，应该是非常慎重的，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要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而宋徽宗的联金灭辽，只是听从了几个近臣的臆测，非常草率决定的，事后也没有作充分的军事力量的训练与发动，更没有去分析金人败盟的可能性。从宋人反对联金灭辽的奏章上来看，金人败盟几乎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如果这时不做任何准备的进行联金灭辽，与螳螂捕蝉又有什么区别呢？宋徽宗不清楚本国实力，又不了解金的状况，而盲目投机的联金灭辽，最后只能自食其果。

宋徽宗对外思想中有着理想主义，且投机成份较多，外交原则也随着理想的变化而反复无常，为金人攻宋提供了事实上的借口，最后他的思想转向了投降主义。

四、败盟约，妥协投降的外交思想

宋朝从宋太祖到宋哲宗，对外往中，都有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一旦确立，一般都能自始至终地坚持。宋徽宗对金的外交中，可以说是愚昧无知、眼光短浅、左右摇摆、反复无常，无基本的外交原则。宋金联盟的瓦解，直接来源于宋纳辽

¹（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7《四裔考四·女真》，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十通”本，第2571页。

² 陈乐素：《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载《辅仁杂志》，1933年第4卷1期。

降将张觉。

张觉（宋史作珏）在辽第进士，仕至辽兴军节度副使。金太祖占领燕京后，宋人以海上之盟求燕京及西京地，金太祖以燕京、涿、易、檀、顺、景、蓟与之。平州自入契丹别为一军，所以没有打算交还给宋政府。金以平州为南京，任辽降将张觉为南京留守。“太祖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实京师（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地区），民心多不安，故时立爱因降表曾言及之。及以燕京与宋而迁其人，独以空城与之，迁者道出平州，故觉因之以作乱。”¹张觉本是地方实力派，拥有军队，降金后，金统治集团对他并不放心。多次派人到平州了解张觉的军队动态，如果张觉对金不顺从，就以兵攻平州、擒张觉，张觉的处境危险。当时金统治者又迁徙燕云地区的人口至上京，而多数人不愿意远走他乡。在这种情况下，降金辽将张觉不堪金朝的压迫，逃到燕山府，又以平、营、滦三州降宋，宋人纳之，建平州为泰宁军，以张觉为节度使。

在宋金双方联合灭辽的过程中，双方都可以接受辽兵的投降，但是在战前约定，凡是已向宋人投降的辽国兵将，即不能再向金人投降，反之亦然，这种原则应该被双方遵守。宋廷处理张觉降宋的问题上，视外交如儿戏，见利忘义。张觉携三州降宋，不战可获得三州，这是宋徽宗燕云三策中所希望的，并且宋徽宗认为张觉降宋是他自己的选择，宋朝不应负责任。这种想法表现了宋既想获得三州之地，又要侥幸躲过与金的对垒。但是宋纳张觉，宋是利益获得者，这种利益是从金手中获得的，意味着败盟及金对宋的战争。吴乞买听到张觉降宋的消息，大为震怒，派宗望讨伐之。宗望以纳叛将责问宋的宣抚司，索要张觉。朝廷想搪塞过关，可是金人索要更急，并扬言“若不与我，则举兵自取。”宋政府知道后感到恐惧，“乃议斩珏（觉）矣，密旨既下安中，安中数其过，逼之行刑，珏（觉）语殊不逊而死，因传首金人。”²在金的压力下宋徽宗下令杀张觉，使降宋将士感到寒心。“燕京降将及常胜军皆泣下，郭药师自言曰：‘若来索药师当奈何’？自是，降将卒皆解体。”³张觉之死，使众多降宋将领感到不寒而栗，害怕张觉的命运也是未来自己的命运。

徽宗外交没有一个明确的方针和态度，在做出决断时往往犹豫不决，外交决

¹ 《金史》卷 133《张觉传》，第 2844 页。

² 《三朝北盟会编》卷 18，宣和五年九月十五日，第 271 页。

³ 《金史》卷 133《张觉传》，第 2845 页。

策反复无常、没有基本原则。宋徽宗明知杀张觉，会引起一系列的消极反映，但是仍然无原则地退让，当时朝中出现了一些用心险恶的谣言，不但指责徽宗不守信用，还散布宋朝将尽杀降将的流言，这些谣言严重动摇了军心。在张觉事件发生时，金还提出要求交出一些与金人不协作的官员，在与金人的交往中，宋朝不断杀害、贬抑抗金将士与官员，扼杀了抗金的力量。宋纳张觉，又杀之，是宋徽宗外交决策中的一个重大错误，“宋不立徽宗，不纳张觉，金虽强，何衅以伐宋哉？”¹外交决策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第一原则，但在实力不济的情况下公然背约原则，等于给敌人以进攻的口实，1125年金灭辽，吴乞买再次以招纳叛亡张觉等事为借口，向宋朝兴师问罪，悍然发动了对宋朝的侵略战争。

五、面对强敌的逃跑主义

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金太宗吴乞买下诏伐宋，金军进围太原，宋徽宗下了“罪己诏”，表面上好象要改过自新，准备抗金，实际上他想的只是逃跑求和。敌人还离东京上千里，徽宗不是积极组织各地官兵，英勇抵抗，甚至御驾亲征，而是在惊惶失措中把皇位禅让给儿子赵桓，退诣龙德宫，为道君皇帝。退位第二天，他说：“除（道教）教门事外，余并不管”。²大敌当前，徽宗因害怕而仓促让位，他一怕承担亡国的责任，二怕在处于弱势的情况下，与金军决一死战。在危机的关头，让没有执政经验的长子赵桓处理这种混乱而复杂局面。徽宗禅位后，与蔡攸、童贯等一路南奔，把东南地区给中央的物质与“勤王”之兵，全部截留，一律不准前往东京，准备等局势稳定后，再恢复其统治。这些做法，使徽宗自私自利、卑鄙猥琐、软弱投降的思想一览无余，这些猥劣思想必遭到世人的鄙视，其后被掳北狩，受尽金军的肆意欺辱，可谓自食其果。

第二节 童贯联金灭辽，和平收复燕云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

童贯生于至和元年（1054年），卒于靖康元年（1126年），字道夫，东京人，徽宗朝童贯从一名普通的宦官到受命领枢密院事，掌控着宋朝的军事、外交的大权。由于童贯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位，其外交思想对北宋末年社会和外交的影

¹ 《宋史》卷22《徽宗四》，第418页。

² （宋）佚名：《靖康要录》卷1，宋史资料萃编第一辑，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71-72页。

响固然不容小视。童贯主导的“联金灭辽”策略，希望摧灭传统的强敌，恢复中国的故地，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也直接引发了“靖康之祸”。

童贯“少出李宪之门。性巧媚，自给事宫掖，即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顺承。”¹徽宗继位后，在杭州设置了明金局，贯以供奉官的身份为徽宗在江南搜罗精巧之物，童贯因置办宝物得力，而受到徽宗的信赖。在蔡京的大力推荐下，崇宁二年（1103年）童贯开始掌握兵权，监洮西军，与王厚复湟州，继续西进，大胜，连复四州，童贯因功迁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崇宁三年（1104年），童贯因功迁武康军节度使，政和二年（1108年）十二月丙戌，为太尉，政和元年（1111年），进检校太尉，政和五（1115年）年二月庚午，以童贯领六路边事，政和六年（1116年）正月以童贯宣抚陕西、河北，同年九月，以童贯为开府仪同三司。政和七年（1117年）三月乙未，以童贯权领枢密院。”²从此，童贯全面总管军政，成为两宋历史上唯一的宦官执政，童贯受命领枢密院事，成为全国仅次于皇帝的最高军事首长，也开了宦官主持枢密院之先河。然后，童贯拜为太傅，封泾国公爵，有“媪相”之称。

今人研究童贯的论著不多，主要有谢诒徵《宋之外交》³第四章第二节《童贯》，认为童贯在宋对外关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分析了联金灭辽之害，提出了童贯“不足责”的观点，要谴责的是宋徽宗将如此重任托付给童贯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宋世荣《童贯》⁴是中国宦官丛书的一部，本文描述了童贯一生，其中出使辽国、议取燕云、临阵脱逃等章论述了童贯外交的事实，是一本大众化的通俗读物。童贯是北宋后期握有重权的宦官，可是研究他的生平与思想的论著却较少，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一直以反面人物的形象出现，又是宦官，认为他仅是政治或军事任务的执行者，而不是“思想者”。其实童贯掌握军权长达二十余年，在徽宗时期的政坛上，位高权重，处心积虑，成为当时许多对外政策的始作俑者。

一、童贯开疆拓土的理想主义思想

自童贯在崇宁二年（1102年）掌握兵权开始，他的心中就有着许多开疆拓土的梦想。如果宋政府不对外进行战争，童贯的权力就不可能提高与巩固，因此

¹ 《宋史》卷468《童贯传》，第13658页。

² 《宋史》卷21《徽宗三》，第397页。

³ 谢诒徵：《宋之外交》，大东书局1935年版。

⁴ 宋世荣：《童贯》，蓝天出版社1998年版。

童贯利用亲近皇帝的机会，劝徽宗征讨西夏。次年，徽宗决定攻伐西夏，恢复神宗时的疆土，以显国威。徽宗令童贯监洮西军，合军十万取青唐。童贯认为这是提高个人地位的大好时机，只有勇往直前，夏军根本不是宋军的对手，胜利可唾手而得，只要在这场战争中获得胜利，就得到更多的尊重与名利。宋军到达湟川，恰巧汴梁的太乙宫失火，徽宗以为宫中失火是上天垂兆，应免动刀戈，于是下旨让童贯回师，阻止他出兵西战。童贯因见战机成熟，断然决定不奉诏，他看罢手谕马上折起来塞到靴筒里。王厚问其原因，童贯若无其事地说：“上趣成功耳。”¹从中可以看出童贯想获得胜利的强烈欲望。此后宋军继续西进，果获大胜，宋军连复四州，很快占领了惶城、宗哥城、都州、廓州、洮州等地。童贯此举深得徽宗赏识，破例被升之为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大观二年（1108年），又收复积石军（今贵德西）、洮州（今甘肃临潭）等地，童贯再加检校司空，奉宁军节度使。未几，宋改熙河兰会路为熙河兰湟路、童贯升任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累迁武康军节度使。

对夏战争接连的胜利，使童贯产生了西夏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错觉，他将秦、晋锐师深入河、陇，薄于萧关古骨龙，认为这样可以战胜夏军。童贯遣大将刘法取朔方，当时刘法认为敌据优势地理位置，仓促起兵，会遭受失败。童贯逼之曰：“君在京师时，亲授命于王所上前，自言必成功，乃以难告，何也？”²法不得已出塞，遇伏而死。“熙河帅刘法，官至检校少保，与全军俱陷，童贯更以捷闻，上皇受贺。”³因此百官表面上祝贺，背后却都咬牙切齿，但都不敢讲出实情。童贯领军，却不懂得战争中的战略战术，在军事上是一个外行。他命令将帅勇往直前，主要来自于他的理想主义与急功近利，他认为西夏软弱不堪一击，宋军能够轻而易举的战胜西夏。刘法的战败，说明童贯的理想与实际情况还是有着很大差别的。

宣和元年（1109年），童贯命种师道、刘延庆等取夏国永和等寨，大败夏人而还。六月，夏人纳款。“使至，授以誓诏，辞不取，贯强馆伴使固与之，还及境，弃诸道上。”⁴夏人纳款，宋在西夏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是又不能使西

¹ 《宋史》卷468，《童贯传》，第13658页。

² 王称：《东都事略》卷121《童贯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38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88页。

³ 《宋史》卷468《童贯传》，第13659页。

⁴ 《宋史》卷468《童贯传》，第13659页。

夏完全臣服于宋，西夏产生了与辽或女真联合攻宋的思想。“政和初，议进筑，至是十余年，遂得横山之地，夏人失援，故纳款。然国家是时已建平燕之策，益以多故。其后西夏与女真有约，乙巳冬，女真围太原，夏人犯河外，则是横山之取，有以结怨于彼也。”¹夏与宋的这种芥蒂，使夏不断入侵北宋边境，使北宋处于两面受敌的危机之中。

二、童贯“联金灭辽”的思想

“联金灭辽”在没有实现前，应该是一种对外思想。首先提出这个想法的，虽然并不是童贯，但由于童贯在宋代外交决策上的重要地位，他成为“联金灭辽”策略的主导人物。政和元年（1111年），童贯即战胜西羌，击败西夏，九月，宋徽宗派遣郑允中、童贯使辽。当时朝廷有人认为不妥，谓：“以宦官为上介，国无人乎？”宋徽宗曰：“契丹闻贯破羌，故欲见之，因使觐国，策之善者也。”童贯到辽后，辽君臣相聚指笑曰：“南朝人才如此。”²童贯对辽臣的指点很愤恨，开始萌发攻辽的思想。童贯出使归来，行至卢沟河时遇到燕人马植，因为马植在燕不得志，所以见到童贯后，马植就陈述取燕云的策略。童贯听到后非常高兴，让马植归宋。马植到宋朝后，赐姓赵，名良嗣，即赵良嗣。

童贯“联金灭辽”思想的萌发较为复杂，首先发源于童贯个人对辽的仇视心理。童贯出使契丹受到嘲笑，使他心中充满不快，天祚帝对珍奇之物的无限索取，也使童贯感到气愤。天祚帝贪得中国玉帛珍玩，而童贯“所赉皆极珍奇，至运两浙髹藤之具、火阁书柜床椅等往献。天祚所以遗贯者，亦称是。后天祚数移檄索取，贯讳不与。复燕之议，盖始此。”³随着时间的推移，童贯也觉得天祚帝欲壑难平了。

其次，童贯为贪图个人名利。童贯一举平西羌，战功显著，但是依然无法摆脱人们对于他是一个宦官身份的歧视，他希望能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来摆脱这种心理的芥蒂。他出使辽的实地观察，发现辽统治的腐败，使他的野心萌动。同时，金方攻辽的迅速进展，又使他视为近在咫尺的王爵拿不到手了，所以他急于出师，以获得不世之功名。在他出师征辽前，又举而平方腊，国内一帆风顺的胜利，使他对自己盲目自信，越发认为辽必可灭，金不足惧。

¹《长编》卷352，元丰八年三月甲午朔注，第8450页。

²（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0《天祚皇帝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8页。

³（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0《天祚皇帝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页。

其三，“辽必可灭”的思想。童贯借宋太宗联渤海高丽夹攻契丹的故事，认为用“以夷制夷”，能够报复辽国“开边慢我”之仇。“联某国以制某国”，即所谓以夷制夷，一直是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为特征的策略，被童贯看作是孱弱的宋朝政府唯一可行的外交之策，他认为，宋王朝的军事力量不足以应对辽，要想收复燕云之地，必须取得新兴国家金的支持，同时，他相信，只要采取正确、灵活的策略，金会答应宋的要求，因为辽金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利益冲突，正好可以利用这些矛盾和利益冲突，使辽金彼此互相牵制，抵消力量，最终辽可以被打败，宋可以实现收复故土、保疆护国的目标。

联金灭辽的目的，是要利用辽方衰弱的机会，联络一个东北新兴的小国，摧灭传统的强敌，恢复中国的故土。如前所述，联金灭辽的思想受到了人们的反对，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童贯力排众议，上了一本《平燕策》，全面阐述了收复燕云的重要性与可行性。“云中根本也，燕蓟枝叶也，当分兵挠燕蓟，而后以重兵取云中”¹童贯认为就燕云形势而言，燕京为根本，云中为枝叶，朝廷应该将陕西与河北之兵互调，以河东一军牵制云中，而集精兵锐甲攻取幽州，此后据关守险，则天下可定，社稷可安。童贯的军事计划，激活了宋徽宗的雄心壮志，使他看到了“平定燕云”的希望，开始有了同契丹决裂的思想。这样导致北宋自挖坟墓，引得各方非议的宋金“海上之盟”被正式启动了。宣和元年（1118年），徽宗派武义大夫马政使金，向阿骨打传达了宋朝欲与金通好伐辽的意向，双方开始商讨结盟攻辽。

三、用和平方式收复故地的思想

宣和四年（1122年），宋徽宗命太师童贯为宣抚使，以蔡攸副之，勒兵十五万巡边，下诏收复燕、云故地。宋徽宗认为辽已经面临着灭亡，只要宋兵一到，进行招降，不用武力即可攻占燕京。在童贯看来，燕云地区的人民，从被辽统治那时起，就一直想归附于宋，如果出师燕云，当地人民一定会箪食之迎，将轻骑数千过界。童贯信心百倍的准备北伐辽朝、全部收复燕京之地。童贯遣张宝、赵忠面谕燕王耶律淳，使举国内附，致书略曰：“吴越钱俶、西蜀孟昶等归朝以来，世世子孙不失富贵。况辽之与宋，欢好百年，诚能举国内附，则恩数有加；苟怀执迷，后时失机，恐有彭宠之祸起于帐中。”²耶律淳看完谕书，非常气愤，把

¹ 《三朝北盟会编》卷2，政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第29页。

²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1《天祚皇帝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

张宝、赵忠杀了。童贯仍没有放弃劝降的策略，又派出使者劝降易州汉族土豪史成献城，使者被史成押送燕京，斩之。童贯两次派使者说降，都遭到了坚定拒绝，但他仍没有放弃理想主义的和平统一燕云的思想，他又以“王者之师”的姿态，对燕京民众进行“吊民伐罪”的宣传，却根本不作战斗的准备，他张榜称：“奉圣旨，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吊民伐罪，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并命令军队“如敢杀一人一骑，并从军法”，¹不料燕京民众没有出城迎接北宋的军队，以响应童贯的号召。相对童贯“和平统一”燕云的思想，辽为保卫燕云而要与宋决一死战。辽将大石林牙者让宋将王介儒给童贯传话：“童贯欲和即还，作善邻，不欲和，请以军相见，毋令诸军徒苦也。”²辽统治者坚定的以武力迎战宋军，宣和四年五月宋军与辽军战于白沟和范村，在辽将大石林牙率士兵猛烈进攻下，宋军大败，退守雄州，又遭到辽军袭击，损失惨重。

宋军的惨败，表明了童贯理想主义的和平统一燕云思想的失败。从石敬瑭936年将燕云地区割与辽，至童贯出兵燕云，已经一百八十多年了，宋建国前燕、云之地就已经归属辽。从宋的角度来看，燕、云一直是宋的失地。从统治燕云的契丹与汉族官吏来讲，辽在燕云统治长达一百多年，他们大多数认为燕云并不是宋的燕云，而是在辽的现实统治下。所以宋来攻燕云，他们多数不会轻易放弃守地，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就有了汉族土豪史成拒绝献城的事情。从燕云地区的民众来讲，经过上百年汉、契丹民族的融合，已经不存在与辽对立的情绪，心理上已经接受了辽的统治。辽的统治腐败，宋的统治又会比辽好到什么地方呢？也是一个未知数。燕云人民也不希望在自家门口发生战争。这时候，宋来攻打燕云，虽然广为宣传，但这些宣传没有足够的说明力，从统治燕云的官僚阶层到人民百姓见到宋军不可能“持箠来迎”。

四、用“代税钱”收复燕京的理想主义思想

童贯对于当时辽国内局势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但他对金的野心认识不深，所以，他认为只要适当地满足金的无理要求，委曲求全，即可与金达成一致，保

页。

¹ 《三朝北盟会编》卷7，宣和四年五月二十六日，第96-97页。

²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121《童贯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38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89页。

证中国收得失地。

宣和四年（1122年）辽天祚帝逃入沙漠，辽朝行将灭亡，宋朝认为这是伐辽的好时机，七月，宋又命童贯等率军万进兵，十月，在良乡被辽将萧干所阻，宋将刘延庆烧营而遁，宋军又大败而归。童贯为逃避罪责，不得已密遣使至金营，请金军攻打燕京。金向宋提出进一步要求，燕京交给宋以后，宋除了每年缴纳万两“岁币”外，另外还要增加万贯“燕京代税钱”。童贯认为只要答应了金的要求，就可以得到燕京。十二月，金太祖攻下燕京，“金人既得燕山子女，乃大毁诸州及燕山城壁，楼槽要害皆平之。”又“尽括燕山金银钱物，民庶寺院，一扫皆空”，金人当时还想，“中国修理三二年，间却取之”。¹宣和五年（1123年）四月，童贯、蔡攸进入燕京时，燕京实际上已经是一座空城。

宋金海上之盟实施过程，充分暴露了宋朝政治的极端腐败，特别是军队战斗力薄弱，遭到金统治者的鄙夷，用“代税钱”获得燕京，更表现了宋的懦弱，使金开始了有攻宋的野心，并在宣和七年，开始以张觉事件，驱兵向宋，童贯理想主义的“联金攻辽”思想遭到彻底的失败。童贯在外交中的理想主义思想，遭到现实的惨败后，其思想开始退化为委曲求全，妥协退让、对外投降的思想。

宣和七年（1125年），粘罕南侵，童贯在太原，金人认为“贯之所在，重兵系焉。粘罕既由云中入侵，贯必与之相持。”²但是由于义胜军反叛，宋军西线战场一开战就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太原岌岌可危之时，童贯遣马扩至金营，金人以纳张觉为责，且遣使告宋兴兵。贯对金使厚礼之，使者劝童贯速割两河，童贯非常气愤却又束手无策。十二月童贯带着参议宇文虚中等，以事体重大，须回朝奏禀天子为名，轻率撤离太原。太原知府张孝纯率文武请求童贯驻节太原，统率河东宋军抗金。张孝纯讽刺童贯说：“金人逾盟，王当令天下兵悉力枝梧，今委之而去，是弃河东与敌也。河东入敌手。奈河北乎？”贯怒叱之曰：“贯受命宣抚，非守土也。君必欲留贯，置帅何为？”孝纯拊掌叹曰：“平生童太师作几许威望，及临事乃蓄缩畏怯，奉头鼠窜，何面目复见天子乎？”³这位宋朝派往北方的最高统帅，强行离开了太原。

宣和八年（1126年），随着金人的入侵，童贯成为众矢之的，以“结怨辽金，

¹ 《三朝北盟会编》卷16，宣和五年四月十七日，第232页。

² （金）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3《太宗文烈皇帝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页。

³ 《宋史》卷468《童贯传》，第13661页。

创开边隙”的罪名一连三贬，最后被诛杀。有人把“联金攻辽”的行动看作“靖康之难”的根源，“顷童贯、蔡攸贪土地以奉主欲，营私而忘国计，屯兵境上，欲灭大辽，以取燕、云之地。方是时也，契丹之使，交驰接境，祈请于前。为贯、攸之计，宜伪许而从其请，乃欲邀功以兼人之地，遂貽患于主，而宗庙危。”¹清人王夫之评价了童贯与宋徽宗外交政策的一系列的错误：“靖康之祸，自童贯始。狡夷不可信而信之，叛臣不可庸而庸之，逞志于必亡之契丹，而授国于方张之女直。”²

联金灭辽的思想未能实现，根本在于朝廷腐败，军事的软弱与理想主义外交思想的错误。“一个君王不应该和一个较自己为强的君王缔结联盟，去攻打别人，除非他是像我们在上面所说，他这样做是为环境所迫，不得不然，你不应该缔结这种联盟，因为如此而他若打了胜仗，你就得仰他的鼻息，而为人主者却应该尽其可能来避免仰承任何人的意旨的。”³童贯理想主义外交思想终是败于未能知彼知己，不知金势力的强大，不知宋军的衰退，脱离实际，不自量力。

童贯与宋徽宗为猎取功名，不自量力，图占便宜，有理想主义与投机、功利主义思想，他们想收复失地，以报世仇，但没有从战略的角度考虑辽国存亡对宋的意义，违背了宋辽“澶渊之盟”的相关协议，这一违背盟约的做法，曲在宋不在辽，宋朝承担了外交逾盟违约的责任，且打破了宋辽多年的总体外交平衡格局，使得宋朝从此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¹ 王明清：《挥麈第三录》卷3，四部丛刊续编，商务印书馆1934年。

² (清)王夫之：《宋论》卷8，第150页。

³ (意)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5—96页。

第七章 宋代投降主义的外交思想

投降主义是当国家利益受到侵犯，或外敌入侵的时候，背弃国家根本利益，竭力迎合外来侵略者的利益和需要，反对和破坏反侵略战争，散布亡国论调，对敌人妥协、屈服、投降的思想和行为。

宋代外交以失败而著称，一个重要原因是北宋末年与南宋时期投降主义思想的“高涨”。北宋末年，在金大举入侵的情况下，虽有英勇不屈、以身殉国的将士¹，可是选择弃城逃跑的将士也比比皆是²。当弃城而逃的守将几乎被人们淡忘时，投降金人而身陷囹圄，客死他乡的宋徽宗、钦宗却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扼腕叹息的人物，徽宗、钦宗的投降主义成为宋朝外交思想中的典型代表，且他们的投降主义思想对南宋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章主要论述宋高宗、秦桧、贾似道的投降主义外交思想及产生这种思想的原因。

第一节 宋高宗的投降主义外交思想

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北宋灭亡。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康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县南）即位，是为宋高宗。高宗生于大观元年（1107年），卒于淳熙十四年（1187年）。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传位于宋孝宗，在位36年之久。

高宗在国破家亡、百废待兴的形势下即位，支撑了刚刚重建的南宋王朝，并使赵氏王朝的统治得以延续。高宗在位时，有暂时支持宗泽、韩世忠、岳飞等主战派应战金军的一面，也有错失战机，主动求和的一面。高宗屈己求和是因为宋弱金强而不得已为之，还是本身就是个失去了血气的软骨头？学者们对此评价不

¹ 例如，宣和七年（1125年），金人斡离不、粘罕分两道入攻，围攻太原，太常少卿傅察奉使不屈，死之。金人陷汾州，知州张克戡、兵马都监贾宣死之；金人陷淮宁府，守臣向子韶死之。（《宋史》卷23《钦宗》，第431页）。

² 例如，建炎二年（1128年）二月金人陷均州，守臣杨彦明遁去；三月，金人陷凤翔府，守臣刘清臣弃城去；金人陷延安府，权知府刘选、总管马忠皆遁。十二月，金人犯东平府，京东西路制置使权邦彦弃城去；又犯济南府，守臣刘豫以城降。（《宋史》卷25《高宗一》，第459页）

一。多数学者认为高宗自始至终，殚精力竭地推行一条对金求和妥协的路线。前人研究的成果有李克武《败求和，胜亦求和——宋高宗屈膝求和心理分析》¹，认为高宗是弱型性格，其求和动机有三个，即拒绝钦宗回朝，避免皇位受到威胁，避免因战争导致的农民起义，稳固其统治。任仲书在《试论南宋初年高宗对金退避妥协的原因》²中认为南宋初期，政权腐朽，高宗无意中兴，军政涣散，力量薄弱，社会矛盾突出，统治力量分散，是高宗退避妥协政策的原因。但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如杨峰《南宋初年宋金“和”“战”新论》³重新评价了高宗与秦桧，认为赵、秦二人不应是投降派，“议和”是宋弱金强的历史背景下做出的一种策略。

诚然，高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在研究他时，不应该因为他的一些话语，就认定他为投降派或为重建南宋王朝的具有大智大勇的英明君主。要想探明宋高宗思想的主流，就要从当时宋金力量对比，与高宗的实际行动及其后果中来分析。高宗虽不止一次声称要与金决战，而实际上大敌当前，高宗往往选择的是条逃亡之路。他的逃跑主义思想，指引着他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八年(1138年)的十余年间，辗转至东南沿海各地躲避金军。高宗时常会感叹战乱使民不聊生，希望人民能够拥有和平，休养生息，以养民力，因此他义无反顾地用求和的方法获取和平。可是，和平的获得并不一定必然要妥协求和，在宋金之间力量的消长变化中，如果高宗能够利用有利机会，实现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最大化，我们概不能给他戴上投降主义的帽子，但高宗无视宋金力量的变化，放弃有利时机，屈辱称臣、赔款割地、屈己求和，使他成为南宋投降主义的代表。

一、高宗的逃跑主义思想

大敌当前，高宗表面上倡议抗金，而内心里却选择了逃跑。建炎元年五月，南宋朝廷初建，金人汹涌南侵，高宗面前只有二条道路选择，或是积极组织军事力量，抵御金人，或是向南逃窜。当时朝廷主战派李纲、宗泽要求募兵买马，请求高宗在开封抵抗金军。主和派中书侍郎黄潜善与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则力劝高宗逃向江南。高宗当时表示要留在中原，为表示此决心，他把主和误国的靖康大臣（如李柷、宇文虚中、郑望之等）都贬斥至广南诸州。高宗不止一次对大臣们

¹ 李克武：《败求和，胜亦求和——宋高宗屈膝求和心理分析》，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² 任仲书：《试论南宋初年高宗对金退避妥协的原因》，载《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³ 杨峰：《南宋初年宋金“和”“战”新论》，载《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4期。

表明其抗金的决心。如建炎元年五月刚刚即位时，他说“朕欲身先士卒，北首赴难”，¹后来又对李纲表示“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训练将士，益聚兵马。虽都城可临，虽金人可战。”²。如果听高宗这些话语，说他是投降派太冤枉了他。

但是大敌当前，高宗坐卧不安，害怕靖康之变的厄运重演。一些大臣出于恢复故土的愿望，提议他建都建康或坐镇汴京，都被高宗回绝。张浚劝高宗“权都建康，渐图恢复”，但高宗否定了这个建议。中丞许景衡又上奏：“南阳无险阻，且密迩盗贼，漕运不继，不若建康天险可据，请定计巡幸。”³奏请高宗建都建康。高宗看到他的提议，非常生气，罢许景衡为资政殿大学士。在开封宗泽依靠义军抵制了金军进攻，欲渡河北伐，他不断上书力劝高宗回汴京坐镇，以号令抗金，一年内上《乞回銮疏》达二十几次，但高宗置若罔闻，根本没有重回开封的打算。

在这期间高宗一直与黄潜善、汪伯彦等人谋划南逃之计。建炎元年七月，高宗下诏：“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⁴建炎元年九月，黄潜善、汪伯彦共政，金兵再次南侵，这时高宗再也没有表现出抗金复仇的勇气与决心，而是没等金军袭来，就准备南逃了。他担心逃跑时被大臣们反对，就下令“有敢妄议惑众沮巡幸者，许告而罪之，不告者斩”⁵，这条诏令把高宗急切的逃跑主义思想毫无掩饰的真实表露出来，也说明高宗先前表现的英勇精神，纯属做个姿态给人们看看罢了。

面对金军的入侵，高宗“无复经制两河之意”⁶，犹如惊弓之鸟，十月初从南京（今商丘）出发，逃至扬州。高宗到扬州后，没有积极组织军队，以防御金人南进，而是经常在行宫里纵情享受，胡作非为。建炎三年二月，金人兵至扬州。高宗极度恐惧，仓皇渡江逃至镇江。金人攻下扬州后，焚城而去。高宗又由镇江逃到苏州、杭州。建炎三年十二月高宗听说金军渡江，由越州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在得知金军进军临安时，他干脆坐船逃往定海县（浙江镇海），继而渡海至昌国（浙江定海）。建炎四年（1130年）正月，金军攻占明州，高宗从昌国南

¹ 《三朝北盟会编》卷 102，建炎元年五月二日，第 1567 页。

² 《三朝北盟会编》卷 109，建炎元年七月十四日，第 1692 页。

³ 《宋史》卷 363《许宗衡传》，11342 页。

⁴ 《宋史》卷 24，《高宗一》，第 447 页。

⁵ 《宋史》卷 24，《高宗一》，第 449 页。

⁶ 《要录》卷 9，建炎元年九月壬辰，第 213 页。

逃至台州（今临海）海边。金军破定海、昌国，乘船追击 300 余里，要活捉高宗，因海上风大，退回明州。直到三月，高宗才由海道沿原路返回明州，又至越州，结束了长达四个多月的海上逃亡生活。在逃跑的路上，高宗时常饥不择食，与路人相先后，可谓狼狈之极。

从建炎元年八月李纲罢相至金人十二月兵分三路大规模南侵，有四个多月的时间，如果高宗在这四个月里，组织力量，加强战备，积极防御，不论是否能够战胜金军，起码会延缓金军南下的进程，而不会现金军一日得数城，或“金人自黄州渡江，凡三日，无知之者。”¹高宗的逃跑主义思想与行动，动摇了南宋军心，皇帝还在拚命奔逃，南宋军队的许多将士更是在金兵来临之际，弃城而逃，以致“帅守之弃城者，习以成风”²。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前三十卷的建炎年间纪事中，弃城遁跑者满目皆是。

高宗逃跑主义思想贯穿始终。建炎年间，南宋军事力量弱小，社会一片混乱，高宗恐怕自己被金人俘虏，选择了逃跑。逃至扬州后，没有采取任何有利的措施，组织力量进行积极防御，直到金兵又至，仍然选择了逃跑。甚至到了绍兴年间，金兵还离他千里，他又要逃跑。绍兴三十一年，金完颜亮大举南侵，高宗在敌我力量平衡的情况下，仍不积极组织抵抗，甚至要“散百官，浮海避敌”³，后来由于一些大臣的坚决反对，才决定抵抗。

宋高宗面对金兵的咄咄进逼，贪生怕死，束手无策，置国家和民族利益而不顾，没有抵抗敌人的意志和决心，而是退避妥协，其逃跑主义的思想彰显无遗。

二、 宋为金臣国的思想

从北宋政权的败亡开始，宋高宗一直认为宋、金是两个不平等的政权。金政权高高在上，不但掌握着赵氏皇室的命运，也掌握着南宋政权的命运。建炎年间，高宗在南方逃窜的路途中，不仅一次表示：“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以远涉，而后为快哉！”⁴可是，金统治者对他的苦苦哀鸣根本置之不理。建炎三年十一月，在金兵的追捕中，高宗下诏曰：“谓父兄在远，而兵民未抚，不欲身陷于锋敌。故包羞忍耻，为退避之谋。”对金国“卑

¹ 《宋史》卷 369《刘光世传》，第 11481 页。

² 《要录》卷 15，建炎二年四月丙寅，第 311 页。

³ 《要录》卷 193，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乙巳，第 3243 页。

⁴ 《要录》卷 26，建炎三年八月丁卯，第 524 页。

辞厚礼，遣使相望，以至愿去尊称，甘自贬黜，请用正朔，比于藩臣。”¹如果说这时因为迫于金人的强悍凶猛，国内秩序的混乱，军队战斗力的损耗，高宗被迫尊金国为上，那么在宋金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宋金不平等的思想仍然继续，并且宋方根本不愿意随着力量的增强，而改变宋金不平等的地位，就蕴含着投降主义的思想了。

绍兴二年（1132年）正月，高宗将朝廷迁至临安，南宋政权在江南基本上稳定下来。这时宋金战场上已经扭转了宋军败多胜少的局面。南宋军事力量逐渐上升，而金的力量逐渐下降。绍兴五年（1135年）金、伪齐联合攻宋的失败，充分暴露了金军的力量下降。金将韩常曾评论：“今昔事异，昔我（金）强彼弱，今我弱彼强，所幸南人未知此间事耳。”²

尽管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南宋的变化，宋高宗却视而不见，在他的思想中，金人的强大是南宋军队不可战胜的，金的地位要远远高于宋之上。因为金从来没有承认过南宋政权的合法性，执行的战略目标就是灭亡南宋，所以在高宗思想深处，希望金能够承认南宋的合法性，放弃攻打南宋的计划，为此，即使南宋世代臣服于金，也是可以接受的。要使金承认南宋，就必须与金进行谈判。绍兴八年，金熙宗采纳了挾懒的主张，将刘豫废罢，把伪齐统治区划给南宋，以不战而使南宋臣服。十二月，金派使臣入境，要求宋高宗跪接金国诏书。对于这种屈辱的仪式，朝野震惊，纷纷反对。高宗居然说：“士大夫但为身谋，向使在明州时，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³大臣们提醒高宗“今日事势与明州时不同。”高宗对此答非所问，说这件事秦桧也是此意。求和心切的宋高宗迫不及待的认同了宋为金臣国的地位。在高宗投降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宋金在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宋正式成为金国的属国。

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宗弼又举兵南下，在长江北岸驻兵，以造成兵临城下之势，又致书南宋政府，宋高宗向金帝所进的誓表中，卑躬屈膝地说：“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因为宋高宗心甘情愿做金的臣国，金朝在册封高宗的册文中，称道：“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

¹ 《要录》卷 29，建炎三年十一月丁卯，第 576 页。

² （金）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卷 27《韩常》，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391 页。

³ 《要录》卷 124，绍兴八年十二月戊寅，2024 页。

为屏翰。”¹

高宗心中宋金不平等的思想，使他没有看到宋金双方力量的变化，不断向金求和，造成了宋金力量均衡的情况下，宋对金称臣纳贡的后果，出卖了南宋的国家与民族利益，这种思想也构成了其投降主义思想重要部分。

三、 屈已求和的投降主义思想

从靖康二年(1127年)至绍兴六年(1136年)的10年间，高宗派遣使臣向金朝乞降数十次。建炎元年十一月高宗派王伦使金求和，王伦被扣；建炎二年五月，他又派洪皓向金宗翰求和，同年十一月派魏行可在澶州向金求和，表示宋愿意奉表称臣，愿用金正朔。一次次的乞和，都被金拒绝了，这时金国的主要战略目标就是消灭北宋的残余势力。

为了消灭南宋政权，建炎三年五月，金兵分路渡河南下，高宗从扬州逃往杭州途中，又一次派洪皓为使向金宗翰求和，被金扣留。七月，又派崔纵前去求和，还未到达金营，金兵已经渡江。八月高宗再派杜时亮、宋汝为出使求和，且致书金朝元帅宗翰，书中极为可怜地写道：“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此所以惴惴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²高宗的求和，似乎透露出无奈，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其实至高宗即位到建炎三年，虽国弱财匮，但从金军南侵的进度来看，进进退退，宋还是有喘息之机的。如果在这期间，宋政府能够做一些实际的防御措施，也可以起到加强宋军实力，牵制金兵南下的作用。特别是这期间有一些大臣提出请高宗加强战备，以抵御金人，高宗却对这些建议或置之不理，或迁怒于上书人。如胡舜陟在高宗即位初就曾上疏：“今日措划中原，宜法艺祖命郭进、李汉超、董遵诲等守边之术，……择人为节帅，使各以地产之赋，养兵自卫，且援邻镇。”结果胡舜陟被罢去，“议遂格”。³宗泽多次要求宋廷依靠义军，大举北伐，高宗不予理会，宗泽忧愤成疾，临终前高呼“过河”，但仍然没有感动高宗。在宋弱金强的局势下，高宗只想着亡命逃窜与苦苦哀求，根本没有想到加强战备，尽可能地维护国家利益与捍卫民族尊严。

绍兴二年，高宗将朝廷迁至临安，南宋政权在江南基本上稳定下来。宋金

¹《金史》卷77《宗弼》，第1756页。

²《要录》卷26，建炎三年八月丁卯，第534页。

³《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壬辰，第119-120页。

战场上，互有胜负，南宋的军事力量迅速加强，收复了部分失地，宋金军事力量渐趋平衡。金统治者意识到在短时期内不可能灭亡南宋，从绍兴四年(1134年)开始至绍兴七年(1137)改单纯军事进攻为“以和议佐攻战”¹的诱策。

宋高宗始终没有认清宋金形势的发展变化，他的悲观恐金思想促使他在绍兴年间过高的估计了金人的力量，而对南宋的实力估计不足。宋高宗最希望得到的结果是宋金议和，南北分治，自己稳居帝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仍然遵循建炎年间的思想，不顾一切地向金乞怜哀求。绍兴四年（1134年）九月，宋朝派遣魏良臣、王绘使金时，宋高宗曾说：“卿等此行，切不须与金人计较言语，卑辞厚礼，朕且不惮，如岁币岁贡之类不须较。”²在高宗的意识中，只要金同意与宋议和，不论金臣说多么侮辱国格的话，都不要计较；宋以多少金银为代价，都在所不惜，真是让人可气可叹！绍兴和议前，高宗在同秦桧的一次谈话中，进一步阐释了他的投降主义思想，他说：“敌人议和，熟思所以应之，若彼我之势强弱相等，如是而和者，彼有休兵之意。我强彼弱，足以制其命，如是而和者，彼有惧我之意也”。³这是宋高宗一种非常特殊的心理，不论宋与金力量对比如何，都要与金讲和。双方力量相当，只要讲和，就可能得到持久的和平，这恐怕只能是宋高宗的一厢情愿。

宋高宗为了确保其帝位的稳固、不顾人格、国格向金屈膝求和。绍兴八年十二月，金使张通古到临安，称南宋为“江南”，称金国主写给高宗的收信为“诏谕”，并要求高宗跪拜接受金国主的书信。金朝的苛刻要求遭到宋朝野舆论的强烈反对，如韩世忠多次上疏反对议和，高宗赐给他的手札说到：“十余年间，兵民不得休息，早夜念之，何以为心！所宜，第屈己和戎，以图所欲，赖卿同心其克有济。卿其保护来使，无致疏虞”。⁴高宗乃降旨曰：“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宫未还，母后在远，陵寝宫阙，久稽洒扫，兄弟宗族，未得会聚，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欲屈己就和。”⁵高宗要“屈己讲和”，这种“讲和”说的可谓冠冕堂皇，为了百姓免于战火，为了尽孝而迎回父亲的棺灵，不管自己多么委屈，

¹（金）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卷7，《太宗文烈皇帝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6页。

²《要录》卷80，绍兴四年十月戊寅，第1311页。

³《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月庚午，第2280页。

⁴《要录》卷123，绍兴八年十一月辛丑，第1991页。

⁵《要录》卷123，绍兴八年十一月辛丑，第1989页。

也要达到求和目的。后来迫于压力，高宗以为父亲守丧为名，由秦桧代行接受诏书的跪拜礼。高宗对金的苛刻要求不是毫无办法，当宋金力量均衡的时候，可以战佐和议，可以在与金和谈中，有所予，有所不予，而不是把金的所有要求，不加条件的全部答应。

高宗承袭了一贯的投降主义思想，忽视了宋军实际力量的增长，同意给予金每年以岁贡，并让秦桧代他行跪拜礼，不但有损于民族的尊严，而且加大了人民的负担，放弃了国家的实际利益。王夫之曾经评论此事：“高宗之畏女真也，窶身而不耻，屈膝而无惭，真不可谓有生之气矣。”¹

不能否认，高宗也曾说过要与金进行斗争的话，但是这些语句却很难在实际行动中实现。如绍兴十年(1140年)，金军大举入侵，宋军英勇反击，取得了顺昌、郾城等役的重大胜利，在这种情况下，高宗对右正言陈渊说：“今日之和，不惟不可偏执，自当以战为主”。但此话刚刚说完，就迫令张俊、岳飞等撤军，金兵则乘机进军淮南，形成大军压境之势。这时投降主义思想又使宋高宗彻底求和，以割地、纳贡、称臣的屈辱条件，与金朝订立了绍兴和议。

绍兴和议并没有给南宋带来长期的和平，金仍然时常践踏和议，在边境进行武装挑衅，而宋高宗不但没有对这种野蛮行径进行抗议或反对，却为平息事端，一次次地放弃国家利益，如绍兴十六年二月辛丑，金提出索地的要，而南宋则“割金州丰阳县、洋州乾佑县畀金人”等。

宋高宗的投降主义不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使用的一种斗争策略，而是畏惧恐金的投降主义思想的作祟。当宋弱金强之时，可怜求和；当形势有利于宋时，仍然屈辱投降，并为了投降，不顾一切，这种思想使人悲愤，就连为帝王树碑立传的《宋史》，在高宗本纪的最后，也不免感慨道：“帝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谗，悲夫！”²

四、 高宗投降主义思想的形成

首先，高宗个人懦弱恐金的心理，是其投降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北宋灭亡，皇室人员几乎被女真人一网打尽，给本来就具有懦弱性格的高宗心理上抹下了浓厚阴影。高宗靖康元年在女真军营作人质时，亲身感受到他们的强悍勇

¹ 王夫之：《宋论》卷10，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5页。

² 《宋史》卷32《高宗九》，第612页。

猛、凶暴异常的气势。女真军队南侵时，他们攻掠南宋城池，残忍屠杀无辜百姓，非常野蛮与血腥。建炎年间，高宗又被女真军队长期追杀，几次差点被俘，更是加剧了高宗对金人的恐惧，他由懦弱到恐惧，再到心理上充斥着失败主义的悲观情绪。他害怕抗金失败，南宋王朝步北宋的后尘，自己成为金人的“阶下囚”。以宋高宗为首的投降派对金软弱怯懦，专意求和，但当妥协求和被金拒绝时，也能暂时组织宋军对金兵进行抵抗，因此文献记载中留下了高宗一些加强战备的诏谕，但这些诏谕是在金人拒绝宋的求和时，没有其他道路可走时才被动为之。随着宋金战事的发展，当金人愿意接受宋的求和时，软弱的高宗就不再提加强战备，与金战斗的事情了。这时投降主义思想就会起到主导作用。

其次，高宗担心金朝放钦宗回朝，威胁他的皇位。这是高宗奉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封建的宗法继承制下，只有嫡长子才有继承皇位的权利。排行第九的高宗本来没有资格登基即位，徽、钦二帝“北狩”，他才有了这一机会。如果高宗在战争中取得胜利，金人可能放归两帝，这时高宗势必处于两难境地，会严重威胁到高宗的皇权。因此，钦宗回归，成为高宗心理上的“软肋”，也是他心中之大忌。以李纲为首的抗战派上书言事总是以迎回二帝为口号，违背了高宗心愿，因此很快被罢职。金人很好的利用了高宗的这一“软肋”，当南宋取得抗金战争的阶段性胜利时，金人就放出舆论，要放还钦宗，给高宗施加压力。高宗以称臣赔款割地等屈辱条件讨好金朝，签订绍兴和议，获得金人的正式册封，彻底阻止了钦宗南归。

再次，南初军事力量薄弱，社会秩序混乱，财政匮乏，不能有效全面抵抗金军。南宋政权建立时，对外要应付南侵的金兵，对内要平定流寇叛将的骚扰和各地爆发的农民起义。宋政府所掌握的军队已经被女真铁骑摧残殆尽，军队不仅数量少、不集中、又没有统一领导，且“军政久废，士气怯惰。”¹朝廷统御失策，将领各怀异志，军队没有战斗力，军中不战即降、临阵脱逃者，不可胜数。在宋弱金强的情况下，高宗感觉无反手之力，悲观地选择了投降主义。

最后，投降派对高宗投降思想的迎合，对高宗的投降主义心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高宗的投降主义得不到近臣的支持与执行，高宗的投降主义思想就会倍感压力，高宗在多数时间里选择主和派来领导朝廷的运转，先是有黄潜善、

¹ 《宋史》卷 358《李纲上》，第 11257 页。

汪伯彦得宠于高宗，排斥主战派，他们不以国家大局、民族利益为重，而是把聚集家财、请功邀赏、高官厚禄作为奋斗的最高目标。他们不作战守之备，隐匿军情不报，迎合退避之策，力主高宗南迁。后是秦桧为相十八载，他他深知高宗的懦弱恐金，为得到高宗的信赖，劝说高宗必须坚定讲和的决心，在求和中不惜一切代价，秦桧对高宗的劝导，坚定了高宗屈已求和的意志。

高宗的投降主义思想，是多个“合力”形成的。既有他个人的懦弱恐金，又有国家实力的不济；既有巩固皇权的要求，又有个人享乐的因素，这种“合力”使高宗置国家利益而不顾，用投降主义主导南宋初期国家外交的路线。在宋金力量均衡的绍兴年间，高宗也没有抓住机会，没有保持军事与外交的同步协调发展，而是基本沿袭了徽宗、钦宗的投降主义。高宗不惜代价、屈已求和、对金称臣，其“怀苟安自全之心，无雪耻复仇之志”¹的投降主义，被后人不耻。

第二节 秦桧“屈已救国”“绝意求和”的投降主义外交思想

秦桧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他倡和误国，滥杀忠良，千百年来遭到世人唾弃。南宋时期官方对秦桧的评价几经变化，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宋高宗为褒其主和之功，题其神道碑额曰：“决策元功，精忠全德”。²追封为申王，赠谥为“忠献”。半个世纪后，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因为“秦桧首倡和议，使父兄百世之仇不复开于臣子之口”，³于是削夺秦桧王爵，改谥号为“谬丑”。元朝时修《宋史》，将秦桧列入《奸臣传》。后人对秦桧的评价也大相径庭，痛斥者众多，为其傅粉者有之。如《靖康小雅》评论秦桧“公，儒也，内激忠愤，不顾其身，惟义所在，岂古所谓忠臣耶！”⁴不论对秦桧褒奖者还是贬议者⁵都不能离开秦桧“力

¹（明）陆容：《菽园杂记》卷13，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62页。

²《宋史》卷31《高宗八》，第582页。

³《宋史》卷398《李壁传》，第12107页。

⁴《三朝北盟会编》卷220，引《靖康小雅》，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第3283页。

⁵明代中叶的理学名臣丘浚认为，“南宋再造，桧之力也。”（李贽：《续藏书》卷11《内阁辅臣·丘文庄公》）南宋王明清曾认为宋金“卧鼓灭烽逾二十年，此桧之功不可掩者也。”

（《玉照新志》卷4，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近年大陆，一些学者也以秦桧主和为是，谓能“审时度势”，而以主战为非，谓其“秉持义理。”吴俊：《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两宋和议辩》，载《上海文化》1994年第4期）日本一些史学家也挖掘相关材料，以重构秦桧的生平及其他所实行的政策。如日本衣川强先生《秦桧的议和政策》，载《东方学报》45（1973年9月），第245-249页；寺地尊《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台湾

主和议”的思想，多数评价者分析了这种思想带来的后果，而忽视了对思想本身的剖析，梳理秦桧的对金外交思想，将对南宋外交思想有更深入的了解。

秦桧生于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卒于绍兴25年（1155年），字会之，江苏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秦桧登进士第，历任太学学正、职方员外郎、御史中丞等职。在金人南下之初，他曾主张抗金，反对割地求和。金军攻占东京后，欲立张邦昌为帝，秦桧进议状，主张另立宋朝宗室为帝，反对成立张邦昌伪楚政权，遂被金军驱掳北上。建炎四年（1130年）十月，秦桧南归，并得到宋高宗赵构信任，官至宰相，成为赵构朝廷中乞和派的代表人物，绍兴二年（1132年）八月在与吕颐浩的权力斗争中失利，罢相，乃为观文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重新拜相，力主和议，代表宋高宗向金使跪接诏书。绍兴十年（1140年），金朝都元帅完颜宗弼领兵南侵，次年，宋高宗与秦桧解除岳飞、韩世忠等大将的军权，诬构谋反罪状，杀害岳飞，与金朝签订了屈辱的绍兴和议，宋向金称臣、纳贡、割地。

一、秦桧“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思想

金人未破东京前，秦桧一直主张抗金，反对割地求和。靖康之难后，身为御史中丞的秦桧坚决反对立张邦昌为帝，金人将其北掳直至建炎四年（1130年）十一月秦桧才得以南归，入见高宗，提出了“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议讲和。”¹不久，秦桧被任命为吏部尚书，继又升任参知政事。

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秦桧被任为右相兼枢密使，明确主张“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秦桧的主张，与自身作为南方人，而被金人所掳，其最终又回到南方有关，但是他能回到南宋，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例子，且被众多人所质疑。他的“南人归南”，有着打消别人对他的怀疑心理，而“南人归南”对众多南人来讲，实际上只是一句空话，因为，肯不肯让南人南归，其决定权掌握在女真贵族手中，是不由南宋王朝做主的。“北人归北”，女真人在建炎三年（1129年）入侵扬州时就曾号召过，这一次又借秦桧之口提了出来。

由于南宋的军队和将领主要是西北、河北和山东等地人组成的，如果按照秦桧“北人归北”，即以河北人归还金国，中原人送给伪齐刘豫，就等于把北方土地全部奉献给女真贵族，而且大批不愿降金而南下的北方人士，都得回去接受金

稻乡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415页。

¹《要录》卷39，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第734页。

人统治，就等于南宋自毁家园，主动解除武装，表明对金放弃武力抵抗。秦桧提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思想，认为如果北人都自动奔向金国，金人必然大喜，宋金无战事，随后两国相安无事。秦桧甚至认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在几个月内，“可耸动天下”。秦桧的这条投降路线遭到许多大臣反对，高宗对此认为：“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¹在一片反对的声音中，高宗对秦桧也倍感失望，秦桧入相仅一年多，就被罢去相位。

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再次入相，仍推行他的“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思想，绍兴十一年（1141年）和议后，因为宋军的抵抗与金国势力的衰退，南宋与金的关系相对缓和，宋高宗又认为此乃秦桧“南自南，北自北”的功劳。绍兴十七年（1147年）八月，前知郢州赵叔涪言：“陛下即位以来用人多矣，而竟持异议，故投艰弭乱，略无宁岁，自专任一相，坐致太平。望以今日得人之效，宣付史馆。”上可其奏，因顾左仆射秦桧曰：“此卿之功也。朕记卿初自敌中归，尝对朕言：‘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遂首建和议。’朕心固已判然而梗于众论，久而方决。今南北罢兵六年矣，天下无事，果如卿言。”桧顿首谢曰：“和议之谐，断自宸衷，臣奉行而已，何功之有？”²南宋以退让换取了金的暂时息兵，但“南自南，北自北”的思想使宋弃边纳地，削弱了南宋边备。宋孝宗时太学博士叶适上奏曰：“秦桧遂行其南自南，北自北之论，汤思退从而效之。撤守弃地开，门纳敌，几危于隆兴之初。王之望、尹穉翁然附和，更为务实，黜虚破坏，朋党趋赴事功之说，相承至今，况守已撤矣，地已弃矣，和亲成矣，尚何实之可务？何事功之可赴哉！虽然此犹小人之论耳。”³“南自南，北自北”的思想虽使宋金之间暂时表现出缓和的局面，实际上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对宋后世的边防守备留下无穷遗患。

二、“屈己讲和”、“欲和甚坚”的投降主义思想

从建炎元年（1127年）高宗即位到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再次入相，历时十一年，高宗基本奉行了吕颐浩的策略，吕颐浩认为“敌性贪婪，吞噬不已，若不用兵，则二圣必不得还，中原必不可复，伪齐资粮必不可焚，和议之计必不可谐，大江之南必不可保，宜间遣使臣，再贻书以骄之，复示弱以给之，而我急

¹ 《宋史》卷473《秦桧传》，第13751页。

² （宋）熊克：《中兴小记》卷33，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³ （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96《经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43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72页。

为备，出其不意，乘时北伐”。¹这些策略为南宋的发展赢得了机会。南宋朝廷养练士卒，形成了一支可与金人抗衡的军事力量；安集流民，恢复生产，使财政权大为好转；这些策略立足于守与战，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绍兴三年(1133年)至绍兴六年(1136年)，金军与伪齐军队二度南侵，遭到了韩世忠、岳飞的激烈反击，大败而归。金开始对南宋实行“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²的策略。这时南宋的军事力量正在逐步加强，主战派在朝中还占有一定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南宋才保住相当于北宋时期三分之二的版图。

南宋政府与金朝一边谈判，一边防守的局面很快发生了变化。绍兴五年(1135年)金内部统治者粘罕死，挾懒得势。绍兴八年(1138年)，赵构又起用秦桧为相，秦桧再次入相，推行投降主义的思想路线。“始，朝廷虽数遣使，但且守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自桧始。”³绍兴八年春正月戊寅，高宗心事重重的给秦桧说：“先帝梓宫果有还期，虽待三二年尚庶几，惟是太后春秋已高，朕晓夜思念，欲早相见，所以不惮屈己，冀和议之成者为此也。”秦桧回答道：“陛下不惮屈己讲和，此人君之孝也，群臣见人主卑屈，怀不愤之心，此人臣之忠也。君臣用心两得之矣。”高宗说：“虽然有备无患，纵使和议已成，亦不可弛兵备。”赵鼎说：“假使金人与我河南地，亦须严备。”⁴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高宗与秦桧所提到与金的“讲和”，不是一种平等的和谈，双方利益互让的“讲和”，而是要委屈自己，放弃个人的身份，放弃国家利益的“讲和”，这种“讲和”非常不体面，而高宗与秦桧却把它涂上了“孝”与“忠”的光彩。

从宋金力量发展看，当时形势有利于南宋，这时候放弃既得利益，势必会遭到群臣的反对，秦桧也料到了这一点，因此提出了“求和”不能摇摆不定，必须坚持立场，绝不动摇。高宗让群臣议论讲和的事情，部分大世认为不可讲和，秦桧为赵构增强求和信心，对高宗说：“臣僚畏首畏尾，多持两端，此不足与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专与臣议，勿许群臣预。”高宗表示认同，他说：“朕独委卿。”秦桧为了进一步认高宗确定，他说：“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高宗欲和的决心非常坚定，秦桧仍然怕今后留下后患，他说：“臣恐别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又三日，

¹ 《要录》卷 87，绍兴三年五月壬寅，第 1450-1451 页。

² (金)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七《太宗文烈皇帝五》，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12 页。

³ 《宋史》卷 473《秦桧传》，第 13749 页。

⁴ (宋)熊克：《中兴小记》卷 24，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2 页。

秦桧知道高宗确实求和意志坚定，就提出“乃出文字乞决和议，勿许群臣预。”

¹ 赵构同意了秦桧独揽与金求和的大权，并相继罢去不同意求和的刘大中参知政事和赵鼎的相位，从此朝廷一切重大举措，都取决于秦桧，其他官僚几乎不可能参与。

朝中大臣们听到求和的议论，仍是群情激动，纷纷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如下：

首先是因为当时形势有利于南宋，他们认为讲和只是金的缓兵之计。金朝“内讧外叛，互相猜贰，拥兵角立，莫敢先动”，²其军队“老弱尽行，人心乖离”，³势力渐弱，一旦军事力量有所恢复，必将再图南侵。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韩世忠反对议和，他认为：“窃详金人，与本朝结怨至深，又金人事力炽盛，敌情窥伺，已踰十年，朝夕谋画，意在吞并。”金人遣使讲和，是一个阴谋而已。“今国家避地东南，目前军势，敌尚堤防，虽谋吞并，未敢轻易深入，故用此谋。”⁴

监察御史张戒认为金人同意归还宋河南、陕西地，可能别有用心，宋人不能上当，他上书认为“兵强而后战可胜，战胜而后中原可复、梓宫可还，渊圣可归。”⁵张戒认为不劳力而坐享成功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因此希望南宋大臣会见金派来的使节时，要大义正色，严兵以待，不要委曲自身去接受金使的书词之慢。

第二，一些大臣反对宋高宗向金人称臣。权吏部侍郎魏矼言：“如屈膝受令，则大不可从者也。”魏矼又提出称臣所带来的问题“倘或轻从之，屈膝受令，他时反为所制，号令废置，将出其手，一有不从，便生兵隙，予夺在彼，失信在我，非计之得也。虽使还我空地，如之何而可保？虽欲寝兵，如之何而可寝？虽欲息民，如之何而可息？”⁶

司勋员外郎朱松、馆职胡珵、张扩、凌景夏、常明、范如圭同上一疏言：“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边备，以竭我国力，以懈缓我不共戴天之仇，以绝望我中国讴吟思汉之赤子，以诏谕江南为名，要陛下

¹ 《宋史》卷 473《秦桧传》，第 13753 页。

² 《要录》卷 121，绍兴八年七月丁亥，第 1953 页。

³ 《要录》卷 120，绍兴八年六月戊辰，第 1939 页。

⁴ 《要录》卷 123，绍兴八年十一月甲午，第 1987 页。

⁵ 《要录》卷 120，绍兴八年六月辛未，第 1941 页。

⁶ 《要录》卷 123，绍兴八年十一月壬寅，第 1993-1994 页。

以稽首之礼。自公卿大夫至六军万姓，莫不扼腕愤怒，岂肯听陛下北面为仇敌之臣哉。”¹他们认为在宋金力量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如果向金人称臣，将会使金人不断提出新要求，一旦这些要求不能实现，就会发生新的事端。

第三，一些大臣提出南宋要接受过去与金人议和与刘积当儿皇帝的教训。左宣议郎王之道认为：自靖康以后，国家就因议和而失策，结果以致徽、钦二帝被俘，“百姓堕于涂炭，造今十有四年”²如今“尚不觉悟”，再与金人议和，那无异是“引贼入家”³。当时反对议和的大臣众多，赵鼎、张浚、王庶，岳飞、李纲等都曾经上书，提出反对议和的心声。

秦桧对于这些对金议和持反对态度的大臣，提出了要以诚待敌的思想。金使乌陵思谋等人要求议和时，高宗、秦桧特派权吏部侍郎魏矼当“馆伴使”，但魏矼常论和议之非，今难以专对，所以坚决拒绝当“馆伴使”。秦桧把他召至都堂，责问他为什么反对议和？他认为敌人不可信。秦桧对他说：“公以智料敌，桧以诚待敌”。当时魏矼毫不客气地反驳秦桧说：“相公固以诚待敌，第恐敌人不以诚待相公耳”。³在这里秦桧谈金人为“敌”，敌可以在任何的时间对宋发动进攻，可以随时对宋劫杀无故，敌人如果有诚，也不谓之为“敌”了。秦桧的“以诚待敌”的思想，即要信任金人答应还南宋失地的允诺，同时，对于金人所提要求，也要诚心诚意的考虑，其实是对金俯首贴耳，任凭宰割的投降主义思想。

秦桧决意议和，以是否赞同“和议”作为人事迁升与打击的标准。秦桧先后提升孙近、王次翁、范同、魏良臣、钱周材等人，与他们结党营私，共同卖国。秦桧为扫除和议障碍，费尽心机，不遗余力，对一些不同意议和的人进行了打击。如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愿斩桧与王伦以谢天下”，在朝野引起很震动，高宗一时不知所措，秦桧以辞职相要挟，胡铨受到秦桧的打击，由秦桧亲自拟定，把他贬往“昭州（今广西平乐县）编管”。秦桧还觉得对胡铨的处分太轻，未必能使反对“讲和”的人从此钳口不言，遂又胁迫赵构特地下了一道诏令，说胡铨的上疏是“肆为凶悖，初投甌而未出己，誉槁而四传，导倡陵犯之风，阴怀劫持之计，儆诚心于体国，但合输忠，惟尊意于取名，”⁴戒谕中外，不许效尤。

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不顾众多大臣反对议和，开始与金和谈，金使张

¹ 《宋史》卷 473《秦桧传》，第 13754 页。

² 《要录》卷 119，绍兴八年五月辛亥，第 1931 页。

³ 《要录》119，绍兴八年五月辛亥，第 1931 页。

⁴ 《要录》卷 124，绍兴八年十二月丙辰，第 2009 页。

通古到临安，称南宋为“江南”，称金国主写给赵构的书信为“诏谕”，并要求赵构跪拜接受金国主的书信，秦桧居然“欲上行屈己之礼”，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业，岂可受金人封册。”¹但因为秦桧的决意投降之说，使高宗同意秦桧代行接受诏书的跪拜礼。这次宋金议和（绍兴初议）的主要内容是，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宋金两国以黄河为界，金将刘豫管辖的河南、陕西之地交还宋朝。宋向金称臣，岁贡银 25 万两、绢 25 万匹金，送还徽宗梓棺以及亲族。从此，秦桧在朝廷中的身价提高了，宋金战和的权力几乎全部由他左右。

三、为贯彻投降主义思想扫清障碍

宋金第一个和约签订不到一年，金统治集团内部就发生了政变，对南宋主张诱降讲和策略的挾懒被杀，完颜宗弼（兀术）上台。从绍兴十年（1140 年）起，金撕毁和约，以宗弼当统帅，挥军直取河南，陕西。金军的这次南侵，证实第一次绍兴议和之始，大臣们认为议和为金缓兵之计的担心；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秦桧不惜屈己讲和，以诚待敌思想的失败。可是，秦桧并没有接受这一教训，反而有意削弱宋军力，以图再次议和。

金人背盟，宗弼兴兵南侵，宋军奋起抗击，东起两淮，西至川陕，全线取得胜利。正在这关键时刻，岳飞却接到了班师的命令。岳飞对此非常不解，他上奏：“金人锐气沮丧，尽弃辎重，疾走渡河，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²桧深知岳飞抗金意志不可夺，就先撤张俊、杨沂中的军队，然后说岳飞孤军不可久留，严令迅速退兵。岳飞愤慨惋惜地说：“十年之力，废于一旦！”³忍痛下令退兵。以赵构、秦桧为代表的南宋投降派胜利之时要求班师，主在因为金国也不断在战争失利时派密使威胁高宗要“送还汝兄”，并不断暗示囚在五国城的宋钦宗与岳飞有秘密来往，令高宗疑窦丛生，甚至到了“寝食不思”地步。他们既担心抗金战争会激起女真贵族的不满，也忧虑岳家军的迅速壮大，会威胁他们的统治地位，因此，胜利在望之际，迫令岳飞撤退，主动放弃河南陕西之地，以图能够与金人再次和议。

秦桧唯恐重要将领难于驾驭，就想方设法收回他们的兵权，以扫除他投降活动的障碍。绍兴十一年（1141 年）四月，高宗与秦桧召三大将韩世忠、张俊、岳

¹ 《要录》卷 124，绍兴八年十二月戊辰，第 2015 页。

² 《宋史》卷 365《岳飞传》，第 11391 页。

³ 《宋史》卷 365《岳飞传》，第 11391 页。

飞入朝，“论功行赏”，三将到达临安，韩世忠、张俊被任命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明升官职，实解兵权。

宗弼得知秦桧解除三大将兵权的消息后，乘机一再对南宋进行军事威胁。他告知赵构，金各路大军水陆并进，南下问罪，如肯顺降，须以淮水为界。绍兴十一年(1141年)九、十月间，秦桧又兴起岳飞之狱。他派谏官万俟卨收集伪证，组织狱词，罗织罪名。秦桧又串通张俊，收买、勾结岳家军重要将领张宪部将王贵、王俊等人，秉承秦桧意旨，诬告张宪欲据襄阳为变，以谋恢复岳飞兵权。张宪遂被捕入狱，岳飞，岳云父子也送大理寺，使军无统帅，士无战心，不但和议的阻力排除了，而且沿边兵力虚弱，造成了非和不可的局面。“自秦桧当国，阴与金人相结，沿边不宿重兵”，并且少量的兵力还“皆习于骄惰，不堪战攻。”¹十一月金提出“划淮为界，岁币银绢各二十五万，割唐、邓二州”为议和条件，因军中无将，在和议中宋只能被动的接受金的所有提议，宋金订立了和议，这就是宋金第二个和约，史称“绍兴和议”。这次和约与绍兴八年的和约，宋又进一步的退让，丢失了黄河以南、淮水以北的大片领土。

宋金达成和议，南宋虽然保持了一个封建王国所具有的独立性，如皇帝的地位、独立的政治、经济与军事，但不可否认和议使国家利益再次遭受到巨大的损失，秦桧投降主义思想的后果，使宋的国家领土再次受损。朱熹曾指出：“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虎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²

四、秦桧投降主义思想的形成

秦桧在靖康之变前后，作为主战派的代表，其口碑很好，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盛誉。靖康元年，金人攻汴京，遣使求三镇时，当时同意割地的有以范宗尹为首的70人，而反对派则只有以秦桧为首的36人。桧上兵机言四事：“一言金人要请无厌，乞止许燕山一路；二言金人狙诈，守御不可缓；三乞集百官详议，择其当者载之誓书；四乞馆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门及引上殿。”³靖康之变时，京城破，金欲立张邦昌，在金人的威逼下，宋朝百官议立张邦昌为帝，“执政以下

¹ (宋)袁燮：《絜斋集》卷4《论备边札子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5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2页。

²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75《戊午谏议序》，四部丛刊初编集部，商务印书馆1937年缩印明刊本第7册，1385页。

³ 《宋史》卷473《秦桧传》，第13747页。

无敢有异议，唯会之抗疏以为不可。”¹秦桧认为“张邦昌在上皇时，附会权幸，共为蠹国之政。社稷倾危，生民涂炭，固非一人所致，亦邦昌为之也。天下方疾之如仇讎，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杰必共起而诛之，终不足为大金屏翰。必立邦昌，则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桧不顾斧钺之诛，言两朝之利害，愿复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万世利也。”²因此事件，金人俘秦桧一家北上，秦桧建炎四年（1130年）南归后，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成为宋对金求和的代表。

对于秦桧的这种变化，目前有几种看法，一是秦桧归宋是作为奸细被金放回，邓广铭先生有“女真贵族阴遣汉奸秦桧归南宋”³之说、王曾瑜先生认为“判断秦桧是奸细，大致是没有冤枉他的”，但同时认为“既然传世的史料不可能提供秦桧是奸细的过硬证据，就留下了人们讨论这个问题的空间”。⁴如果秦桧是奸细，那么他义无反顾的投降思想，就可以非常容易的去理解了。也有一些学者反对秦桧是奸细的说法。何忠礼、何兆泉等通过对现存史料的客观分析，具体考察当时的宋金局势和朝野舆论，认为秦桧逃归可能更符合历史事实，否认了秦桧是金的奸细之说。⁵这二种相反的观点，使秦桧是否为金的奸细无法确定。如果秦桧属于第二种情况，即从金人那里逃脱归宋，那么他为什么一反前态，摒弃了以前忠贞不屈的思想，代之以屈己求和的投降主义呢？

首先，秦桧亲身经历了北宋之灭亡，在其关押其间，亲眼目睹了女真兵马野蛮残酷、横行无忌的凶悍，这一切给他的思想带来了影响，他认识到单凭宋之力量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打败金国。南归后，当秦桧看到南宋小朝廷偏居江南，不思北进，便转变了自己的观点，放弃抗金主张，决定“屈己救国”，以“和议”代抗金，高宗认为：“两国和议秦桧中间主之甚坚，卿等皆预有力，今日尤协心一意，修兵息民，确守勿变，以为宗社无穷之庆，”⁶为南宋争得时间，以保全赵氏之政权。

其二，高宗虽屈身“江南一隅”，仍是具有赵氏皇室血统的继承者，作为人

¹（宋）朱熹：《朱子语类》卷10《学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1页。

²《宋史》卷473《秦桧传》，第13748页。

³邓广铭：《岳飞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0页。

⁴王曾瑜：《关于秦桧归宋的讨论》，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王曾瑜在《岳飞与南宋前期军事政治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也同样提到了这一问题。

⁵何忠礼、何兆泉：《关于秦桧归宋问题的再讨论》，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⁶《要录》卷170，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乙未，第2794页。

臣的秦桧有着忠君的思想,也同时有着利己思想,以忠君而巩固个人地位的思想。秦桧的忠君与岳飞的忠君固然有着很大的区别,秦桧的忠君是迎合高宗,对于高宗的投降思想,予以逢迎与发展。如前所述,宋高宗本人一向惧怕金朝,在金人在海上追击他时,宋高宗就非常明确的向金人表示彻底的臣服,自此后始终把议和视为救命稻草。南归后的秦桧,经过观察发现高宗对“议和”有着紧迫心理,如果追随高宗的观点,将得到高宗的信任,保全他的地位。秦桧在这种复杂思想的指导下,由忠君发展为对金议和投降。

其三,不可否认,秦桧力主和议,其中也有着“保全东南”的思想。秦桧认为:“行奉东朝之养五兵,不试永居北极之尊。益坚邻国之欢盟,深思社稷之大计,谨国是之摇动,杜邪党之窥觐。”¹表明自己坚信对金议和是当时的“国情”下保全国家的唯一出路。他认为战争需要大量积累,需要暂息兵戈,与民生息,当时连年战争对宋的损失很大,精疲力竭的宋急需休整。虽然议和确实能够达到这一目的,但从秦桧生前的言行与思想来看,秦桧任相后,对于金人不正义战争的遣责之词消失了,连以前认为“金人狙诈”也变成了要“以诚待敌”,当宋金战争局势对宋有利时,仍要屈己和谈,说明了秦桧放弃防御,决意求和的投降思想,这种思想是不能用为了“保全东南”一语而掩之。

秦桧从绍兴八年(1138年)二次入相,全面执掌了南宋朝廷的权柄,到绍兴五年(1155年)在权势巅峰中死去,历时十余年,其“南自南,北自北”,屈己求和,一意投降的思想,对南宋后期有着重要影响。秦桧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一方面促使两次绍兴和约的订立,南宋政府被迫对敌贡奉重金,国家处于任强敌宰割的状态。另一方面秦桧的专意求和,即可保全东南,使政权延续的思想,助长了南宋后期投降派的阵营扩大,成为南宋后期投降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

第三节 贾似道的投降主义外交思想

13世纪上半叶蒙古从北方草原兴起,向金朝发动了进攻,一度向金朝称臣纳贡的南宋接受了蒙古联合灭金的请求,联蒙灭金,金亡后,唇亡齿寒,南宋与充满扩张掠夺性的蒙古为邻,贾似道就这个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时期,成为南宋朝廷的权相,独揽朝纲,掌握了南宋的政治、经济、外交大权长达十八年之久,

¹《三朝北盟会编》卷220,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第3228页。

他的腐败无能于外交中欺诈、投降思想，使南宋王朝处于灭亡的边缘。

贾似道生于嘉定八年（1213年），卒于德祐元年（1275年），字师宪，台州人。嘉熙二年（1238年）登进士第，因其姐为宋理宗贵妃，得擢太常丞。后又升知澧州。自淳祐元年（1241年）始，贾似道先后担任过湖广总领、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抚使、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等职，宝祐四年（1256年）升任参知政事，次年又任“知枢密院事”，再改任“两淮宣抚大使”。成为代表朝廷统率两淮各路抗蒙军队的最高长官。

贾似道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有何忠礼《南宋政治史》¹第六章理宗朝的政治和对外关系中，论述了宋、蒙议和与钓鱼城之战的胜利；贾似道登台和鄂州之战。粟吕孝《南宋军事史》²第四章南宋与蒙古（元朝）的战争中，分析了蒙古攻宋战略的调整，论述了元朝大举攻宋与南宋全面崩溃，勾画了贾似道为政时的政治、军事背景。

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兵分三路大举攻宋，朝廷大震。理宗令似道率军援鄂，即军中拜为右丞相，后又以右丞相兼枢密使被召入朝，从此权倾一时。景定五年（1264年），理宗驾崩，在贾似道的一手扶持下度宗继位，咸淳三年（1267年），他又进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度宗对他每朝必答拜，称之曰“师臣”而不名，“朝臣皆称为“周公”。³贾似道位高权重，其对内争斗、敛财之能力很强，而对外却胆怯、短视，想以欺骗之手段，获取外交的胜利，却败在蒙军的铁骑之外。“理宗之立，归德弥远，群邪辐辏，善类日消，不顾唇齿之谋，窃取复仇之美；驯至度宗，权归似道，欺君败国，卒至覆亡。”⁴贾似道的外交思想，成为南宋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对外不战乞和的思想

开庆元年（1259年）春，蒙哥弟忽必烈率领军队攻打鄂州（今湖北武昌），理宗皇帝急忙命令贾似道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分，屯兵汉阳以增援鄂州，后又移防黄州，十月，鄂州城下的蒙古兵猛烈进攻，一度攻破东南面城墙，涌入城内，城内宋兵拼死抵御，几经血战将蒙军逐出，鄂州城内的宋军“死伤者至万

¹ 何忠礼：《南宋政治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² 粟吕孝：《南宋军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³ 《宋史》卷474《贾似道传》，第13783页。

⁴ [元]揭傒斯：《揭傒斯全集》，《文集》卷3《吴清宁文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三千人。”¹不久，形势有了转机，自云南北上的兀良台部被宋军阻于潭州（湖南长沙市），不能与忽必烈顺利会师，而鄂州城中的宋将张胜、高达奋勇拒敌，宋将吕文德从重庆顺流而下，东援鄂州，与此同时，贾似道统一指挥的援鄂大军出四方云集，向鄂州进发，“两淮之兵尽集白鹭（江苏南京市西南），江西之兵尽集隆兴（江西南昌市），岭广之兵尽集长沙，闽、越沿海巨舶大舰以次而至，伺隙而进。”²忽必烈的谋士郝经不无忧虑地指出，如果宋兵“遏截于江、黄津渡，邀遮于大城关口，塞汉东之石门，限郢、复之湖泆，则我将安归？”³何况忽必烈自出师以来，千里奔波，戎马倥偬，士兵中染疾，战斗力下降，忽必烈也对此深感忧虑。这年闰十一月，忽必烈采取声东击西手法，声言直攻临安。这时鄂州城外，聚集了宋之大军数十万，形势对宋极其有利。贾似道听到忽必烈要直趋临安的消息，惊惧不已，带领的援鄂大军，还没有与蒙军交战，因恐惧蒙军的力量，就产生了与蒙军不战而和的思想。他先派宋京与蒙军接洽，遭到忽必烈的拒绝。不久贾似道得到蒙哥死亡的消息，并且蒙古军也因此人心浮动，贾似道仍然坚持着不战乞和的思想，认为这时是又一乞和的良机，又再次派人前去求和。忽必烈由于急于返回漠北争夺汗位，派江淮荆湖宣抚使赵壁为使，至鄂州城中与宋将谈判。谈判时宋将宋京提出：“北兵若旋师，愿以江为界，且岁奉银、绢疋两各二十万。”⁴这个条件，应该是贾似道给宋京的谈判条件，也表现出贾似道不战乞和的强烈愿望。蒙方同意，但双方对议和没有形成最后的正式文书，遂成为后来两国外交中的遗留问题。

贾似道秘密议和，使忽必烈的军队撤退，但贾似道认为如果议和被朝廷知道了，就丢失了个人体面。为保住个人地位，贾似道一方面隐藏议和事实真相，另一方面在忽必烈撤退时，“用刘整计，攻断浮桥，杀殿兵百七十。”⁵急于北撤的蒙古人不想扩大事态，因而没有还击，就此，贾似道编织了谎言，向朝廷报喜不报忧，隐瞒了自己奴颜婢膝地向忽必烈求和，答应纳贡赔款之事，而是他带领军队，英勇奋战，打退了蒙军，挽救了国家。

贾似道在有利形势下，因对战争的恐惧，坐失良机，不战乞和，使国家利

¹ 《宋史》卷474《贾似道传》，第13781页。

² 《元史》卷157《郝经传》，第3706页。

³ 《元史》卷157《郝经传》，第3706页。

⁴ 《元史》卷158《赵壁传》，第3748页。

⁵ 《宋史》卷474《贾似道传》，第13781页。

益受损。元人认为“守将贾似道，駮遽请和，属宪庙升遐，王师言还。”¹贾似道隐瞒和议内容，大言不惭地谎报诸路大捷，昏庸的理宗皇帝对谎话信以为真，下诏重奖励了他，并进封他为“少师”、“卫国公”，被皇上视作“股肱之臣”。贾似道又指使门客撰写了《福华编》，为自己根本不存在的“援鄂之功”歌功颂德。贾似道的这种“丰功伟绩”，为以后元大举南侵埋下了祸根。

二、外交中的期瞒思想

在贾似道的思想中，不论对内还是对外，都有着期诈思想。他与蒙方外交，有着瞒天过海、能骗则骗的思想与行动，被蒙方识破并挥舞起“大棒”时，贾似道的思想就会立刻转为投降主义。

忽必烈返回漠北后取得汗位，景定元年（1260年）七月他派遣郝经向宋廷索取“岁奉银、绢各二十万”，贾似道怕郝经到达临安，会泄漏“鄂州大捷”的假象，暗地指使把郝经扣留在真州（江苏仪征）。忽必烈几次派使对拘留郝经向宋问责，景定二年（1261年）五月，元世祖忽必烈派崔明道、李合义为使臣，赴宋访问国信使郝经等所在，并以稽留信使、侵扰疆场责问宋朝。景定四年（1263年）二月忽必烈又派王德素为国信使、刘公谅为副使赴宋，“致书宋主，诘其稽留郝经之故。”²贾似道自知理屈，不肯回答，对蒙古是否再次南侵，抱着侥幸的心理，运用期诈、拖延战术，想把真实情况，无限期搁置，但是这种方法显然不可能得逞。

景定四年（1263年）七月，忽必烈即以此为借口，下诏侵宋。诏书如下：

“宋人不务远图，伺我小隙，反启边衅，东剽西掠，曾无宁日。朕今春还宫，诸大臣皆以举兵南伐为请。朕重以两国生灵之故，犹待信使还归，庶有悛心，以成和议，留而不至者，今又有半载矣。往来之礼遽绝，侵扰之暴不已。彼尝以衣冠礼乐之国自居，理应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见。今遣王道贞往渝。卿等当整尔士卒，砺尔戈矛，矫尔弓矢，约会诸将，秋高马肥，水陆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³

忽必烈的诏书，说明了等到时机成熟，一定会出兵伐宋，但贾似道却对此置

¹（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5《国信使郝文忠公传》，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95页。

²《元史》卷5《世祖本纪二》，第91页。

³《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第72页。

若罔闻，在今后的几年里，依然如故，不做防御的准备。

忽必烈虽下诏书，但当时西征北伐，暂时无力南侵，使南宋朝廷获得了几年的喘息时间。郝经被拘十余年，在漫长岁月里，郝经先后给理宗和贾似道等写了十余封信，倾诉弭兵息民之诚意，抗议宋朝不该如此对待使臣，但是贾似道均置之不理。贾似道公然在外交中采取欺骗手段，却对后果不做思量，认为拖延时间，就能解决问题。贾似道拖延的结果不但没有把求和之事一笔勾销，而是让忽必烈大怒，数年后，大举南伐，坚决不接受纳贡议和，直接以占领南宋全部疆土为目的，贾似道在外交中的欺骗与短视给南宋带来了灭顶之灾。

三、拒绝救亡的投降主义思想

南宋赢得了虚构的“鄂州大捷”之后，以理宗皇帝和贾似道为首整个统治阶层全然不顾忽必烈对宋的觊觎之心，很快过起莺歌燕舞的日子。执掌权柄的贾似道不顾国家之安危，荒废边事，为个人之权力，排斥异己，残害抗战将领。如大将曹世雄、向士璧军中英勇善战，却因一些小事情，得罪了贾似道，贾似道以打算法，核诸兵费之名，称世雄、士璧皆坐侵盗官钱，把他们贬向偏远地州县，致使他们最后含冤死去。贾似道认为将领王坚不服从他的命令，解除了他的兵权，以至于王坚郁闷而死。

置国家利益不顾，排斥异己。咸淳五年（1269年）襄阳被围，襄阳守军为贾似道所依重的吕文焕（吕文德之弟），一些大臣认为高达可以援助襄阳，但贾似道担心高达会削弱驻守襄阳的吕文焕的权力，不用高达。贾似道不顾国家之安危，大敌当前，考虑的不是如何对外团结一致，英勇抗敌，而是自己恩仇与利益得失。

贾似道排挤抗战将领，削弱了南宋军队的战斗力，一些将领因不满贾似道的飞扬跋扈，投降蒙军。如大将刘整等，刘整原是金人，金末投奔宋朝，在抗蒙斗争中屡立战功，被人嫉妒，被贾似道排斥，以泸州等十五州郡降了蒙古。投金的宋将使蒙军获取了宋的重要军事情报，为蒙军出谋划策，为蒙军轻易战胜南宋军队提供了条件。

襄阳失陷之后，陈仲微上书批评贾似道说：“失襄之罪，君相当分受其责。误国者回护耻败的局势而不敢议，当国者昧于安危之机而不后悔。只有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还可为。”结果贾似道非常恼怒，贬走了陈仲微。襄阳失陷，社稷

危在旦夕，然而昏庸懦弱的宋室皇帝仍然一味重用贾似道，贾似道也不思悔悟，拒绝一切救亡建策，南宋的灭亡不可避免了。

四、畏惧元军，害怕战斗的思想

两国交战，双方军队对峙，开战在即，胜负难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方将领却在战前，就产生了投降逃跑的思想，那么双方不战就已经决定了胜负。在宋元丁家洲战役中，双方还没有交战，贾世道的心中就产生了对元军的畏惧。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元军自襄阳东下，势如破竹。贾似道亲自督师，率精兵13万、战船2500艘，浩浩荡荡开赴前线。调兵遣将，声势浩大，应该是为战而做准备，但是贾似道并不想与元进行任何战斗。他一到安庆鲁港，与大将夏贵部会合，夏贵一见贾似道，便从袖中抽出一张字条，上写“宋历三百二十年”，似道俯首而已。¹贾似道与重臣对于南宋的灭亡已经预知，因此在战前就害怕与元军的交战，出现了不战而逃的思想。

大敌当前，贾似道依然延缓他的“不战即和”的策略，所以当他带领军队到达芜湖之后，还未与元军正式交战，便迫不及待地与元军议和，给元军主帅伯颜送去荔枝、柑橘以讲和约，被伯颜拒绝，并继续将元军开进至安庆和池州一带，池州知州望风而逃，城降。

贾似道求和不成，只好退而被动应战，因为有了不战就逃的思想，这一场战争刚开始，就以宋的失败而告终。贾似道把七万精兵交给孙虎臣统领布于丁家洲，让夏贵领战船2500艘陈列江面，自己则领军停泊在鲁港（安徽芜湖南）。虽然从战船、武器装备与人数上说，宋军处于优势地位，但是宋人心涣散，宋军与元兵还没有相遇，贾似道与主将孙虎臣、夏贵已经被元的气势吓倒。战争一开始，元军炮声震百里，宋军震动，元军俘掠宋战舰后，大呼：“宋人败矣！”“似道仓皇失措，遽鸣金收军，军溃。”²贾似道与夏贵带领的军队，没有与元军正式交手，就不败而逃。

宋元在丁家州相遇，南宋几乎是不战而溃，元军英勇奋战，军容甚盛，而“似道闻鼓声先遁，其师遂溃，获都督府符印，斩虏无算。”³南宋军队除了被杀的，落水溺亡者不计其数，武器战备几乎全部拱手送给元军。经此一战，南宋水、陆

¹ 《宋史》卷474《贾似道传》，第13785页。

² 《元史》卷159《伯颜传》，第3105页。

³ （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2《丞相淮安忠武王》，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8页。

军主力损失殆尽。丁家州之战溃不成军，将帅不战而逃，可以看出南宋军事腐败，“夏贵之于汉口，贾似道之于鲁港，皆以数十万之众，不战自溃，于是卖降效用者非民也，皆宋之将也；先驱倒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¹

贾似道作为丁家州决战的最高统帅，成为众矢之的，群臣激愤，许多人要求诛杀似道，但谢太后念“似道勤劳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礼。”止罢平章、都督，予祠官。²当时有大臣认为处罚太轻，请求斩贾似道以正法，还罗列了他“饶、讦、贪、淫、褊、骄、吝、专、忍、谬”十大罪状，在诈与谬两项罪中，历数了贾似道在外交中的错误。在“诈”之罪中，痛斥贾似道“朝三暮四，粗公诈术，欺天罔人，终不容伪，窃闻庚甲之入相也，实尝于鄂为城下之盟，许以岁币，欺给理祖。”在“谬”之罪中，痛责贾似道“畏而退，退而溃，假息淮海，失其督印，岂非初意本谋，技止此耶。似道专制国用，岂无素储，首倡毁家之议，尽衰举国金银。”³贾似道虽被从轻发落，但其人实为众人所唾弃，德祐元年（1275年）八月，贾似道被贬行至漳州，被监押使郑虎臣杀死，以平民愤。

贾似道的不战即和，不战即逃，有南宋末年国力虚弱的原因，更有其自身的原因。贾似道是一个追求个人享乐，不学无术、道德品质卑劣之人。贾似道每日不勤朝政，“日坐葛岭，取旧宫人及娼尼，淫戏无昼夜。”他“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所狎客抚其背曰：‘此平章军国重事耶？’尝作半闲亭，以停云水道人。”当时有“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⁴之说。

这样不思进取，不学无术之人，却被昏庸的皇帝委以重任，实为当时内政外交之隐患，谢太后曾经下诏痛斥贾似道：“先帝幼冲居简，军国惟所专制，其害乃至于毒民误国，使吾与嗣君坐受其祸兴，言及此，痛悔何追，似道明正其罪。”⁵谢太后知似道之罪，但太晚矣！贾似道之政，使南宋岌岌可危，其用谎言虚报的大捷，用拖延扣留的郝经，用欺诈掩盖的和议，不战乞和的投降主义思想，无何如何也无法抵挡了元军的铁骑，宋朝三百二十年，终亡于似道之政也！

¹ 《文献通考》卷154《兵考六》，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十通”本，第1348页。

² 《宋史》卷474《贾似道传》，第13786页。

³ （元）方回：《桐江集》卷3，影印《宛委别藏》丛书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35页。

⁴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5《佞倖盘荒》，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7页。

⁵ （宋）卢宪：《嘉定镇江志》，《附录》，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586页。

结 论

宋代外交思想一方面继承了汉唐以来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外交思想，另一方面在 10-13 东亚政治格局的风云变幻中，宋代外交思想也复杂多变。宋代外交思想中有坚决维护国家利益，主动出击、以夷制夷的现实主义思想，但也存在着背弃国家根本利益，妥协屈服的投降主义。在国家危难之时，现实主义思想与投降主义思想在斗争中发展，可惜的是最后往往是投降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宋代外交屡遭失败，究其根源，最高统治者外交思想的失误难辞其咎。

一、宋前期执行的外交思想影响着宋中、后期的外交轨迹，导致了以后宋外交的被动地位。

宋建国初期，形成了“守内虚外”、消极防御的思想，澶渊之盟后又产生了“以金帛换和平”的思想，宋代的外交思想多数时期趋于保守。虽然宋神宗时期有着“无惧于夷狄”、“包制四夷”的现实主义思想，但这种思想很快在宋对外战争的失利后而销声匿迹。此后，保守主义的因循守旧、闭关自守、消极防御、不思进取，直接导致了宋中后期军备废弛、外部环境不断恶化等诸多问题。当北宋末年，金兵大举入侵时，主张坚决抵抗、积极防御的现实主义思想很快被淹没在妥协退让的投降主义思潮中。

二、宋代和平外交思想，一方面使宋王朝成为维护东亚政治格局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也成为对外妥协的一个幌子。宋统治者在遇到外来入侵时，时常打着“和平”的旗号，把放弃国家利益、投降妥协罩上了一件“体面”的外衣。

宋代外交思想“以和为贵”、“以德抚远”，希望在大国关系与朝贡体系中建构一个外部和平的环境，“四夷顺而中国宁”，“厚往薄来”，宋王朝追求的外交目标是对外具有政治、经济及其文化的影响力，不用武力对外征服与扩张。虽然和平外交的思想可以使宋成为东亚政治格局中维护稳定与和平的重要力量，但是和平不是依靠行德或退让能够获得，宋统治者时常打着“和平”的幌子，对外来侵袭，妥协退让，特别是对战争畏缩、恐惧，不敢用武力去解决争端。宋王朝对战争的畏惧，并不能避免战争的到来。当东亚政治格局的新兴国家——金、蒙古力量壮大后，军事力量薄弱的宋王朝就成了他们入侵的对象。宋朝廷对外来侵略

者的哀书、降表等，充分暴露了其和平外交的另一面。

三、以“王道”处理外交问题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弱点。

宋代统治者外交思想中以传统儒家思想为核心，注重道德感化，希望通过行“王道”，达到其外交目标。传统儒家学说以仁政服人，行德利天下，德化及远等。仁义是“交邻国之道”，能够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儒家的仁义观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之上，相信人性善良，战争给人们带来无穷灾难，善良的人性都不愿陷入战争。以“仁”、“德”、“礼”、“信”、“义”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文化转化为外交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性恶的一面，忽视了利益对人性的影响，把儒家文化推之以外交领域，一方面可能会得到异族政权的尊重，双方友好往来，和平相处；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到，在与其他政权进行交往的过程中，这些政权最终关心的不一定是交往的方式或者文化，而是非理性的功利性原则与永恒的现实利益，当争取现实利益的愿望强烈时，儒家思想中的“仁”、“德”、“义”等在外交中会显得苍白无力。外交思想中的软弱与妥协，不是“示德”与人，不但得不到对方“以己推人”的理解与回报，而会被对方认为是软弱可欺，会刺激对方的欲望，因此不会得到对方的对等与尊重，相反而是轻视与怠慢。

四、宋代外交受到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过于内敛，有着明显的“冲击—反应”模式。

保守主义希望保持现状，固守传统。但宋朝廷外部环境一直在变化，对这些变化，宋廷一般不会主动改变其外交政策，而是静观变化，直到受到外来的冲击后，才有所反映。宋朝廷与其他国家发生矛盾冲突时，一般都是对方提出矛盾的解决方案，而中原王朝只是被动的接受。这种内敛式的外交思想，必然也使外交产生被动。因此，在外交中，必须打破这种被动模式，对任何一个可能有关自我发展的问题，都应该作出主动的积极反应。

五、宋代投降主义外交思想的产生、发展与宋统治者有着直接的关系。

外来的入侵摧毁了北宋与南宋的政权，在国家存亡的关头，两宋朝廷内部又都是投降主义思想占主流。宋统治者的软弱无能，丧失民族的气节是投降主义思想在朝廷内部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弱国是否有外交，决定这个问题的重要因素是统治者的外交思想与外交政策。历史上不乏弱国经过艰苦奋斗，而打败强国的例子。封建的皇位继承制，使两宋末期的最高统治者昏庸无能，不求进取，在

外来的打击下，束手无策、贪生怕死、为求生存，而可悲的选择了投降主义。投降主义最后的结局就是政权在外来的武力之下瓦解，统治者个人受尽欺凌而性命不保。投降主义终将被后人不耻。

参考文献

一、古籍

1. (春秋)左丘明:《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 (春秋)左丘明:《左传》,岳麓书社2006年版。
3.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
4.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5. (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96年版。
6. (宋)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
7.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97年版。
8.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
9.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0.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徐规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版。
11.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2. (宋)王明清:《挥麈后录》,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3. (宋)王明清:《挥麈余话》,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4. (宋)王明清:《挥麈三录》,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5.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6. (宋)王德臣:《麈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7. (宋)赵汝适:《诸番志》,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18. (宋)李纲:《李纲全集》,岳麓书社2004年版。
19. (宋)庄绰:《鸡肋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
20. (宋)叶适:《叶适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
21. (宋)叶适:《习学记言》,中华书局1977年版。
22. (宋)宗泽:《宗忠简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3. (宋)朱熹:《朱子文集》,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年版。
24.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
2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87年版。
26. (宋)熊克:《中兴小纪》,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7. (宋)陈准:《北风扬沙录》,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28. (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碗琐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9. (宋) 范成大:《吴郡志》,《宋元方志丛刊》第一册,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30. (宋) 陈骥等:《南宋馆阁录》,中华书局 1998 年版。
31. (宋)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32. (宋) 朱弁:《曲洧旧闻》,中华书局 2008 年版。
33. (宋) 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
34. (宋) 张端义:《贵耳集》,中洲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35. (宋) 岳珂:《愧郗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6 年版。
36. (宋) 王十朋:《王十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37. (宋) 陈渊:《默堂先生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8. (宋) 苏辙:《栾城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4 年版。
39. (宋) 王称:《东都事略》,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40. (宋) 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41. (宋) 苏轼:《龙川略志》卷 6,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35 页。
42. (宋) 苏轼:《龙川别志》,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43. (宋) 石介:《徂徕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44. (宋) 陈均:《九朝编年备要》,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45. (宋) 叶隆礼:《契丹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46. (宋) 佚名:《靖康要录》,宋史资料萃编第一辑,文海出版社 1967 年版。
47. (宋) 丁特起:《靖康纪闻》,《全宋笔记》第四编第四册,大象出版社 2003 年版。
48. (宋) 费衎:《梁溪漫志》,三秦出版社 2004 年版。
49. (宋) 欧阳修:《归田录》,中华书局 2006 年。
50. (宋) 王栐《燕翼诒谋录》,中华书局 2007 年版。
51. (宋) 刘敞:《公是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52. (宋) 佚名:李之亮点校本,《宋史全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53. (金)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崔文印校证,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54. (金) 佚名:《大金吊伐录校补》,金少英校补,中华书局 2001 年版。
55. (宋) 洪皓:《松漠纪闻》,阳羨生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56. (宋)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57. (宋) 范成大:《吴郡志》,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58. (宋)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中华书局 2005 年版。
59. (宋) 邵伯温:《邵氏闻见后录》, 中华书局 2005 年版。
60. (宋)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 中华书局 2005 年版。
61. (宋) 周密:《齐东野语》, 中华书局 2005 年版。
62. (宋) 李廌:《师友谈记》, 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63. (宋) 范镇:《东斋记事》, 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64. (宋)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 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65. (宋) 蔡攸:《铁围山丛谈》, 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66. (宋) 朱彧:《萍洲可谈》,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67. (宋) 张师正:《杨文公谈苑》,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68. (宋) 刘祁:《归潜志》卷, 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69. (宋) 李攸:《宋朝事实》卷,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
70. (宋) 叶隆礼:《契丹国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71. (宋) 王铨:《默记》, 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72. (宋)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 北京图书出版社 2004 年版。
73. (宋) 王安石:《王安石全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74. (宋) 陈亮:《陈亮集》, 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75. (宋) 张方平:《张方平集》,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76. (宋)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77. (宋)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78. (宋) 韩琦:《安阳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79. (宋) 秦观:《淮海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80. (宋) 范祖禹:《范太史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81. (宋) 庞元英:《文昌杂录》,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82. (宋) 叶适:《水心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83. (宋) 魏了翁:《鹤山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84. (宋) 张世南:《游宦纪闻》,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85. (宋) 吕中:《宋大事讲义》,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86. (宋) 周密:《志雅堂杂钞》,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87. (宋) 周密:《癸辛杂识》, 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88. (宋) 范祖禹:《范太史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89. (宋) 钱若水《宋太宗实录》,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90. (宋) 王应麟:《玉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91. (宋) 周辉:《清波杂志》, 中华书局 1994 年版。
92. (宋) 欧阳修:《文忠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93. (宋) 朱熹:《朱子语类》, 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94. (宋) 程颐、程颢:《二程文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95. (宋) 程颐、程颢:《二程粹言》,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96. (宋) 程颐、程颢:《二程外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97. (宋) 程颐、程颢:《二程遗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98. (宋) 丁度、曾公亮:《武经总要》,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99. (宋) 方勺:《泊宅编》, 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100. (宋) 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101. (宋) 吕祖谦:《宋文鉴》,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02. (宋) 李觏:《李觏集》,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103. (宋) 宗泽:《宗忠简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04. (宋) 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 年版。
105. (宋) 魏泰:《东轩笔录》, 中华书局 1983 年。
106. (宋) 佚名:《韩魏公家传》, 巴蜀书社 2000 年版。
107. (宋) 窦仪:《宋刑统》, 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108. (宋) 曾敏行:《独醒杂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109. (宋) 熊克:《中兴小记》,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110. (宋) 袁燮:《絜斋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11. (宋) 卢宪:《嘉定镇江志》, 宋元方志丛刊本, 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112. (宋) 司马光:《涑水纪闻》, 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113. (宋) 叶梦得:《石林燕语》, 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114. (宋) 曾巩:《隆平集》, 台湾文海出版社 1967 年版。
115. (宋) 文彦博:《潞公文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16. (宋) 司马光:《传家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17. (宋) 司马光:《司马光奏议》,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118. (宋) 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 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119. (宋)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120. (宋) 周去非:《岭外代答》, 中华书局 1999 年版。
121. (宋) 赵彦卫:《去麓漫钞》,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22. (宋) 范镇:《东斋记事》, 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123. (宋) 苏颂:《苏魏公文集》, 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124. (宋) 吴自牧:《梦粱录》, 浙江人民出版 1980 年版。
125. (宋) 未著编者:《宋大诏令集》, 司羲祖整理, 中华书局 2009 年版。
126. (宋) 龚明之:《中吴纪闻》,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127. (宋) 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28. (宋) 吕陶:《净德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29. (宋) 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 四部丛刊本。
130. (元) 脱脱:《宋史》, 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131. (元) 脱脱:《金史》, 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132. (元) 脱脱:《辽史》, 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133. (元) 马端临:《文献通考》, 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134. (元) 揭傒斯:《揭傒斯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135. (元)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 中华书局 1996 年版。
136. (元) 宋无:《唵呖集》, 齐鲁书社 1997 年版。
137. (元) 方回《桐江集》, 影印《宛委别藏》丛书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138. (明) 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39. (明) 陆容:《菽园杂记》卷 13, 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第 162 页。
140. (明)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 5,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141. (明)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 中华书局 1955 年版。
142. (明) 宋濂:《元史》,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143. (清) 徐松:《宋会要辑稿》, 中华书局 1957 年版。

145. (清) 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顾吉辰点校, 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146. (清) 吴广成:《西夏书事》,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47. (清) 梁启超:《王安石传》, 海南出版社 2001 年版。
148. (清) 赵翼:《廿二史札记》, 中华书局 2008 年版。
149. (清)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 商务印书馆 1958 年版。
150. (清) 王夫之:《宋论》, 中华书局 1964 年版。
151. (清) 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52. (清) 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年版。

二、今人著作

1. 谢诒徵:《宋之外交》, 上海大东书局 1935 年版。
2. 严复:《严复集》, 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3. 张云台:《张荫麟文集》,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4. 邓广铭主编:《宋辽西夏金史》,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 年版。
5. 邓广铭:《岳飞传》, 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6.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版。
7. 周宝珠、陈振:《中国历史: 宋史》, 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8. 王曾瑜:《岳飞与南宋前期军事政治研究》,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9. 漆侠:《宋代经济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10.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三联书店 2006 年版。
11. 沈起炜:《宋金战争史略》,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12. 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 台北联经出版 1984 年版。
13. 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14. 朱瑞熙:《辽宋西夏社会生活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15. 何竹淇:《岳飞抗金史略》, 三联书店 1959 年版。
16. 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983 年版。
17. 姚瀛艇:《宋代文化史》,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18. 杨渭生:《两宋文化史研究》,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19.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20.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21. 张孟伦：《宋代兴亡史》，上海书店 1989 年版。
22. 赵永春：《金宋关系史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23. 杨昭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 年版。
24. 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25. 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26. 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27. 张希清：《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28. 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29. 田浩编：《宋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30. 贾海涛：《北宋“儒术治国”政治研究》，齐鲁书社 2006 年版。
31. 金毓黻：《宋辽金史》，商务印书馆 1946 年版。
32. 李昌宪：《司马光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33. 任崇岳：《宋徽宗：北宋家国兴亡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34. 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书店 1963 年版。
35. 陈述：《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36. 张正明：《契丹史略》，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37. 杨树森：《辽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38. 马振铎：《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39. 李之鉴：《王安石哲学思想初论》，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年版。
40. 张宏杰：《北宋变法名相王安石》，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41. 吴晓萍：《宋代外交制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42.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43. 李桂芝：《辽金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于 1996 年版。
44. 李金明、廖大珂：《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45. 陈荣照：《范仲淹研究》，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7 年版。
46. 汤承业：《范仲淹研究》，台北国立编译馆 1977 年版。
47. 颜庭锐：《宋初新政名臣范仲淹》，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48. 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49.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 1979 年版。
50. 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51.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5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53. 何忠礼：《南宋政治史》，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54. 粟吕孝：《南宋军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
55. (日) 西岛定生：《中国古代国家和东亚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3 年版。
56. (日)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57. (日) 堀敏一：《中国与古代东亚细亚：中华的世界与各民族》，岩波书店 1993 年版；《东亚世界的形成——中国与周边国家》，汲古书院 2006 年版。
58. (日) 田村实造：《中国征服王朝的研究》，同朋舍 1985 年版。
59. (日) 菊池英夫：《宋高丽制度史研究》，汲古书院 1992 年版。
60. (日) 西岛定生：《东亚世界与册封体制》，岩波书店 1962 年版。
61. (日) 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全集》，东京筑摩书房 1970 年版。
62. (日) 稻叶一郎：《司马光的政治思想》，法律文化社 1995 年版。
63. (日) 有田颖右：《朱子的国家哲学》，千里山文学论集，関西大学 1983 年版。
64. (日) 松川健二：《宋明的思想》，二松学舍大学人文论丛第 63 期 1999 年版。
65. (日) 金成奎：《宋代的西北问题与民族政策》，汲古书院 2000 年版。
66. (美) 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67. (美) 斯塔夫里阿诺夫：《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68. (古希腊)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
69. (法) 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70. (德) 傅海波等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71. (美) 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72. (美)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

73. (美) 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 年版。
 74. 陈乐民:《西方外交思想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75. 黄金祺:《概说外交》,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
 76. 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77. 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78.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79. 张维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80. 王勇:《中日关系史考》,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版。
 81. 杨考臣:《中日关系史纲》,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
 82. 陈尚胜:《中韩交流三千年》, 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83. 杨通方:《中韩古代关系史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84. 柳卸林:《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85. 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86. 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87. 王福春、张学斌:《西方外交思想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88.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编著:《西方政治思想史原著资料选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89. 韦祖松:《帝国生存环境的诠释: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90. Herbert Franke. *China Among Equal-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the Centur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3.
 91. J.K. Fairbank ed .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92. Wright David. *From War to Diplomatic Parity in Eleventh Century China:Sung' s Foreign Relations with Kitan liao*. Brill Press, 2005.
- ### 三. 论文
1. 彭向前:《辽宋西夏时期西北民族关系研究》, 河北大学 2004 届博士学位论文,

www.cnki.net.

2. 李辉:《宋金交聘制度研究》,复旦大学 2005 届博士学位论文, www.cnki.net.
3. 陶玉坤:《辽宋关系研究》,内蒙古大学 2005 届博士学位论文, www.cnki.net.
4. 曹显征:《辽宋交聘制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 2006 届博士学位论文, www.cnki.net.
5. 杨浣:《辽夏关系史研究》,复旦大学 2006 届博士学位论文, www.cnki.net.
6. 邓昌友:《宋朝与越南关系研究》,暨南大学 2005 届博士学位论文, www.cnki.net.
7. 冒志祥:《论宋朝外交文书》,南京师范大学 2007 届博士学位论文, www.cnki.net.
8. 李胜伟:《试论宋朝与越南李朝的关系》,郑州大学 2000 届硕士学位论文, www.cnki.net.
9. 窦学欣:《辽金元时期北京及周边地区战争的初步研究》,首都师范大学 2005 届硕士学位论文, www.cnki.net.
10. 朱晓乐:《高丽与我国辽金王朝外交关系略论》,中央民族大学 2004 届硕士学位论文, www.cnki.net.
11. 吕洪伟:《金末金宋关系相关问题探讨》,辽宁师范大学,2006 届硕士学位论文, www.cnki.net.
12. 漆侠:《王安石的明妃曲》,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 年春之卷(总第 23 期)。
13. 王曾瑜:《关于秦桧归宋的讨论》,载《历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
14. 王煦华、金永高:《宋辽和战关系的几个问题》,载《文史》1980 年第 9 期。
15. 朱筱新:《评辽在夏宋关系中的作用》,载《宁夏大学学报》,1988 年第 1 期。
16. 任爱君:《辽宋对峙格局破灭的文化意义》,载《北方文物》,1996 年第 3 期。
17. 陶玉坤:《辽宋和盟状态下的政治对抗》,载《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 年第 1 期。
18. 陶玉坤:《辽宋对峙中的使节往还》,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 年第 2 期。
19. 程兆奇:《略论宋代的“恢复”情结》,载《史林》,2001 年第 3 期。
20. 韩昇:《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及其基本原则》,载《学术研究》,2008 年第 8 期。

21. 唐兆梅:《论司马光处理民族关系的主张》,载《中州学刊》,1993年,第3期。
22. 周方高、薛治国《关于司马光民族观的若干思考》,载《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
23. 刘建丽:《北宋御边政策的调整》,载《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24. 刘建丽:《西夏与辽朝关系述论》,载《辽宁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25. 徐红年:《论辽宋战争性质》,载《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26. 李卫东:《欧阳修与北宋边事》,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27. 苗波:《试论辽王朝的外交政策》,载《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
28. 崔岩勤:《试析辽圣宗的对外政策》,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29. 李慧娟:《苏颂与北宋的对外关系》,载《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30. 胡绍华:《论宋朝以大理国为外藩的原因》,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31. 胡绍华:《大理国与宋朝关系新探》,载《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32. 梁利:《从“联丽制辽”到“联金灭辽”》,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33. 何晓芳:《论程朱理学对朝鲜王朝的影响及作用》,载《满族研究》,2001年第2期。
34. 程尼娜:《东亚共同体与日中关系的历史及未来》,载《史学集刊》,2005年第2期。
35. 朱瑞熙:《重新认识宋代的历史地位》,载《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36. 贾玉英:《宋辽交聘制度论略》,载《中州学刊》,2005年第6期。
37. 孙建民,顾宏义:《宋朝高丽交聘考》,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38. 吕英亭:《高丽王朝与辽、宋政治关系之比较》,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6期。

39. 朴今海:《试述中世纪高丽与辽宋之间的关系》,载《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4期。
40. 李云泉:《宋朝高丽观中的战略安全意识》,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41. 安国楼:《王安石的民族思想与民族政策》,载《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42. 王开堂:《李纲政绩述评》,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43. 王丽华:《试论李纲的抗金策略与措施》,载《江汉论坛》,1996年第7期。
44. 肖建新:《宋代临朝听政新论》,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
45. 朱子彦:《宋代垂帘听政制度初探》,载《学术月刊》,2001年第8期。
46. 罗家祥:《元祐之政剖析》,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5期。
47. 杨果:《宋代后妃参政述评》,载《江汉论坛》,1994年第4期。
48. 张邦炜:《两宋无内朝论》,载《河北学刊》,1994年第1期。
49. 李克武:《败求和,胜亦求和——宋高宗屈膝求和心理分析》,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50. 任仲书:《试论南宋初年高宗对金退避妥协的原因》,载《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51. 杨峰:《南宋初年宋金“和”“战”新论》,载《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4期。
52. 何忠礼、何兆泉:《关于秦桧归宋问题的再讨论》,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53. 吴玉亚:《变动社会中的外交模式——从宋廷对高丽使臣接待制度看宋丽关系之流变》,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54. 王晓波:《宋太宗雍熙北伐失败后的对辽策略》,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55. 任仲书,苏红:《辽宋金元时期的民族关系》,载《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56. 赵克:《王安石“使辽”及“使辽诗”考辨》,载《北方论丛》,2001年第2期。

57. 朱筱新:《评辽在夏、宋关系中的作用》,载《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58. 王慧杰:《宋朝遣往辽国的贺岁使节述论》,载《贵州文史丛刊》,2005年第4期。
59. 靳华:《嘉定义和后的宋金关系》,载《北方论丛》,2002年第6期。
60. 张嘉友:《宁宗前期的宋金关系述评》,载《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61. 胡建华:《北宋前期“以夷制夷”政策初探》,《中州学刊》,1988年第1期。
62. 马箫箫:《从岳飞的命运看南宋的军事战略》,载《文教资料》,2008年第3期。

附录 1:

From war to diplomatic parity in eleventh-century China :

Sung's foreign relations with Kitan Liao

David Curtis Wright

Acknowledgements	ix
Abbreviations	xiii
Introduction	1 (6)
Chapter One: Sung-Liao Diplomacy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7 (32)
Chapter Two: The Sung-Liao War of 1004-1005 and the Covenant of Shan-yüan	39 (61)
Chapter Three: Embassies	100 (43)
Chapter Four: Routine Diplomatic Missives	143 (32)
Chapter Five: Embassy Reports	175 (23)
Chapter Six: Mid-Century Crisis	198 (31)
Conclusion	229 (4)
Bibliography	233 (14)
Glossary	247 (28)
Index	275

中文目录：

十一世纪中国由战争到外交平等：宋朝对辽的外交关系

怀特·德维

简介	6
第一章 中外关系中的宋辽外交	7 (共 32 页)
第二章 1004 年的宋辽战争与澶渊和议	39 (共 61 页)
第三章 使臣	100 (共 43 页)
第四章 日常外交文书	143 (共 32 页)
第四章 使臣奏议	175 (共 32 页)
第五章 中世纪的危机	198 (共 31 页)
结论	229 (共 4 页)
参考书目	233 (共 14 页)
专用词汇表	247 (共 28 页)
附录	275

附录 2: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y

Rossabi, Morris

Note on Transliteration

xi

Preface

xiii

Introduction

Morris Rossabi 1

Part I China in Disarray

1 Diplomacy for Survival: Domestic and Foreign Relations of Wu Yueh, 907-978

Edmund H. Worthy, Jr. 17

Part II The Sung Dynasty in a Multi-State System

2 The Rhetoric of a Lesser Empire: Early Sung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s

Wang Gungwu 47

3 Barbarians or Northerners: Northern Sung Images of the Khitans

Tao Jing-Shen 66

Part III Institutions for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Multi-State System

4 Sung Foreign Trade: Its Scope and Organization

Shiba Yoshinobu 89

5 Sung Embassies: Some General Observations

Herbert Franke

116

Part IV Foreign Lands and the Sung

6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Medieval Korea: The Impact of Liao and China on Koryo

Michael C. Rogers 151

7 Tibetan Relations with Sung China and with the Mongols

Luciano Petech 173

8 Old Illusions and New Realities: Sung Foreign Policy, 1217-1234

Charles A. Peterson 204

Part V The Mongol Hegemony

9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Uighurs of Turfan in the 13th Century	
Thomas T. Allsen	243
10 Turks in China under the Mongol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urco-Mongol Relations in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Igor De Rachewiltz	281
Part VI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Historical Context	
11 Yin and Yang in the China-Manchuria-Korea Triangle	
Gari Ledyard	313
Glossa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355
List of Abbreviations	
	373
Bibliography	
	377
Index	
	409

中文目录:

同等国家中的中国：10-14 世纪的中国及邻国

莫里斯·罗沙比（编）

前言	1
第一部分：分裂中的中国	
1 沃斯·爱德玛德：外交的生存：吴越（907-980）的国内及对外关系	17
第二部分：在多边体系中的宋朝	
2 王庚武：小国的辨术：宋朝初期与邻国的关系	47
3 陶晋生：蛮人或北人：北宋人心目中的契丹人	66
第三部分：在多边体系中的外交关系研究	
4 斯波义信：宋代对外贸易：范围与组织区域性	89
5 傅海波：宋代外交使臣	116
第四部分：外国与宋朝	
6 米歇尔·C·罗杰斯：朝鲜中世纪民族的觉醒：辽金对高丽的影响	151
7 L·毕达克：吐蕃与宋、蒙古的关系	173
8 查尔斯·A·彼斯森：旧幻想与新现实：1217-1234 年宋的外交政策	204
第五部分：蒙古的霸权	
9 托马斯·T·爱尔森：13 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	243
10 罗依果：蒙古统治下的突厥人：13-14 世纪突厥与蒙古关系初探	281
第六部分：在历史视域中的中国外交	
11 盖瑞·莱德亚德：中国、满州、朝鲜半岛三地关系中的阴、阳之道	313
中国专业用语词汇表	355
缩略语表	373
参考书目	377
附录	409

附录 3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

作者：叶自成

出版社：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3 年版

上篇 春秋战国时期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

第一章 春秋时期华夏地区国际关系主体的形成	19
一、西周古代国家的初步形成	20
1、大同社会——朦胧中的理想世界	20
2、夏朝与奴隶制国家的出现	21
3、商、周“国家”概念的形成	22
4、周朝的分封制与古代华夏地区的“国际社会”	24
二、“五服”：西周时的中心——外围体系	26
1、“协和万邦”与“中国”中心	26
2、“五服”与中心外围关系有确定	27
三、周朝从政治经济文化中收演变为松散的“联合国”	30
1、“联合国”——从周朝主导的四方民大和会到盟会	30
2、东周王室外的衰弱	33
四、独立主权国家的产生与国际关系主体的出现	34
1、华夏文化的扩散与东周国际关系的形成	34
2、诸侯国成为独立主权国家	37
3、华夏国家体系主体的四种形式和特点	38
五、春秋时期的国家观念和外交观念	43
1、国家主权观	43
2、国家尊严与外交礼仪	46
3、外交手段运用于国家关系	46
4、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崛起	52
5、国家外交机构的建立	56
6、国家疆界的概念	58
7、国家概念的变化与朴素爱国主义的产生	58
第二章 春秋时期的霸权格局与霸权秩序论	63
一、春秋前期的一超多强格局	64
1、第一个霸权国家的出现	64
2、晋国和楚国向霸权国家挑战	69
3、新的霸权和晋国的超级大国地位	69
二、两极霸权对抗时期	74
1、晋楚两霸的对搞格局	74
2、两极格局的破坏和力量的失衡	76
三、吴越争霸与多极化格局的形成	77
1、吴越争霸	77

2、五极体系的出现-----	78
四、霸权国家的特点和主要作用-----	82
1、霸权国家的特点-----	82
2、霸权国家的责任和作用-----	84
五、霸权国家维护霸权体系的主要方式-----	88
1、首先要有雄厚析实力-----	88
2、挟天子令诸侯是霸权国惯用的手法-----	91
3、利用霸权制定游戏规则，建立体系的行为准则-----	91
4、霸权国家两面性和虚伪性-----	92
六、霸权秩序论-----	94
1、礼仪——霸权秩序的核心-----	94
2、等级制——霸权秩序的基础-----	96
3、仁义——霸权秩序的价值观-----	99
七、霸权主导下的盟会与多边外交-----	107
1、盟会是关系各国存亡的大事-----	107
2、盟会的形式及其内容-----	110
3、盟会的意义：背盟与信盟-----	112
4、叔向的结盟理论-----	114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理想主义及其流派-----	117
一、春秋时期外交思想的主流是理想主义-----	118
1、礼仪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	118
2、理想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小国与大国关系-----	123
3、春秋时期和平主义思潮的产生-----	128
二、管子与理想主义霸权学派-----	134
1、管子——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兼具的大政治家-----	134
2、秩序是管子霸权学派的核心-----	136
3、管子的霸术-----	136
4、管子的对外开放与经济外交思想-----	146
三、孔孟和儒家的理想主义仁义学派-----	149
(一) 孔子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	149
1、孔子与外交-----	149
2、信义是孔子外交哲学的基础-----	152
3、和平理想与中庸之道-----	153
4、大一统的外交理想与平等观-----	157
(二)、孟子的外交哲学——仁义观、国际秩序与干涉主义-----	161
1、孟子对孔子外交哲学的继承与发展-----	161
2、仁义是孟子外交哲学的核心观念-----	162
3、仁义是孟子的国际秩序的理想-----	167
4、仁义与孟子的干涉主义-----	168
四、老子庄子的理想主义自然学派-----	173
1、道与自然是老子自然主义外交哲学的基础-----	173
2、庄子对自然主义外交哲学的继承与发展-----	178

下篇：春秋战国时期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

第四章 从理想主义外交到现实主义外交的发展	183
一、春秋时期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初步成果	184
1、军事威慑理论的产生	184
2、均衡理论的出现	185
3、范文子的先内后外思想	187
4、春秋时期的国家利益观	188
二、子产——现实主义外交的先驱	194
1、子产是春秋时期杰出的外交家	194
2、子产的小国善事大国与大国尊重小国思想	198
3、不许大国干涉小国内政	203
三、理想主义外交到现实主义外交的转折点：吴越战争	204
1、伍子胥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	204
2、文种范蠡的现实主义超限制外交学派	207
四、从七国争雄到秦统一中国：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发展的大环境	214
1、战国时期礼仪道德的崩溃	214
2、战国时期周朝沦落为一个小国	216
3、从无序的多极格局到秦统一天下	217
五、战国时期国家观念的进一步发展	220
1、战国时的“天下”与“中国”	220
2、小国与大国的关系：小事大与中立观念	222
3、国家之间的结盟与不结盟	224
4、大国间的不平等关系	226
5、爱国主义观念的发展	228
6、国与民、国与国，“国家”概念的发展	231
第五章 对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追逐与外交形式的发展	235
一、战国时期的利益观	235
1、“国家利益”的概念	235
2、为了利益不顾一切——战国时期人们心态的普遍变化	237
二、战国时的强国运动——改革与变法	247
1、各国的改革运动	242
2、商鞅变法	243
三、人才——追逐权与利的关键	246
1、范雎的用人思想	246
2、蔡泽的人才观	249
3、姚贾的用人思想	252
4、乐毅的人才观	253
5、荀子的人才观	255
四、战国时期的外交形式与外交观念	257
1、孙子的伐交思想	257
2、战国时外交的几个概念	259
3、孙子的谋交理论与苏秦的谋交实践	274
第六章 战国时期的现实主义外交谋略派	283

一、张仪的外交思想和连横战略-----	284
1、张仪其人-----	284
2、综合国力的思想-----	285
3、大国外交谋略在斗争中具有重要意义-----	286
4、重视“中间地带”-----	287
5、利用矛盾，连横破纵-----	288
二、苏秦的外交思想与合纵战略-----	292
1、苏秦其人-----	292
2、提出“外交”概念-----	296
3、为燕制定联赵拒齐抗秦的战略思想-----	297
4、抓住主要矛盾，提出联合抗秦的战略思想-----	299
5、“权籍”与“时势”是制定外交政策的基础-----	304
6、“形同趋利”，“同形利长”，后发制人-----	303
7、“战攻非所先”，谋伐善于用兵-----	305
三、苏代、司马错、范雎等人的外交谋略-----	307
1、苏代的“尊上交，务正利”的思想-----	307
2、司马错的外交思想与实力论-----	309
3、范雎的餐交思想车远交近攻战略-----	312
第七章 荀子的霸道——王道貌岸然论和韩非子的权力——利益学说-----	314
一、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矛盾；荀子的霸道与王道论-----	315
1、秩序论-----	315
2、国家观-----	318
3、王道与霸道论-----	321
4、义利观-----	324
5、天下主义与一天下观-----	326
二、韩非子的权力——利益学说-----	331
1、对仁义观的批判和对法家权力学说的继承-----	331
2、利益是社会内部和国家间政治的动力-----	333
3、法治是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之道-----	336
4、权力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	338
5、韩非子对谋略派的批评-----	341
结束语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	345
一、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与西方的可比性-----	345
二、春秋战国时期理想主义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	346
三、春秋战国时期现实主义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	355
主要参考书目-----	365
后记-----	367

后记

四年前，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再次迈进河南大学。河南大学是我的母校，十五年前我在这里攻读硕士学位，度过了一段难以忘怀的美好时光。河南大学美丽的校园、平易近人的老师、亲密无间的同学都时常让我怀念。时光荏苒，对河南大学的美好回忆，使我选择回到母校攻读博士学位。

掩卷回想自己四年的博士研究生求学之路，倍感这薄薄的百余张纸的份量，因为论文的每一部分都浸透着自己辛勤的汗水，也倾注着太多的关爱和照顾。在这里，我首先诚挚地感谢我的导师苗书梅教授。在我的博士论文写作期间，苗老师在论文的选题、结构的确立、论文撰写和创新点的提炼等方面给予了耐心、细致的指导，她总是在繁忙之中逐字逐句认真地为我修改论文，每次我拿回修改的论文中都密密麻麻布满了她批注的问题，我的论文自始至终都倾注着她的心血。苗老师以严谨的治学风格、渊博的学术造诣、坚忍不拔的毅力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为我树立了终生学习的典范。“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苗老师的教诲与鞭策将激励我在社会科学和教育的道路上努力向上，开拓创新。

感谢张德宗教授、李华瑞教授、李少军教授、孙君键院长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的热心指点和帮助，并给予宝贵的修改意见。非常感谢本文的评审专家与历史文化学院的博士生导师，他们从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对论文进行认真详细的评审与指导，他们的意见将有助于我正确认识论文的不足，使论文能够进一步修改与完善。

感谢同班同学：田冰博士、马福贞博士、陈二峰博士等，他们在本文的研究思路、资料交流以及学习生活方面给予了许多无私的帮助和支持！感谢师妹杨高凡同学在研究和工作方面所给予我的帮助！特别感谢师妹郭艳艳同学为我核对注释、修改论文格式并几次帮助我打印论文。四年来和大家共处的美好时光将令我终生难忘，感谢大家在学习和生活中给我的关心和帮助，并致以衷心的祝福。

我还要感谢我的爱人，当我求学时，他带着刚刚蹒跚走路的孩子，担负家里的众多事务，没有他的帮助、体谅、包容和支持，我很难有大量的时间进行论文写作。他在最艰难的时候给我以勇气和鼓励，让我心平气和，保持乐观生活态度！

张云箏

2010年5月3日